

3
丝绸之路·年度系列

2015.9.28
2015年第39期
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周刊

织与造的传奇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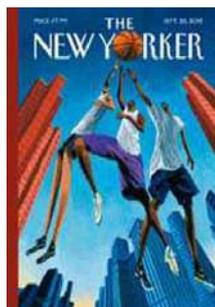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2元



《明镜》2015.9.21

圣母默克尔

在她总理生涯的末期，默克尔把她全部的政治资本都投在了难民问题上。她的欧洲伙伴感受到了背叛，而她的党内同僚则普遍认为，柔软的心肠使得她在这件事情上对现实的判断出了问题。今年涌入德国的难民将会超过80万。从现实利益考虑，默克尔肯定会令德国的利益受损。目前以色列国内也有声音呼吁忽略宗教分歧对难民开放边界，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应该吸取德国的教训。



《纽约客》2015.9.28

珠峰浩劫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珠穆朗玛》的大部分情节发生于珠穆朗玛峰，1996年新西兰人罗勃·霍尔带着一群人努力登顶。他们不是新手，但也不是职业登山家，影片的力量部分就源自这种身份的张力。电影给人的印象不是困难和悲伤，而是珠峰完全的无情。一群人遇到一道裂缝，架上了一只刚好足够长的梯子，队员的鞋钉在横档上打滑。下面就是等着吞没他们的空洞。如果这听上去让人不敢直视的话，告诉你，它还是3D的。



《纽约时报杂志》2015.9.20

有大脑的芭比

自有玩具以来，我们就希望它们能跟我们说话。爱迪生把它发明的留声机商业化的第一个创意就是让玩偶能够说话、唱歌、哭泣。目前能说话的玩偶都只是播放录音。但过去5年间人工智能和语音识别方面的突破使得智能手机、电脑、汽车等有了跟用户对话的能力，听用户说什么然后给出智能的回答。11月将出现一款能交谈的芭比娃娃。成年人并不会以为这种机器是有生命的，这些机器无法通过图灵测试，但是孩子很难分清何者为真、何者为假。



《新闻周刊》2015.9.25

假药泛滥

全球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使用假药。假药泛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假药产业的低风险和高回报；假药产业国际化程度高，流通方式多样；各国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和国际合作。检测和查封假药需要耗费昂贵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成本，只有在发生大规模的假药出现时，执法机构才有可能采取行动。遏制目前假药泛滥的现状，要促使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一方面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要共享检测技术，建立合法药品的全球数据库。



《经济学人》2015.9.19

双面墨西哥

墨西哥拥有拉美最大、最先进的工业基础，出口汽车的数量仅次于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它从美墨边境延伸到墨西哥城的工业走廊，中产阶级正在壮大。该国的政治体系也很稳定。然而墨西哥仍有一半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无序、腐败和利益冲突在警察、法院和政治家中非常盛行。墨西哥的两面性显示，搞对宏观经济政策对成功来说很必要但不充分。城市要能够提供交通、电力、卫生设施和安全，才能实现其经济潜力。

P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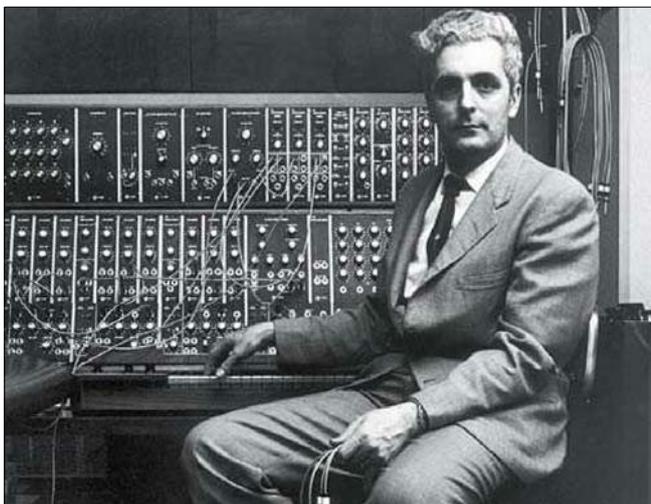
织与造的传奇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 40 东方丝与西洋镜的平行宇宙
- 64 丝路之丝：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
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 72 东西物流中的早期创业者
- 76 物种输入，1500 年的历程
- 84 丝绸之路的植物
- 94 那些来自异域的动物



P114



P126



P130

2015年第39期 总第855期 2015年9月28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社会

- 102 专访：大改革是走出低谷的支撑
- 106 人物：许荣茂：带领两千名香港人“北上取经”

经济

- 100 市场分析：美联储暂缓加息
- 112 商业：在行将颠覆和突破的“黎明期”

文化

- 114 戏剧：在爱丁堡过艺术节
- 122 电影：赵涛，演别人的一生，然后自己慢生活
- 126 音乐：最后的乐器
- 130 设计：第二个家：创业公司的共享办公空间
- 134 科技：与机器人谈谈爱，聊聊人生
- 144 思想：人类情绪大全
- 146 书评：“我是一个美国人”
- 148 书与人：比拉-马塔斯：一个总在作家的作家

专栏

- 22 邢海洋：错在创新？
- 138 苗千：宇宙的新画像
- 140 张斌：快快成为“骆驼”
- 142 宋晓军：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灰色地带”

- 4 环球要刊速览
- 14 读者来信
- 16 天下
- 24 理财与消费
- 26 好消息·坏消息
- 27 声音
- 28 生活圆桌
- 32 好东西
- 150 漫画
- 152 个人问题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舒可文 Shu Kewen 苗炜 Miao Wei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阎琦 Yan Qi 吴琪 Wu Qi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曾焱 Zeng Yan 王恺 Wang Kai 陈晓 Chen Xiao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王星 Wang Xing

朱步冲 Zhu Buchong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魏一平 Wei Yiping

蒲实 Pu Shi 庄山 Zhuang Sh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杨璐 Yang Lu 何潇 He Xiao

徐菁菁 Xu Jingjing 黑麦 Hei Mai 陆晶靖 Lu Jingjing 程磊 Cheng Lei

记者 Reporter

李东然 Li Dongran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阿润 A Ru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邢宇 Xing Yu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尤帆 You Fan

艾江涛 Ai Jiangt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设计总监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徐睿浚 Xu Ruihan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总监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发行事业部 Circulation

荣誉总监 Honorary Director

范于林 Fan Yulin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大南方总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Southern China

雍江 Yong Jiang

北京区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Beijing China

周旭 Zhou Xu

发行拓展经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品牌经理 Brand Manager

肖丽媛 Xiao Liyuan

客户经理 Sales Accoun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渠道经理 Senior Manager of Marketing Channel

于硕 Yu Shuo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付新林 Fu Xinlin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潘姮 Pan Heng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产品部 Products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张莉 Zhang Li 袁媛 Yuan Yuan 连子君 Lian Zijun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罗启宏 Amy Luo 陈陌陌 Chen Moyang 孟佳 Meng Jia

内容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王晶 Wang Jing 薛芃 Xue Peng 祝童 Zhu To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技术部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韩雅丽 Han Yal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广州办事处地址：

广州市海联路6-8号银珠商务中心405室

邮编：510230

电话/传真：(020) 34283562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2.00 \$6.00 港币 16.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347099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中外书刊音像经销有限公司 (0431) 82708592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大河书报刊销售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楼兰酒业
2~3 · 万达
5 · 如依家
7 · 霞公府
9 · 华为
11 · 力度形象
13 · 科勒
23 · 佳士得
39 · 一汽大众
63 · 比音勒芬
71 · 人民日报
97 · 童颜面具
137 · 周刊征订
141 · 周刊20年
151 · 书店广告
封三 · 暇步士
封底 · 浪琴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SL 到 10655111，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8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No.854

张爱玲的后半生

张爱玲作为天才作家，又有着传奇的人生，在华语世界受追捧几十载。不过，对读者而言，她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她生活中的低调，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导致有关她的信息不少为传说或臆造，长时间里真假难辨。在作品之外，读者自然渴望了解有关她的点滴真相。在她去世 20 周年时，有这样一组经过认真考据、研究和广泛走访撰写的报道，鲜活人生故事外，还提供了其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价值的再认识，满足了我的所有好奇。

南京 钟诚

领导的话外音

我的朋友老刘，供职于县公安局，虽然早已跨过不惑之年，但操劳半生，还是大头兵一个。眼看着自己当年带的几个徒弟如今都有了一官半职，老刘是越发不淡定了。老刘虽本是散淡之人，从未想过封妻荫子，但在不大的县城里，大头兵的身份，还是让老刘觉得越来越没有面子。去年，攒足了劲儿的老刘破天荒地主动跑到领导家里汇报了几回思想，几番努力下，终于被提拔为一名小组长。这小组长是“内部粮票”，人事组织部门其实并不认可，但老刘还是十分满足。可不到一年，领导找老刘谈心，很关心地问他，最近局里要动干部，他是否有什么想法？老刘直言自己年纪大了，还能对仕途有什么想法，就这样吧。领导听了，没有再多说，挥手让老刘出去了。没多久，局里提拔名单出炉，老刘又变回了大头兵，小组长被人顶替了。这让老刘十分不理解：自己本本分分，工作上并没有什

么过错，怎么就给撸了？

硬着头皮去见领导，老刘并没有得到机会宣泄自己的满腹委屈，领导反而表现得比老刘还委屈。领导说：“局里对你这样的老同志一向重视，当初不是还专门咨询了你的意见吗？你当时自己说没有想法了。既然没想法了，那自然就应该给有想法的人让位呀，让有想法的同志上位，不是更有利于工作开展嘛。”领导的一番话，让老刘顿时哑口无言，啊啊了几声，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只好悻悻而归。回来后，老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领导的確征求了自己对未来的想法，自己也说了没想法，可这个想法应该是指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想法呀，怎么变成了是否继续当小组长的想法了呢？是自己没有体会领导的意思，还是领导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老刘左思右想，也没想明白。面对无法改变的结果，只有怪自己当初没有问清楚领导口中的没想法是什么意思。

前不久，市里某领导到局里视察工作。结束时，市

领导拉家常似的随口说了句：“我一个远房侄子小王就在你们局里工作呀，这孩子，也不求进步，不争气。”隔着好远的老刘，听到市领导这番话，不禁心生感慨：大领导就是不一样，对自己的亲戚要求这么严，不仅不替其美言几句，还严厉批评。善良的老刘，当时心里还颇为小王捏了一把汗：这句“不求进步”的评语会不会影响小王未来的进步？不过，老刘担心的未来并不遥远，市领导走后没多久，小王就进步了，被提拔为派出所所长了，这让老刘惊讶不已。对比自己之前的遭遇，老刘惊讶之余也有些许迷惑：领导的话，到底该怎么揣摩？

郑州 邵宁

垄断企业的服务

最近接连碰到两件事情，让我对国有企业的服务和质量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第一件事：前段时间家里在三天内烧坏了两台入夏才购买的电风扇。烧坏第一

台风扇的时候，我大大埋怨了生产厂家一番：才用了两三个月就坏，质量也太差了。接着又过了一天，第二台风扇也在半夜的时候“停工”了。有这么巧合吗？本人有一点点用电常识，于是怀疑是否电压太高造成风扇接二连三地坏了。第二天一大早请来电工检查家里的电源进线电压是 244V，再看看风扇的额定电压是 230V，看来原因找到了。打电话到供电局咨询，了解怎样才能将电压调下来。

“95598”的接线员态度很好，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承诺 24 小时内会有辖区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回复我的问题。下午 13 点多，辖区技术人员就来电，响应速度还蛮快的。礼节性问好，该人员就跟我按照电力行业的技术原则 244V 是超过了额定电压，但是高层住户的入户线管辖权是物管不是供电局，这个问题只能找物管处理，随后就问：“这样的答复您满意吗？能否消去这条投诉单？”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距离本居民

楼100米内新建了一座变电站，以前没有这个变电站时我家的电器运作正常。自从供电电源改为这个变电站，家里灯泡就经常烧坏，而且据我了解本大楼很多家庭都陆续出现灯泡经常烧坏的现象，是否因距离变电站太近，而变电站出线的电压过高导致居民家电压也过高，这问题物管能处理吗？”该人员还是不冷不热地回答我：“您提出的问题是入户线电压过高，这个责任还是在物管，请问您能否消去这条投诉单？”“难道入户线电压会无缘无故地变高吗？入户线前的线路电压不应由电力部门去检查吗？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前，我是不同意撤销投诉的。”“好的，我再了解一下，请您等回复电话。”至今已一个多月了，回复的电话一直没有再响起来。根据电力部门的公告，所有的投诉都是闭环管理，在客户不同意撤销投诉的情况下，真不知道这投诉最后在其内部是怎样完结的，又或是怎样被“高高挂起”的。

第二件事：由于先生单位可报销个人话费，需要在电信营业大厅办理家庭电话机主变更的业务，并将该电话号码关联的所有业务一并转移，话费划扣也同时变更在先生名下。当时业务办理顺利，但次月我却收到了扣费5元的短信通知。我致电咨询，业务员答复，该5元是189号码手机新闻报播的包月费用。先说说189号码的来历吧：几年前电信局为拓展业务，每个家庭电话号

码免费赠送一个189号码与手机，该号码附属于家庭号码，机主必须一致，产生的所有费用都与家庭号码一并结算。因此在办理机主变更时，我理所当然认为189号码的业务同时转移。但业务员答复189号码产生的业务是已转到新机主，但费用划扣需另外办理变更。听到这答案真让我醉了。到最后我还是得跑到营业大厅将189号码扣费业务变更了。

近年来，国有企业服务质量已有所提升，改变了过去门难进、脸难看的情况，客户办理的每一件事都规定了流程及流程每一个环节所需的时间，并要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此对内部员工进行考核。但其员工为保“钱包”，对待客户的态度虽好，但总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诸多规定不主动提示客户，导致客户办理业务时总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多跑几趟，由此也给客户一种不真诚、敷衍了事的感觉。

广州 绮珊

乡村的变化

跟我在打工的城市租住在一起的安徽籍老张暑假结束后返城又来学校打工了。他家住在偏僻的山沟里，虽说经济条件不那么发达，但生态环境非常好。他说在老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天天跟乡亲们到农田、山缝儿里捉蝎子。言说野生的蝎子价格很贵，1斤在400多块钱左右，逮的人很多，并问我

老家那一带蝎子的多寡情况，我无不遗憾地告诉他：“我们那儿早就绝迹了。”

30多年前，我的故乡冀中平原腹部那一带的乡村还比较贫穷落后，当时的社会背景还是以生产队为基层单位走合作化道路的结构模式。儿时的记忆里生态环境特别优美：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树木青葱茂密，各种野生的小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多得数不清。特别是夏季的夜晚繁星满天，一望无际的天宇浩如烟海，各种不知名的昆虫时而呢喃时而奏鸣时而吟唱，多么美好的一幅原生态乡村画卷。那时河水的水清澈碧绿，一眼就能望见不同种类在河草间自由游动的鱼虾等，像鲫鱼、鲢鱼、鳙鱼、嘎鱼、泥鳅、乌龟、河蚌、河虾、大小青蛙、水蛭、癞蛤蟆等随处可见。夏日的傍晚，全村人都在河里游泳、洗澡，洗去一天的疲乏与汗渍泥渍。田间地头河沿沟渠里也时常碰见蝈蝈、蚰蚴、萤火虫、蝎子、蜈蚣、蜘蛛、蜥蜴、刺猬、地哼、菜蛇等一些野生昆虫小动物，真可以说那时候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明显。全村有七八口水井，哪家哪户不是在清晨与傍晚到井台上挑水吃？

自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种地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也越来越注重科学种田。不过，家

乡却也从此出现了农药无节制地乱喷乱用、化肥盲目地滥施滥投现象，再加上一些小化工厂、小土炼油厂的出现，原有的生态环境正逐步遭受破坏。虽说粮食生产逐年增高，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河水被污染了，大人孩子们谁也不到河里游泳洗澡了；用污染的河水灌溉农田，农作物难免不深受其害。井水也受到了牵连，人们从此不再挑水吃，而是各家各户开始打小机井，吃深层水，养育了几辈人的多年老井逐步荒废被填埋。田野间的昆虫们逐渐消失，甚至绝迹，那些穿梭于农田之中的野生小动物们也是难觅踪影，经过几千万年进化适应下来的多种小生灵们，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变迁中被现代文明扼杀绝种。

不到40年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那一带的乡村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夏日的夜晚，很难看到繁星满天的星空，原本寂静的乡村正被汽车、机器的噪声扰得喧闹不宁。很多乡村特有的景观也一去不复返，昔日那美好的乡村生活只能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故乡，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她的发展变迁势必牵涉我们这些在外漂泊打工者的心迹，但愿故乡的发展前景别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还故乡一个宁静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吧！

天津 刘希亮

本期截稿时间：9月21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印尼 | 牛车比赛

9月13日，松巴哇岛的一场牛车比赛上，一位骑手在驱赶水牛前行。参赛者在两头牛身上套上木架，手持木杆站在木架上指引水牛奔向终点。

英国 | 珍妮特国际芭蕾舞比赛

9月18日，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参加珍妮特国际芭蕾舞比赛的学生在伦敦千禧桥上留影。来自16个国家的76名选手将参加这一比赛。英国皇家舞蹈学院主办的珍妮特国际芭蕾舞比赛有“舞蹈奥林匹克”之称，首次比赛于1931年举行。比赛的名称是为了纪念英国皇家舞蹈学院首任院长及创办人之一珍妮特女士。





澳大利亚 | 云中行走

9月16日，36岁的澳大利亚走钢索表演者凯恩·皮特森走过了架在墨尔本尤里卡观景塔之间距离地面300米、长21米的钢索，这是南半球有史以来最高的走钢索表演。皮特森此举是为了纪念电影《云中行走》抵达澳大利亚影院。皮特森模仿的是电影的主角、法国杂技艺术家菲利普·帕特1974年在世贸中心双塔之间走钢丝的壮举。





美国 | 瑞塔·奥拉演唱会

9月14日，英国女歌手瑞塔·奥拉在纽约欧文广场演出。



澳大利亚 | 腊肠犬比赛

9月19日，墨尔本啤酒节上，一只迷你腊肠犬在参加腊肠犬跑步比赛。

土耳其 | 小难民

(左页上图) 9月15日，土耳其毗邻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的埃迪尔内市，在连接土耳其与欧洲的高速公路上，一位小难民在土耳其警察和宪兵面前爬行。土耳其安全部队阻止难民前往埃迪尔内市中心。

古巴 | 教皇到访

(左页下图) 9月21日，教皇访问古巴奥尔金省时亲吻一名男孩。9月19日，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抵达了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他受到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的迎接。

错在创新？

文 / 邢海洋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被查，坊间立刻联想到他所主管的资本市场创新。股市下跌，连少数经济学家都将之归罪于股指期货的做空功能。但股灾与金融创新的联系，却很少有研究和证明。

盖棺定论，引发本轮股灾的并不是融资融券这个官方主导的金融创新品种，而是民间的配资创新。恒生Homs系统是恒生公司开发的一款全托管模式金融投资云平台，它可以将一个证券账户下的资金分配成若干独立的小单元进行单独的交易和核算，也就是业内所称的伞形分仓功能。这一新系统能够方便基金管理人、交易员团队进行分仓管理、风控和业绩考核，因此被广泛运用于信托阳光私募产品中，并在投资私募中迅速普及。Homs对外只有一个出口，而证监会对市场的监管主要通过中证登公司的机构和个人账户实现，一个Homs账户下掩盖着的多账户交易行为于是游离到监管之外。而随着股市暴涨，民间配资公司看中了Homs这个资金监管平台，宣称互联网金融概念，可以给客户进行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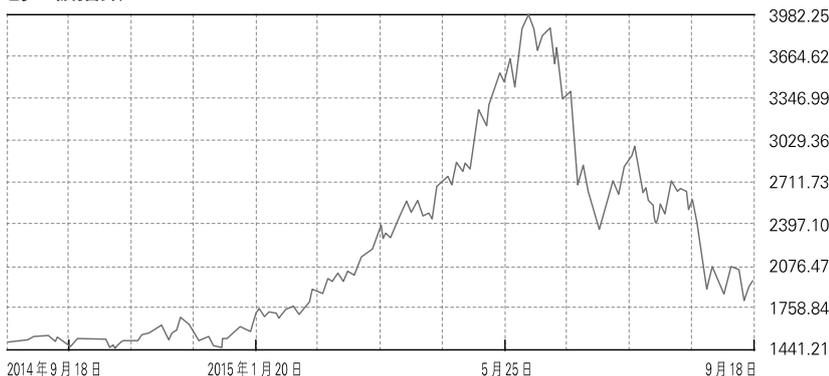
甚至最高1:9的杠杆配资以进行股票投资，市场崩盘踩踏的隐患由此埋下。

现行金融法规，场外配资并不合法；如果是一个有着立体化多方位衍生产品的金融市场，场外配资、伞形信托也没有存在的基础。投资者若希望小幅度加杠杆，自可尝试融资融券，而证监会允许的融资融券最高比例是一倍，资金成本随行就市，但已经超出了普通的贷款利率，更大比例的杠杆，即使不考虑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仅从借贷成本上也是致命的。对于有着更强赌性的投机者，尽可以在衍生品上赌涨跌，这时候他只需找到对赌的对手，而不会每天都面对累积利息的风险。而成熟的期指和期权的设计，早将市场暴涨暴跌的因素考虑在内，投机者即便爆仓，也不会危及实体市场。实际上，自沪深300股指期货开通，5年中市场投机者、投资者各得其所，市场走势比此前稳定得多，体现了价格发现功能，增进了市场效率。而年初以上证50ETF期权上市为起点的期权上市，也将促进个股的定价效率。可惜期权创新还未展开，便遭遇厄运。

俗话说，大道废弛群魔四起。期货与期权，本来成熟的资本创新，全盘拿来即可，来到A股市场却人为设障，没有50万元不得参与。金融创新推出的速度，也出奇的慢，至今仍无一只可为个股加杠杆的衍生品。面向中小投资者的期指小合约甚至从未出现在证监会的议事日程。最疯狂的时候，场外配资高达1.4万亿元，是场内融资的一半，中小散户们明知Homs系统缺乏保障，仍口口相传，冒险介入。把投资者赶入场外配资陷阱的，正是证监会创新的不到位，而不是创新本身。当然，你也可以争辩，如果没有互联网金融，如果没有Homs系统，就不会有后来的麻烦，可金融脱媒大势所趋，银行、保险业都在努力适应互联网金融潮流，唯独证监会故步自封。当一个肌体无须面对压力，只监管别人而不被监管的时候，对外界变化自然感觉不敏锐，而应对突发事件则慌乱无序。4月中旬，证监会才意识到场外配资的危险，张育军频繁向证券公司警示风险，6月则严查配资，给市场急刹车。及至股市暴跌，他又主导了一连串救市行动。不过尽管这一连串事件勾勒出的是个救火队员的形象，从这些公开的事件，外界很难猜测作为主管者的张育军错在了哪里，至少如果说是错，也是技术性的。

但借着张的被查，外界仍获得了一次梳理市场管理者救市前后所为以及张在任职期间出台的政策的机会。不难看出，一个所谓的创新者，和互联网金融的滚滚大潮比起来，其实落伍了，并由此给市场埋下了动荡的隐患。☑

创业板指数



佳士得上海秋季拍卖

2015年10月24日

上海半岛酒店

典雅生活艺术:名表与手袋
艺术的生活:中国及亚洲当代设计
+86 First Op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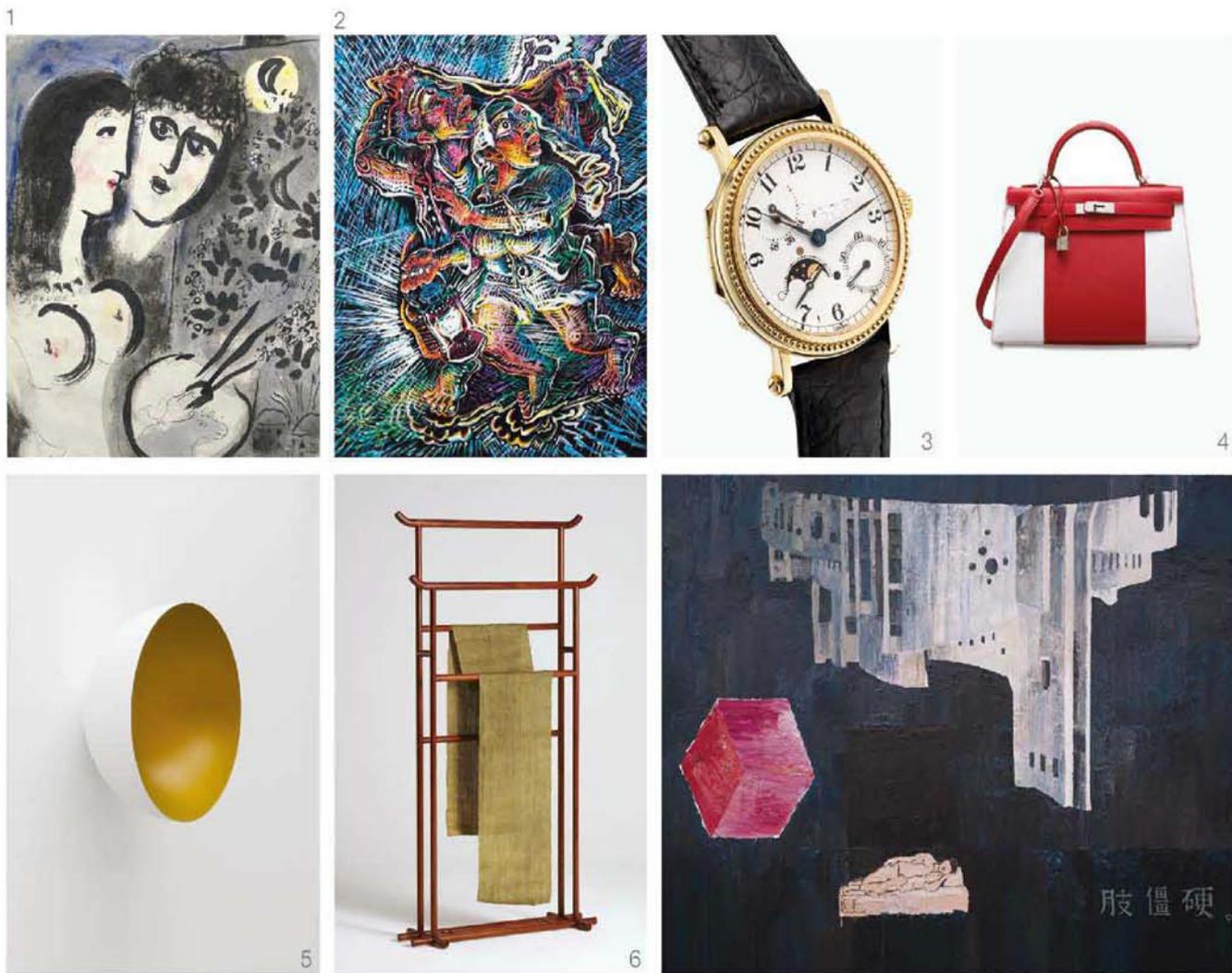
亚洲与西方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

北京预展
10月16至17日
国贸大酒店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

查询
北京
enquirybj@christies.com
+86 (0) 10 8572 7900

上海预展
10月22至24日
半岛酒店
上海中山东一路32号
佳士得上海艺术空间
上海圆明园路97号
安培洋行

上海
enquirysh@christies.com
+86 (0) 21 6355 1766



1. 马克·夏卡尔 (1887-1985) 《恋人与调色盘》© 2015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ADAGP, Paris.

2. 罗中立 (生于1948年) 《雷阵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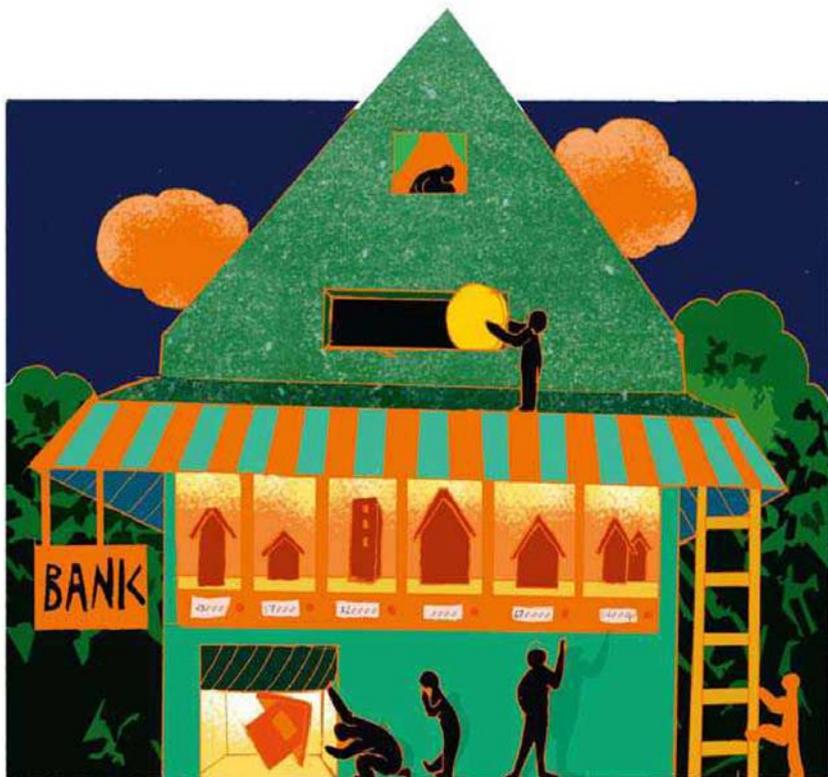
3. 百达翡丽, 18k金自动上弦腕表, 配动力储存及月相显示, 型号5015, 约1995年制

4. 限量版ROUGE CASAQUE色及白色EPSOM牛皮32公分SELLIER FLAG凯莉包附铂金配件 爱马仕2013年

5. 安尼施·卡普尔 (生于1954年) 《无题》© 2015 Anish Kapoor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DACS, London

6. “清源”立挂「璞素」注:「艺术的生活:中国及亚洲当代设计」专场拍品将于10月13至24日在佳士得上海艺术空间进行预展

7. 仇晓飞 (生于1977年) 《肢僵硬》



栏目插图 | 范薇

住房储蓄贷款

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的住房储蓄贷款今年有望在天津、重庆试点基础上向全国推广。这本是一种古老的存贷方式，源于英国伯明翰，当下欧洲甚为流行，在德国，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已经履行了住房储蓄贷款合同。储蓄贷款的理念是“先存款后贷款”。中国独家试点运营住房储蓄业务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已获准在全国开展业务，一大特色是利率恒定，3.3%。恒定利率确保其借款成本处于偏低水平，并有利于帮助中低收入者规避市场波动风险。

房价看涨预期

楼市回暖，一、二、三线城市住宅库存的去化速度加快。截至2015年8月底，易居研究院监测的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环比减少0.8%，同比减少1.4%。库存规模已连续6个月出现环比下跌，并为54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跌。8月份三类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分别为9.9、12.5和19.7个月，其中一线城市已经连续8个月存销比低于12个月。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已连续20个月呈现下滑趋势，同比增速已从两年前的20%以上跌至不足4%，更加速了上涨预期。

大手笔增持

大手笔增持还是有用的。《证券时报》统计，7月9日至9月15日沪指跌幅超一成的情况下，股东增持金额亿元以上的146股其间平均上涨2.04%，涨幅跑赢大盘16%。据统计，共有1091家公司发布了重要股东的增持公告，累计增持次数达5134次，合计增持数量为83亿股，以增持均价或增持股份股权变动日收盘价估算，增持金额合计1204亿元。146只个股中，韶能股份和天辰股份股价均实现了翻番，新世界和齐星铁塔等13只涨超50%。

现金为王

美银美林的月度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基于对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担忧，投资者的风险资产偏好也在9月份急剧恶化，基金经理们对全球股票资产的配置降至3年最低水平，并创下4年来最大降幅，现金持有比例则创下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最高水平。基金经理们认为“最拥挤”的交易仍然是做多美元，但百分比由8月的45%大幅降至本月的27%，而做空新兴市场股票、做空商品相关股票、做空新兴市场货币的“受欢迎程度”紧随其后。





理财跳水

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央行已 5 次降息、4 次降准，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储户存款收益“缩水”，互联网系、基金公司系“宝宝”产品收益率跟着下滑，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也不例外。8 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54%，较 7 月份再降 0.14 个百分点，创年内新低。6% 以上的预期收益绝迹，5% 以上的面世就被一抢而空。由于参与股市配资的规模急剧缩减，银行理财产品目前尚未找到更好的高收益渠道，未来收益率也难有起色。



自营盘“裸奔”

中金所出台史上最严厉的抑制过度投机的多项措施，期指成交量骤降九成。9 月 18 日 9 月合约交割，套保盘将移仓至 10 月合约。然而在极度缺乏对手盘的情况下，券商很难实现套保，数千亿元股票自营面临仓位全裸风险。6 月底和 7 月初的股市维稳初期，券商曾为约 1000 亿规模的自营进行了套保操作。无法转仓意味着期指市场丧失了套期保值功能。“再见，中金所；你好，A50！”一则调侃式广告，或引领 A 股投资机构奔赴新加坡的富时 A50。

加息的多空清单

不是 9 月就是 12 月，美联储加息迟早来临，投行在为此做着准备。高盛以浮动债务占总债务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来判断一个公司受加息的负面影响程度。如果一个企业拥有高比例的浮动利率债务，那么加息意味着他的融资成本会增加。据此，苹果、eBay、大都会集团、可口可乐等都最可能是受加息拖累的企业。而百事可乐、贝莱德、谷歌、苹果、Priceline、甲骨文等在过去的加息初期，股价平均表现超过大盘 5 个百分点。苹果“脚踩两条船”，是因为其既拥有高比例的浮动利率债务，又在过去几轮加息周期中表现较好。

汇率回到 2002

商品周期是从 2002 年开始的，这种超级周期已经结束，不会再回来。瑞士信贷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现在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已经较 2011 年新兴市场繁荣时期贬值逾 60%。分析师用的是经通胀调整的实际汇率，商品周期显然发挥了作用。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如果新兴市场国家经历高通胀，其名义汇率总体贬值。当商品进入上升期，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增加，廉价资金支撑了一系列坏账项目。商品进入下跌周期，资金流向反转，坏账连环引爆，汇率不堪重负。



自助以助人

流感季节将近，你是否做好了接种疫苗的准备？发表在最新一期《临床传染病》杂志上的全美调查数据显示，成年人接种流感疫苗不仅有助于降低自身感染风险，还可以为社区中的老人提供额外保护。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小组发现，在那些年龄在18到64岁的成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地区，老年人患上与流感相关疾病的概率可以降低21%。研究者指出，近三分之二以上因流感而需入医院治疗的案例发生于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体，而老年人也构成每年流感死亡人数的九成以上。从这种意义上看，任何一点额外的保护都至关重要。

好消息



长颈鹿的小夜曲

长长的脖子一直被认为是阻碍长颈鹿发出复杂声音的先天不足，然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动物学家对3个欧洲动物园中的长颈鹿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跟踪录音后发现，当夜幕降临时，长颈鹿会发出频率在92赫兹左右的轻柔“哼唱”，当人注意聆听时便可察觉。



熊猫以外

大熊猫的可爱憨态和濒危地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保护，但也招来了有关人士对资金流向合理性的质疑。一项针对132种哺乳动物、117种鸟类和249种两栖类动物的分布调查结果显示，除一种鸟类外，所有这些动物都在大熊猫保护区中广泛分布，享受到栖息地不受干扰的益处。

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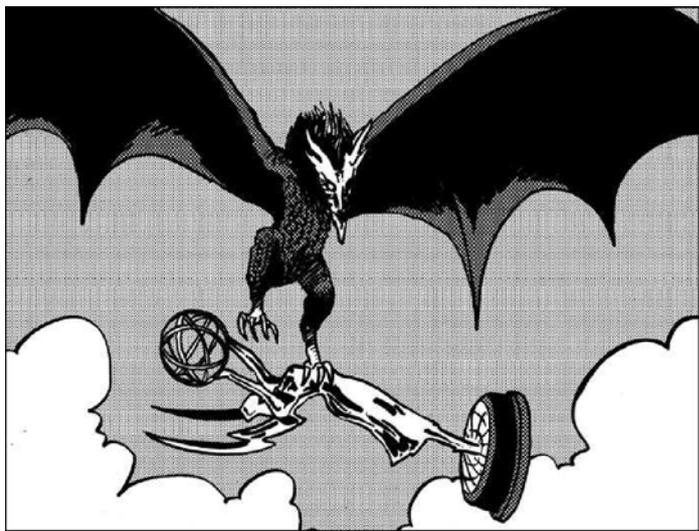
鱼油的种族歧视

别再迷信鱼油的所谓好处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遗传学家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鱼油面前，人人不平等。研究者比较了爱斯基摩人、欧洲人和中国汉族人的DNA后发现，后者中的绝大多数不具备可以从额外摄取 $\Omega-3$ 脂肪酸中获益的遗传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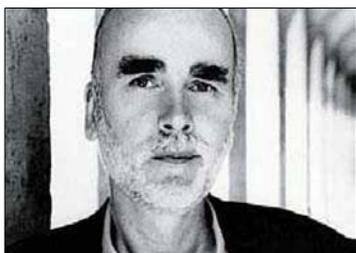


咖啡打乱生物钟

晚饭后来杯现磨咖啡或许会让这一刻感觉不错，但睡眠质量却将为此付出代价。发表于《科学—转化医学》上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睡觉3小时前饮用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足以将人体生物钟平均向后拨慢40分钟。但这却不失为自东向西长途飞行时调整时差的好办法。



(插图 山羊)



有些作者借助反讽鞭挞消费社会；另外一些作者，则继续发动对宗教的战争；还有一些作者，依然在与资产阶级搏斗。有时候，反讽可以表达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的挣扎。而有时候，反讽不过是在掩盖心智的贫困。因为，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反讽自然就会派上用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捍卫热情》

生活是相反事物所创造出的短暂的美，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冲突，依赖于肉体和精神被困于这个日渐衰老的躯体内部所形成的两股力量。

——西蒙·范·布伊《爱，始于冬季》

抑郁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写实主义，关乎整个世界的腐朽，尤其是你的生命的腐朽。但这种写实主义只是掩盖

抑郁真实本质的面具，面具后面是势不可挡的与人群的疏离感。你越相信你的腐朽之路独一无二，就越害怕与世界交涉，你和世界来往得越少，就越觉得其他继续与世界来往的人笑脸是如此虚假。

——乔纳森·弗兰岑《如何独处》

桌子越大，木材越昂贵，其占有者就越是位高权重。桌子越像是本应放在客厅的桌子，其所有者越是假装远离工作，因此其权力就越大。然后等级制度开始瓦解，通过家具的大小来公开展示权力的方式过时了。现在通过家具来炫耀地位是庸俗的做法。现在利用桌子来炫耀的方式是抛弃椅子，站立工作。地位更高的人可以用跑步机桌子。

——露西·凯拉韦《办公桌的故事》

拥有制造某种很酷的东西的技巧和雄心应该招致掌声，而非被捕。未来属于穆罕默德那样的人。

——扎克伯格在脸书主页上声援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这位14岁的得克萨斯州少年在家中制作了一个数字闹钟并带到学校，结果被校方认为是炸弹，少年遭到逮捕

数字

29
名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瑞士、英国、瑞典、荷兰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力的五个国家，排名前25位的都是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第29名）的表现接近于前25强的高收入国家。

50
%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伦敦动物学学会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说，过去45年间，以海洋为生存环境的动物数量减少了近一半，主要原因包括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报告显示，人类餐桌上一些常见的鱼类数量锐减，比如金枪鱼和马鲛鱼减少74%；亚洲餐桌上的珍稀海参数量过去几年锐减，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红海的海参减少了98%。

21
秒

佐治亚理工学院生物物理学教授胡立德获得了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他与其团队使用一架高速摄影机拍摄老鼠、山羊、牛、大象、狗等哺乳动物的排尿过程，并通过流体动力学建模发现，体重超过3公斤的哺乳动物的排尿时间都在21秒左右。在进化过程中，大型动物的尿道变长，帮助快速排尿，以免在排尿时被其他动物攻击。

超级捞饭

文 / 皮卡

图 / 谢驭飞



老卢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吃泡米饭。记得他曾经还是主任的时候，他一把饭菜整理成泡饭的样子，就有很多年轻人围拢过来。有的说是“您这吃饭有个性，就像您的人一样仙风道骨”，还有人说“您这个太清淡，让我给您添点儿料吧！”说着还把碗里的糖醋小排往他碗里加。他的碗里，瞬间变成一碗膨胀的好似羊肉泡馍的杂烩。

卢主任感到很受宠，说这只是一个口味偏好，不值得提倡。大家说：“您这是超级捞饭，有我们在就是全家福。”只有怀孕的小路说：“这种吃法对您的胃不好啊！”饭后，卢主任总爱拉着很多年轻人打牌。小路问：“您为什么爱打牌？”他说：“找下胜利的感觉嘛，谁叫我年轻当兵时总想当将军，我总喜欢赢的感觉。”

老卢闲着的时候，总是爱放手机里的一段钢琴曲。这时，跟着的同事就总会说：“这么好的曲子，您哪里下的？”这样很多别的部门的人也会把大脑袋伸过来。他就说：“我儿子弹的。”大家都会说，真不错，就跟唱片里的似的。还有的说：“有空传给我吧，我把它做个手机铃声。”小路却说：“咱们同事也是，每次你放出来都会觉得很新奇的样子，我真搞不明白。”老卢说：“我搞不明白的是他们为啥要我儿子弹的，他们估计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天，老卢突然被免了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那天在外边开会，他又吃起了泡饭，可是他的周边不再有人簇拥。这时，小路过来了，说是“今天您的泡饭好清澈啊”。老卢说，是啊，难得。

小路说：“这里的米饭太硬，不如我请您吃碗热汤面吧。”用餐结束后，老卢再不好意思去拉年轻人打牌。小路顶着大肚子说：“我陪您溜达一下吧。”

在路上，老卢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首曲子。他接完电话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这是我儿子唯一会弹的完整曲子。弹会了这首之后，他不愿意再学下去了。”小路说：“没关系，这是他的成长纪念，您做成铃声真的很用心。”老卢越来越孤独，但是他的菜谱却换了，捞饭在他的菜谱里消失了。他每天中午不再去打牌，而是到附近遛弯。小路，偶尔和他坐在一起，总是要看看他盘子里的饭菜。

那天，上级突然下来命令，老卢升职成副局长，聚到他身边的人逐渐多了。大家都关切他为啥不吃捞饭了，他说这个不爱吃了。大家都遗憾地说，“全家福”做不出来了。有人怯生生地说：“您还打牌吗？”老卢说：“不打了，不过谁陪我玩麻将去？”大家都面面相觑了。老卢说：“开个玩笑，我去遛弯了。”老卢总想找小路聊聊，感谢她陪自己度过了一个时期。不过，小路回家生孩子去了。

老卢给她打了个电话表示慰问。小路说：“怀孕期的人，对什么都很敏感，看谁都像自己的孩子，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健康以及孤独。你儿子的那首成名曲，真的很好听。”老卢说：“只因为我是领导吗？”小路说：“我只喜欢我觉得美好的东西。”老卢说：“这算是胎教吗？”她说：“我希望这是身教。”

文艺瘟疫

文 / 修越

图 / 谢驭飞



朋友和我说，你现在身处病态。我问什么病，他说文艺病。他又引用俗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看朋友的眼神仿佛我是病入膏肓了。当然，不知何时我已经懒得和这种糙人解释什么了。我把家里的墙纸都扯掉，抹满水泥，刻上随意的纹路。多余的家具也被我都扔个精光，留下的只有一套黑色的皮沙发。连电视我也送给了亲戚。现在我仿佛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每天在淡青色的晨曦里醒来，吃一个西柚。

去年冬天，我认识了小一。我俩在一间咖啡店相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她一个人坐在角落的位置，依靠在褐色的沙发上，鬓角飘动在舒伯特悠扬的音乐里。她在读《昔年种柳》。

她搬到了我的公寓，这天我才发现她的后背文了一句法文，大概的意思是明天会更好，她对我说的時候我大笑了。刚刚进门对我设计的屋子赞不绝口的小一在生活一周后竟然问了我一个让我觉得诧异的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买个电视？”当时的我暴怒如雷，我把她赶走了。她在走的时候留下一句：“真是神经病，如假包换。”

聪明如我，却引一个假文艺的毒瘤进了家门。这种女人大概每天都坐在咖啡店里搔首弄姿抱着自己看不懂的书等待猎物吧。晚上的时候我躺在我的皮沙发上时不时望向镶在水泥墙上的门，阵阵凉意在后背徘徊。小一轻易地成为我最厌恶的女人第二名，至于第一名，非阿莎莫属了。

阿莎是在一场酒会上认识的。她很好，我们很谈得来，尽管她对诗词歌赋小说歌剧并没有兴趣，但她却有难得的真实，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看也不来干预我。每次我看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的时候她都去刷微博，这样我就好像过了一段单身时光，可等我从电影里出来，她又确实实实在在那里，不吵不闹，让人非常舒服。我和她的关系结束在一个雨天，在我看来雨天总是充满悲伤。那天她对我说她想和我结婚。其实我打心底里知道这天总会来临，只不过是我在逃避罢了。等到真正面对时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们沉默了好久，最后我虚弱地对她说我还没准备好，我不希望和真正爱的人结婚，那样爱情就变质了。

她对我笑了笑，就去收拾行李了。外面的雨霏霏地下着，我想抱住她可是却不能。她走的时候没说话，但送了我一个耳光。

生活依旧在继续，朋友准备开一家花店，在大学城附近，他说这商机无限，他准备赚够钱后再投资一家小旅店，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专门面向周末开房的大学们。他找到我让我这个病人为他的花店取一个文艺有内涵的名字。我说：“叫一室春吧！”他点了点头没作声。

开业那天他邀请我去，我望着紫红色的牌匾上刻着三个绿色的大字。我的血像银针般地扎入脑袋，我问他：“你这店名叫什么？”

“花啦啦。”他对我笑。☑

单身的可乐

文 / 喵小鱼

图 / 谢驭飞



自从小区附近盖了所贵族学校之后，它的楼价就开始飙升，停在楼下的车越来越多。附近的商铺也厮杀起来，开张倒闭好几轮，剩下的竟然是美容院、美宜佳、琴行和补习社。置身于豪房豪车之中，我们豪迈地观望彼此，以此为乐。

不久，来了新同事B君。B君口头禅特多，待人接物暗藏着各种不怀好意的热情，一见到有呼吸的女同事就拥上去勾肩搭背。至于做事，跟他的长相一样，潦草极了。上一堂公开课，讲到半路连自己都蒙掉了。我们私下谈论他：估计又是干不长久了。

B君独住三楼。三楼有厨房，厕所和饭厅，吃喝拉撒都跟午晚托的学生搭在一起。白天学生多家长多，一片闹哄哄，80多平方米的补习社总是显得很拥挤。可是当学生逐个被接走，同事也走光了，B君才记起自己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躺在一张午托学生睡的折叠床上，80多平方米的天花板在瞳孔里不断被放大，孤独得不成人形。

我们遇到过太多次了，每个清晨，我们敲办公室的门，B君则穿着三角裤，披着条花纹复杂的被单来开门。我们开始同情起B君：补习社这么大，为什么连职工宿舍都没有？老板立刻找B君解释，说是工商局查牌，装修要延后，叫他“相信以后会更好”。B君悻悻而逃。

B君职场的滑铁卢，是从他那双新百伦球鞋失窃开始的。那天，他在办公室里赤脚转了好几个圈，才问我们：“谁见过我的球鞋？”我们摇头。他又在教室里转了几圈回来，才意识到自己的球鞋不是失

踪了，而是失窃了。他抱怨道：“五百块买的，没穿几天就丢了。”老板眼尖，看到他天天穿着拖鞋接送学生，不喜欢。连学生也问他：“赵老师，你怎么穿拖鞋了？”B君说：“老师的新百伦球鞋被偷了。”

不出三天，B君又丢了瓶哆啦A梦洗发水。这一次，我们似乎更能理解这桩失窃案件了。一定是装修队里的人手脚不干净。当晚，B君依然在办公室里。他说，办公室里摆着这么多台手提，他睡在里面，有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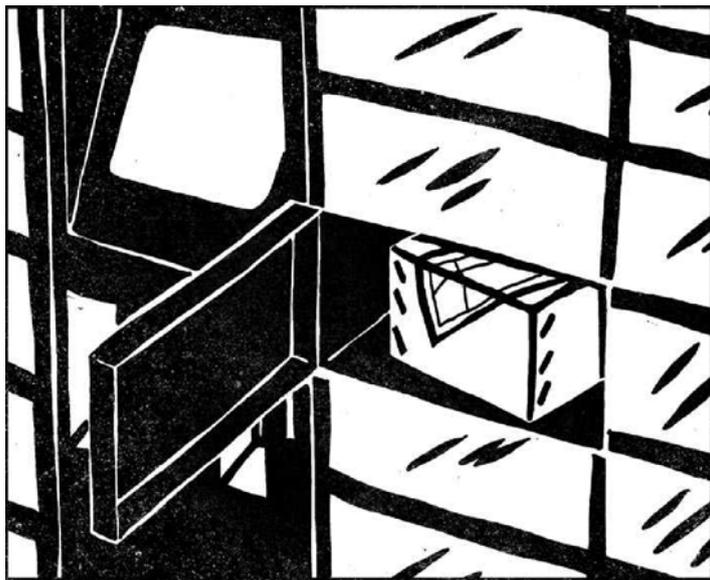
装修结束后，B君连人带被搬进职工宿舍。他的隔壁住着一位男同事，男同事的女朋友时常会来过夜。B君脑洞大开，想起他还缺一位女朋友。他想去看电影，没人陪他去。他想去唱KTV，没人陪他去。去叠石餐厅点牛排，服务员还问了他两次，要不要点情侣套餐。然后他到处跟别人说：“我单身太苦了，可不可以买支可乐给我？”有位已婚女同事数了20张一毛钱给他，叫他去买可乐。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一毛？”女同事说：“你没逛过超市吗？你找零的时候没有收过一张一毛吗？”他说：“单身太苦了，没有人陪我逛超市。”

有个消息渐渐在补习社里传开了。B君入职那阵子，家里发生了变故，他为此消沉了一段时间。他跑得不够快，总是执著于花出去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免不了频频回头去看昨日的自己。我猜，B君不一定喜欢喝可乐，也不一定讨厌单身，但单身和可乐都足够廉价，能够让他清高地披着它们招摇过市，掩饰自己一跌不起的消沉。☑

一个包裹一生中的 24 小时

文 / 小刀微微

图 / 谢驭飞



首先，请允许自我介绍下：我是一个快递包裹，穿着层层的海绵气泡包装。出发前就有不祥之兆——书商没有完整填写收件人地址，空留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随车南上。在上海，快递包裹们在见到真正的收件人前，都会住在高楼大厦般的速递箱架中，等待各自的收件人输入密码提取。我的收件人小刀此时出门在外，快递员“大姐夫”和小刀通完电话后，就把我和另一个包裹扔进快递箱架中——另一个包裹肚子里是一架小小的儿童敲击钢琴，又轻又廉价——但我俩的架子被搞混了，于是奇特的 24 小时旅程开始了。

我被人取了出来，但很失望地扔在地上。新主人原本期盼着“儿童琴”，结果只发现一本超重的外文书。她自然没想到“儿童琴”正美美地待在我的箱架格子间里，也没想到联系真正的收件人小刀——过了一会，我被扔到了速递箱架边。

小刀来取快递了，可惜她不认得我。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琴”被她捧走。一位保洁阿姨上前拨弄了下我，还好，她又把我留在了原处。

小刀看到“儿童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联系了对方收件人，然后把“儿童琴”送到物业待领。“儿童琴”收件人告诉她，自己正在向玩具卖家据理力争一个新的免费儿童琴。而我只好眼睁睁又看着小刀再次从我面前走过。

书商发件人、广州的快递公司和“大姐夫”都联系了小刀，可惜，谁都搞不清楚我在哪。小刀觉得麻烦，想让书商再发本书，然后由快递公

司和书商接洽赔偿事宜。但书商坚持投诉快递。听说我只是本书，“大姐夫”打算直接赔给小刀了事。

出乎意料的是，我比那儿童琴贵十几倍。沉默了一会儿，“大姐夫”决定再好好寻找我的下落。小刀也决定帮助他。可惜此时，我已经不在箱架边。快递箱架公司有监控摄像头，可是他们不理睬“大姐夫”，坚持要求小刀（用收件所留的手机）联系箱架公司，他们才同意调查监控录像。“大姐夫”又联系“儿童琴”，想搞清楚应该回看的监控时间……

这时，箱架公司发现我被回收了，而且现在就在箱架中！原来，我被另一位路过的快递员发现，又放回到了箱架中，只不过收件人号码是随意填写的，而不是小刀。于是这位热心快递员的手机号码被箱架公司发送给小刀，小刀接力给“大姐夫”——几小时后，“大姐夫”终于联系上热心快递员，凭着单号和快递单上小刀的手机号码，再次取回了我！

系统显示签收的整整 24 小时后，我终于来到小刀手上。其间，小刀和大姐夫打过十几个电话，最后一个电话里，他简明扼要地要求小刀撒谎：“请务必在线上确认这个包裹是 24 小时前就签收的，没有超过时限，我怕……”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LG ROLLY 蓝牙键盘

内置蓝牙系统，可与任何电子智能设备相连使用。将其铺展平凡，把智能设备靠在带有磁性的一侧即可开始全键盘输入模式，功能和普通键盘一样。展开后变身全键盘输入设备，并会自动开启蓝牙，连接附近的LG的平板电脑设备，后期可能支持连接其他安卓设备。



索尼 H.ear 系列耳机

树脂材料与铝合金结合工艺，表面采用电镀铝合上色技术，搭载40毫米HD驱动单元，振膜原型镀钛，以确保音色无损，入耳式耳机腔体内外侧两个麦克风均配有数字降噪引擎，配以高刚性铝质腔体和镀银OFC耳机线，降低型号传输损耗。



FAKE NATOO 秋冬系列女装

本季FAKE NATOO依旧与意大利面料工坊合作，自行开发巨大图案的羊毛面料将游牧的大地之感融入温柔的穿着，来自青海藏区的Norlha（诺乐）面料坊专门为FAKE NATOO打造了一款浓厚的绿色牦牛毛毡布料，特殊的拉绒效果使得大衣摆脱了羊毛面料的厚重而变得极易穿着与打理。

CHLOE2015 秋冬季女装

以欢快清新的田园风情为灵感基调，柔和的淡色彩盘中注入了男装色彩元素，包括散发女性意味的紫罗兰、米黄、矢车菊蓝与深色海军蓝、石南绿、朱红、象牙白以及棕红色无间交织。立体触感的面料贯穿始终，从柔软的格纹绒呢、挺阔的麦尔登呢、复古灯芯绒到浓密羊毛、精致暗色蟒蛇皮。

宝格丽 DIVA 系列珠宝

采用标志性的弧线设计，其风格深深植根于繁华奢侈罗马时代艺术审美，采用色泽绚丽多变的材料，从闪亮的绿松石、青金石或珊瑚石到深色玛瑙与灵动的珍珠母贝，密镶钻石缠绕其间，同时适合于日常佩戴与晚宴正装场合。



Gucci Heloise 系列女鞋

标志性 4.5 厘米金色半月形鞋跟，方形鞋头。鞋子上的毛球材料为水貂毛，短靴为罗马角斗士风格，十字形多层绑带，绑带顶端以水貂毛球收尾。鞋子后跟有拉链方便穿脱。



宏碁 Revo Build mini PC

Revo Build mini PC 采用了 Pogo Pin 探针技术将所有的模块堆叠在一起，其中基础组建包括所有的必备硬件，如处理器、内存、硬盘等，除此之外，用户拥有极大的扩展空间，可以自选不同容量的硬盘、无线充电装置、显卡、声卡等。

刺绣手袋

以世界旅行作为主题，室内设计师卡罗·泰西娅推出“珍贵”系列手工刺绣牛仔布手袋。整个系列总共 38 款不同刺绣图案，引用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向卡通人物致敬，融合了艺术气息与古怪的幽默感。



绿松石项链

瑞士珠宝设计师苏珊·泽兹以对色彩及生活的热爱著称，她设计的这款 That's Amore 项链由 24 颗绿松石圆珠和一颗镶有超过 700 颗钻石的钛质多面圆球组成。绿松石这一铜铝磷酸盐矿物因为富含铁质，呈现出鲜明诱人的绿色调。



立式镜子

Cappellini 品牌的 PEG 落地镜以白蜡木为镜框，透过椭圆形镜子上端的圆洞，可以看到支撑镜子的三角架。这个镜中圆孔一方面为了呼应同一系列中的桌子，也显示出设计师 Nendo 对细节的注重。



无线耳机

Plantronics 的“BackBeat FIT”是一款轻量级的无线立体声耳机，带集成麦克风。它的主要特点是 P2i 纳米涂层的防汗防水设计，安全性为导向的功能还包括夜光以及让你听到周围环境的声音。



玻璃气球

Pulpo 品牌的 Oda 落地灯，黑色金属结构托起手工吹制的琥珀色有色玻璃灯罩。

受到德国摄影师贝恩德和希拉·贝歇尔拍摄的水塔照片的启发，设计师塞巴斯蒂安·赫克纳的目标是制造一个充满光线的气球。



我的小马驹

意大利奢侈品零售商 Luisa Via Roma 与美国孩之宝 (Hasbro) 玩具公司合作，推出“我的小马驹”时装设计项目，为“救助儿童”慈善组织筹集资金。巴尔曼、芬迪、米索尼、里克·欧文斯、罗伯特·卡瓦利、高田贤三和范思哲等众多时装品牌加入其中，对这件标志性的玩具进行高级时装改造，并在易趣上拍卖这些小马驹。

花卉图案

Littala 品牌的 Sarjaton 系列总共 26 件日常用品，包括托盘、储物柜、桌布等，从概念和设计都深深植根于芬兰民间传说和工艺。产品上面印制的 Varpu 花卉主题图案出自瑞典插画洛塔·奥尔森，以快乐花的力量充实人们的每一天。



织与造的传奇

中西风物：文明的交融

主笔 / 王星



描绘 19 世纪上半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水果季节集市交易景象的绘画作品



“东方”与“西方”，在汉语中原本就可以化为双关的“东西”，因此横亘在欧亚大陆及其海岸线外丝绸之路本身的走向自己就可以道出它最主要的用途。

为什么汉语中只有买卖“东西”而没有“南北”？《辞源》里的标准解释是：“此义云物产于四方，约言之曰东西，犹记四季而约言春秋。”《辞源》的解释来自清代梁章矩《浪迹丛谈》续谈》，但民间流传更广的解释来自清代翟灏的一则笔记，大意是：明崇祯帝向辅臣周延儒提出这个刁钻问题，周延儒答：“南属火，北属水，若在黄昏做晚饭时向别人借水借火，没有不给的；‘给’不能叫交易，因此交易物只能叫东西。”这一说法后来衍生为更加通俗的“东木西金”版本：东属木，西属金；木、金可以放在篮子里，而火、水不能用篮子装，所以“物”称“东西”，不称“南北”。

至于“东西”何时开始成为“物”，中国学术界至今难以定论。最早的定于汉代，但更集中的意见是唐代，当时东、西所以成为“东西”则被解释为：唐有“洛阳”、“长安”东、西二京，长安又有东、西二市，“东西”作为俗语完全可以再现商贾或市民逛市场时东张西望的景象。不过，这种说法在近年受到了挑战。有学者提出：宋以前文献中“东西”一词出现的频率远不及更传统的“物”，“动使”反倒五代时期频频被用作“物”的同义词，因此“东西”更可能是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动使”口音讹传。

事实上，就“货物”含意而言，中国史籍中最早的其实多是“南北”。南北朝就有《北史·魏收传》载：“南北初和……求南货于收。”至今一些怀旧的店铺还有“南北行”、“南货店”等名称。倘若依据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判断，明代之后其实是“东西”更安全的时期。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说“西产多珍，东产多矿”。“东矿西珍”不久超越“南北”成为明代海外贸易方言中的“东西”，并进而引申为市肆交易“四方物产”的专称。至少到嘉靖年间苏祐撰写《迺旃璫言》时，已经出现这种今人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说法：“世称钱物曰东西，称男子曰南北。……

意盖乡语相传有自来矣。”

即便汉代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开辟时很可能暂且只有东、西之说，丝绸确实都被路途两端视为好东西。以至于当1877年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为这片贸易区命名时，他也使用了“丝绸”。李希霍芬很细心地在著作中对“丝绸之路”采用了“Seidenstrasse”与“Seidenstrassen”单复数两种说法，而且并没有用该术语指称汉代之外的情况，但“丝绸之路”已经如同代替了“南北”的“东西”一样，成为描述欧亚贸易史最常见的词语。

丝绸甚至原本不是“丝绸之路”上最早流通的物品。倘若溯本清源，在东方语汇之外，陆上丝绸之路应该因马匹与皮毛交易而被称为“马毛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该称为“胡椒之路”。出现在贸易线路上的还有比马匹、骆驼或山羊更不能称为“东西”的奴隶交易。探寻“丝绸”这种人与自然共同成就的物品何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导贸易砝码，实际上也是在探寻东西方以心灵而不是纯粹足迹丈量彼此间隔的过程。千百年间商队们走过的路并非偶然地覆盖了——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所说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实现麦金德“枢纽地区”假说的核心条件是物资的流动。一方面欧亚间的地理枢纽为商队们提供了便利，同时他们携带的货物也成为这一枢纽最核心的推动力。

黄瓜、大蒜、芫荽、芝麻、核桃、葱、石榴、无花果、蚕豆、豌豆、豇豆、葡萄、苜蓿、茉莉、槟榔、杨桃、柰、莴苣、恭菜、菠菜、西瓜、海枣、扁桃、阿月浑子、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等，源于食物补给的贸易总是最容易被铭记，而香料、金银器、玻璃、棉布、野生动物制品等更多带有区域性人工附加值的贸易却并非总有丝绸那样的运气。麦金德1904年提出的欧亚大陆“枢纽地区”，同时代的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则提出“李约瑟

之谜”(The Needham Question)：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

“李约瑟之谜”显然是东方在经历“南北”出现“东西”后未必乐于看到的话题。不过，麦金德至少曾试图以西方视角解决当时西方面临的“李约瑟之谜”困境，进而提出“新地理学”：地理学的主要职能是“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相互作用”，而地理学发展的最大隔阂来自“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之间”，“地理学家的责任是建立一座桥梁”，同时“地理学必须研究历史以证实他所提出的关系”。对东方的好消息是：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无可抗辩的物质存在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地理与历史素材。

李约瑟曾将中国明代崇祯年间一位落魄举人宋应星誉称为“中国的狄德罗”。比法国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早半个世纪诞生的宋应星在闲暇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闲书：《天工开物》。成书后虽颇有“栏杆拍遍无人与共”之感，百年后却在西方获得了“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名。狄德罗亦因编写《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字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留名青史。在后世看来，狄德罗捎带的诸如“物质和运动不可分”之类哲学论断的《百科全书》使它堪称“理工书本中最文艺的”，正如对程朱理学深有研究的宋应星那本《天工开物》在东方眼光看来是“理学书中最不文艺的”。

中国明代之后讲究“器以载道”，其出处源自宋应星同时代人顾炎武所说的“非器则道无所寓”，只不过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上，更多时候不变的是器、常变的是人心中的道。如同东方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样，西方自古希腊也有“认识你自己”。倘若时光回转，其实必先知东、西，始知东西。换言之，当我们看到好东西，根底里还应回归东西的交往。☑

高尔夫R-Line 炫然上市



高尔夫R-Line “驭”见你的另一面

出类拔萃者岂止于循常一面？以稳健风格驾驭商业游戏，更让极限挑战成为你的拿手好戏！

高尔夫R-Line，创新动感演绎德式经典，“驭”见你的另一面！搭载全新一代1.4TSI发动机，以强劲动力呼应内心的澎湃；配备运动型真皮方向盘，集合换挡拨片、定速巡航、语音电话等众多功能，随心选择亦信手拈来；独有R-Line标识，在视觉上与你实现精神契合；17寸运动轮毂，与你一同丈量世界！

高尔夫R-Line，谨献给活出另一面的你！

惠聚“节能先锋”即日购车，享节能补贴3000元！

高尔夫R-Line



Das Auto.



土耳其商人的丝绸店

东方丝与西洋镜的平行宇宙

将东方与西方，替换成丝绸与玻璃，也未尝不可。虽然，这两者并不在我们的经验与知识谱系内，但它们之间东西相向的旅行及其命运，足够传奇。

主笔 / 王星

在最为“丝路繁忙”的大唐盛世过去 1000 多年之后，1851 年，以“世界博览会”为名的另一场为展现盛世而集结的盛事在英国伦敦开幕。虽然出现在描绘开幕式的油画上的那位神秘“希生老爷”实际上算不得真正的“中国嘉宾”，来自湖州的 12 捆“荣记湖丝”倒确实是中国商人徐荣村主动提供的展品。湖州自唐朝起就是重要的蚕丝产区，“荣记湖丝”最后获得了世博会金奖的确实至名归，但也该在意料之中：毕竟这是一场“日不落帝国”展示它光照寰宇能力的大庆典，而“丝绸”在当时的西方视野中依旧是完美的东方符号。英国对于自己的形象定位则毫不掩饰地以主展馆“水晶宫”的方式彰显在世界面前。直至今时，被奖项环绕的漂亮的中国丝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水晶宫”在以西方的方式炫耀着什么。

水晶宫的主要构建材料是丝绸的老相识：玻璃。东方的丝绸与西方的玻璃在丝绸之路上曾多次相遇，这是确凿的史实。然而，如同地球原本是三维的球体、地上的路在视觉中却往往只剩下平面映像一样，流转在丝绸之路上的太多物品在书本历史中也只留下平面化的符号：它们本应携手同行，中途却误入时空空洞的平行宇宙。对于丝绸与玻璃这两种东西方原本各自引以为荣的工艺来说，尤其隔膜如此。

织与造的神话

公元 1 世纪，古罗马皇帝尼禄 (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

身披来自东方的奢华丝绸观看斗兽表演时，由于近视，他佩戴了另外一件奢侈品：用翡翠精心打磨的单目镜片。虽然当时玻璃已经出现，而且是流向东方、对等于丝绸的贵重贸易品之一，但在烧制技术上还只限于制造装饰品、不足以承担如此精细的光学使命。尼禄时代的 1300 多年后，玻璃在西方羽化为“眼镜”，又花费 3 个多世纪出现在同样身着锦缎的清代皇帝康熙的鼻子上，却只成就了清朝一段烧制如同丝锦般精致的玻璃器的年代。耶稣会 (Societas Iesu) 会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在康熙即位前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和用中文撰写的《远镜论》同样不足以改变玻璃被视为“玩物”的命运，而与此同时，耶稣会在更早开拓的日本教区发展的生丝贸易却已经成为西方摆脱传统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禁锢的一条捷径。

即便如此，更宽广的宇宙中似乎始终有种同时眷顾着东西方的力量。早在丝绸与玻璃这两种人间技术可被考古发现验证的存在证据出现之前，天上对它们都存在宿命感的一颗星辰已经存在，而这两项技术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诞生神话放到了那颗星辰辉煌的年代。在东方丝绸王国的这一端，那颗星辰最常见的名字是织女星。

有关织女星的神话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上古年代。与“牛郎织女”这样的七夕节小清新故事相比，上古传说中的织女远为彪悍。据传织女属彘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首领，在距今 3 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

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据说她与燧人氏首领的联姻成就了伏羲与女娲的诞生。因人间盛名而命名天上星辰并非后世天文学的独创，于是当时北半球夏季星空中亮度高且位置相对稳定的一颗星便被命名为“紫宫”，也即后世所说的织女星。织女后来又衍生为包括丝绸在内的一切东方纺织技术的守护神。按照天文学的术语，由于地球位移的“岁差”因素，织女星曾经在公元前 1.2 万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担负着近似今天北极星的指路星任务。如果当时有横贯东西的商旅行进，他们依据的应当是“织女之路”。

从考古角度来看，“公元前 1.2 万年以前”依旧是一个智人与洪水传说纠缠不清的时期，对于当时东西交流的猜想还都只能在画里飞。幸好，作为天空星辰亮度的标准星，织女星是地球上东西方除太阳之外被最早密切关注的恒星之一，因此它早在古希腊的神话时代就已得到了自己的西方命名：“天琴座阿尔法星” (α α)。天琴座的希腊命名得自于俄耳甫斯 (Ὀρφεύς) 弃世后的那把诗琴。天琴座与玻璃间在西方的音乐关联直到 18 世纪后半期玻璃琴的出现才有所回应，但玻璃诞生的东方故事似乎早在织女星作为指路星的年代已经出现：中国上古传说中，织女的后代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五彩石落入人间后便成为“琉璃”。

关于“琉璃”是否就是“玻璃”，这是一桩考古界至今纠缠不清的公案。单纯从名称上看，类似现代玻璃的物件在战国后的中国历史中还曾有“陆



1851年伦敦世博会主场馆“水晶宫”内的观展

离”、“流离”、“琉璃”等别名，宋代之后“玻璃”一词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代初年，经历过“琉璃瓦”这层最后的词义混淆，“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建筑构件术语，因皇帝喜好而兴起的玻璃器工艺却使“玻璃”成为“奢华”的代名词之一。然而，风水轮流转。“料器”原本是玻璃烧制工艺的一种，待20世纪这一称谓成为玻璃器作为地方特产的代称，“玻璃”在词义上不再拥有昔日的华丽地位，以至于当21世纪中国开始兴起艺术玻璃烧制工作室时，众工作室纷纷以“琉璃”自名，以示与普通玻璃制品有别。

玻璃在汉语命名中的浮沉与它的诞生神话直接相关。早期中国玻璃器与它们同期的西方小伙伴最大的外观区别在于透明度。“壁流离”、“铸玉”、

“药玉”、“罐子玉”，这些更具东方色彩的别称暗示后人：无论是作为“琉璃”还是“玻璃”，这些人间烧制的物件都蕴含了近似于东方玉文化的天上梦想。女娲所炼之石又被称为“五彩玉”，同时也被传说为人间玉石的渊源。“玉”本为天然形成的“石之美者”，但传说中的“炼”字却足以留给后人无限的“人定胜天”梦想空间。现实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玻璃的诞生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烧铸青铜器时范模中的沙砾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原本平淡无奇的二氧化硅升华为仿佛天赐的梦幻晶体。在“琉璃”或“玻璃”被纳入佛教“七宝”之后不久，擅长炼丹的中国道士们也开始以“琉璃仙”或“琉璃师”自居。在公元86年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中，直白记载了中国早

期玻璃的东方式用法：“《禹贡》曰‘琳琅’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中国古人相信玉可使肉身不朽、而出自西域的“真玉”并不易得，中国早期玻璃器很自然地担当了“仿玉”的责任。如同安家瑶《玻璃器史话》所述：“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珪和握玉4种。作为葬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珪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现了。此外，玻璃璧自战国中期出现，汉代墓葬中还继续使用，这些玻璃璧也属于丧葬用玻璃。”

无独有偶，中国丝绸在早期也被



收藏在耶路撒冷的公元前后的玻璃小瓶，用于盛装香精和香水

赋予了更为主导的“引领灵魂”的力量。袁宣萍、赵丰所著《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说：“丝绸业一开始就是一项宗教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这一自然界中生命的奇迹令远古时代的人们无比敬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是一切宗教的根本问题。蚕的一生仿佛提供了一个答案。”“既然蚕的变化如此神奇而重要，蚕赖以生存的桑树就显得十分神圣了。从古史传说来看，桑林不啻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祭高媒之神（即生育之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进行祭天求雨活动。”“由于蚕与桑的神圣性质，丝绸也不会是普

通的织物。作茧自缚是模仿蚕蛹化蛾，是灵魂升天的必由之路。人们在死后直接用丝织物或丝绵包裹起来，等于用丝质的材料做成一个人造的茧子，在寂静中等待新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在中国与丝绸起源相关的神话中，无论是黄帝元妃嫫祖、蜀地蚕丛氏或是被江浙一带称为“蚕花娘娘”的马头娘，都多少延续了这种“茧此生以求来世”的观念。相形之下，西方对于玻璃的传说远为质朴，而对于丝绸来历的传闻更多几分类似于中国《山海经》中“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的迷幻色彩。西方有关玻璃诞生的最早记载源自古罗马老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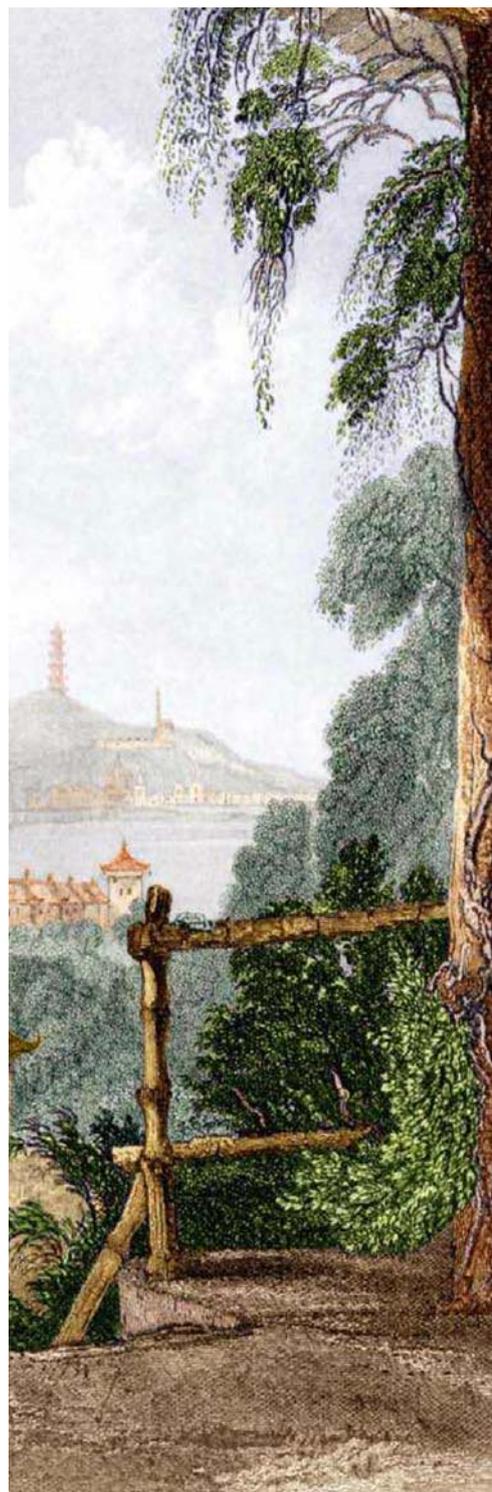
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79年留下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距离东方的王充记载“道人消烁五石”之时约10年。老普林尼的版本说：公元前3000多年前（也即中国神话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一艘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高船满载着被称为“天然苏打”的硝酸钾晶体在地中海沿岸航行，由于海水落潮商船搁浅，于是船员们纷纷登上沙滩，抬来大锅、搬来木柴，并用几块“天然苏打”作为大锅的支架在沙滩上做起饭来；饭饱潮起、准备登船时，船员在锅下面的沙地上发现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東西。老普林尼说：“其实腓尼基人发现的这种物质就是玻璃，它是岸边的沙砾和苏打在高温燃烧中发生反应生成的物质。”

不过，后世的实证考据已经证明老普林尼的记载有误，因为烹饪所需的温度远不足以炼成玻璃，而考古发现证实：远在腓尼基人搁浅烧饭前，埃及与两河流域已经具备成熟的玻璃烧制技术。西方玻璃的历史因此从起源就缺失了根本的神话色彩，反倒是老普林尼延续他一个世纪前的前辈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留下的丝绸故事成为影响西方很久的神话。维吉尔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恰逢张骞开辟丝绸之路而丝绸进入罗马之时，也正值古罗马发明玻璃吹制工艺、使玻璃容器日益成为民间消费品之时。古罗马从古埃及与古希腊延续了玻璃烧制工艺且发扬光大，只是无论制造出多少精致的玻璃器在那个年代也抵挡不住维吉尔《田园诗》（*Eclogues*）中东方幻境的魅惑：“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直至老普林尼的时代，这位死于实证的理工男还在《自然史》中颇具情怀地留下了这样的描述：“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闻名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维吉尔所说的“树上羊毛”正是蚕丝，而“赛里斯人”（Seres）虽然至今在考古学上仍定位不准，但指向中国。古希腊历史学家克泰夏斯（Κτησίας）最早在他的著作中用“Σήρες”来称呼产丝的国家，原意是“制丝的人”。在以引经据典著称的20世纪美国学者拉赫（Donald F. Lach）的鸿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里，关于“Seres”与“中国”间的关系则有这样的考证：“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年代，

中国被称为‘泰奈’（Sinae）和‘赛利卡’（Serica），当然后者更为常用。当中国被视为海路的末端时，就被称为‘泰奈’，中国的北部被认为是遥远的陆路末端的‘丝绸之地’，它被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彭波尼斯·米拉以及普林尼称为赛利卡。米拉断言，亚洲的最东部居住着三种人：印度人、赛里斯人和西徐亚人（Scythians），在这种划分中使用的名称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称呼：印度、中国和鞑靼。赛里斯人居住的地方最明显的特征是那里有丝绸。古代的作家们认为那里是一块位于有人居住的世界末端的幅员辽阔且人口稠密的陆地，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文明、公正、节俭。赛里斯人被认为不愿同其他族群发生亲密的关系，但是愿意把他们的丝绸、毛皮和铁器卖给外国商人。在奥古斯都时代，来自赛里斯的商人可能到达过罗马帝国的领土，但是很明显没有中国的官方使团前来拜访罗马城。”

无论“Seres”是否为中国，传承自拉丁语的“serica”（丝绸）已经在西方话语间留下了难以更改的印记。直到公元6世纪蚕种外传，有关“Seres”的归属才会引发更多的争论，而在公元之前的年代，“从树上梳出丝”确实更像对西方口味的神话，其迷离不亚于“爱丽丝漫游仙境”。以至于当神话已不存在的1700年后、英国派出马夏尔尼（George Macartney, 1st Earl Macartney）使团探寻与传说中的丝绸之国直接贸易时，带来的是他们想象中堪与东方丝绸神秘感匹敌的西方玻璃工业精品：望远镜。只可惜当时东方仍处于入茧待生的状态。20世纪法国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一本《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Récit Historique*）已经写尽当年的状况，但“树上梳丝”神话的破解还是从中国学者的笔下看来更有趣味。《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载：



“野蚕以桑叶为食，本是桑树的天敌，与桑树相伴相生，因此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从桑树的野蚕茧中抽丝挺符合“树上梳丝”的童话意象，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



西方绘画展现的 19 世纪中国蚕丝作坊

蚕茧更似乎给了中国蚕丝文化发源于公元前 3500 年前仰韶文化，也即与古埃及同时期大批烧制玻璃器同期的证据，只是这不利抽丝的半个蚕茧更容易让人想起先古年代的另一种选择：毕竟蚕蛹是可以吃的。因此《中国丝

绸文化史》又有说：“与桑树相伴的原始先民有机会接触到自然分布的大片野生的桑树与食桑为生的野蚕。可能为了吃蛹或是占卜、或是什么原因，他们切割、撕开蚕茧使得丝纤维松散，或蚕茧在雨水中浸泡导致纤维离解，

种种机缘使得人们对蚕结茧、茧抽丝这一自然过程有了直观的认识。”

东方丝国的琉璃梦

不管在东方是从树上梳出来的还



法国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

是吃出来的，丝绸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得到了与它原文发音类似的命名。玻璃却在中国古汉语中别名众多，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绝无仅有。南宋之后，经历过种种过渡，“玻璃”开始特指进口玻璃，“琉璃”或“药玉”等更具东方玲珑修饰方式的名称留给了国产玻璃，直至清代初年。古罗马留下了对丝绸最早的描述，并在本国玻璃业发展的盛期向正处于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出口了大量玻璃容器与玻璃珠饰。然而，时至公元12世纪前后“番琉璃”一词出现时，所谓的“番”却未必是罗马，甚至很可能东方心目中的“番”从来就不是罗马。

事实上，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就已将丝袍当作东方征战的重要战利品之一穿回了罗马，中国古代是否与地

中海意义上的罗马有过直接文化与贸易交往，这是一桩和玻璃的汉语名称一样芜杂的公案。20世纪80年代，有新闻称甘肃永昌镇内的骊靬村曾为古罗马兵团战俘安置地，至今仍有古罗马人的后裔和古罗马的遗迹。此桩公案因此又添加了不少热闹。虽然这段“中国—罗马交往佳话”不久就被学术界以各种论据证实为子虚乌有，但并不妨碍2015年初成龙主演的《天将雄师》上映时仍打着这样的招牌：“影片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讲述了保护丝绸之路和平的故事。”当年将骊靬与罗马联系起来的“证据”之一是：“骊靬”的发音与中国史籍中对古罗马的称谓“大秦”与“犂轩（黎轩）”近似。然而，根据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用40多万字的专著《骊靬梦断》论证出的结果，不仅“骊靬”与古罗

马毫无关系，“大秦”与“犂轩（黎轩）”也原本不是一家：“骊靬为西汉张掖郡所属县名，犂轩（黎轩）为《史记》、《汉书》所记西域安息国以北的亚美尼亚或塞琉西亚，大秦为东汉以后的中国典籍对罗马帝国的称谓。”

中国与大秦最近距离的主动接触是在公元97年。《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安息西界的西海就是今天的波斯湾。甘英究竟为何止步西海，至今是历史谜案。激进如康有为甚至曾指责甘英胆小怕死，他的怯懦导致了近代文明的不发达，中立一些的学

者则认为是当时安息国内的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不过如今听起来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安息国是汉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东方的丝绸与西方诸如玻璃之类的奢侈品都经安息商人周转贩运，倘若汉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安息就会失去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权。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安息人一味强调渡海的艰难，没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经由叙利亚抵达大秦的陆上路线。

东出大秦受到阻碍，近一个世纪后，大秦的使者倒似乎来到了汉廷。《后汉书·西域传》又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桓帝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依据这一年份，如果真的是来自古罗马帝国的使者，“大秦王安敦”就应该是“帝王哲学家”之称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西方贤王遣使拜谒东方皇帝”，这听起来在气场上完全不亚于公元元年“东方三贤人”那场向西的朝拜。更能诱人浮想联翩的是：在使节拜访汉廷约4年之后，马可·奥勒留开始撰写他的名著《沉思录》（*Tὰ εἰς ἑαυτὸν*）。《沉思录》以古希腊语成书，假如书中能寻得几分东方儒家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这部著作将成为集三大古文明精髓的奇书。然而，西方的史料中对此遣使却没留下对应的记载，只记录下马可·奥勒留在公元166年正忙于征战两河流域一带的塞琉西亚（Σελεύχεια）、也即中国史籍中曾与“大秦”混淆的“犛轩（黎轩）”。另有说“大秦王安敦”应指马可·奥勒留的前任安东尼·庇乌斯（Anthonius Pius）。安东尼的名字固然在读音上更接近“安敦”，只是这位皇帝在公元161年就已去世，除非那位忠诚的使者是此前就从罗马出发、跋涉近5年到达中国。然而，“日南徼外”这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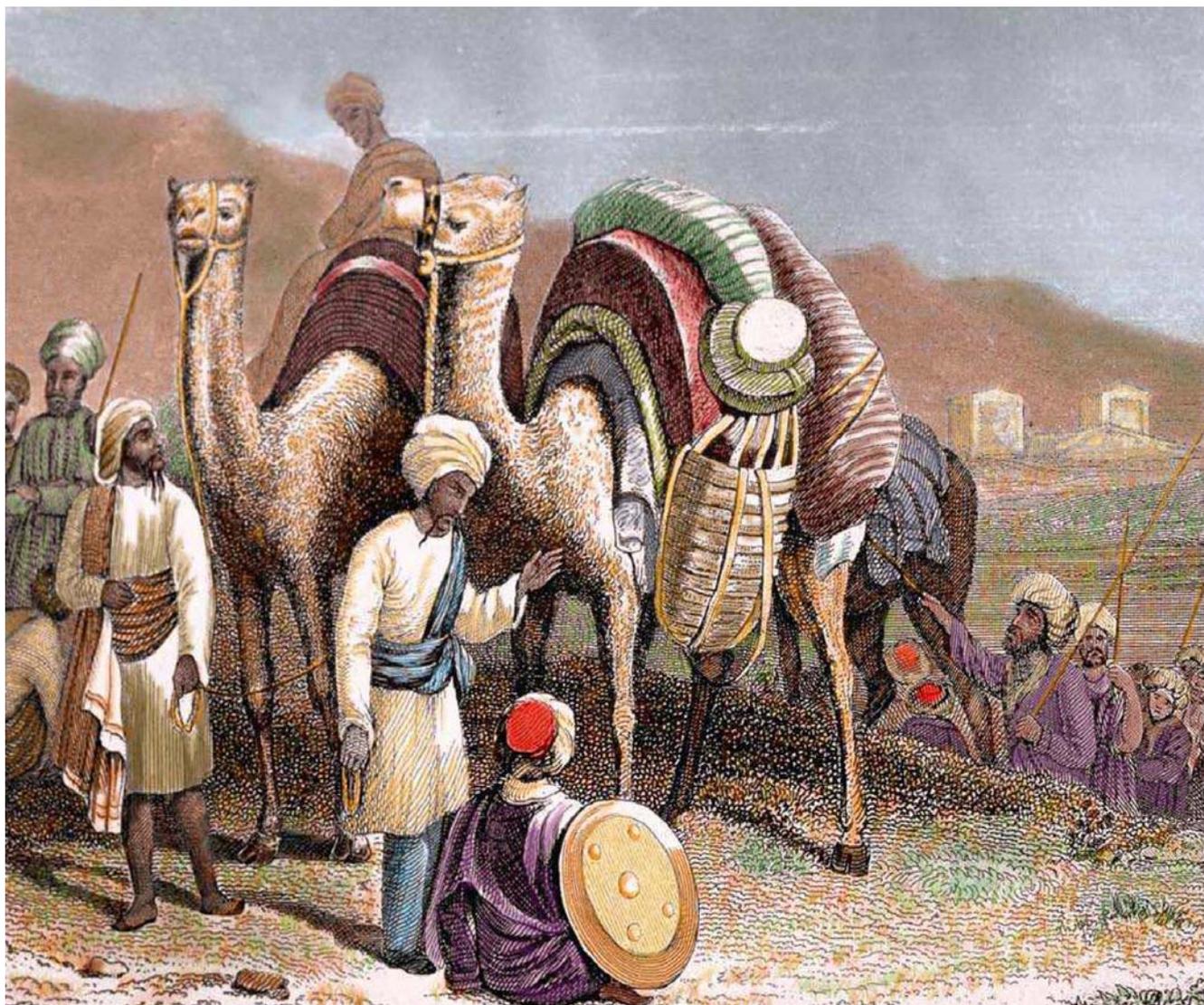
法似乎又证明使者的出发地并非罗马：即便与现今越南境内曾被西汉设郡的“日南郡”无关，但“徼外”毕竟是汉代对西南部以四川、云南为代表的“荒夷之地”的通常说法，且“日南”即便不是专有地名，也是“在日之南”或者说在北回归线以南之意。综合以上，因此近年一些学者的猜度也许不无道理：使者并非真由罗马皇帝派遣，不过是些打着御使的名义进入东方宫廷、试图在贸易上获得来自东方皇帝的特殊优待的南疆商人。

“大秦王安敦”使者以“官方”身份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在中国史书上得到的评价却是：“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有关“珍异”的传言，理应来自之前周旋于罗马与中国之间进行掮客贸易的商人，而他们曾为东方带来的商品也确实远比“象牙、犀角、玳瑁”琳琅多彩。《魏略·西戎传》中就有记载：天竺“其西与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琅玕”是中国古代对玻璃的诸多称呼中又一种，与它的很多小伙伴一样，确切的含意已经湮没在历史的辞藻罐头里。汉语在奢侈品描述方面从来不乏创意，其实也早就为丝绸创造出同样丰富的词汇。东汉成书的《说文解字》“糸”部共收字248个，多与丝织品相关，依工艺不同划分出的品种就有锦、绮、绫、纨、缣、绉、绢、縠、绣、縠等。由上古到汉代，中国丝绸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当时世界领先的纺织技术，在提花织锦方面尤其堪称一绝。可是，正如汉语中琳琅满目的丝织用词到罗马都简化为以“serica”为原型的各种相似词汇，《魏略·西戎传》中的这段记载铭记下了当年中国丝织品进入西方的古怪命运：“（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中对此有更为通俗的描述：“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有哪个罗马商人

曾穿过其西部的入口到达了中国，或者哪个中国人曾横跨大陆到达罗马意大利的边界之内，但穿越大陆的要道仍然被有条不紊地开凿着，以便于搬运着大量天然纺织丝绸的商队通过，他们把这些丝绸运往黎凡特地区，装载到去欧洲的货船上。大批的中国丝绸在叙利亚和埃及被重新加工，以满足罗马人对于半透明的以及色彩艳丽的纺织品的嗜爱；显然，沉重的、有图案的中国丝织品对于罗马人基本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拆丝重纺，“重新加工”的另一重要环节是染成罗马人“嗜爱”的“色彩艳丽的纺织品”。对于自先秦起就尊五行，相信君子只应服白、青、黑、朱、黄五种“正色”的中国人来说，庞培最初披回罗马炫耀的那一袭紫色丝袍并不合礼仪，甚至不啻犯了《论语》中所说的“红紫夺朱”之恶，也即用“间色”以邪夺正。不过，公平些说，当源自中国的种种寄托有不死成仙梦想的云纹丝锦在中亚被拆解以满足古罗马审美趣味的同时，古罗马人引以为豪的手工玻璃器在当时中国市场得到的也是类似诡异的待遇。

在织女星已经不再是指路星时，连贯东西的路程出现迷乱也是正常的。古罗马虽然不是玻璃诞生的故乡，而且据美国学者恩格尔（Anita Engle）考证，中国最初玻璃器的出现实际与公元前7世纪伊朗高原上的胡里安人（Hurrians）有关，但古罗马在公元1世纪发明的玻璃熔炉以及由此演化出的玻璃吹制工艺在世界玻璃制造史中被公认为是与蒸汽机出现同等的里程碑式事件：玻璃熔炉使大批量高质玻璃原料的生产不再困难，吹制工艺则赋予玻璃更多的造型与量产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为大型透明平板玻璃的出现铺垫了道路。传说古希腊时代阿基米德曾用巨型玻璃凹透镜聚集阳光火烧古罗马舰队，即便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个比数世纪后东方“借东风”烧船



在丝绸之路上稍事歇息的骆驼商队（19世纪版画）

更具美好想象力的故事，但是潜藏了西方比“织云纹锦以近天”更执著的“探天”梦想。光学玻璃透镜是包括天文望远镜等光学仪器得以发明的基础，而透明平板玻璃是光学玻璃出现的先决条件。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有公元1~4世纪的古罗马平板玻璃残片，更重要的是，他们造出了透光度能够用于灯具的吹制玻璃。

德国艺术史学者、玻璃史专家萨尔登（Axel von Saldern）在其著作《古代玻璃》（*Ancient Glass*）中指出：吹制玻璃技术的发明无疑是玻璃发展史上的革命，而罗马人对于吹制玻璃的贡献并非仅限于技术上的革新，

更重要的在于对它的推广与普及。“在罗马统治下，希腊玻璃中心生产的奢侈玻璃品很快就被新的玻璃形式所取代：容器和餐具，这完全是罗马的发明。”“如果能够看到一个典型的罗马贵族从出生到死亡这一生中与玻璃结下的全方面的不解之缘，我们完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玻璃在古罗马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比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重要得多。（罗马人）第一次洗澡就可能用到贮藏在玻璃瓶中的橄榄油，甚至连喝奶的奶瓶都是玻璃制造的，这已经有考古发现为证。”

然而，陶瓷早已在中国抢占了玻璃在罗马的地位。至于玻璃本身，它

的透光度、样式与尺寸大小等等并不是当时中国场所关心的。当中国的丝绸日益花团璀璨之时，却恰值古罗马追求丝织品如东方玉文化一般返璞归真；同样，当古罗马烧制透明玻璃容器的技术益发成熟，中国却依然还在纠结玻璃珠中哪些是天然的“真玉”。

玻璃最初在埃及和西亚诞生时主要被制成珠形饰品。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也是出现在春秋时期墓葬里的玻璃珠，但这些玻璃珠出现得太突兀，而且烧制技术过于成熟，因此更可能是贸易得来而不是本土制造。当中国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的玻璃工匠依据如同青铜器铸造一样的模压

成型技术试制“璧流离”，或是道士们用炼丹的方式“烧炼珠玉”，他们追逐的都是一个梦想：以人工技术仿造出西方天然出产的“真玉”。“东方琉璃世界”的概念在汉代还没传入中国，否则东方的梦想者和传说出产“真玉”的“西方极乐世界”里的同行真应该坐在一起喝个茶、吃个面包什么的。公元三四世纪以后的中国魏晋文献中曾比较明确地将“琉璃”与人工玻璃建立起关系，例如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只是即便在西域已通达的唐朝，仍有学者如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说：“《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异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谓皆销治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真，实非其物也。”

对于今人来说，古人对“琉璃”与玻璃之间的东西方误读可以很简单地用化学常识解释。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西方则是钠（钾）钙玻璃，差别在于烧制时因地制宜使用了不同的助熔剂。西方最早的玻璃配方来自亚述人的楔形文字记载：60分砂、180分海生植物灰和5分白垩。大量植物灰的使用与当地曾经丰盛的草木有关，而其中钾离子的间或存在为数世纪后耐高温的化学玻璃容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国玻璃最初的配方则很大程度上源自又被称为“铅汞之术”的炼丹术。成分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玻璃不同的特性，又因为中国古代玻璃属于低温烧成、退火工艺不成熟，轻脆易碎、不耐高温、透明度差都成为它易被诟病之处；由古罗马工匠将其工艺完善的钠钙玻璃则属高温烧成，是如今所称的“普通玻璃”的前身。不过事实上两种玻璃本无绝对的优劣之分。19世纪西方开始以“水晶宫”这样的全平板玻璃建筑来炫耀自己的工业技术，但也同时发现千年前中国烧制玻璃时

使用的氧化钡可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是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虽然同样的折射在当年中国道士眼中可能只是炼炉中珠玉一道无伤大雅的晕彩。

如同古罗马的贵族最初只欣赏东方蚕丝的轻盈一样，在丝绸与玻璃最初相遇的年代里，玻璃注定要以更原始的状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价。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这种贸易颇似远程相亲。在2000多年前，东西间的远程贸易也确实因为一股中间力量变得益发复杂。“安息”不只是一个在甘英止步于海边才被中国史籍提到的地名，与它的汉语字面意思相反，安息是当时东西方贸易间最为活跃的代号之一。自从公元224年被波斯萨珊王朝（Sasanid Empire）征服后，地处伊朗高原的这片地区在史书中更多以“萨珊”名称铭记，它目睹了东方自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直至唐代开国的历史，也见证了古罗马帝国的分裂与西罗马的灭亡。虽然萨珊王朝止步于公元621年，却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新老客户各自留下了“萨珊玻璃”与“波斯锦”两种特产。

由于对“真玉”的膜拜，古罗马吹制玻璃技术制作的容器在汉代难免有“匠气”之嫌，虽有源自古罗马的玻璃瓶在中国东南沿海出土，而且广西出土过不少很可能效仿了古罗马玻璃烧制配方与吹制技术的含钾的本土玻璃容器，但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玻璃容器仍沿用了原有的铅钡配方以及浇铸成型技术，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玻璃盘与玻璃耳杯就是典型代表。尽管这些玻璃容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自制玻璃器皿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也显然远不及同墓穴出土的金缕玉衣。真正将吹制技术与迥异于中原器型的玻璃器皿销往东方的是萨珊。萨珊所承继的是一个对于玻璃贸易原本就不陌生的文明。古罗马帝国没落之后，萨珊将本国原有的掮客角色改换为出品商。由于萨珊风

格玻璃器的大量出现，虽然西方玻璃的成分不曾改变，但玻璃的用途在东方视角中日益固化为人工雕琢的奢华装饰器。

最早借鉴萨珊玻璃烧制技术的是广州的玻璃制造业，他们依照中东玻璃的配方制造出国内早期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有记载：“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考古发现表明，此时广州的玻璃烧制业除透明玻璃碗外，也自行烧制过其他颇具创新器型的日用玻璃器，水平远超过北方地区。然而，南方玻璃业大约在公元4世纪以后逐渐没落，原因至今不明。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丝绸业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于原料获取不易、织制工艺烦琐，丝绸自战国后就被视为近似于黄金的货币替代品，恰如玻璃在古埃及与古罗马曾被称颂为贵于黄金。汉代出现了纺织效率更高、成品质量更好的斜织机，这本可以使丝绸如同玻璃一样走向更加日常的领域，恰如罗马玻璃获得了高温熔炉一样，只是由于当时丝绸更经常地被中国皇帝频繁用作赐予“番邦”或结交于“夷国”的礼品，中国织匠的心思也更多用于如何更加工巧地织就种种云纹、祥兽与诸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类的铭文。早在萨珊玻璃取代罗马玻璃进入东方之前，东汉时期东方对于丝绸之路西端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甘英出使之时，丝绸织造技术的发展倒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中国丝绸文化史》中记述：“东汉可能已出现花本式提花机……《西京杂记》中记载巨鹿陈宝光家用‘一百二十蹶’的织机织散花绶……各种织机都使用了踏板连杆装置，有用踏板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也有用挑花方式先预制一个花本、用花本来间接控制经丝提花的。这种思路与工艺实现手段，导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提花机的发明。”

萨珊王朝崛起之时，中国正值各种心机远超于织机上的经纬纵横的三国时代。三国时不仅提花机得到再次改良，大批人口的南迁也将原本重心位于山东与中原的丝织业逐渐南移至四川与江南。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孙权也在宫中设立了官营织造机构。丝绸曾经成为三国那个神奇年代纵横捭阖的砝码之一，也成就了闻名后世的蜀锦。然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间更为辉煌的倒是因石崇、王恺等豪族斗富而存史的萨珊玻璃器。《魏书·西域传·大月氏》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大月氏在三国末期已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灭，因此这种令“中国琉璃遂贱”的“五色琉璃”很可能就是萨珊玻璃。

在魏晋那段成就了种种名士的逸闻和玄言的“世说新语年代”，萨珊玻璃的出现却也同时为各种豪富故事提供了材料。《洛阳伽蓝记》载：“后魏河间王琛为豪富……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瓿、槃、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色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尽管西晋傅咸曾写《污卮赋》，还在感慨心爱的玻璃酒具误被顽童掷染尘埃，此后不能再似赏玉一般把玩，被素有洁癖的东方玉文化压抑了数百年的西方玻璃器终于在此时获得了一篇更直接的颂词——与傅咸同时代的潘尼曾作《琉璃碗赋》。晋代张隐《文士传》载：“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尼于座立成。”曰：“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非停。灼烁方烛，表里

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捏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琤而外见。”

史载傅咸比潘尼大11岁，“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比傅咸晚7年去世的潘尼“稳静恬淡，不与人争利”。所谓西方“真玉”与东方“琉璃”间的纠结难得地在那个纠缠不清的年代出现了东方式的拈花一笑，东方工匠也不失时机地在此时为源自西方的玻璃工艺敞开了大门。魏晋时期，玻璃吹制工艺进入中原，产生了大量产自本土的效仿萨珊玻璃的器皿，“吹制”更代替“模压”成为北魏之后中国玻璃最主要的生产方法。从西汉到下一个堪称“东方盛世”的唐代，中国丝绸的图案与花纹排列方式中经常也可以看出西域的影子，只是已经很难说这期间东西方到底各自影响了谁。因为考古发现和史籍证明：先于萨珊王朝时期，蚕的繁殖以及蚕丝获取的知识已经被丝绸之路西端的许多国家以及中国东面的朝鲜和日本共同分享。

开放的蚕种与隐秘的镜厅

谈及中国丝绸，很多中西书本上都会出现这样的说法：“中国对育蚕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情况却很有可能与此大相径庭。从史书上看，至少中国对于自己的东邻没有保密。《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田蚕织作。”因此，早在殷商时期，中国的蚕桑技术可能就传到了朝鲜。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暂无史料可查，不过《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正始四年（243）倭王派使八人，来献倭缎。”由此看来，丝绸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应晚于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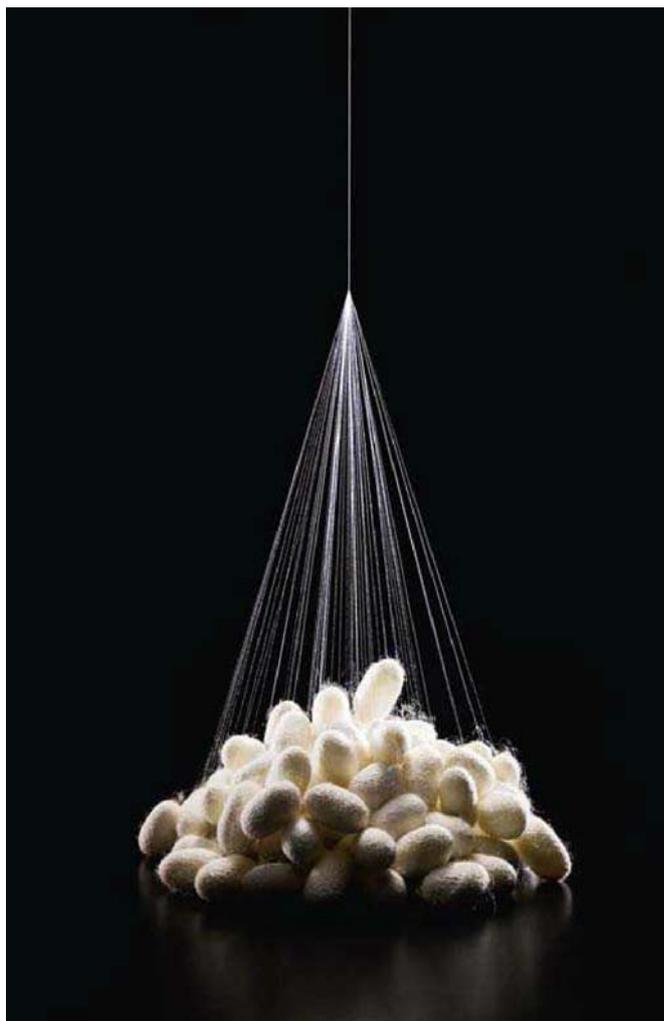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4年提出：“中国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

密，日本以及所有远东国家的桑蚕业，都是传自中国，今日全世界的养蚕技术，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导源于中国。至于拜占庭在6世纪中期如何由中国学得此术，在当时中国并未注意及此，中国任何方面不反对外人学习养蚕法，也无人主动地向外传播养蚕法。此事在拜占庭恐怕也只有少数人知其内幕。这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一方面是故意神秘其说，以抬高桑蚕的地位；一方面是贼人喊捉贼，是他们自己一个不可告人秘密的恶意反射，因为他们学得饲蚕术后，立即定为国家的秘密，禁止外传，以便拜占庭政府可以垄断。拜占庭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编造的这样一篇彻头彻尾的胡诌，欧洲的历史学者不做思考地传抄了1400年。”

忽略种种文字上的铿锵，有关丝绸外传，在中国史籍上其实真有一个久已流传的“东国公主”故事。故事的最初来源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其中记载：西域瞿萨旦那国原无丝织业，国君求婚于“东国”，央求“东国公主”将“东国”禁运的蚕种暗藏于帽冠带入瞿萨旦那国，由此获得丝织的秘密。后世考证“瞿萨旦那”是梵文“Gostana”的音译，地处今天新疆的和田，古代又称“于阗”。于阗最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也即秦统一中原前后，立国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年代，特产东方梦想中的玉石。20世纪初，匈牙利裔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和田东边的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一处佛寺发现的木版画似乎证实了这则故事，故事又因该版画闻名于世。尽管如此，现代中国学者对于玄奘记载中“东国”的考据却产生了另一种说法。拜占庭史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提出：“玄奘记载中的‘东国’是否指当时的中原王朝？中原王朝嫁公主于西域是国家大事，史书必有记



桑蚕



蚕茧与被抽出的蚕丝

载，而中原王朝史书无公主下嫁于阗的任何记载，说明故事中的公主并非来自中原王朝。”“欧阳修《新唐书·西域传》记于阗也提到此故事：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将‘东国’改作‘邻国’，说明作者已经明白公主和蚕种都不是来自中原王朝。有的学者认为‘邻国’很可能是楼兰（鄯善），是有道理的。”

有关蚕种西传的西方故事始于玄奘在译经业余写下《大唐西域记》之际。玄奘卒于公元664年，次年武则天登基，依稀让人想到织女星曾为天“紫宫”的年代，只是之前西方已经出现

关于丝绸的另一些传说，也即那些被雷海宗斥责为拜占庭“编造”的故事。不过张绪山在论文中提醒：“毫无疑问，雷先生指出中国从来没有保守过养蚕法的秘密的事实，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文献中找不到禁止养蚕法外传的记载。不过，他断言是拜占庭帝国的少数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故意神秘其说’、‘贼人喊捉贼’，则是不确切的，从拜占庭原始史料中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东方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存世的拜占庭文献中有三处记载，其中以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的重臣、公元6世纪初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可比（Προκόπιος ὁ Καισαρεύς, Procopius of Caesarea）在《查士丁尼

战记》（*ὑπὲρ τῶν πολέμων λόγοι*, De Bellis）中的记载最为详细。张绪山根据希腊原文译出了这段故事：“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注：公元552年前后），几位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到达这里，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丝绸，便前来拜见皇帝，许诺说他们可以设法弄到丝绸，使罗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他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Σεξίλδα, Serinda）的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出丝绸。查士丁尼皇帝细加追寻，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修士们告诉皇帝，产丝者是一种虫子，

天性教它们工作，不断地促使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赛林达）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蚕卵，蚕卵产出后很长时期，以厩粪覆盖，使之孵化——厩粪产生足够热量，促成孵化。修士们做如是解释后，皇帝向他们承诺，如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必将酬以重赏。于是，教士们返回印度，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培植蚕卵，成功地孵化出蚕虫，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建立起来。”

在普罗可比之后，拜占庭还有两位历史学家记载过此事，分别是公元6世纪末的赛奥凡尼斯（Θεόφανης, Theophanes of Byzantium）和12世纪的佐纳拉（Ἰωάννης Ζωναράς, John Zonaras）。佐纳拉的记述极其简单，赛奥凡尼斯的版本倒是为学者考证东方蚕种的输出途径提供了不少有趣的佐证：“查士丁尼执政时，某一位波斯人在拜占庭展示了丝蚕孵化之法。此前罗马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位波斯人离开赛里斯国（Σήρες, Seres）时，以手杖盛蚕卵，将它们带走，安全地携至拜占庭。阳春告始，他将蚕卵置于桑叶上。蚕以桑叶为食。蚕虫食桑叶后长成带翅的昆虫并完成其他任务。后来查士丁皇帝（查士丁二世，565～578年在位）让突厥人观看育蚕吐丝之法，突厥人大为吃惊，因为当时突厥人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这些市场和港口从前曾为波斯人所控制。”（张绪山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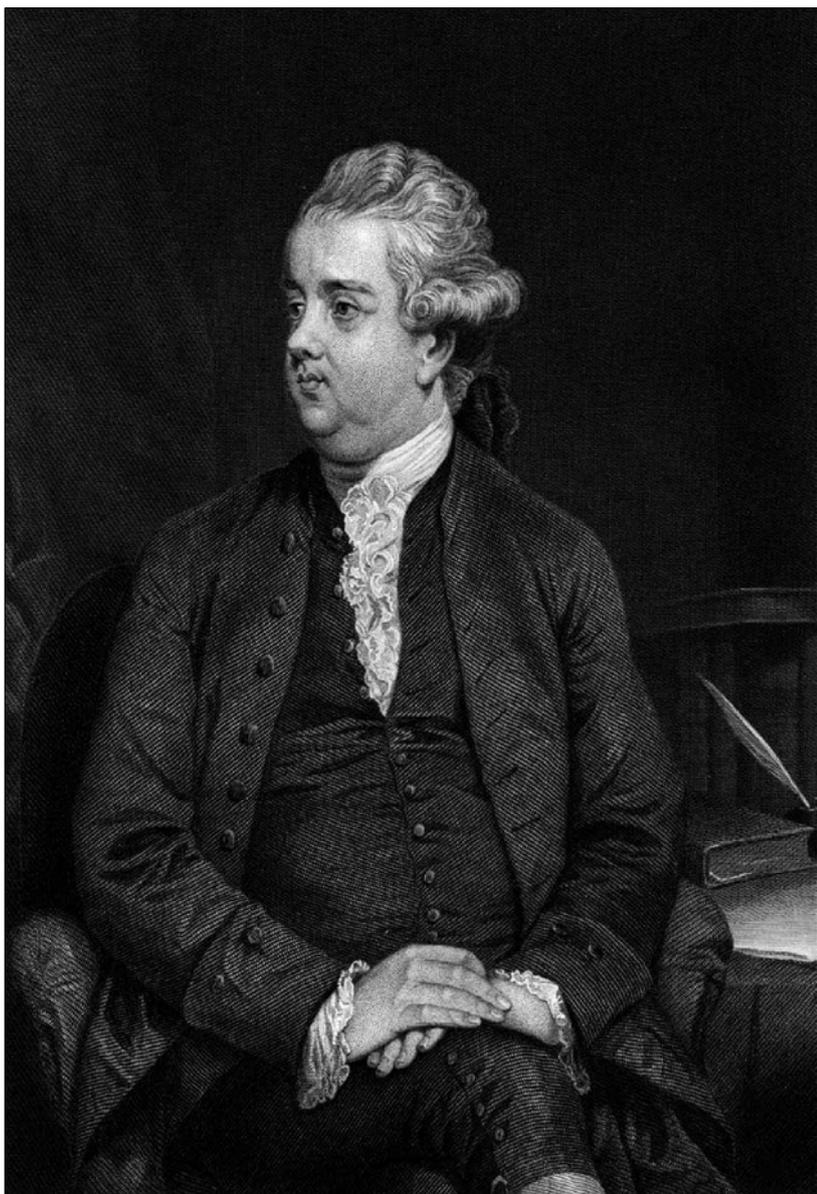
在这一版本中，不只是神秘的“赛里斯”再度跟随更加暧昧不清的“赛林达”出现，而且几位“印度修士”变成了一位颇具“世界贸易大同”精神的波斯人。“赛里斯”与“赛林达”的定位问题在挑战度上堪称中亚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两个地名如同哥德巴赫猜想中那两个不拘管辖的

质数一样、至今不肯就范于史学家们为它们划定的任何区域。在19世纪后期，也即来自中国的生丝出现在伦敦第一届世博会后的那些年代里，包括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英国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乃至探险家斯坦因在内的西方研究者都普遍认为：“Serinda”是一个类似印度支那（Indo-China）的复合词，表示介于“赛里斯”和印度之间的中间区域，很可能是和田。近一个世纪后，中国学者季羨林也附议：“所谓赛林达就是指的新疆一带，再缩小一下范围，可能就是和田，因为和田是最先从中国内地输入蚕种的。在古代，和田一带的确住过印度人，那么印度人从这里把蚕种输入罗马也就不足怪了。”然而，这并不能阻止“赛林达”们开始各种如同“克里克里巴巴变”一般的变身。美国历史学家赫德逊（Geoffrey Francis Hudson）在20世纪初提出：赛林达（Serinda）指的是交趾支那（Cochin-China），更确切地说是柬埔寨。同时代的法国东方学家戈岱斯（George Cœdès）则认为赛里斯人居住的地区应在“突厥斯坦”。不仅如此，在大量辑录和研究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有关东方的记载后，戈岱斯得出一个更具东方色彩的结论：“如果这一名词明显起源于东亚，那么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泛指许多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

张绪山在2008年的论文中则提出：“就普罗可比和赛奥凡尼斯的记载而论，关键在于赛里斯地望的考证，因为普罗可比的‘Serinda’实际上是由‘Ser(es)’和‘Ind(i)a’两部分构成，它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赛奥凡尼斯记载中的‘Seres’。”“普罗可比提到由米底（Media）进口到拜占庭的‘米底布’时写道：‘这就是丝绸，人们现在习惯于用它制造衣裳，从前希腊人称之为米底布（Medic），现在

称之为赛里斯布（Seric）。’从前希腊人称丝绸为‘米底布’，说明直接经营丝绸贸易的中介者是波斯西北部的米底人（Medians），是他们将丝绸卖给希腊人；后来拜占庭人称之为赛里斯布，说明当时他们知道赛里斯人是丝绸的主人，米底人不过是居间经营者，并非生产者。”米底人公元前9世纪为亚述的臣民，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击败后与波斯人融为一体。时至赛奥凡尼斯书写历史的公元6世纪后期，米底人似乎在商业上也遭受了挫折。赛奥凡尼斯的蚕种故事暗中引出了一个即将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族群：粟特人（Sugda）。查士丁二世向突厥人展示“育蚕吐丝之法”，更多近似某种外交上的实力炫耀。拜占庭曾长期挣扎在波斯对东方丝绸贸易的垄断之下，突厥的崛起给了拜占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机会，只是在此之后仍未突破与突厥联盟的粟特人的贸易网。当代希腊历史学家科尔多西斯（Μηραή Κνξδῶζεο）认为：“鉴于白匈奴人控制的地区为波斯人和突厥人所瓜分，前者得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者得到了粟特地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赛奥凡尼斯的赛里斯国（普罗可比的赛林达）应是粟特地区。此外，根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Μένανδρος Προτήκτωρ）的记载，突厥统治时期，主要是粟特人居间将丝绸卖给拜占庭。”

“突厥”本身就是又一个身份混乱的名词。因此，尽管19世纪后期的英国汉学家裕尔已经相信赛奥凡尼斯的记述可视为“考定赛里斯人和中国人为同一民族的最后一个环节”，21世纪中国学者张绪山的论文在累牍考证后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地域范围内，我们知道已有几个地区早已掌握了育蚕术；和田在419年掌握了育蚕术；6世纪初叶，这项技术不仅已传到拔汗那（费尔干那）和粟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

特地区，而且还传入了木鹿绿洲和里海东南岸的古尔甘。因此，无论认为从和田还是中亚其他地区获得育蚕术，都是可能的。至于具体地点，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尚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的考订。”

东方蚕种在中西史料中的走向几乎像陆上丝绸之路里的沙丘一样飘忽不定，不过侧面留下的好消息倒是：中国真的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否则很难如此四面开花。普罗可比版蚕种故事中“印度修士”的出现给这一原本可能不是秘密的谜案

笼罩上另一层迷雾：蚕种西传或许根本源于海路。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因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而为后世敬仰，但书中对蚕种西传的记述倒更近似于诗而不是史。在吉本笔下，“印度修士”与“波斯人”被融合为“波斯教士”，他们“对宗教或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对其祖国的热爱”，“骗过了一个富有嫉妒心的民族”，从当时东方丝国的都城南京出发，借海路千里迢迢完成了“手杖偷运蚕种”

的使命。故事的大结局是：“查士丁尼之后即位的皇帝时期，出使拜占庭的粟特使节承认育蚕制丝业方面罗马人并不逊色于中国人。”

在吉本生活的年代，欧洲人还想象不到将蚕种藏在手杖中长途跋涉的成活率，因为欧洲再度尝试重现这种神话还要等到近100年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齐思和对比吉本的描述及依据的拜占庭史料后得出结论：吉本的记述“开启了后来学者的普遍性偏见”。吉本的影响甚至延续至20世纪前期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é Étienne）的著作中，在他1988年的名著《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里仍可见到这样“镜中世界”般的文字：“如果在6世纪中叶，丝绸的秘密已泄露给西方，那是由于两名景教修士蓄意为之。他们以非法走私偷运的方式把珍贵的‘蚕种’藏在一根空心竹杖中，成功地把活蚕种一直带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使查士丁尼皇帝创建了养蚕业，由此而诞生了欧洲的丝绸工业。正如我们今天各个国家都争相利用间谍诡计而窃取核武器或电子计算机的机密一样，当时的基督教修士们的情况也如此，他们无疑都愿意冒着被处死的危险而完成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惩罚那些泄露制造最漂亮丝绸秘密的人。”

普罗可比曾说有“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间隔2000多年后安田朴又提到的“景教修士”，这些确实能颇具诱惑力地令西方设想早年东方已对西方信仰有所崇敬，恰似当时东方梦想西方的“真玉”世界。公元431年，聂斯脱利派（Nestorian）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教徒陆续遁入东方避难，正值“才高八斗”的谢灵运开创山水诗、却不能善终于山水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6世纪初，聂斯脱利派已在现今的印度及其邻近地区颇具影响，传入中国则是在唐贞观九年（635），后来的中国史书称其为“景教”。



唐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中考证：“聂斯脱利派教徒向东逃亡，经叙利亚、两河流域和波斯向东传播。5世纪末景教已在中亚的嚧哒人中发展起来。498年，波斯王卡瓦德与其兄弟争夺王位失败逃亡嚧哒，受到嚧哒人景教徒的善待和帮助。5世纪末6世纪初，出生在埃及的希腊商人科斯马斯在游历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时，曾听到巴克特里人、匈奴人(嚧哒人)、波斯人和其他印度人中大量基督徒活动的情况。549年，嚧哒统治者曾派遣一名基督教教士前往萨珊朝首都，请求波斯境内的景教首领马尔·阿布

哈一世(536~552)任命这一教士为所有嚧哒基督教徒的首领。景教徒活动的地区，正是传统上希腊罗马人称之为‘赛里斯’的地区，将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育蚕术传达到拜占庭，是可能的；而且他们长期活动在波斯境内，有资格被称为‘波斯人’。景教初传中国时，景教徒曾被称为‘波斯僧’，景教被称为‘波斯经教’，可以为证。事实可能是，景教徒在得到拜占庭皇帝的许诺之后，从中亚某地得到蚕种，然后从里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之路到达拜占庭人控制的黑海港口，再将它们带到君士坦丁堡。因此，我们不妨推断，

这些活动可能就是十余年后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盟的先声。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联盟期间(568~576年)，突厥—粟特人使节的往来穿梭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

西方史籍中“赛里斯”与“赛林达”的纠缠足够彰显印度在东西方早期贸易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此地不止牵涉“景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多默(St. Thomas)据传曾于公元初年传教至印度，而且留下了一批被称为“圣多默基督徒”的追随者。因此在早期罗马教会的心目中，传说中的印度不仅是神秘的香料产地，更是天赐的

传教福地。当时香料从东方向西方转运还需要陆路的支持，但密藏在陆上丝绸之路下的海上香料之路已经具备了除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精神附加值。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年代间，印度成为西方世俗力量与教会共同穷追不舍的目的地，原因正在于此。早年来自印度的任何信息都会被罗马重视，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与耶稣会的教士先后都选择以这片陆地作为向远东传教的跳板也就不足为奇。

与海上香料之路相伴的是包括罗马玻璃器皿在内的西方奢侈品的输出，这种输出或许同时促生了中国南部沿海的仿罗马玻璃器皿制造业，却未必帮助中国丝织品巩固自己在西方视野中的神话地位。“丝绸”是现今汉语对于西方语言里“silk”之类称谓习以为常的译法，但“silk”原本并不包括织成的“绸”，仍停留在普林尼的“树上羊毛”原材料范畴。1851年在伦敦世博会水晶宫的玻璃映照下夺得金奖的“荣记湖丝”只是生丝，沈寿以中国生丝为材料创作的刺绣作品在旧金山世博会上得奖还要等到1915年，因此，当公元6世纪那些神秘的“来自印度人(居住区)的修士”力阻来自波斯的丝绸贸易时，他们想到的更可能是以中国生丝织造的更为廉价的萨珊或粟特丝绸。

所幸，无论是否有萨珊或粟特丝绸混杂其间，而且无论中国的蚕种已经以何种渠道外传，事实是当拜占庭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丝织市场之时，唐代的中国的丝织业反而因与西方的交流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在纹样上，出现了对后世中国丝织品影响深远的“联珠动物纹”；在织造上，则出现了结合西域技术的益发堂皇的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中唐或晚唐周肪绘制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一众身着丝绸的唐代仕女，有学者认为她们臂上若隐若现的镯子实际为萨珊玻璃。倘若确实如此，这张画本应成为东方丝绸与

西方玻璃器珠联璧合的绝好例证。

在包括张绪山在内的很多现代中国学者看来，无论何朝何代，中国从未有记载禁止育蚕术外传的法律和政策，西方史籍对东方蚕丝的神秘印象更可能来自于当时这一行业本身与出口贸易无关的种种民间禁忌。地处长江以北的中国蚕丝发源地原本就有蚕神崇拜与禁忌，当蚕丝业因北方战乱不得已进入气候条件更加莫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此类禁忌益发琐碎。据《西吴蚕略》、《吴兴蚕书》、《广蚕桑说》等书记载，不论蚕室内外，禁忌名目极多：蚕初生时忌室内扫尘、忌炙爆鱼肉、忌油火纸于蚕室内吹灭、忌侧近春捣、忌敲击门窗、忌槐锡箔、忌蚕室内哭泣、忌秽言淫辞、忌未满月产妇作蚕娘、忌灶前热汤泼灰、忌产妇孝子入家、忌烧躁腥爵香等物、忌当日近风、忌西晒日照、忌温热时猛风骤寒、忌寒凉中突然过热、忌不洁净人入蚕室、忌蚕室近污秽、忌吸烟、忌油漆，并忌一切烟熏等等。诸多禁忌原本旨在维持蚕室整洁安静，保持蚕室最佳温度与湿度、预防传染蚕病，只是在不明根底的外人看来，未免有些莫名的古怪。

中国在盛唐有诗人说“相看两不厌”，拜占庭帝国乃至后来西方世界对玻璃技术的种种保密行为在东方看来也未尝不能被相视为“怪力乱神”。拜占庭在20世纪之后的西方史学家眼中向来有“专卖制和特权的天堂”之名，不仅竭力把控东西方之间丝绸的专卖，对金银器、羊毛、陶器乃至日常食品的进出口也采取严格的配额管理。即便有萨珊玻璃的存在，拜占庭继承的罗马玻璃仍是重要的出口奢侈品。在查士丁二世骄傲地向突厥人展示拜占庭从东方获取的蚕丝业秘密之际，亚得里亚海北端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城市也正在崛起。刚经历过查士丁尼大帝盛世的拜占庭帝国此时当然不会预想到800年后帝国将灭亡，

更不会料想这处名叫“威尼斯”的海港城市即将接管自己的玻璃制造秘密。英国历史学家洛佩茨(Robert S. Lopez)的著作《中世纪的商业革命》(*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中记载：公元8世纪中叶，威尼斯从对拜占庭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与拜占庭帝国的从属关系逐渐转变为对等关系，成为地中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或从事东西方商品贸易，或将欧洲基督徒贩运到阿拉伯帝国卖为奴隶，但仍然通过提供海上支援以效忠拜占庭帝国而引以为豪。英国拜占庭学者唐纳德·尼科尔(Donald Nicol)的《拜占庭与威尼斯：外交与文化关系研究》(*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中更加直白地分析了君士坦丁堡与威尼斯这两个行政等级似乎并不平级的城市间的互利关系：“在追求实际利益方面，威尼斯人充当了当代商品经营者的先导和楷模。尽管罗马教皇三令五申，不许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与阿拉伯人做生意，但威尼斯人却从来不受这条禁令的束缚……同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为威尼斯人带来了大量财富，使他们有大量金银货币去君士坦丁堡市场换取东方的奢侈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的拜占庭港口是威尼斯贸易的财富之处，威尼斯需要拜占庭帝国作为它的同盟者以抵制西方皇帝不断增长的野心。反之，拜占庭也需要有威尼斯国家这样一个同盟者，帮助它在亚得里亚海一带维护帝国海岸线的安全。因此，在13世纪以前，威尼斯一直是拜占庭帝国可靠的合伙人。”

每个地方都会有几座在心理归属与地理归属上不太一致的城市，自公元7世纪末就自立为共和国的威尼斯之于意大利也是如此。不过，这毕竟是一座西罗马难民在泻湖上不得已人工建造的城邦，在心理上偏向拜占



意大利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工匠以传统吹制法烧制玻璃器皿

庭也难以厚非。不管拜占庭的皇帝对威尼斯存有多少戒心，君士坦丁堡的平民对于威尼斯显然抱有亲近感。当1204年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陷落时，包括玻璃工匠在内的大批城中工匠逃往威尼斯，“威尼斯玻璃”由此成名。1291年，威尼斯议会颁布法令，以“玻璃熔炉会引起城中火灾”为名，下令所有玻璃厂迁往威尼斯泻

湖北端的穆拉诺岛（Murano）。无论这一法令的初衷是否纯为避免火患，它改变了这座原以渔业与盐业为生的无人问津的小岛的命运。迁自拜占庭的玻璃匠们曾被给予种种特权，例如：允许佩剑、免于被威尼斯政府起诉、他们的女儿也可嫁入威尼斯豪门。穆拉诺的玻璃匠们迅速成为岛上最显赫的公民。然而，与特权同期而至的是

严格的人身限制：为防止玻璃吹制技术外泄，玻璃工匠被严禁离开威尼斯甚或穆拉诺。1300年威尼斯议会已经下令：“禁止贩卖水晶玻璃的仿制品。”当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更多的玻璃工匠涌入威尼斯并被送至穆拉诺岛。1454年，威尼斯议会下令：“对泄密的玻璃工匠施以酷刑直至死刑。”“威尼斯玻璃”至此在西方改以神秘的“穆



拉诺玻璃”闻名。

在制造各种精巧的玻璃器皿的同时，穆拉诺岛也继承了看似平淡的延续自古罗马时代的平板玻璃工艺。以金箔作为底衬的小型玻璃镜子始见于公元77年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更接近于现代意义的玻璃镜子最早记载于11世纪摩尔人统治西班牙之时。时至16世纪，玻璃镜子却已经升华为

穆拉诺的绝学，以至于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年代不得不从威尼斯的穆拉诺岛偷技，恰如传说中从东方窃取蚕种。只是史学的发展使这番“玻璃偷技”远比蚕种西传记录得详细。作为16世纪法国与意大利半岛战争的残留影响之一，源自意大利的奢侈品爱好决定了法国宫廷的趣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热衷于使用镜子装饰室内，却值威尼斯垄断着镜子制造业，法国一直无法模仿制造出同等质量的产品。为国为王，时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决定不惜代价招揽威尼斯制镜工匠，成功地两次派人从威尼斯偷运高级制镜工匠前往法国。1665年，法国在诺曼底开设了皇家制镜厂，待法国工匠已掌握核心技术才放走全部威尼斯工匠。1672年，法国取消镜子进口，彻底实现国产化；1682年，凡尔赛著名的镜厅揭幕，使用的都是皇家制镜厂的产品；1687年，新的制镜技术在法国诞生，自此法国彻底超越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在质量与产量上都堪称第一的镜子制造国与出口国。“法国”成为与“时尚奢侈品”对等的符号肇始于此。凡尔赛的镜厅保留至今成为不只是吸引观光客的炫技符号。

然而玻璃依旧是件西方秘物。在17世纪镜厅似乎已经可以公开展示之时，玻璃在西方顶级的表现，也即光学玻璃仍被作为秘密隐而不传。拜占庭帝国衰亡之际，东方玻璃工艺反倒因萨珊代表的伊斯兰玻璃器而延续，避免了西方隐秘镜厅的命运，但也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东方锦缎式路途。

当镜片映照出织女星

祖先会有各种纠结，后辈的取舍却很简单。东西方的玻璃因为不同的成分而命运各异，东西方的丝绸则在近似的原料上摆开了不同的道场。目

睹过玻璃与丝绸在中国唐代之前的纠葛，看到它们在唐元之后的种种兴盛和沉默也就不足为奇。

致使中国早期玻璃品质不及西方同类的重要原因是助熔剂，但西方记载的“海生植物灰”或者说“草木灰”其实也早潜藏在中国古代的丝绸业内。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就载有“草木灰浸泡兼日晒法”：把业已缫制的生丝放进棘木灰与蜃灰的温水中浸泡，然后取出在日光下暴晒，晒干后，再浸再晒，如此连续数日，一方面利用水温和水中碱性物质脱掉丝上多余的丝胶和杂质，另一方面利用日光紫外线的漂白作用使生丝产生独特的光泽和柔软的手感。这种练丝工艺在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几乎历代均曾采用，直至现代大部分生丝的精炼使用的仍然是碱性药剂。

类似的物质在中西相遇而不相逢，其间的错过令人想起曾经令东西方都多少有些错觉的“东方琉璃世界”。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据佛经载“身蓝琉璃宝色”。关于“玻璃”一词，曾有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李志超提出对应于拉丁语的“vitrum”，中国古籍中的诸多译法（“吠琉璃”、“毗琉璃”、“髀头梨”、“颇黎”）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在汉语中音译加上了意译的结果。语源学总是一种多少有些占星式的学问，遇到跨语系的词汇时更是如此。恰如东西方早就各自看到头顶星空中的织女星，却衍生出了不同的神话。不过，“契合”或者说“偶遇”也是确实存在的，比如“vitrum”原意为“靛蓝色”。

无论是琉璃还是玻璃，在中国都曾被赋予过一项中国特有的使命：作为舍利容器。“舍利”俗称“佛骨”。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建塔安奉舍利始自三国时期的东吴。有关东吴至唐代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中曾说：“建塔安奉舍利的制度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但玻璃舍

利瓶的采用，却是中国的创造。据日本学者高田修对印度、阿富汗境内 100 座安置舍利的佛塔的考察研究，盛放舍利的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的，没有一例采用玻璃舍利瓶。”“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玻璃瓶的舍利瘞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印度用瘞坛瘞埋的方式，更符合中国的习惯。”

中国文化的东传也将这套舍利瘞埋制度传递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正如之前中国传播了源自西方与本土的玻璃烧制技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药师琉璃光佛为度众生发了十二大愿，其中第二大愿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清澈，光明广大遍满诸方，焰网庄严过于日月，铁围中间幽冥之处互得相见，或于此界暗夜游行斯等众生，见我光明悉蒙开晓随作众事。”汉传佛教诸经籍关于佛家七宝的记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把“琉璃”列入其中。唐代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中记载：“吠琉璃，宝名也，或云毗琉璃，或但云琉璃。须弥南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直至唐代中国对玻璃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合成仍尚存混淆，但中国独有的舍利瘞埋制度无形中与佛经中的“琉璃”形成了某种默契。其间隐含的另一层与西方的契合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元 1~2 世纪，玻璃骨灰瓶开始在罗马流行，这正是罗马帝国开始施行火葬的时期，也正值中国最热衷以丝织品入殓佑护亡者升天的两汉时期。

君士坦丁堡的玻璃工匠纷纷逃亡至威尼斯时，中国也早已远离了曾经“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开元全盛日”。在曾经隶属唐代的疆域中，这段时期即将留在史书上的至少有四个政权的名称：南宋、金、西夏、西辽。承继自罗马的拜占庭玻璃工业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曾一度面临危机，中国的丝

绸业虽在此之前就经历了唐衰落后五代十国近一个世纪的战乱，以及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却变得益发繁荣。

如同很多事情一样，唐代也是中国丝绸业的巅峰期之一。史载唐武则天时织染署有织工 365 人、内“作”使有绫匠 83 人、掖庭局有绫匠 150 人；唐玄宗时，贵妃院中有 700 名织工为杨玉环织绣服饰，诸州官锦坊人数则难以统计。私营纺织作坊中不乏“货财亿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绢、锦等丝织品被纳入“租庸调制”更使得官府仓库“缙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但唐代对中国丝绸业的意义远不止于数量，更关键的是为丝织技术带来的西域色彩浓厚的变革，不计工艺烦琐、但求华丽为上的“锦”可称为丝织品中的王者。赵翰生著《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中记载：“唐代的锦分经锦和纬锦两类。经锦是唐以前的传统织法，蜀锦即其著名品种之一，是采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唐初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结合斜纹变化，使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新织法。以多彩多色纬线起花，比之经锦能织制图形和色彩都大为繁复的花纹。”“纬线起花”是蚕种西传后典型的西方织锦技术。以唐代为界，中国的织锦技术由此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是经锦为主，纬锦为辅；唐以后以纬锦为主，经锦为辅。恰如萨珊玻璃器在公元 651 年萨珊王朝衰亡后仍对中国本土玻璃器制造留下浓厚的伊斯兰风格影响一样，中国丝绸以盛世的气度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繁华。

纯粹从丝绸史上看，北宋与南宋发扬光大了唐代的丝织业传统，尤其在数量上达到了又一登峰造极的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载：“宋代的官营丝绸生产组织形式与唐代相似，但规模远胜唐代。其时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除京城之外，还遍及全国主要丝绸产地。”“绫锦院在端拱元年（988）有 400 多张绫锦织机，1034 名匠人。

淳熙十四年（公元 1187 年）文思院年织绫 1100 匹，用丝 3.5 万余两。元丰六年（1083）成都锦院有 117 间场房，154 台织机，共用工人 449 人，共用挽综工 164 人，织工 154 人，染匠 21 人，纺绎工 110 人，每年用丝 11.5 万两，染料 21.1 万斤，生产锦 1500 匹。”同时宋代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专门从事纺织的家庭机户，他们由官府统一提供原料，产品同样由官府统一收购。

宋代的丝织品数量如此巨大，其走向却未必是一个说起来同样华丽的问题。先是向辽，后是向金，宋代输送了大量作为“岁贡”的丝织品。1004 年宋辽签下的“澶州之盟”除“贡银 10 万两”之外还包括岁贡“绢 20 万匹”，不久又增加为 30 万匹。丝绸早在唐代以前就因“保值”而被作为实物货币广泛使用，自唐开元二十年（732）正式颁布法令“绫罗绢布……与钱货兼用”后，丝绸更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易的合法货币，只是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唐玄宗绝不会想到中国的丝绸会被兼用作“岁贡”的货币。

1204 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南宋正值宋宁宗在位的嘉泰四年。就在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那个 4 月，36 岁的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次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取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以示恢复北方江山之志。1206 年，宋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爵位和谥号、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同年 5 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然而，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1208 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丝绸在宋代又一次印证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只是已经少了该典故原本在西汉《淮南子》中的雍容：“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时局的变迁成就了丝绸业的

全面南移，江浙地区至此完全取代北方山东、河南等传统丝织业中心的地位，以致江浙成为后人心目中丝绸的理所当然的代名词，而几乎忘却当年在陆上丝绸之路上传送的丝绸其实原本与江浙无关。唐代奠定的“纬锦”技术在丝绸业南移后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驱动力中多了一层来自北方的需求，“织金锦”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前宋代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过“捻金锦”，即在织物中加入金线，因过于奢华而屡遭禁止。但金色饰物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最爱，因此织金锦便屡屡现身于丝绸的岁贡之路中。对于南宋本国的子民来说，风土的变化倒使纱罗织物大为流行。如同《中国丝绸文化史》中所说：“宋地的人对纱罗与罗縠似乎更为迷恋，此类织物的轻灵飘逸更能体现文人士子的风采，而南宋政权建在南方，炎热的天气也使得纱罗织物大行其道。”

两宋是公认的“文人画”兴起年代。“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的纱罗与罗縠也确实更能映衬文人画中那些欲说还休的云水迷蒙。丝绸北贡的同时，宋倒也享受着来自三佛齐王国（Sambuja kingdom）之类南方“蕃国”的进贡。三佛齐王国位于苏门答腊岛，自唐初开始与中国有贡奉与贸易往来。《宋会要辑稿》记载，三佛齐王国经常进贡玻璃器，仅南宋淳熙五年（1178）正月一次就进贡了200多件。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1225年著成的《诸蕃志》中记载：三佛齐王国大部分物产来自大食，也即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当拜占

庭的玻璃隐退入威尼斯、日益神秘之时，延续自萨珊玻璃的伊斯兰玻璃却正毫不拘谨地步入东方的殿堂。只是此时中国人对于玻璃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中国与“玻璃”或“琉璃”漫长的接触史中，南宋是最早彻底分辨清楚玻璃与玉石差别的时代。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清楚指出：“铸石为器，古已有之”；“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玻璃的神话色彩消除后，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获得了“番琉璃”、“药玉”、“假玉”等不太恭敬的别称。“番”字在两宋时期已经不大能全现“万邦来朝”的气魄，反倒多了些防范的意味。“药玉”意指玻璃是以“铅和诸药”人工烧成，“假玉”则将“药”这一讳称也直接省略了。苏轼作有一首标题经常被简化为

《独酌试药玉滑盏》的五言诗，起首是：“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从纯理科的角度看，苏轼准确描摹了一只以铅为助熔剂烧制的仿定窑瓷国产玻璃杯；但倘若换作宋代文人的眼光去看，“作玉真自欺”才是核心，而且原标题“有怀诸君子”诸字不应省略，后面的“曹侯天下平，定国岂其师”等句也不该被忽略。事实上，苏轼的友人陈师道不久就回过一首《次韵苏公独酌试药玉滑盏》，起首是：“仙人弃余粮，玉色已可欺。小试换骨方，价重十冰磁。”

当玻璃与玉划清经纬，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总结：“中国人自古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真实纯正，例如人们一直在追求足赤之金、无瑕之玉，而对于一些仿造材料则不屑一顾。当宋代的人们认识到以前被看作至宝的玻璃是用一钱不值的石头之类熔制而成时，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宋代同时有伊斯兰玻璃料块进口，而且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遗迹为宋代遗存，但上层社会对玻璃的冷落决定了这些作坊不会费力烧制做工过于复杂的高级玻璃器。另一方面，距离古罗马人1000多年之后，日常玻璃器皿终于在宋辽时期大量进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即便如此，在中国古代世界里，玻璃器皿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一样成为日常用具，除去瓷器这一劲敌的因素，中国铅钡玻璃器自身的不耐骤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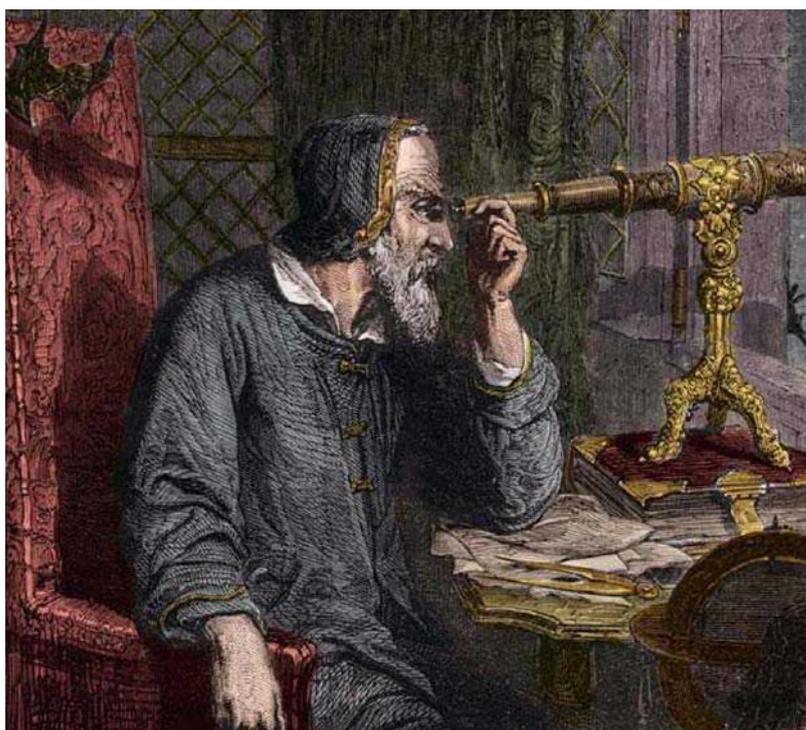
喀布尔地区发现的公元1世纪大型玻璃酒杯

骤热的弱点也决定了它难以进入中国人充满了开水与热菜的生活。

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对东西玻璃器做过比较中肯的对比：“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番琉璃也。”赵汝适《诸蕃志》另有记载：“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填入南硼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同出自南宋的这两份文献表明，当时中国已经清楚本国玻璃与伊斯兰玻璃在物理特性与烧制方法上的区别，但无论是文献还是出土实物中都不曾显示中国曾在此时试烧过“滋润不烈，最耐寒暑”的玻璃器，反倒是有一些关于中国向南洋诸国出口中国玻璃器的记载。这些玻璃器多为玻璃雕成的鸟兽、花卉盆景等小摆件，秉承了中国善雕玉石的传统，且造价颇为低廉。

“嘉定和议”签订68年后，从亚洲北部崛起的另一个强悍民族结束了南宋与长江以北地区在军事与贸易上的拉锯战。强大的元帝国设立了大都织染局、成都绫锦局，将中国传统丝织业中的织金锦进一步升级，成为大量使用金箔、伊斯兰风格浓郁的“纳石失”。与此同期，如《玻璃器史话》所述：“1401年，蒙古军队攻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破坏了伊斯兰玻璃的制造中心，并将玻璃工匠掳到中亚的撒马尔罕，伊斯兰玻璃从此一蹶不振，只生产普通的生活用品玻璃，已没有高质量的玻璃制品。”元朝的确设立过制造玻璃的官办作坊，但其地位与影响力极其低微。

当马可·波罗到访中国，被绵延数里的织金营帐闪耀得眼花缭乱时，意大利最先拥有丝织业的城市卢卡（Lucca）刚利用水车完成了拈丝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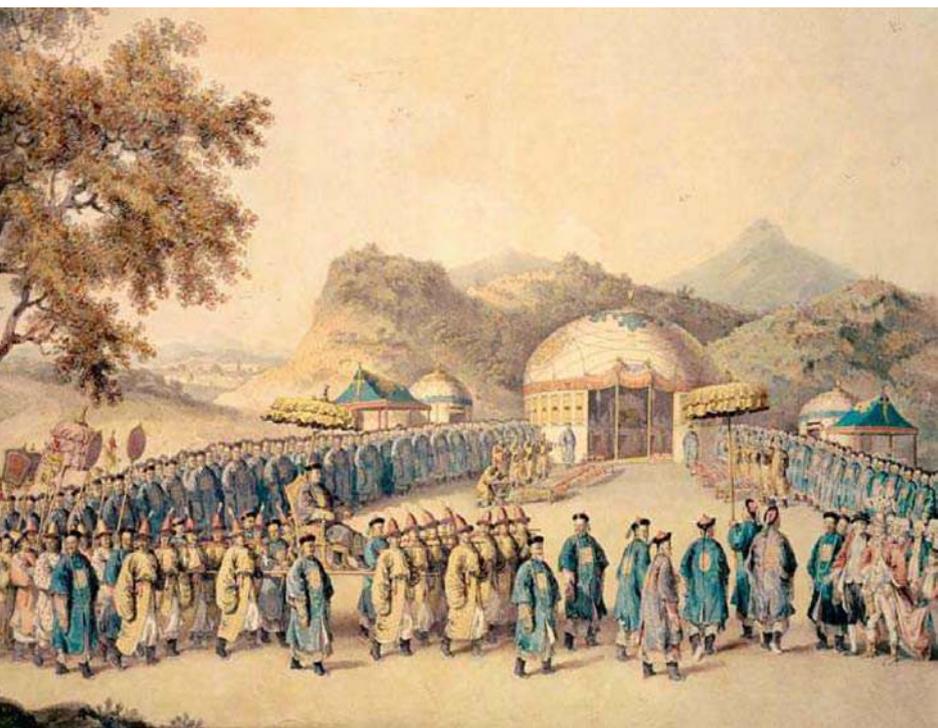
伽利略和他制造的天文望远镜

的自动化，成为13至14世纪意大利丝织业的霸主；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借助生丝转运贸易的有利条件兴盛丝织业，还要等到一个多世纪以后，而当时已是中国的明代。元、明两代官办或民间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在历史上达到了顶峰，与此形成映照的是当时中国玻璃业的状况。自元代以后，以广州、泉州、宁波为主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据巩珍所著《西洋藩国志》记载，除丝绸、瓷器等传统外销品外，郑和下西洋时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的中国商品之一是“硝子珠”，也即玻璃珠。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对舶来玻璃珠抱有种种梦想，似乎终于在此时完成了与“东方琉璃世界”的对接。

另有清代医家汪汲《事物原会》载录：“三宝太监出西洋，携烧玻璃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璃顿贱。烧者有气眼而轻。”甘肃学者马建春所著《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中认为：“这说明在郑和出使西洋期间，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工匠跟随

宝船来到中国，他们乃在国内传授了烧制钠钙玻璃的制作工艺。于是，能适应骤热的各种玻璃制品被大量生产，并销往全国各地，玻璃器物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再为皇室后宫、达官贵人所专属特有。这应是继葛洪于4世纪称交、广仿制中东水晶玻璃，《魏书》、《北史》云5世纪西域大月氏烧铸五色琉璃于洛阳后，又一次关于西域玻璃工艺的记载。”

三宝太监的“玻璃人”固然神奇，有关明朝的玻璃，更神奇或神气的名词是“博山”。1982年，现属山东淄博市的博山发现了元末清初的玻璃作坊遗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生产玻璃的遗址。山东本为中国最早的丝绸原产地之一，《汉书·韩安国传》中“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便是借当时山东丝织品的精细以比喻。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文中根据挖掘发现与民间记史推断博山琉璃的起源应在元代以前。后世对博山玻璃的文字考



描绘 1793 年清朝乾隆皇帝前往承德万树园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水彩画

证主要基于清康熙三年（1664）孙廷铨纂修的博山最早的地方志《颜山杂记》。孙廷铨出身玻璃烧制世家。《颜山杂记》中记述：“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孙廷铨后代编纂的《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更明确记载了博山玻璃的主要产品：“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作坊遗址出土的玻璃样本经化验与西方和中国早期的玻璃都有所不同，但《颜山杂记》中记载的玻璃配方倒显示出元、明两代中国本土经过改良的玻璃配方延续到了清代早期。然而，即便是有所改良，倘若放在 15 至 16 世纪的国际玻璃舞台上，当时东方的玻璃也已经如同南宋丝绸业中的纱罗一样，自“卧看”于一隅。

1280 年前后，也即蒙古军队在欧亚的疆域达到鼎盛之时，意大利发明了一种后世称为“眼镜”的基于玻璃镜片的制品，这开启了西方磨制玻璃镜片的历史。该行业最初兴盛于商业嗅觉敏感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尽管

威尼斯在 1301 年颁布法令试图限制这一技术的输出，但它仍在拜占庭灭亡前蔓延至更有耐心的现今荷兰与德国领域。当 16 世纪中国本土的玻璃业还沉醉于“珠灯、珠帘”，士大夫们调侃自广州进口的玻璃器“其制不一，奈无雅品，惟瓶小者有佳趣”时，最早的显微镜已经在荷兰出现，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所称“织女星”的天文望远镜也在孕育之中；当孙廷铨纂修《颜山杂记》之时，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和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早已在探寻天地珠帘之外的秘密。

没有人会怀疑明、清两代中国丝绸业的成就，只是此时孜孜于丝绸贸易的早已不只是原来的老客户。无论之前蚕种西传故事中身份不明的修士究竟是谁，秉承了梵蒂冈意愿的耶稣会修士终于在 17 世纪初进入了传说中的东方丝国。汤若望 29 岁抵达中国，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在中国度过了近 47 年生涯，他编撰了《时宪历》，第一个将天文望远镜引入中国。然而他的出现并未使他去世百年后的 1793

年英国外交使团来到中国时更加容易。马戛尔尼近 600 人的团队带来的礼品据说是经过了充分调研，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先进的枪炮、利剑、望远镜、秒表、试探气候架、火镜、军舰模型、钢铁制品、纺织机、布料和油画等，其结果也无非“封存”二字。汤若望秉承了前辈利玛窦的梦想，而利玛窦又秉承了前辈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追求。时至中国康熙年间，源自西方玻璃工艺、代表西方见识的眼镜终于如范礼安所愿架到了中国皇帝康熙的鼻子上。

康熙的眼镜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美国汉学家艾美丽（Emily B. Curtis）2000 年的著作《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杂考·虹影瑶辉》中有这样的记述：“康熙三十四年（1695），纪里安奉召赴京，留居法国神父居所，即西安门内蚕池口之天主堂。康熙三十五年，洪若翰致函法国。10 月 17 日函：我们的居所正在制造玻璃。10 月 31 日函：由于纪里安神甫的缘故，皇上正于我们居所旁的一幅大地方上建造玻璃厂，乞请我们法国玻璃厂选派一位或两位熟练玻璃工匠来华，以便制造出如同我国的玻璃盒水晶，以致镜面釉彩，亦请选派珐琅匠一名。”纪里安（Bernard-Kilian Stumpf）为德国巴伐利亚人，1655 年出生，1694 年经澳门抵华，在京师任职直至 1720 年。德国人向法国请教技术，如今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在 17 至 18 世纪却是理所应当。自威尼斯“偷师”之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玻璃制造大国，这种状况直到伦敦世博会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有所改变。更适合望远镜的光学玻璃 18 世纪初在欧洲出现，首先拥有这项技术的正是法国，随后相继被英国与德国掌握。烧制光学玻璃的秘诀之一恰在于中国本土玻璃中一直不被看好的铅。早在 1684 年，康熙就曾派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

前往法国，寻求精通科技与各种技艺的法国传教士。虽然是德国人，但纪里安“奉召赴京”也是源自于此。不过，纪里安留下的玻璃厂并不曾“与时俱进”地烧制多少光学玻璃，这其中或许有法国向来对外界封闭自己的光学玻璃烧制技术的原因，或许也有典型东方式的偏好因素。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康熙至乾隆三朝，自嘉庆之后日益衰落，光学玻璃已不敢奢求，连皇室日用玻璃器皿都日渐粗糙，至同治、光绪年间连皇帝都忍不住下旨训斥。雍正对玻璃器的烧制比康熙还要上心，甚至在自己常居的圆明园开设了玻璃厂分部，颇令人想起中国玻璃器最初与炼丹的血缘。乾隆自是盛世，当马夏尔尼携带以英国烧制的光学玻璃制造的望远镜到来时，中国宫廷玻璃工艺的最高成就“套玻璃”，也即以多色套彩再加雕琢的装饰器皿正达到高峰。时隔百年之后、伦敦世博会前后，同治年间的清代学者赵之谦仍在《勇庐闲诂》中回味：“时（康熙之时）天下大定，万物殷富，工执艺事，咸求修尚。于是列素点绚，以文成章，更创新制。谓之曰套。套者，白受彩也。先为之质曰地。则玻璃车渠珍珠。乃白色明玻璃，康熙中制有之，后不复见。其后尚明玻璃，微白，色若凝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红有蓝……更有兼套，曰二彩、三彩、四彩、五彩或重叠套。雕镂皆精绝。康熙中所制浑朴简古，光艳照烂如异宝。乾隆以来，巧匠刻画，远过詹成。矩凿所至，细入豪发，扞之有棱。”赵之谦是鼻烟壶鉴赏大家，而鼻烟壶也是清内

务府造办处玻璃厂最知名的特产。回想起来，宋代文人对已明身份的玻璃不屑，却对舶来盛放“蔷薇水”的小型香水玻璃瓶网开一面；明代文人继承了宋代文人的清高，甚至连进口玻璃器都不再入得法眼，却也“惟瓶之小者有佳趣”。

在清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烧制诸般精巧的鼻烟壶时，法国已经将丝织业与玻璃制造一样纳入到自己的专有制造范畴。即便同是在一个半球，东西方头顶的天空也可能不同，何况历史中的星空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指路星。当西方的路易十四与东方乾隆的帝国梦想交相辉映的同时，天空的织女星早已偏离东方词汇中作为“紫宫”的

北极指路星之位，与银河另一岸的牛郎星相望，成为更为家园化的神祇。中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产生于西汉，但现在也有观点说它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诞生。作为亮度颇高的一颗星，牛郎星在古希腊时代同样得到过自己的西方命名：“天鹰座阿尔法星”（Altair α）。古希腊神话中天鹰座是宙斯化身的雄鹰升天而成，天鹰座旁边的天瓶座（Aquarius）则是宙斯化身雄鹰虜上天宫的侍酒童子迦尼美德（Ganymede）的象征。玻璃酒杯是古希腊较晚出现的酒具，但在古罗马已成标配奢侈品，由此才奠定了现代葡萄酒杯的标配材质。同在北半球，当古希腊人以及以“特洛伊人后裔”身份延续了地中海古代传说的古罗马人仰望中国称为“七夕”的那片晚夏星空时，他们看到的会是一幅集合了诗琴、主神、童子的宴乐场景，而不是一派不经隐忍的悲悲切切。

1840年7月17日，中国清代道光年间，西方第一次用得益于玻璃透镜的相机拍摄星辰，主角就是织女星。在中国生丝出现在首届世博会的28年后，西方天文学家凭借玻璃棱镜分光仪又拍摄下织女星的光谱照片，再经20多年后这一发现将掀起一场名为“量子物理”的物理学革命。21世纪初，天文学家已经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织女星并不孤单，它的周围很可能围绕着一个星团。在天文望远镜发明近一个世纪之际，西方已经有诗人以带有东方禅意的语言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粒沙看世界，从一朵花看天堂，把永恒纳进一个时辰，把无限握在自己手心。”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Biemlfalkk
比音勒芬

中国国家高尔夫球队指定品牌

公司官网: www.biemlf.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113-2228



关注比音勒芬官方微信



1. 北宋 饰缙丝边缘绢棉袍 (新疆喀什麦盖提县采集)
2. 东汉 丝质绣花粉袋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1号墓出土)
3. 北朝 牵驼纹锦缘马面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4. 东晋 彩色丝履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305 号墓出土)
5. 北朝 木顶锦帽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6. 唐 套环宝花纹绫风帽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7. 北朝“大王出由”锦枕套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丝路之丝：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

——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

从丝绸认识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主笔 / 王恺

2009年，第一次在新疆考古所看到大批的丝绸织物的遗存，这个以往不算珍贵文物的东西，在现在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之后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敦煌丝绸遗存展览上，见到了中国的丝绸学者赵丰，他向我介绍了丝绸文物的价值，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里存留的丝绸文物的状况，这时候才真切感觉到：原来，丝绸之路上的“丝绸”部分，是活生生的，并非抽象意义上两个字，从这些文物上，既可以看到东西方怎么交互影响，又可以从这些丝绸，包括毛织品和麻织品的遗存物上，全面观察人类文明史上“衣”的发展进程。

后来才知道，赵丰从小在海宁长安镇长大。那里曾经建设有浙江缫丝一厂，所以他从小就从在丝绸厂工作的父母亲身上获取了很多关于丝绸技术的基础知识，大学时期，他学的是丝绸工业技术，后来又转学丝绸科技史，加上成年后在世界各地漫游的经历，使他成为兼具丝绸工艺专业知识及专研物质文明史的专家。在研究文化史的专家中，这种文理兼通的学者并不多，采访他数次，他从文献结合考古实物的讲述，帮我理清了关于丝绸的许多困惑。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刚刚兴起，很多研究成果尚无定论，但是成果颠覆了很多以往的认识：比如丝绸之路很早就开始，甚至在中国刚出现丝绸的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就开始使用了。再比如，丝绸传播并不是单向的，粟特帝国的粟特

锦，就曾经反向传播到中国，影响了唐代的丝绸制造。

丝绸是从何处起源的

2009年，在新疆和阗的达玛沟文物挖掘现场，看到了很多壁画的残片，色泽鲜艳，很多拼接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不过上面还是有各种人物线条，依稀可以猜测当年的故事；比如《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东国公主将蚕种带到瞿萨旦那国的故事。当年东国公主将蚕的种子私藏在花冠里，然后偷偷带到瞿萨旦那国，在路过关卡的时候，因为检查人员不敢搜她的花冠，所以顺利地将蚕种带到了她出嫁的瞿萨旦那国，当地的丝绸业因此发展起来。

这个题材，在新疆很多地区的壁画上都有反映。最有名的一块，现存大英博物馆，目前新疆博物馆里面有它的复制品。画面的正中央是东国公主，头戴非常漂亮的花冠，右边有侍女正在用梭机纺纱，而另外一边的侍女则用手指向公主的帽子，似乎暗示帽子里面藏有玄机，在公主前面，还有一只碗，碗里面有一颗圆形的物质，很像蚕种，画面展现得很详尽，几个画面联系在一起，故事就完整化了。

按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当时位于现在和田地区的瞿萨旦那国后来学会了养蚕，但是因为当地是佛国，不肯杀生，所以没有学会中原地区的缫丝工艺。当地都是将破了的茧子抽松，然后进行纺线，和棉纺织类似，但是这样就不能抽出长丝来了，与中

国做法完全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地珍惜来之不易的蚕种，所以不肯杀死茧蛾，一定让它飞出来，再产卵，进入下一轮培育新蚕中。

斯坦因在新疆找到的不少版画上，都有丝绸织造的过程，包括用竹片工具，也有拿割刀割断丝绸的。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什么？文献并不清晰，《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很多只能算是传说，按照赵丰的分析，这个东国公主应该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一串小国的某国公主，有可能是楼兰公主，但应该不属于中原体系。“当时中国对丝绸技术的封锁并不严密，所以不太会出现这种故事，相反，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为了从丝绸贸易中抽取高额税收，所以严格控制蚕种往西边传。”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的丝绸传播的不易，先可能是丝绸实物传播，然后慢慢是技术的传播，但最早技术可能用于纺织棉毛等制品，之后是蚕种、桑树等的传播，落地生根后，当地有了自己的丝绸制造产业，再之后才是双方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

中国是最早发明桑蚕丝织的国家，这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因为中国内陆广泛存在桑树和野蚕，所以能结成各种野生的蚕茧，人们再慢慢驯化成家蚕，从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大量资料来看，这个应该不会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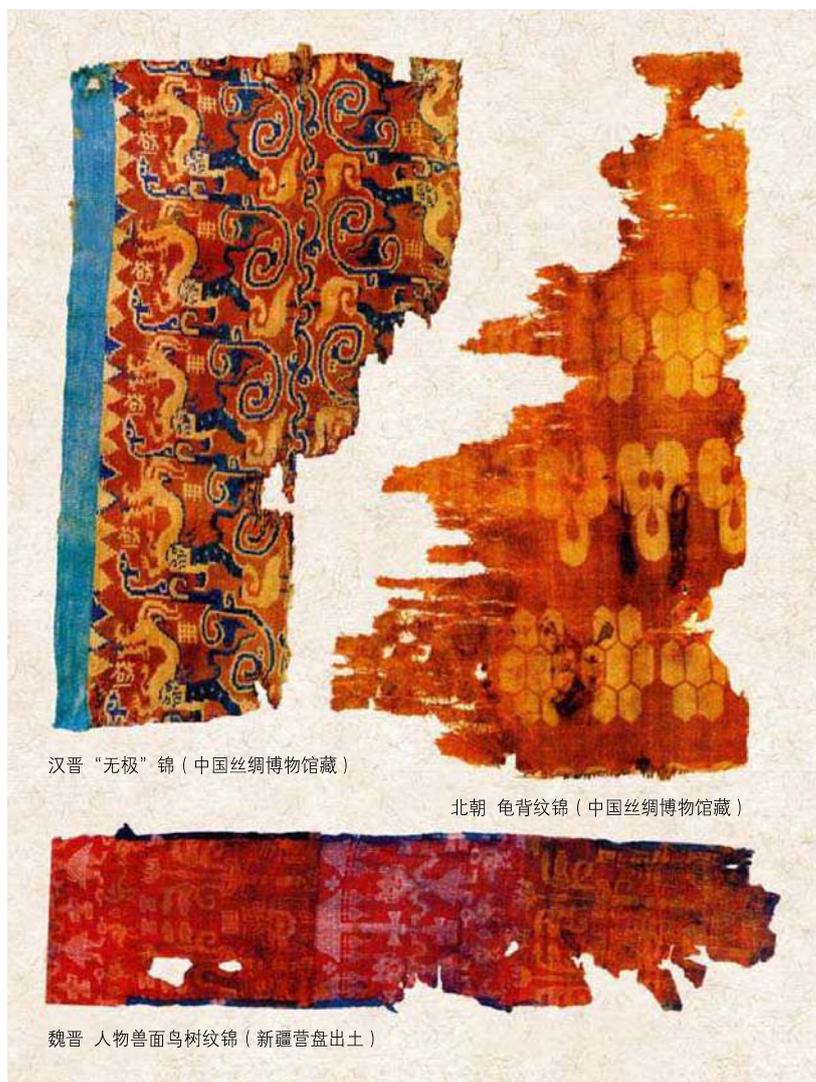
赵丰说，1926年，中国早期的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找到一个存在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半颗蚕茧，因为被刀刃切去了一半，所以一直被称为

半颗茧，当时出土就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考古学家李济找许多学者看了蚕茧，开始既没法确定是，也没法确定不是。后来找到中国昆虫学的创始人刘崇乐先生，才确定是桑蚕茧。但是因为距离今天有5000年，所以人们很难相信那么早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也有人认为这个茧是食用的，并不能证明当时中国人已经会养蚕了，这半枚茧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地区找到了半筐丝绸织物，一下子把中国的蚕桑文化提到了4000年前左右；1980年，在郑州青石村又挖掘出一些丝织品的残物，发现是典型的桑蚕丝纺织品，还有染色痕迹，丝绸在中国的起源被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而早期的希腊文明也记载了中国的丝绸，不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丝绸的制造过程，他们把丝绸理解为羊毛树上采集的羊毛纺织成的漂亮织物，一直到公元2世纪才慢慢弄明白真相。

这并不能怪希腊人，即使在中国早期，因为蚕的复杂习性，人们对它寄托了很多神秘含义，首先认定蚕不死，破茧化蛹是羽化的意思，甚至羽化一词都是从这里来的。而桑林也被赋予了复杂的含义，包括人们在里面举行生殖狂欢，而纺织成的丝绸早期也只作为尸体所穿的衣服，却不是悲哀的含义，而是吉祥的意思，认为只有穿上这种衣服才能升天，这也是早期中国的墓葬群中发现大量丝绸织物的原因。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肯定早于西方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到了拜占庭时期，波斯僧人才把中国的蚕种带到西方，西方国家才明白丝绸的由来——此时距离丝绸之路的开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波斯人不希望西方国家与中国直接做生意，这样他们可以控制中间商



汉晋“无极”锦（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北朝 龟背纹锦（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魏晋 人物兽面鸟树纹锦（新疆营盘出土）

的巨额利润，所以一直控制着丝绸之路。以至于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被波斯人盘剥，很多商人开辟了北方丝绸之路，而不再走欧亚草原。这时候，西方有了相对准确的丝绸知识，查士丁尼大帝向突厥人讲了蚕的相关知识，非常准确。

但是，丝绸之路上的靠近中国的国家，包括当时的西域诸国，以及中亚的国家，是否原本就拥有蚕种和桑树？这个疑问是我在新疆碰到的。新疆有很多古桑树，当地人对桑树的利用有漫长的历史，不仅仅提供养料给蚕，也用桑树皮造纸，和新疆邻近的中亚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蚕桑丝绸的重要产地，现在，当地也还留存

大量古老的桑树。赵丰说，他在当地一些13世纪的遗址上，也看到很多古老的桑树。那么，这些桑树是原生种吗？还是从中原而来？

另外，在丝绸之路，蚕种就一定来自中原吗？印度有学者认为，印度的野蚕也曾经影响过丝绸之路，的确，无论是希腊书籍的记载，还是玄奘的记录，都曾经提到过野蚕丝的纺织品，但是，这些野蚕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丝绸之路？

赵丰说，光靠文献记载已经难以辨别真相。唯一的方法是科学地分析出土的丝绸之物的遗存，他们找了很多遗存的丝线，发现家蚕丝和野蚕丝确实不同，家蚕因为营养丰富，吐的

丝粗壮，而野蚕丝偏细，结果发现，很多丝路上的丝织物的成分很复杂，里面既有家蚕丝，也有野蚕丝，很多丝绸制品不是从中原运过去的，而是在当地生产的。这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当地生产丝绸，是先把丝打成棉线，再用平纹重组织生产，和内地的织法不太一样。但是，即使是这种在当地生产的丝绸织物，也会发现里面包含既有家蚕丝，也有近乎野蚕丝的很细的蚕丝，这就更增加了复杂性：并不能就认定当地也有野蚕丝生产，也许是传过来了蚕种吃了当地的桑叶后，吐出了细丝？中亚等地的丝绸，究竟是受中国工艺的影响学会了生产，还是整体传播，连物种、植物群落一起从中原移植而来？这还是个无法特别清晰化的问题。总之，在没有更大量的物质材料前，中国和印度，包括中国和中亚之间的丝绸交流，还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要进一步下结论，需要更多的材料。

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的丝绸文物

在新疆和中亚尚未出现丝绸生产的早期，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有丝绸输送到西方了，当时的路径已经很难彻底清晰化，但是根据猜测，基本上走的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喀尔巴迁山脉的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这条通道纬度平直，北有森林，南为耕地，最早活动在这里的是游牧民族，但是因为交通不便利，所以基本上不属于后期频繁的丝绸贸易，大约起止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也有学者把这段文明称为“库尔干文明”时期，“库尔干”指的是草原文化中特有的用石头垒起来的巨大的墓葬群，中国的新疆北部、北面的俄罗斯，还有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地，都有这种墓葬群，说明在阿尔泰山两侧早就有交流，丝绸也就是顺着这条道路流

传出去的。

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发明了提花织机，能够织出精美图案，刺绣也很发达，当时，北方地带、中原，包括长江流域都能生产出丝绸，也就是因为丝绸的流行，才可能一直被贩卖和馈赠到那么遥远的阿尔泰山的北侧。靠近阿尔泰的冰雪覆盖的深山，也就是巴泽雷克的谷地，从1929年开始，苏联的考古学者一共挖掘了六座大墓葬，一般认为，这里是早期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墓地，一共发现了五片丝绸，其中三片是比较普通的平纹织物，另外还有织锦，以及一片蔓草纹刺绣，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技术，赵丰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看过这几片残片，整个巴泽雷克墓葬群的珍宝都收藏在这里，包括大量的马具，还有完整的马车，里面还有布满刺青的人皮，墓顶上吊着几只天鹅标本，这是当时在墓葬中流行的意向，就像在草原中天空真实飞翔的天鹅一样。但是这几片丝绸丝毫不弱于这些珍贵文物，那件蔓草鸟纹刺绣非常漂亮，应该是在绢上刺绣，用的是中国传统绣法：锁绣。之后，在天山的吐鲁番地区，也出土了凤鸟丝绸刺绣，而且和内陆的凤鸟形状很类似，可以肯定，战国时期，这一类丝绸就到了新疆，然后再通过阿尔泰山，到了另外一侧。

除了丝绸，在这里流通的还有其他的纺织品，比如世界上最早的地毯，也是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细部的图案很漂亮，包括草原民族喜欢的高帽子，说明当地的纺织技术也很成熟，有没有受到中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草原民族流行的动物捕食图案也确实在中原出现过，包括草原流行的鹿、狮子等，说明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向的，反过来也在影响中国。

中国的丝绸遗留，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野。原因在于墓葬结构的变化，西汉之前，内地的墓葬基本都有大量木头做棺椁，外加挖

得很深，所以保存的丝绸都比较好。但是西汉后期，因为内地改成了砖室墓葬，保存状况就很差，这时候，能保存下来的丝绸制品基本都在干燥的西北地区，加上之前也出土的西北地区的一些丝绸残片，构成了中国丝绸文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部分丝绸制品，都出现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因为这里彻底的干燥，使这里的丝绸制品在千年之后仍然保存了原来的许多特征，这里也是当时汉朝的势力所在，在嘉峪关外的阳关和玉门关，有许多烽火台，附近有很多垃圾坑，考古学者在这些坑里发现了很多丝绸制品，玉门关附近的花海墓地，也发现了很多漂亮的丝绸文物，包括用扎染工艺制造的丝绸，这属于汉人地域所发现的丝绸文物。

玉门关以西，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地界。1900年，斯文·赫定重新发现了楼兰，之后是斯坦因的进入，他在高台墓地里发现了大量的丝绸织物，包括各种锦囊，其中一件毛织品上面还有希腊的神像。说明早期这里属于东西方交流之所在；斯坦因把大量丝绸文物放在了英国和印度；在他之后进去的只有少数日本人，如桔瑞超等人；1949年之后这里被设立为禁区，一直到2003年，新疆文物部门才再次进入，发现了楼兰王陵，里面有大量保存不错的服装，后来经过考古学界复原后发现，与壁画上面的古人服装非常类似，都有宽大的袖口。

楼兰附近的营盘和尼雅也发现过大量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尼雅墓地，十几具棺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织锦服装。根据专家研究，这系列墓主人里面很可能包括精绝国王。这里面发现的大量汉锦很多属于东汉和魏晋时期，一般称为“云气动物纹锦”，这是在早期东周织锦图案上发展而来的，但更加自由多变，在各种云气造型中间穿插有神气的动物纹样，并且还有带有吉祥意义的汉字。

1959年，当时的考古学家在尼雅墓地短暂挖掘过一次，挖掘出一件漂亮的云纹服装，没有动物，里面穿插了汉字“万世如意”，所以叫万世如意锦，这和史书记载的“云锦”有所类同；之后在楼兰出土的很多锦上面也有各种形状的云纹，有团状，也有小朵状，里面穿插有神奇的动物，应该是汉代求仙理想的反映。在动物之外，也有文字出现，比如斯坦因带到印度新德里的一件云锦。这和后面的很多云锦图案可以对照观看，但是这件相对完整，之所以存放在新德里博物馆，是因为当时印度资助了斯坦因到中国的考古，所以也有部分存在了那里。

赵丰看到了这件，大为欣赏，整个云锦非常完好，上面有完整的图案和铭文，是我们第一次在丝绸文物上看到了人名，上写“韩文绣文佑子孙无极”。后来，1995年再次在尼雅墓葬群挖掘，陆续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锦绣，基本都是东汉生产，陆续运到西域国家的，不少是汉室赏给当地国王的。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图案也在变化，尤其是云的形状，后期的山状云越来越多，而且铭文也有了变化，除了祈福文，也有一些表达特殊含义的铭文。比如1995年在尼雅墓葬群出土的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这是一块五色锦，和汉代流行的五行包括五味观念相符合，用四重丝线在不同区域变化，最后就变成五种颜色。这是一块长条状的物品，发现的时候，分成两段，上半段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按照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这句话听起来很吉祥，和现在五星红旗暗合，而且又有“利中国”的字样，因此被定的文物级别很高，在新疆博物馆也有了重点待遇。

但是真实的情况没这么简单。考古学者在附近发现了纹样一样的小织锦，上面有完整的“南羌”，还有半个



9月15日，中国丝绸博物馆2015年度“丝路之绸”特展展出一具身着绸衣的“新疆营盘男尸”

言字旁，所以学者们推断这应该是同一块织物。整句话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按照考古学家，也是墓葬的挖掘者于志勇的研究，当时打仗时候要观察星向，这应该是一句鼓舞士气的话，尽管“五星出东方”的例子在天象上极其少见，但是当时很多文书有记载，应该是统治者鼓舞人心的话。后来赵丰又在国外的私人藏家手中看到了类似的残片，均为五色织锦，非常精美，在文物价值上，可能五色织法的重要性，比那句吉祥话的意义更大。

根据学者研究，这块织物整件应该是护膊，缠在胳膊上，供老鹰站住，所以使用者是出外狩猎所用。

在这个阶段，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并非单向，而是双方互相影响的。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导致了漫长的希腊化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开始，丝路上的希腊文化开始显现，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持续更为深远，在丝绸之路发现的丝绸文物，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赵丰说：“比如尼雅出土的蜡染棉布，同样是1959年那次考古挖掘的结果，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后来在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走向盛唐的展览的时候，

我才发现这两块棉布应该是一块，里面的主题很受西方的影响，里面的半裸女神也许是希腊女神提喀，或者说也是中亚当地的女神阿尔多喀洒，而棉布中间的图案，应该是希腊神话中与狮子搏斗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这是一块中国发现的早期棉布，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蜡染作品。”

1995年在营盘发现的一件锦袍，更能说明这点。营盘属于大罗布泊地区，靠近楼兰，整个墓葬在一片戈壁滩上。1995年在其附近的一片山脊上，发掘了15号墓葬，考古人员立刻觉得很不一样，挖掘出一具戴着麻面具的男性尸体。1996年运到上海的丝绸之路展览上展示，立刻震动世界，被称为“营盘美男子”。他的面具上面有白色涂层，表情很安详，面部表情俊朗，眉眼细长，额头上面还有金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衣服，非常鲜艳，保存完好。因为后来要把他的衣服剥离下来，赵丰看到过他的尸身处理，很奇特，用丝绸捆绑，像处理木乃伊一样，手指上也捆绑丝绸，为什么这么处理，没有答案。因为当地的考古发现中没有这种处理方式。现在也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国际上通用“营盘美男子”来代称他。他身上的裤子本来以为是毛的，后来发

现是当地的丝制造的；而衣服是双层锦，正面是红地黄花，反面是黄地红花，上面的童子图案，按照专家的考证，有可能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厄洛斯。但手中拿着武器，是盾和剑，比较奇特；另一件在附近发现的锦袍，上面也有厄洛斯的形象。事实上，不仅有爱神形象，在青海都兰墓地发现的北朝晚期的织锦中，还发现过太阳神的形象，不过是接近印度传过来的太阳神形象了，用中国技术完成，并且添加了一些中国的想象，和希腊的太阳神已经不太一样。

从西方倒过来传播的丝绸文化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传播，先是实物传播，后来是原材料和技术，再后来，是整体的艺术风格。生产技术落地在中亚和新疆一带的时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典型的是中亚的赞丹尼奇，也称为粟特锦，大约是中国的唐代开始生产，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居住，慢慢地从乌兹别克斯坦，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西北和内陆地区，他们的织锦和中国传统的纺织技术互相影响，提升了双方的丝绸生产技术。

根据中亚史料记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附近的赞丹那，一直到很晚还生产赞丹尼奇。赵丰去到那里的时候，只发现很多几百年历史的古桑树，可是已经没有人会纺织丝绸了。之后又去了邻近的库卡村，在那里找到一位老农，才知道附近的村落在过去分工合作，都生产丝绸，有的村庄负责纺织，有的村庄负责染色，但是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到来，要求停止私营经济，赞丹尼奇的生产在当地就停滞了。

现在只能从遗址里发现关于赞丹尼奇的奥秘了，粟特的都城虽然被毁灭，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比如布哈拉附近的瓦沙拉遗址，上面的壁画里面所绘的纺织品有明显

的赞丹尼奇的联珠花纹，另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遗址里面，也发现壁画上的人们穿着粟特锦，上面的图案有绶鸟，有长着狗头和翅膀的怪兽，还有双人骑骆驼的图像，骆驼鞍和马鞍上也有大量的联珠纹。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在中国敦煌的壁画上也出现了类似图案，比如隋代洞窟里就出现了类似的图像，但是在其他年代洞窟则没有，联珠纹画得很精细，里面还有驯虎图，说明当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粟特锦的存在，而且基本就是那个时代开始传入，画工觉得精美，所以用在壁画里面。

中国管粟特锦叫波斯锦，西方却习惯叫赞丹尼奇，主要是因为比利时的辉伊大教堂发现团窠对野山羊纹锦，上面直接写赞丹尼奇，因当时中亚最著名的生产村落赞丹那而出名。

赞丹尼奇纺织方式很有特点，与中国传统纺织方式完全不同，一看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大量的波斯锦，其中野猪和马鹿造型都很流行，而在敦煌的藏经洞里也发现了大量波斯锦，不过目前，价值高的基本藏于英国。赵丰去看过很多次，发现了敦煌波斯锦很多不同的特点，有的完全是波斯传来的，比如一块分藏于英法的野外山羊纹锦，和著名的辉伊教堂的那块很相似，有的是中国唐代自己制造的，比如一块红地团花锦，织法是波斯的，图案风格却是唐的，说明在隋唐的时候，中亚的纺织技术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最后，中原的丝绸织品吸收了中亚风格，又促进了大唐新样，其中有两位工匠何稠和窦师纶，在其中功不可没。

最早的传播，应该是中国的丝绸生产上，有了很多胡风题材，包括狮子、大象和大角羊，这是照西方人的图样来生产的，慢慢的，开始在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点，逐渐把外来文化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过

程里，生长在中亚何国的何稠起了很大作用。何国靠近粟特，何稠的父亲是玉雕大师，他自己到长安后，先在隋朝做到太府丞，后来在唐为将作少匠，管理丝绸生产的诸多事宜，最早是仿制波斯锦，后来使用了很多中国技术，织出来的锦绣比粟特锦要精细。在新疆墓葬里发现过这种中原织锦，也有传到日本，收藏于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狮锦”，非常精美：骑士头戴装饰有日月纹的皇冠，马有翅膀。这件唐联珠纹锦是波斯风与唐风的结合，据说7世纪由遣唐使带回，做过圣德太子的御旗。

传说中李世民的表兄窦师纶，被封爵为“陵阳公”，他所创造的很多样式，也就成了“陵阳公样”。样，指的是风格和模式。当时唐流行的变形联珠纹、宝相花外环，还有动物纹夹纛，都是他设计并突出的。而且不仅仅在丝绸制品上，慢慢还在金银器物上显现，特别具有唐代特点。

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创造出很多新样，在很多诗人的诗歌里都有提及。不过保存大唐新样最多的，还是敦煌。敦煌的丝织品，先是被斯坦因带到英国和印度，然后又被伯希和带往法国一部分。其中日本大谷探险队拿走的丝绸文物在大谷破产后，卖到韩国，也有部分后来辗转流到了中国旅顺，所以有部分后来收藏在了旅顺博物馆，也算是幸运。这些丝绸文物，大部分赵丰都观摩过。敦煌的丝绸文物，以幡为最多，幡分为几部分，头、面、手、足和身，每部分都有不同的图案和纹饰，其中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很多都有精美的花朵图案，其中有一只上面的花鸟图样，和诗人王建提到的“蝶飞参差花婉转”是近似的。花鸟图样在唐晚期，已经是敦煌丝绸的主角，敦煌的丝绸文物可以和壁画形成对应关系，是一种丰厚的遗存。

法门寺地宫里的丝绸品也为数不少，可是很多尚未整理出来，有很多



唐 托盏侍女绢画（吐鲁番阿斯塔那 187 号墓出土）

被包起来的尚为打开。其中有一包从侧面看足足有几百层，因为当时一件服装就有多层，表里垫、多件层就更多了，很多还能看出花样。比如一件蝴蝶和穗状花卉对排的，也算是大唐新样。按照发掘人员的说法，刚进地宫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金线，一碰就会断，应该是地宫里悬挂着大量丝绸帐子，织进了金线，丝绸因为潮湿而腐烂，但是金线没有烂，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形。

地宫旁的物账碑上面有详尽的记录，说地宫有多少宝物。但是目前尚无法一一对应。其中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一件绣裙，说是武则天的绣裙，但是根据赵丰的研究，这件团花纹样的精美织物更可能是件包裹皮，近年和德国科学家合作打开的裙子与此完全不同，腰部的织金锦绣一对喜相逢的凤凰，下面用银手绘了裙脚，已经氧化发黑了，但是还可以想象这些裙子当年的艳丽。

尾声：日本留存的中国丝绸名物

隋唐年间，中国的丝绸开始向日本传递，使日本成为丝绸之路的最东端。遣唐使带回大量的宝物，很多都存放在正仓院和东大寺里，中国由于改朝换代的频繁，导致很多文物都被破坏，许多丝绸文物都是通过考古挖掘而出现的，而且集中在西部地区，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系统，保存比较完好，在正仓院能看到很多唐代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圣武天皇年代正好是唐鼎盛年代，所以能看到很多唐物风貌。

在“国家珍宝账”里面，记载有袈裟，其中有件仿照树皮色制造的，造工非常考究；装载正仓院紫檀琵琶的宝花织锦袋子，也是一件传世文物；屏风是另外一件与丝绸有关的珍宝，现在保存的山水夹缬屏风十二叠，属于唐代的夹缬，这种特殊的夹缬织物，既有屏风作品，也有普通作品。除了

山水外，还有鹿纹，鹿头上戴有花盘，应该也是中亚风格的影响，说明胡风跨越了整个中国，又传到了日本。

夹缬属于一种唐代宫廷发明的特殊印染工艺，传说是唐玄宗宫廷里柳才人的妹妹所发明，最初是秘密制作，后来传遍天下，在丝绸之路上逐渐流行。日本保存的这些夹缬非常珍贵，因为在中国只能找到若干不完全的类似文物，但是日本在盛唐时代只派遣了两次遣唐使，何以有这么多夹缬丝绸制品，实在难以明白，日本并没有自己的夹缬工艺，所以这些制品应该明确来自唐。

另外一个藏有大量丝绸文物的地方是法隆寺，正仓院有 17 万件染织品，法隆寺只有 3000 件，但是里面也不乏珍品，比如悬挂的 3 米左右的幡，虽然纬线都断了，但是经线还在，还能窥探出原来的面貌。目前法隆寺的展品基本都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因为保存条件更好，所以定期会拿出展览。其中有几件特别能看出中国、日本和整个丝绸之路的关系：比如一件黄地龟背纹绫，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很相似；另一件兽面纹绫，上面有飞天的形象，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产品，何时去了日本，并不清晰；还有一件著名的佛殿纹绫，上面织有少见的建筑物形状，周围还有几个人，可能是早期佛教题材。很多纹样在当时广泛流行，在日本的丝绸文物和新疆出土的文物上都能看到，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的广泛性。

还有一些丝绸制品，也能说明各个不同区域文明复杂联系。比如新疆现在还在织的艾德莱斯，是一种扎经线的染色绸缎，但是在日本被叫作广东裂，说明当时是从广东一带传入的。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纺织方法，朝鲜也生产类似的织锦，还专门进贡唐朝。但是据考证，这种织法的起源地可能是在印度，说明某种丝绸文化的流行，在当时是席卷整个亚洲大陆的。■

金秋十月

时间：2015年10月17日-18日

地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南园（西门）

奥森汽车主题公园



限量免费门票火热领取中……



BICITY官方微博账号：@BICITY城市骑行



第二届无动力自造车比赛
这是一次狂欢节，有奇思妙想、脑洞大开的参赛作品，各种影视动漫游戏COSPLAY。



多款热门新车型展示
零距离亲密接触，可以看，可以摸，可以乘坐，360°全方位了解它们的性能。



趣味亲子活动
培养孩子的创造精神，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同时让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BICITY自行车主题展
带您重温自行车文化，感受骑行的魅力。

不要错过这个了解汽车知识汽车文化的机会，关注我们，参与活动，赢得神秘礼物。现场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原生态美食免费放送，先到先得！一起来参与吧！

东西物流中的早期创业者

整理 / 王星 插图 / 老牛

魏徵：葡萄酒宗师

但凡对中国历史有些许了解，都不会不知道魏徵。作为唐初“贞观之治”时期的一代名相，他留下了从“以人为镜”到“梦中斩龙”的一系列故事。不过，在朝廷之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葡萄酒酿酒师。

中国葡萄酒最著名的宣传词至今仍是唐代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只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样的断句并非没有可能，而且三件东西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都有些模糊不清：“葡萄”恐怕不是如今人们想当然的红葡萄，“美酒”未必是想象中的葡萄酒，“夜光杯”也很可能并非如同今天的玻璃酒杯一般晶莹通透。

提及中国葡萄酒酿造史，有人很乐意说：“丝绸之路八千里，葡萄美酒三千年。”对仗是否工整到打油暂且不说，后半句可惜很可能不是事实。中国历史太习惯“上下五千年”的说法，以至于但凡好点的东西不加个三五千年就对不起祖宗，中国葡萄酒酿造史中就藏着这样的陷阱。《诗经》中的一些诗句似乎证明中原地区在殷商就有了葡萄，但正如煎鸡蛋和鸡蛋不是一回事，有葡萄并不意味着有葡萄酒，何况中原土生的葡萄并不适合酿酒。周穆王见西王母也不过得了个身份暧昧的“水精”夜光杯。《周礼》中提到天子的果园有一句“树之果蓏、珍异之物”，被郑玄注为“珍异，蒲桃、批把之属”。且不论这依旧不算有葡萄酒的证明，《周礼》成书于战国、郑玄是东汉人物，两者都难算作“目击者证词”。

西域葡萄酒东传史中最“文艺”的传说是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衍生的“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唐朝一代名相魏徵

马嗜苜蓿。汉使取其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在民间葡萄酒故事中，“汉使”被演绎为张骞，而且补充说“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事实是这位汉使出使时张骞已经故去至少10年。张骞在世时，有关葡萄酒只对汉武帝简略提到，他与汉武帝的兴趣显然更多集中在大宛的“天马”上。作为“天马”的饲料，在汉武帝心目中苜蓿其实比葡萄重要，宫苑遍种的葡萄和苜蓿也更近似向“外国使”炫耀的“景观工程”。至于传说中的“酿酒艺人”，《大宛列传》通篇从未提到。

据张玉忠《葡萄和葡萄酒传入我国的考证》，葡萄酒酿造技术在东汉时期才由西域粟特人经营的酒坊带入，但由于中原民间偏爱传统米酒，该技术直至南北朝都只限于粟特人所知，葡萄酒都被视作珍异品独为贵胄享用。中原真正开始从西域引进葡萄酒酿造技术，正是魏徵所在的唐初，随即在宋代出现近千年的断层期，以致出现了仿造黄酒酿造法的加曲发酵法。西域葡萄酒酿造法再度进入中原并达到鼎盛是在元代，但明代再度没落，直至清末略有恢复。葡萄酒在中原的命运延续着简单而残忍的模式：倘若政权掌握对北方与西域民族的控制权，葡萄酒就会兴盛，反之没落。

经过如此的起伏，中国古代葡萄酒能够与1892年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酒直接对接的历史甚至不到200年。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可以在史料中知道魏徵酿造葡萄酒，但他的酿造技术却早已失传。传为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有记载：“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绿翠涛，常以大金罍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醪绿胜兰生，翠涛过玉蕊。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蕊，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羌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一般认为魏徵酿的是“醪绿”与“翠涛”两种葡萄酒，不过从字面上看，与今天常见的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不同，魏徵所酿是一种“绿葡萄酒”。

“醪绿”早在晋代就被作为“美酒”的代称。《本草纲目·酒》中解释：“酒，红曰醪，绿曰醪，白曰醪。”“醪绿”正是一种绿酒。清末吴趸人笔下还有“灯红酒绿”的词句，可见当时绿酒常见，反是如今只剩下“竹叶青”、“杨林肥酒”等少数代表。然而，传统的“醪绿”是用米酿造的，魏徵的“醪绿”脱颖而出则是因为使用葡萄。关于葡萄的东传，北宋《南部新书》中的这段记载经常被引用：“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子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唐太宗因此被视为中原酿酒第一人。但对比史料可以发现，“太宗破高昌”是在640年，而魏徵任左相是在633~642年。643年魏徵病故。一般葡萄种植后3年后才开始结果、5年后才适合酿酒，就算唐太宗心急，葡萄刚结果就拿来酿酒，魏徵恐怕也喝不上了。因此，更可能的是魏徵酿酒在先。至于魏徵从何处学的技术，据岳东《魏徵与葡萄酒酿造术的传播》一文考证，应该于魏徵出身漠北游牧民族高车有关。高车与粟特人来往密切，比较其他史料中对粟特葡萄酒的记载，魏徵显然是得到

了粟特人的真传，然而高车这一卑微的出身使得魏徵不便向唐太宗透露，以至于高昌战后唐太宗才得“酒法”。唐太宗亲自酿酒，其实也可视为向故去的心爱大臣兼一代酿酒宗师致敬。

尽管有皇帝亲酿，魏徵的绿葡萄酒仍然在中国绝迹了。“醪绿”一词虽然仍然大量出现在唐以后的诗文中，但明显指的是米酿绿酒，与魏徵无关。“马乳葡萄”学名“马奶子”，原产西亚与中亚、公元前后由粟特人引进新疆，如今只用于食用，很少用来酿酒。现在全世界只有葡萄牙尚存绿葡萄酒(Vinho Verde)，其酿造史可追溯到古罗马，实际上是一种清淡、酸度高、略带起泡的白葡萄酒，因酒液略带绿色反光而得名。葡萄牙酿造绿葡萄酒最主要的葡萄品种名为阿尔巴利诺(Alvarinho)，字面意思是“来自莱茵的白(葡萄)”。基因测试表明：阿尔巴利诺与德国著名品种雷司令(Riesling)有亲缘关系，而雷司令的母本之一是在法国汝拉山区用于酿造以耐存放著称的黄葡萄酒(vin jaunes)的萨瓦涅(Savagnin)，萨瓦涅的故乡则已接近东欧，遥望“马乳葡萄”的故乡。这恐怕也是魏徵的“醪绿”与“翠涛”留给今人最后一点可幻想的痕迹。

粟特人：小人物的大时代

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惠特菲尔德(Susan Whitfield)出版了一本貌似虚构小说的作品：《丝路岁月》(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书的副标题是“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全书的第一个出场人物是“纳奈反达克”，一位虚拟的粟特商人学徒。将粟特商人置于卷首是理所应当的，没有粟特商人，随后士兵、马夫、公主、僧侣、艺妓、尼姑、寡妇、官吏、艺术家在丝路上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倘若说丝绸等商品是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养料，粟特商人就是推动这些养料流动的“丝路之血”。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

代，粟特(Sugda)人就已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狭长谷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定居，并因居住地得名，使用一种源自中古东伊朗语的语言。粟特人最初臣服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后俯首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世纪又被并入希腊化的“大夏—希腊王国”。200年后匈奴人在北方崛起、大月氏西迁，索格底亚那地区陷入战乱，粟特人一度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直到张骞自从西域带回康居国的情报，粟特人才重现史籍。

战乱成就了粟特人敏锐的外交直觉与卓越的语言才能，两种能力合在一起就成为精明的经商本能。粟特人最初不过是把持着西域商业的贵霜王国(今阿富汗与北印度)商业网络中的区域性“业务员”，公元3世纪，贵霜与汉王朝都开始衰落时，粟特人却逐步摆脱旧东家的控制，通过纳贡等方式连通东方中国走马灯般轮换的政权、北方各游牧汗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网络，使这些威加海内的君主事实上成了在日常所需上听命于粟特商人的忠实顾客。

粟特商人的主要“经营范围”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自西域运进玻璃珠、玉饰、玛瑙、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商品。粟特商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但也不放弃因地制宜地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短线”买卖，例如在新疆贩卖牲畜。粟特商人曾有过贩卖奴隶的不大光彩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个粟特商人都放高利贷，不仅贷钱，还贷放绢帛。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境内政权林立，粟特商人一方面业余做些各政权间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将商业网络突破到丝绸之路东西两极：他们将中原进贡给突厥的丝绸低价收购，躲开波斯的监控、成功进入拜占庭，在拜占庭与北突厥之间直接建立起丝绸贸易线路，打破了以往波斯对这一高利润贸易的垄断。

然而，公元7世纪阿拉伯，也即中国史籍中“大食”的兴起终结了粟特商人的黄金年代。为避战乱，大批粟特人



粟特人

迁入中原。最初他们还利用隋、唐推行胡汉有别、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的政策，为独霸中原的丝路贸易而不肯入汉籍。待公元8世纪以康国为宗主的各粟特城邦被阿拉伯所灭，粟特人逐渐入籍中原，开始在中国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胡”留名。中国盛唐前后种种与“胡风”相关的器物、习俗大多与粟特人相关。

“粟特”是《魏书》中的译名，汉魏之间史料中也有译作“粟弋”的。名为“粟特”时是粟特商人最意气风发之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商人的名姓，20世纪历史学家如惠特菲尔德在试图书写他们的故事时，也不得不用一个虚拟的名称代替。如同其密集的商业网络一样，粟特商人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一个小人物组成的大版图，但在中国历史中，却有一个粟特人因为拆散一幅历史版图而准确无误地留下了他的名姓。白居易

在《胡旋女》中慨叹：“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胡旋”就是来自粟特的舞蹈，擅长此舞的安禄山正是粟特人，同时也正是安禄山挑起了长达8年、造成唐王朝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的名字在粟特语中意为“光明”。粟特人多信祆教也即中原所称的“拜火教”。由于其教义相信“黑暗”与“光明”会不停战斗，因此“光明”同时具备了“战神”的意味。安禄山的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姓康，也即“昭武九姓”中的宗主大姓。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安延偃后，安禄山改姓“安”。安禄山没有辜负他的粟特血液，由于“能说六种番语”，很快得到了边境互市的中介与翻译工作。粟特人祖祖辈辈以血汗换来的大国外交意识则使安禄山在与上司的应对上进退自如，很快便因“商业才能”得到赏识，成为节度使的义子。

如果没有唐玄宗重用胡将的策略，安禄山或许会满足于做一名“节度商人”。然而，因为有战功，而且善于在不损失双方商业利益的基础上调停纷争，安禄山成了黄河北部最有权力的节度使。

此后有关“安史之乱”的种种早已见诸各类汉语史籍，天生善言的粟特人却选择了沉默。战守双方都有粟特人，战事平定后很多粟特人选择了改姓，因为中唐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排胡情绪，甚至在战乱并未波及的扬州也出现了杀胡事件。中原史籍中的“昭武九姓”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这些姓氏有的流传至今，有的为避祸而改姓泯然于众多汉姓。曾经叱咤丝绸之路的粟特人最终卸下了他们的行囊。最后的粟特人据信是塔吉克斯坦的雅格诺河谷中一个被称作“雅格诺比人”（Yaghnobi）的族群。当20世纪末语言学家们找到这一族群时，他们正过着半定居的放牧生活。他们仍保有自己的语言，但因不常与外界交流，曾经以“语言天才”闻名丝路的粟特后裔们已经丧失文字。

汪大渊：东方的马可·波罗

祖籍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初次从福建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时不满20岁，正值元代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或许因为他与马可·波罗随叔父前往东方时岁数相仿，而且见识颇广。但汪大渊与马可·波罗的不同不只在于出发的时间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而且在于汪大渊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走的是陆上。两者取向的不同显示出东西方同样精明的商人对于当时有利可图的商路的类似判断。《马可·波罗游记》为早已熟谙海上抵达东方路线的西方奠定了突破陆上商路的信心，汪大渊留下的《岛夷志》则为75年后东方的郑和下西洋绘制了蓝图。

史料记载：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

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此后至元三年（1337），27岁的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汪大渊只出海两次，不过，闲散人方能成就杂学，汪大渊虽然没有马可·波罗那样桎梏于狱中的不得已时光，在著书前也散漫了10年。元末供职朝廷并因战事随元顺帝“北巡”的刘侏在《北巡私记》中记载：“《岛夷志略》一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1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倪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因为是记载元末元顺帝最后时日的唯一汉语文献，《北巡私记》自从清代起就被称为“希世之秘笈”。然而，所记内容远多于《岛夷志略》的《岛夷志》的散佚对于后世才是更大的损失。如今我们只能从尚存的《岛夷志略》中猜想汪大渊的眼界：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暹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刺、苏洛高、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嘯喷、浚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花面、

淡洋、须文答刺、僧加刺、勾栏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挾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刺、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天堂、天竺、层摇罗、马鲁洞、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虽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汪大渊著《岛夷志》时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因为汪大渊的自信，《岛夷志》留下的名册本应成为几个世纪东西方地理或历史学家考察的密码，其中记载也说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泉州作为“天下之货仓”的概念本应因汪大渊而起。

然而，历史记载上最早的《岛夷志略》的元代版本今俱佚，“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此外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堂书目》、《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而明抄本今已亡失”。

1324年，距汪大渊出海前6年，马可·波罗病逝。汪大渊离世的时间至今是个问号。清代《四库全书》中有《岛夷志略》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然而，汪大渊自海上西游著书后早已远游，无人知其踪迹。与马可·波罗在病逝前遣家人找教士相比，这也可能是某种东方式的自求仙境。✎



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物种输入，1500 年的历程

中国对国外植物的引进是一场历时 1500 多年的传输运动。

主笔 / 陈晓



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

花园

我的植物启蒙是从四川老家的院子开始的。这是一个看起来并不精致甚至有些杂乱的小院落，在住房外用围墙圈出一溜狭长土地上，见缝插针种着各种植物。贴围墙根的是蔷薇和玫瑰，荆棘枝干交错缠绕了整面墙体，围墙拐角处是几株夹竹桃。为了遮挡夏季的太阳，住房的每扇窗户下都有一株葡萄，藤蔓顺着竹架弯弯曲曲爬上窗棂，再爬满整面房墙。在葡萄架和蔷薇花墙之间，种着些零碎花果：几树柑橘，一株无花果，一株石榴，还有一丛茉莉。每年初夏，蔷薇开疯了，满墙摇曳，然后翻山越岭垂到墙外，像给墙头搭上了一匹厚重的花毯子。蔷薇开之前是玫瑰，蔷薇开完之后就轮到葡萄。夹竹桃和无花果的花果期最长，从初夏开始，墙角就开出

几朵白花，几天后花瓣转黄萎谢，新的花苞又次第绽放，能从 6 月一直默默开谢到 10 月。这个时候，秋风送爽，该石榴成熟了。院子谈不上什么园艺布局，植物之间也没什么呼应，只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花期，寒来暑往次第开放、凋谢。

但如果从一个对植物颇有些研究的学者，比如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院子就不那么简单了，可以说是中国引入外国植物物种史在市井民间的缩影。劳费尔曾经盛赞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对植物物种的吸纳能力：“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其变动范围从世上最高的山峰到最低的地表凹地——吐鲁番盆地，从南方的热带雨林至喜马拉雅高山上的冰河期地貌，这种跨度无他国能及。而且他们的位置处于东南亚丰富的珍稀植物与近东古代农业发源地之间，属于世界上借用模仿的最佳位置。”到今天，即便是一个普通的西南住家院落中，也遗留着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传输运动的蛛丝马迹。

比如石榴。原名安石榴，是伊朗至阿富汗一带非常流行的物种。古代波斯人不仅把它当水果食用，还把籽取出来开发出各种用途，以此经营很大的买卖。他们用石榴做酱油，先把它浸在水里，用布过滤，可使酱油有

颜色和辣味。还把石榴汁煮滚用来在请客时染饭，为饭食添色增香。石榴传入中国时间很早，在北魏时期的洛阳都城就流传着一句话：白马甜榴，一实值牛。意思是白马寺的石榴，一个就抵得上一头牛的价值，可见其珍奇程度。千年以后，石榴已完全融入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成为非常家常的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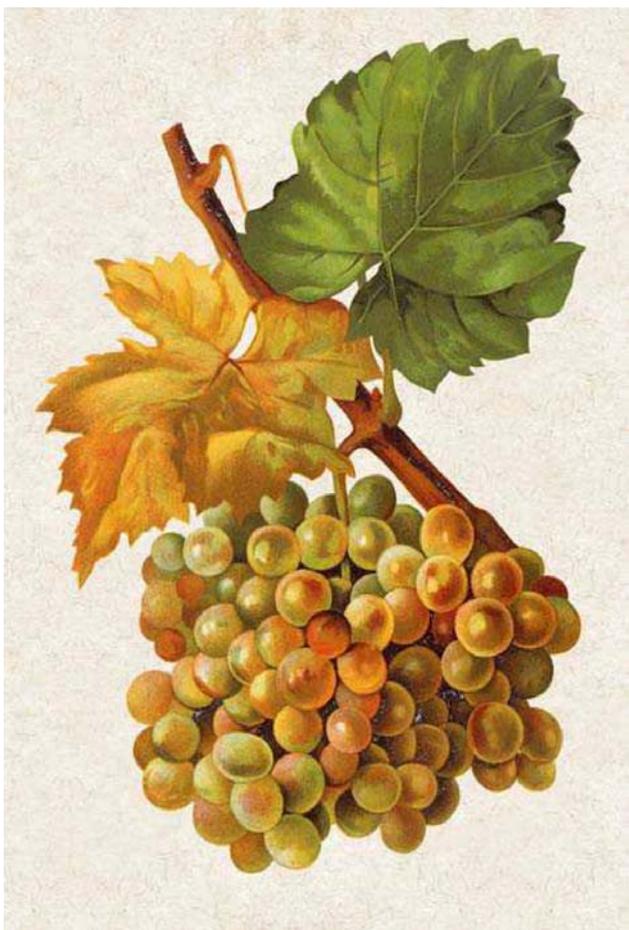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水果集市

葡萄被认为是最早引入中国的物种。《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葡萄不喜多雨湿润的环境，因此刚传入中国时，仅在长安一带气候干燥的地区种植。但如今，葡萄已经能在多雨的西南普通院落中茂盛地生长起来。我记得家中院落中的葡萄有四个品种，能结出红、紫、绿、绿白四种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果实。不仅能吃果实，葡

萄叶也有用处。它既柔软，又大小适中，而且没有异味，每到夏季，挑选出成熟度中等的葡萄叶，用清水洗净，刷一遍白酒消毒添香，然后裹上腌过的肉块，扔到焖饭的锅底，就能烤出喷香的肉块，是童年时最乐此不疲的厨事。后来在梅村著的《饮食界之植物志》看到，葡萄叶的用处还不止于此，它可以代替烟草，洗净煮熟后可以吃。

还有一种葡萄叶，因为含有糖质，是儿童喜欢的食物。

无花果更是一种完全源自西域的舶来品。它在伊朗高原蔓延之广，不下于安石榴，但最初西域种植的无花果都是早熟品种，也叫新疆早黄，完全成熟后果皮呈黄色，有白色椭圆形果点，果顶不开裂，果肉淡黄色略呈淡红色。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葡萄



无花果

中记载，在他那个时代，中国南方已经普遍种植无花果，种植的方法是将树苗栽在地上。这一点特别引起了劳费尔的关注——“因为它说明中国人一直不知道用早熟法。他们的著作里就没有提过早熟法。”我家院子中那株无花果树，就是用中国南方的培育技术栽种出来的。无花果从初夏开始成熟，果皮由青转红，果体慢慢变软。到临近采摘的几天，日日都要去小心巡视几遍。没有熟透的无花果，中部果粒板结成一团，果汁呈白色，淡而无味。但熟起来非常快，硬邦邦的果实会在一夜之间通体柔软，裂出淌着蜜黄色浓稠果汁的大口，采摘稍晚就会被蚂蚁昆虫捷足先登。能成功地摘到一枚全身紫红、光滑圆润、柔软丰盈、咧开大口淌着蜜汁却还没有被蚂蚁抢食的无花果，是童年夏天在院子里得

到的最好馈赠。

茉莉是另一种被考证来自西域的植物。它又名悉耶茗花，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上如此记载：“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於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的《南越行纪》中也写道：“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茉莉花期也很长，从5月带花苞，能一直开到晚秋，于是整个夏天和秋天，都能带着茉莉穿成的手串，至今能记得白色小花貌不惊人，却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幼时记忆中四时更替的园圃之乐，映衬着中国人自汉唐以来在植物物种上兼容并蓄的历史。劳费尔曾写过一本《中国伊朗编》，详细考证了中国对

国外植物的采纳和吸收过程，书中认为中国对国外植物的引进是一场历时1500多年的植物传输运动。“在植物经济方面，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他们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如果要回溯这场历时千年的植物拿来运动，就要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汉朝说起。

植物的引进

如果身为一个汉朝的农民，应该是相当有自豪感的，因为他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美国学者尤金·N. 安德森曾比较过同一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农业生产力：“根据封建时代的标准，汉朝农业产量高于中

世纪的欧洲。欧洲每英亩 500 磅的产量就被视为高产，而且由于种植的谷物品种产出率低，收成中的 1/3 必须留做种子。中国人留种少得多，得到的回报却多得多。”安德森认为汉朝农业生产领先的原因在于自秦帝国形成以来，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重视。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后贯彻法家理念，将农业与食物生产置于重要地位，并视为增强国力的关键。在那场著名的大焚书中，明确赦免的类目唯有农业与医学。汉朝后，农业越发精耕细作，官家用各种手段劝课农桑，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居民。帝国政府在田租、公共水利，及对小农阶级维护上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在中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

西汉末期的重要农学著作《汜胜之书》记述了汉朝农耕的详尽过程，表明了当时农业是何等精耕细作。汉朝的农民会将种子浸泡在煮过的骨头、粪肥或者蚕屑制成的人造肥料里，这种肥料还要加入一些植物毒素。种子被反复覆以一层这类糊状物体，必须小心地将裹在薄薄表皮中的种子弄干，使它们不会腐烂——这些手段是西方人在现代科学实验室里才摸索出来的。政府主导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使稻子得到灌溉，稻田得到平整，而且每年还通过变动水道来改变水流，使水温春天暖和，夏天不热。在缺水的北方，土壤会在夏季被反复弄碎，形成一层蓄水的覆盖土。冬天，农民会将雪被压实，以免被风刮走，用这样的方法冻死在冬天幸存的害虫卵。在一些潮湿的区域，每个过大的果实下都会垫以叶秸，使瓜不会因接触湿土而腐烂。任何含氮的作物都被小心存做肥料……

植物在汉朝的生活体系中如此丰富，不仅体现于食物，还有药物，在当时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大约 365 种药。“偏爱植物的成见在此书中有所显露：67 种是动物药品，42 种

是矿物药品，246 种是植物药品。”通过这些史料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汉朝已是一个植物物种的盛世：有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有足够精细的耕作技术，有重视农业的政策。因此，当出使西域的使者或者远征大宛的将军，将新鲜物种带回国土时，这里已经具备接纳丰富外来物种的能力。

苜蓿被认为是最早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物种。它是汉朝帝国军事意图和国家安全的副产品。汉武帝时期一直在寻找善于作战的良马，听说伊朗高原上有纯种骏马，体格比蒙古种的小马魁梧，全身匀称，四足纤细，胸、颈、臀部都很发达，善于征战。于是常派遣使者到伊朗诸国遍寻好马，最多的时候一年中派遣求马使节十几次。最初找到的良马得自乌孙，后来张骞走到了大宛，发现这里的马种更为优良，因为马奔跑后流的汗是红色，因此被称为“汗血马”。汗血马所吃的饲料就是苜蓿。史书称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求已久的好马如果要在中保持健壮，就要把它的主要食粮一并带回。于是他将大宛的苜蓿种子，带回国献给武帝。武帝命人在宫旁广阔地面遍植这新奇的植物。不久，这种饲草从宫中迅速地蔓延到了民间，遍布华北。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开启物种输入的第一人，因此成为引入物种传说的中心人物。大部分带“胡”字植物，都被认为是张骞周游绝域后带回来的物种。比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的说法：“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还有胡麻，《太平御览》也引用《本草经》，认为是“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还有胡蒜、胡瓜、胡萝卜……一些近代的外国史学家已纷纷否定了这种说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专门撰文指出，张骞无法以一人之力完成那么宏大的物种传输运动。因为他出使西

域时并不是以搜集物种为己任，而且途中险象环生，还被匈奴囚禁了一年，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在逃难过程中并不易保管。但就如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说，舶来品最真实的活力和乐趣在于它来自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遥远地方，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之地生动活泼的想象。张骞“凿空西域”的行为，本身就开启了人们对于外域的想象力。众多的驼队贸易商人沿着被打通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新的物种因此接踵而至。

移植技术

743 年，在西京长安以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人工湖，实际上是一个海外贸易货物的转运潭。来自各地的贸易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转运潭里——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鞞、来自南方的红橘、来自西域的奇花异果……所有货物要在这里被换装到小斛底船上。大批外国商人也随货物而至，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 200 万人，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外来居民数量也相当庞大。突厥、回鹘、吐火罗和粟特的商人们聚集此地，其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一个叫“萨宝”的官职来监管他们。萨宝的意思是“商队首领”。

张骞之后开启的汉土与西域的相互贸易，在唐朝时达到一个高潮。纷至沓来的外国商队不但带来了许多新奇古怪的奢侈品，也促进了西域庭院植物的栽培。因为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来说，“没有他们深深眷恋的故土植物，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就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美洲一样”。但要让植物在气候、土壤条件完全不同的汉土存活生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 304 年，古人嵇含就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物种移植的种种难处：北方的大头菜引种到南方后会变成芥

菜，因为没有冬季的地方不会生出肥大的块根。而南方的橘引种到北方后会变成低级的枳。柑橘被嫁接到较硬的三叶砧木上以后，在寒冷干旱的天气里，插入的树枝往往会变得虚弱或者死去。

后赵武帝石虎在引种西域植物上取得了一些难得成功的范例。《邺中记》记载，石虎的私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还有可以结出重达两斤巨果的句鼻桃，“子大如孟碗”的安石榴树……”这位羯族君王在历史上留下了残暴嗜杀的恶名，但同时也是一位功劳不小的西域植物推广者。他将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减轻了中原居民对这些外域植物的陌生感。

为了引种这些中原本无的植物，石虎花了极高的代价琢磨移植技术。他御使匠人精心围起苑囿，取名华林苑，运来土壤，引水浇灌，以期创造适宜西域果种的生长条件。《邺中记》记载：“华林苑在邺城东二里，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周围数十里，又筑长墙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又凿北城，引漳水于华林苑。虎于苑中种众果。”为了让这些物种能尽早同中原的水土相合，石虎还下令做了一辆大车作为培植这些作物的试验田。大车名为虾蟆车，“箱阔一丈，深一丈四，转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在国君之力的强力推动下，自石赵之后，西域作物移植汉土



唐代宫廷对药材的需求量很大，许多外来物种都声称具备药用价值

的技术渐渐成熟，开始在中国北方普及。安石榴在河北地区开始有了优良品种，而在北魏时的洛阳，就有大面积的西王母枣与句鼻桃的种植。

到唐代后，从物种的传输到物种的分类管理和种植上，都形成了一个包含相当多细节的技术体系。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证植物物种输入的安全运输，最常用的是用蜡将植物的根茎密封起来，再在上面覆盖几层绿色的蔬菜叶，这样就能避免颠簸摇晃，幼苗在几天之内也不会枯萎。植物在细致的保护下运送到长安后，一部分进入“药园师”掌管的药园——唐朝对草药的需求量非常大，药园是由太医署令管辖，专门负责种植、采集草药供太医署使用的庭院。但更多

的物种会进入上林苑——这是一个皇家专门管理植物物种的机构，坐落在一座巨大的苗圃和庭院中，世界各地的各种庭院果木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汉土后，都将先汇集在此苑中。上林苑中不乏技艺高超的园丁，他们的职责是研究方法将这些外域植物安置成活，既供给皇室新鲜的珍奇水果，还要为唐朝各地营林植树提供树种来源。740年，唐玄宗曾发起过一场美化唐朝北方大都市的运动，要求在“两京以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果树的树种，就来自于上林苑。有些植物在苑中移植成功，并长久地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庞大植物谱系的一部分，也有的植物因为技术不成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这是让人遗憾的物种流失，比如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

据说这金桃是将桃树的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长成的，大如鹅卵，其色如金。7世纪时，撒马尔罕的王国曾经两次向唐朝宫廷贡献这种珍异灿黄的桃子作为贡品，专供皇室成员享用。金桃的树种也被长途跋涉穿越西域荒滩戈壁的使臣商队带入唐朝境内，并且移植进了长安的宫廷果园。但或许因为移植技术不成熟，金桃并没有在汉土流传下来，但后世的人们用想象力来弥补了移植技术上的缺憾。美国学者谢弗在写作唐代中国的外来文明时，将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书名：“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无从推测。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

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植物的繁荣

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曾说过：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如果从植物传播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唐代皇家林苑中的植物物种，就像最新的审美和消费时尚一样，经年累月后会慢慢传递到民间。晚唐时期，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私苑中，已经能看到源自西域的物种。白居易就被传为是白莲的民间推广者。9世纪以前，洛阳还没有白莲，直到白居易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才将白莲从苏州移植到了洛阳。白居易在一首诗中描绘了自己在洛阳履道坊私宅中的园池景色，就专门提到了白莲：“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我所好，尽在吾前。”

在唐代，莲花还保持着外国的风韵，以红色和白色为主，黄莲非常少见，而青色的莲花被认为只有在近于巫术的艺术作品中才能看到。唐代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这说明原本从西域传来时，自然界并没有青莲。但在民间园丁们的奇思妙想下，唐宋时期已经能通过人力配置出青莲。有一部宋初的类书中转引了一个湖州的染户家的故事：湖州有一户染户的池塘里种有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发现开出来的是莲花是红色的。这在当时非常罕见，刺史便写信问染工怎么回事。染工说：我家有口世代用于染布的靛瓮，把莲子浸于瓮底，大概一年后，再种植，就能开出红色的莲花。如果在花根部附近的土壤里埋下旧铁钉、金属罐，向花的根部输送铁盐，就能使绣球花变成青色。

物种繁荣与民间智慧相互激发，成就了一些颇受欢迎的著名园丁，郭

橐驼就是留名后世的一位。他是一位驼背园丁，家在长安城西边的丰乐乡，以种树为业，擅长移植。经他手种的树都长得高大茂盛，挂果早且数量多。于是长安城中的富豪人家、从事园林游览和做水果买卖的人，都争相聘请他。柳宗元写过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里面谈到郭橐驼种植的秘诀讲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后来元朝的一本种树书还托名于他。

展示新奇漂亮的植物物种成为长安城中的一种时尚。拥有罕见物种的多少，以及通过技术革新将新植物栽种成活的成果，成为当时长安城中富家豪门“炫富”的方式。史书记载，杨国忠家的年轻人在园林艺术的革新上颇为擅长，他们建造了一种可以移动的木制花园，叫作移春槛——将花园安置在木轮上，园中种植了名花异木。每逢春和景明，就推出这种可以移动的花车上街，车子一边前行，一边还可以缓慢地旋转，使街边路人可以详细地看到车上的奇花异草。

但真正的物种繁荣还是来自更底层的民间。石虎这些来自异域的君王，对后世植物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技术创新和物种引进。他们在统治时引入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制造出了广大的自耕农小农阶级，他们在一小块土地上辛勤地耕作，尽其所能地将最实用的物种栽种进自己的庭院中。陶渊明就是这样一名小自耕农。他弃官归隐后，在魏朝统治的华中务农度过了余生。虽然生活并不宽裕，收支仅能勉强相抵，但他在天地间创造并书写了自己的生活美学。陶渊明的诗歌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园圃之乐》，也可作为当时魏朝小自耕农田庄的全景图。

陶渊明的田庄分为田地、果园和菜园，种植的作物有粟，可能还有小麦、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别的蔬菜。他还栽培了自己喜爱的松

和菊，还有梨、柳、竹子等别的植物。在陶渊明留下的诗作中，我们还不能看到多少西域的物种，但一个拥有小块自己土地的农夫，可以在方寸之地上按自己的意愿种植，是物种流传非常重要的条件。隋唐时代延续了北魏的土地均分政策。在尤金·N. 安德森的考证里，当时一位普通的男性户主受露田80亩，一生均可耕种，年满60岁时还给国家。同时还受永业田20.3亩，可以终身拥有并传给后代。在配给的份额中，20亩应种植桑麻，余下的1/3则为宅基地和菜田。“虽然面积不大，只是一些小的农庄，但已经比大多数亚洲农民的处境要好。而且中国人植桑非常紧凑，很会利用土地，外观上行修建得像丛林一样，因此几英亩的土地已经可以颇有作为。”尤金·N. 安德森曾这样写道。

到唐代时，植物移植技术的成熟，以及多年土地均分造就的小农阶级，促成了植物物种的大繁荣。近东的农作物菠菜、甜菜、莴笋、扁桃、无花果开始广为人知。来自南亚的农作物，海枣、小豆蔻、山扁豆等植物也开始广泛传播。阔叶的甘蓝、类似莴苣的苦菜，以及带香味的胡芹，这些有实用价值的草木，大多被文人墨客忽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达官显贵的私邸花园中，但在民间自耕农们的土地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和传承。

大众的物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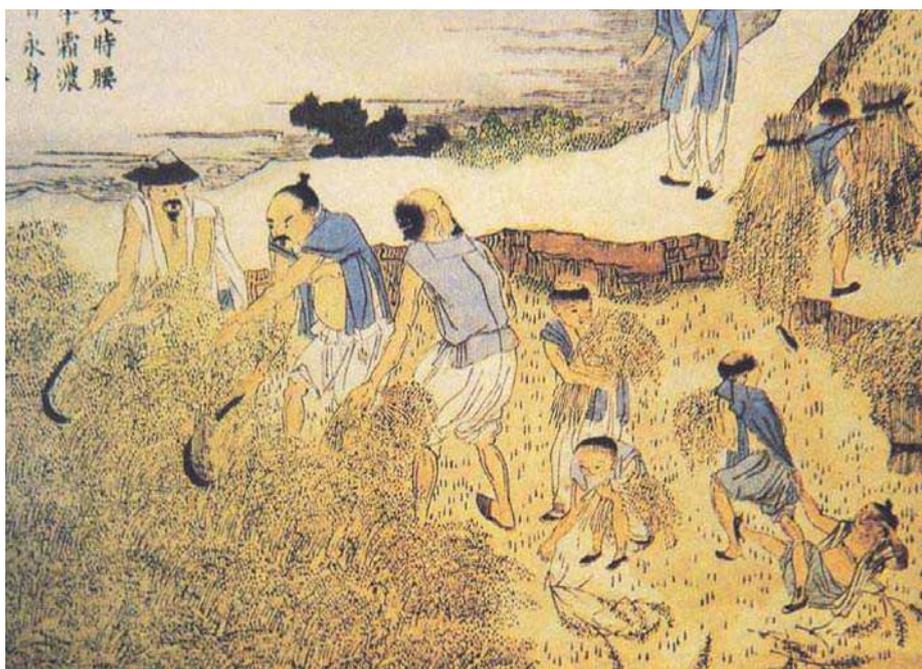
劳费尔认为中国的物种输入是一个延续1500多年的过程。陆陆续续进入汉土的各类植物，开启了人们对化外之地的好奇，丰富了宫廷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但直到宋朝，才出现了真正能称得上革命性物种的输入。

宋朝是一个艰难的王朝。北方胡族入侵，导致南北国土分裂，战乱不断。坏天气与帝国遭受的磨难相辅相成。在北宋末年与南宋末年之间，气候变

得寒冷干燥，偏偏此时中国还迎来一个人口攀升期。人口在北宋期间超过1亿，南宋和金朝的总人口超过1.1亿。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北方国土丧失的情况下，用农耕充实仓廩成为朝政大事。不管是军粮征集还是平民生计，政府在农桑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场新的农业革命应运而生，它被一些外国学者描述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新的知识和工具进一步改良创新，农业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改良；新的材料，粪肥，以及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地保持地力；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但更重要的是，一些高产、耐旱的早熟粮食品种被引入。这些革命性的物种不再只是满足小农自给自足的园圃之乐，或者达官贵人炫耀的奇花异草，而是对国计民生都影响颇大的粮食物种，其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安南占城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和唐代贸易主要经由西北的沙漠绿洲不同，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在海上。宋朝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占城稻就是经由海上到达的。

中国是个吃米的民族，因此在寻求国外物种时，稻米是一种天然能引起中国人好奇心的品种。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细心记录下了在大宛、安息和条支种植大米的情况。在他的亲身经历和听闻传说里，库车、疏勒、和关，和葱岭以北的漕国，还有石国等地都产米甚丰。但这些地方的大米并没有进入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稻米种类非常丰富的国家。据史书记载，光是早稻就有6种，晚稻有10种，早熟的、晚熟的，耐旱的、耐涝的，有黏性的、偏硬朗的……种类繁多。占城稻能在如此庞大的中国稻米体系里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因为它顺应了宋朝天时。占城稻有“百日黄”之称，甚至有的地方可以两个多月就成熟，



清《耕织图》之《收割》

被称为“六十占”。对当时正遭受干旱侵袭的北方来说，占城稻“高仰处皆宜种植，谓之早占”。种植上也不因远道而来就需要特殊待遇，“其耕，锄耨、拔，一如前法”，和通常粒小性硬的高产稻相比，占婆稻的口感相对更好，“米粒大而且甘，为早稻种甚佳”。

宋真宗赵恒是占城稻最大力的推手。佛教作者释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中记录了《真宗求占城稻种》：“真宗深念稼穡，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菘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占城稻种到中国后，真宗先是在皇家农苑中尝试种植，然后命令转运司将稻种与种植方式写成榜文，在山地多的地区推广种植。1011年被朝廷分发推广后，到1012年占城稻已经广泛传播。因为它的高产量和易耕种，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上并不如那些低产量的品种那样受到尊重，却在灾荒年间，为万千穷人提供了得以果腹的食粮。

棉花是宋朝的另一个重要大众物种。实际上早在公元3世纪时，棉花

就通过西域和印度两条不同的道路传入中国，中唐时由高昌人种植棉花，然后纺织而成的棉布非常知名，但当时仅是一种新奇之物，就像一只来自西里伯斯的白鸚，一条拂林国的小狗那样，是高官显贵间流传的奢侈品，并不为民间大众所享用。宋朝时对棉花的利用有了革命性创新。擅长拿来主义的中国人，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将棉花填入衣服中。棉花杰出的吸存热气的功能，对农耕国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民生艰难的年间，棉花在缝绉方式上的突破，使在田间劳作的大众得到保暖，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这些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确立了棉花在中国这个农耕国度重要农作物的地位。

香料与味道

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时，对这个东方帝国富足的物产感到震惊。他看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杭州有“十个大市



印度果阿的集市贩卖咖喱等各种香料

场”和“大批其他市场”。十个大市场都每周开市三天，吸引了“四万到五万人”。在这些市场上可以买到小种牡鹿、大赤鹿、黄鹿、野兔、家兔、鹧鸪、鹌鹑，以及多得不可胜数的鸭、鹅等普通家禽，还有“应有所有的蔬菜和水果”，甘蓝、大葱、大蒜、菠菜、芜菁、胡萝卜、黄瓜和葫芦、茄子、水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形体巨大的水果，最大的梨“每个有10磅重”。当马可·波罗看到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市场时，外国植物物种输入已进行了上千年，绝大部分流传到现代的物种已经进入中国，并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人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餐桌紧密联系在一起。

唐朝行僧义净在求法印度时，很细致地观察了南亚的食物，并将它们与唐朝的饮食进行了比较。他在书中写道：“东夏时人，鱼菜多并生食，此乃西国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经烂煮，如阿魏，酥油及诸香合，然后方啖。”通过这段记述，我们大致可以推知，唐朝早期的饮食与现代日本颇为相似，以清淡的食物为主，有不少生食，只

是在饮食中添加了少量的佐料或者酱油。另一位考证中国食物史的学者尤金·N. 安德森也认为，中国烹饪丰盛香醇的特点，是在宋代才开始确立的。“食物被辅以当地佐料，特别是生姜、肉桂和胡椒、肉豆蔻，也被辅以各种印度与近东的香料果实及种子。糖已用来保存食物，并制作种种甜食与糖果。”这些来自西域的重要佐料，在商人和地方精英的宴席上得到创造性运用，大大丰富了中国世俗生活的味道。

胡椒是最为著名的异域香料。马可·波罗曾记录过元朝时中国人对胡椒的巨大需求量：“只要把一船胡椒运往亚历山大或别的什么地方以供应基督教世界，就有一百船胡椒运抵中国的一个主要港口泉州。”它不仅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佐料，还是财富的象征。777年，唐朝宰相元载被贬赐死，在抄家时发现，元载家中有800石胡椒——这既被作为元载骄奢贪赃、聚敛财富的明证，也从一个侧面窥知当时人对胡椒的喜爱。除了胡椒之外，肉豆蔻也是一种被吸纳进中国烹饪体系的香料。这是一种像杏一样球根状的橘黄色

果实，收获时用长杆将果实打落枝头，在太阳下晒干后，肉豆蔻皮与仁剥离，颜色由深红变为棕红，炖肉时加入一点，会给食物增加带咸味的辛香。

甘蔗的输入则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一种新鲜的甜味。甘蔗大约在公元5世纪时就从东南亚传到了波斯，再经由伊朗进入中国。唐代时，四川中部、湖北北部以及浙江沿海地区都有甘蔗种植。但当时在北方仍然不常见，唐太宗曾经将20根甘蔗赏赐给他的一位大臣，可见这个物种的珍贵。在甘蔗输入之前，中国人已经从蜂蜜和谷物产生的饴糖中得到了甜味，但蔗糖才是所有植物糖中最受欢迎的。它最早被称为“石蜜”，制作方法是在日光下将甘蔗汁晒干制成糖，然后再将糖加工成石蜜。在8世纪时，安国和火寻国都曾经向唐朝贡献过石蜜，康国也出产石蜜。因为西域的石蜜质地优良，唐太宗曾经派遣使臣去摩揭陀国学习当地的制糖秘籍。他们的制作方法不仅是依靠天然的植物，还依靠更多的配料，比如与牛乳、米粉和煎成块。最受后世欢迎的制糖法是将甘蔗汁提纯后，结晶成纯洁雪白的颗粒状，不易变质，适合储藏。这种蔗糖结晶的技术，在唐代时还是秘术，到宋朝时已经被普遍利用于甜食的制作。马可·波罗在杭州的市场上就看到新鲜水果被晒干，用白砂糖腌渍后，做成各式各样的蜜饯出售。

在研究中国食物的学者尤金·N. 安德森的眼里，宋朝是一个美食频出的朝代，菜肴种类根本难以胜数。光一次宴会就可能上200多道菜，从许多不同的米制食品到“基于水果和甜食的菜肴”，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每一种汤、馅饼、汤团、面条和小吃，在宋朝几乎都能找到接近于现代的形式。历时1000多年的外国植物物种传输已完成最重要的部分渐进尾声，而中国的农业和食物烹饪体系在此时也基本成形。■

丝绸之路的植物

整理 / 邱杨 付雪航 吕慧

苜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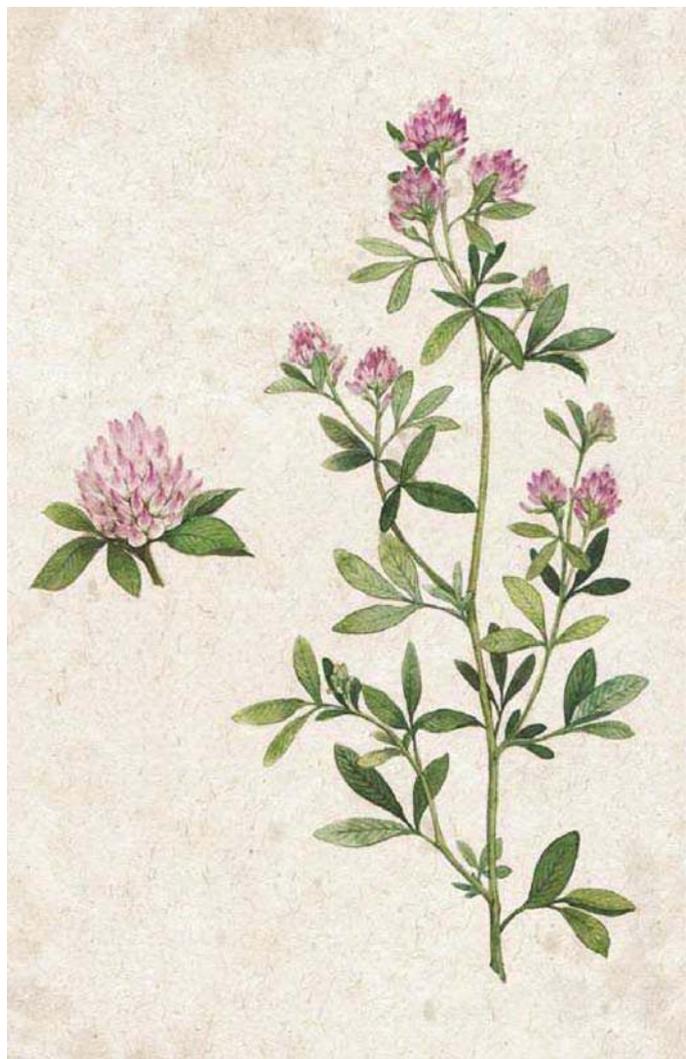
苜蓿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古老的牧草，有着“牧草之王”的美誉。每到夏初时节，根系发达、茎高尺余的苜蓿草，便在光滑细致的茎梢处，悄悄开出紫色的簇状小花，结出如螺旋般的果实和似肾形的种子。这种最早被人类驯化的饲料作物，起源于古代波斯。直到公元前500年波斯入侵希腊，士兵们用苜蓿喂战马和骆驼，才把苜蓿种子传入希腊。公元前200年，苜蓿种子传入意大利和北非。随后，随着“丝绸之路”上骆驼队旷日持久的长途跋涉，苜蓿种子也在向东方传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乌弋、安息、大月氏、大宛等地（今中亚地区包括中亚五国、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等地），见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带回大宛马和苜蓿种子。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当时将天子所乘之马称之为“天马”，常嘴嚼着苜蓿茎花而进出皇城内外，故有“天马常衔苜蓿花”之说。

苜蓿的传播及驯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汉朝引入后，苜蓿先在京城长安的皇家苑囿内试种。由于关中地区与西域皆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气候和人文条件相似，苜蓿很快便适应了这里，并逐渐向陇东、陕北甚至西北地区传播开来。唐代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

自汉朝之后，关于苜蓿的种植便屡有文字记载。《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主要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作者贾思勰在其中详细记载了苜蓿的栽培方法和利用价值：“土宜良熟。七月种之。畦种，水浇，如韭法。”这说明，最晚在北魏时期，苜蓿种植已推广到黄河中下游流域。

到了唐朝，苜蓿的栽培更加普遍。《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蒔以苜蓿。”



苜蓿

（插图：文哲）

也就是说，当时驿站用的官马，都有规定数量的苜蓿地或苜蓿园作为饲料基地。唐代《薛令之传》中还提到了苜蓿能充当人类的食粮，而南朝《述异记》则记录“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并明确指出“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北宋《本草衍义》说苜蓿盛产于陕西，用以饲马牛，人亦有食之者，但不宜多吃。而元朝为了防饥荒，甚至下达了种植苜蓿的法令。《元史·食货志》中记载：“至元七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

到明清时期，苜蓿在华北地区已普遍种植，

呈现出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所描述的“三晋为盛，秦齐鲁次之，燕赵又次之”的局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苜蓿“处处田野有之”，连遥远偏僻的地区都有。淮河流域地区也有了一定范围的栽种，但此时的苜蓿大概还没有扩种至江南地区，所以才有“江南人不识也”的记载。而据乾隆时河南《汲县志》记载，“苜蓿每家种二三亩”，反映出华北、西北地区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种植。清朝农学著作《农蚕经》、《民圃便览》等均对苜蓿的食用方法、饲用价值、栽培技术等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了种植范围的扩张，古人对苜蓿的利用方式也在丰富。苜蓿含水量较高，草质柔嫩，适口性好，是饲用价值最高的牧草。在畜禽生长发育所需要的13种维生素中，苜蓿就含有10种，又被称为“维生素饲料”。更独特的是，苜蓿所含的粗纤维，在反刍动物瘤胃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使家畜产生空腹感，从而刺激食欲，增加采草量。另外，苜蓿的植株生长点位于枝条顶部，刈割后再再生能力强，可利用期长。而这个特点在苜蓿传入之初就已经被古人发现，据《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

除了充当饲料，苜蓿还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壤的理想植被。清代《增订教稼书》记载，盐碱地上“宜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菜，无不发矣”。清朝道光时期河南《扶沟县志》也记载：“唯种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碱。”事实上，这类记载在北方的地方志中比比皆是。而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苜蓿属于深根系植物，根系入土深度通常为2~6米，最深可达39米，强大的根系及其分泌物能为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苜蓿还常常与粮食作物轮作或混作。《群芳谱》指出：苜蓿地“若垦后次年种谷，必倍收，为数年积叶坏烂，垦地复深，故今三晋人刈草三年即垦作田，亟欲肥地种谷也”。明代《养余月令》、《群芳谱》和清代《农圃便览》、《农桑经》等都记载苜蓿与荞麦混作是历史上的普遍经验：“夏月取子和荞麦种，刈荞时，苜蓿生根，明年自生。”这说明古代农民已经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能力使谷物丰收。恰如北方流行的一则农谚所说：“一年苜蓿三年田，再种三年劲不完。”

除了用作饲草外，苜蓿还可供人做菜食用。在《四民月令》中，就有苜蓿作为蔬菜来栽培的记载，《齐民要术》也称“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但在太平年月，一般很少有人拿它当饭菜，只有在粮食缺乏时，才被当作“救荒之奇菜”，以至于苜蓿甚至成了生活清贫的象征。唐朝薛令之在《自悼》中写道：“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宋朝陆游在《书怀》之四中亦称：“苜蓿堆盘莫笑贫，家园瓜剖渐轮囷。”除此之外，苜蓿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作为一种域外引进植物，苜蓿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其固有的自然生态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农用动力和交通工具，战马更是战争的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苜蓿这一重要饲料的种植和推广。唐玄宗时，官员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要保证数量如此庞大的牲畜群体的生存绝非易事，所以“苜蓿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明朝嘉靖年间，军队在九门之外种植大量苜蓿，用于喂养皇家御马。为了保证饲草的充足供应，国家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苜蓿的种植和管理。正因如此，“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的苜蓿，历经2000余年而繁衍不息。

石榴

深秋时节，霜林尽染，红艳艳的石榴也悄悄绽开果皮，露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榴子。当人们细细地吸吮着清甜的榴汁，任琼浆玉露般的汁水沁入心脾，是否会想起遥远的丝路上关于石榴的传说？“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一路传唱着这样的唐人歌声。

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到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一带，即现在的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航海的腓尼基人将石榴种带往地中海沿岸。在西亚，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就爱饮用石榴汁榨的香酒，据说连他的王冠也用石榴纹装饰。在希腊神话中，石榴被称为“忘忧果”，人们相信它的魔力会令人忘怀过去。

在遥远的东方，榴花与天马，则成了汉朝天威远播流沙的标志。一般认为，石榴是在汉武帝

时期，与葡萄、苜蓿等同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安国”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而“石国”则是塔什干，故当时石榴大多被称为“安石榴”。虽然缺乏西汉时期对石榴传播史的直接文献记载，但已有文献中对石榴在汉代已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描述则是确凿无疑。

石榴引入之初，汉武帝就下令遍植长安城。“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据史书记载，当时石榴作为珍树奇果，被栽植在首都长安御花园的上林苑和离宫骊山温泉宫，专为帝王享用。东汉魏晋时期，石榴的种植以河南最盛，而都城洛阳是石榴种植的中心。这一时期，石榴由皇家宫苑开始进入士人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开始形成本土化的优良品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浮屠前茶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茶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京师语云：白马甜榴，一实直牛。”文中“茶林”即石榴，可见在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洛阳已有石榴栽培，尤以白马寺品种最为优异。

东晋南北朝时期，石榴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向南继续传播。从《齐民要术》对石榴繁殖、栽种技术和加工利用有详细记载，表明北方石榴的种植更加普遍，栽培技术已臻成熟。而南方石榴也开始见诸文献，蜀地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始出现地方名优品种。《乐府诗集》收录的《孟珠》诗云：“扬州石榴花，摘插双襟中。葳蕤当忆我，莫持艳他依。”

隋唐时期，石榴的栽培得到快速扩展。《封氏闻见记》卷七记载：“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隋大业元年于洛阳故王城营建东宫时，以樱桃、石榴作为行道树。唐时华清宫有七圣殿，绕殿长满石榴，据称是杨贵妃亲手栽种。《酉阳杂俎》中记载：南朝梁大同年间，东州后堂的石榴都是结成双子；南诏的石榴果实饱满、皮薄如藤纸，味道更胜于洛中石榴。可见在唐代，人们对各地石榴的不同特点也都了如指掌。

宋元时期，石榴的栽培、采收、储藏和加工技术日趋精细，并得到全面推广。宋代石榴品种



石榴

明显增多，仅《洛阳花木记》就记载了九个不同的品种：千叶石榴、粉红石榴、黄石榴、青皮石榴、水晶浆榴、朱皮石榴、重台石榴、水晶甜榴、银舍利石榴。人们对石榴利用价值的认识也加深了：“多食其实则损仁肺。东行根并壳，入杀虫及染须发口齿等药。其花百叶者。主心热吐血及衄血等。干之作末。吹鼻中立差。”

明代是石榴种植业发展的高峰，这与明代士风不无关系。明中叶以后，私家园林进入全盛期，时人谓：“凡家累千金，恒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同时，士子编撰类书、谱录成一时风气，必多方搜求园艺作物尤其是新奇种类。从文献记载来看，尽管南方普遍有石榴种植，但明清石榴的分布仍以北方为重，尤其是品质优良的佳种多出自北方。

石榴在我国悠久的栽培历史中，形成了众多别名，如若榴、安石榴、榭榴、海榴、丹若、海石榴、金庞、金罍、天浆等。如此丰富的词汇，既说明古人对石榴的熟悉与重视，也表明古人对石榴的广泛用途逐渐掌握。

石榴初春新叶红嫩，入夏繁花似锦，仲秋硕果高挂，深冬铁干虬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庭院树种。古诗有云：“春花落尽海榴开，阶前栏外遍植栽。红风满枝染夜月，晚风轻送暗香来。”石榴种植在皇家园林中尤为盛行。李唐时期，因女皇武则天的极力推崇，曾出现“榴花遍近郊”的盛况。在明朝人的插花“主客”理论中，榴花总是列为花主之一，称为花盟主，可见古人对石榴的推崇。

石榴籽实多汁，酸甜可口，营养丰富，自古被视为珍贵果品。除鲜食外，用石榴酿酒在古代较为普遍。梁元帝萧绎有诗句云：“西域移根至，南方酿酒来”；“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石榴还被加工成石榴汁饮用，“北人以榴子作汁，加蜜为饮浆，以代杯茗”。石榴还有醒酒之功，潘岳在赞美石榴时说它有“御饥疗渴，解醒止醉”的作用，清代陈扶摇在《花镜》中也有“其实可御饥渴、酿酒浆、解醒、疗病”的记载。

除观赏、食用外，石榴还被用作药物、染料、胭脂等。在唐代医学家孟诜的《食疗本草》里记载，石榴可以治疗肠肚绞痛、持久泻痢等病，还说到把石榴花阴干碾碎呈末状，混合着铁丹服用一年，即可白发转黑、气色红润。这意味着早在此时，石榴的美容功效已被人们所认识。石榴还是制作胭脂的原料，《北户录》云：“石榴花堪作烟支。”此外，石榴的根皮、树皮及果皮富含鞣质，可作为黑色染料，给玉器描黑、染墨、染发等。

石榴和中国的服饰文化也有着紧密联系。古代女子爱戴石榴花，到南北朝时还很风行，南朝梁简帝肖纲就有“鬓边插石榴”之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裙子染色的染料便是从石榴花中提取，古人由此把红裙子称为“石榴裙”。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美貌女子的代称，而“拜倒在石榴裙下”则成了求爱的代名词。

石榴身上寄托了古人太多美好的愿望和无尽的遐想，从而使石榴文化在华夏大地影响深远。农历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在石榴花盛开的五月，瘟疫流行，人们常会请来钟馗像镇守，而民间所绘的钟馗像耳

边常戴着一朵石榴花，有“榴花攘瘟剪五毒”之说。在我国民间，还有以石榴图案祝子孙繁盛的习俗。人们常用“连着枝叶、切开一角、露出累累果实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孙，谓之“榴开百子”，是新婚时窗花、幔帐、枕头等新房陈设中常见的图案。



黄瓜

黄瓜

原产于印度热带潮湿森林地区的黄瓜，距今已有 4000 年的种植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接着通过“丝绸之路”引进红花、石榴、核桃、胡麻、黄瓜、葱、蒜等经济植物。黄瓜通过丝路传入我国后，便在此安家落户 2000 多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瓜类作物。

黄瓜传入之初，原名胡瓜。因古代称聚居于西北的民族为“胡人”，黄瓜原为“胡人”所种，故有胡瓜之名。而更名为黄瓜，则缘于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319 年，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王朝，立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他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便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勿赦。

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

也就不再指责。

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之中传开了。

不过，这个典故疑似是后人附会的。实际上，胡瓜改称黄瓜的确切年代应该在隋代。隋炀帝杨广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因此隋炀帝有一半胡人血统，但他本人十分崇尚华夏，蔑视胡夷。根据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的《慎所好》记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另有唐代杜宝的《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四年）九月，（炀帝）自幕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可在现代人看来，我们平时食用的黄瓜明明是碧绿清脆，为何不叫绿瓜反而叫黄瓜呢？事实上，现在我们吃的都是还未真正成熟的黄瓜。绿皮黄瓜在它老熟之时，才会露出“本色”：皮色由绿变黄，肉质变老变酸，种子硬挺。据《齐民要术》记载，北魏时，黄瓜要等色黄后才采摘。但后人发现，黄瓜未成熟时吃着更脆、更香，慢慢地便在黄瓜尚绿之时摘下食用。

引种黄瓜早期，所见文字记载很少，及至南北朝时才有了相关论述，到了唐朝，黄瓜已成为南北常见的蔬菜。唐代《本草拾遗》和宋代《嘉祐补注本草》皆著录了黄瓜。南宋诗人陆游更有七言绝句赞美黄瓜：“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时清闾里俱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

到了明清时期，黄瓜的栽培技术获得很大的发展。《本草纲目》中记载：“胡瓜处处有之，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黄花。结瓜围二三寸，长者至尺许，青色，至老则黄赤色，其子与菜瓜子同。一种五月种者，霜时结瓜，白色而短，并生熟可食，兼蔬蔬之用，糟酱不及菜瓜也。”

王象晋的《群芳谱》对黄瓜的形态特征描述得更为详尽：黄瓜“蔓生，叶如木芙蓉叶，五尖而涩，有细白刺如针芒，茎五稜亦有细白刺，开黄花，结实青白二色，质脆嫩多汁，有长数寸者，有长一二尺者，遍体生刺如小粟粒。多‘谎花’，其结瓜者即随花并出。味清凉，解烦止渴，可生食”。

黄瓜为雌雄异花植物，此处的“谎花”是指不能结实的雄花，数量多于雌花达10倍以上。尽管当时的学者不知花有雌雄之别，但两者之差异能被观察和记载确是难能可贵。

对于黄瓜种植技术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篇中记载：“种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收越瓜，欲饱霜，霜不饱收烂。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此处已论述黄瓜的播种采收时期和基本种植法。事实上，黄瓜种法有地黄瓜和架黄瓜之分：地黄瓜适于少雨地区，不搭支架，任瓜蔓于田间伏地生长，栽培管理较粗放；架黄瓜则适于温暖多雨地区，在瓜蔓伸长以前，用竹木搭成人字架，使瓜蔓攀缘其上，栽培管理则较精细。

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不难发现诸如“暖房”、“温室”等字眼，这说明唐代除花木之外，已掌握了黄瓜的温室栽培技术。唐代诗人王建在《宫前早春》诗中云：“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明代王世懋在《学圃杂蔬》中提道：“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入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即结小实。”

经过长期实践，古人逐渐认识了黄瓜既喜温又怕酷暑的特性，设法满足它对温度的要求，使其早上市、多次上市，甚至周年供应。根据记载可以窥见，当时的主要农业措施是根据各地的气候特点，错开播种日期，进行露地栽培或温室栽培，提前或适当推迟采收，以延长上市日期。当时就已经有春黄瓜、夏黄瓜、秋黄瓜和冬黄瓜之别。

黄瓜适应性强，易种易活，瓜可鲜食，亦可腌渍、晒干贮藏。尤其在灾荒年间，瓜干可代食粮度过荒年，这恐怕也是黄瓜受古人欢迎的原因之一。

菠菜

“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薐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宋代诗人苏东坡在这首七言散联中所指的“菠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菠菜。这宛如“铁甲”的美味佳蔬，又名波斯菜、波斯草、赤根菜、鸚鵡草、角菜等，是藜科菠菜属的一二年生草本绿叶类蔬菜，以嫩茎叶及根供食用。

菠菜原产于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唐初经尼



菠菜

(插图·文蔚)

泊尔传入我国。据《新唐书》的西域传记载，唐太宗时曾派遣官级为从六品的卫尉丞李义表出使天竺国（今印度），途经泥婆罗国（今尼泊尔）时通过访问活动，加强了两国的友好联系。到贞观廿一年（647），泥婆罗国国王特地派使节来到长安，贡献波棱等蔬菜，“叶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其后散见于诸书所著录的菠薐、波稜、颇陵、颇菜和菠菜都是引入地尼泊尔语菠菜（palinga）的汉字记音。

其实早在隋代，菠菜从其原产地经民间渠道就已引入中国。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曾说过：“菠薐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西国当指原产地伊朗，因其古称波斯，故菠菜又有波斯草和波斯等别称。直到现在，福建福州、泉州等地区仍将菠菜称之为菠伦。泉州有这样一句俗语：“要食着食菠伦，要穿着穿绸裙。”意思是，吃菜菠菜最好，穿衣绸裙最中意。

菠菜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引起了唐代研究草药的医学家孟诜的注意，在他所著的世界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中，论述了菠菜的药性。其“菠薐”条曰：“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即冷。不可多食，冷大小肠。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发腰痛。不与蛆鱼同食，发霍乱吐泻。”这是菠菜见于我国典籍的最早记载。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郭橐驼在书中说：“菠薐菜过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间种与

二十七、八间种者，皆过来月初一乃生。验之，信然。盖颇棱国菜。”这意味着，到8世纪末，菠菜的栽培已推广至长安西部的农村，郭橐驼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有种菠菜的实践，才能知道菠菜的生长习性。

自郭氏而后，唐代典籍中就没有关于菠菜的记录了，爱写诗的唐人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新奇的蔬菜。杜甫困顿时常食菜蔬，连山野间的杂草苦菜都写进诗里了，却从未提过菠菜。由此可见，菠菜在唐代栽培并不广，且因并非富贵菜，常食还有“令人脚弱不能行”的副作用，唐代的文人墨客并未注意到它，只有一些本草学家、炼丹术士和因经济匮乏而种来聊以添菜的农民对它感兴趣。

到了宋代，菠菜在典籍中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人喜著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菠菜的广泛栽培。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后，著录菠菜的地方志数量便急速增长，这意味着菠菜的广布应在南宋以后。而《中国外来植物》的“菠菜”条目也称：“至宋元方广为种植，成为冬春季常见蔬菜。”

这也与菠菜在文学中的地位变化相吻合。宋孝宗时期的诗人员兴宗在《菜食》中写道：“员子一寒世无有，爱簇生盘如爱酒。菠薐铁甲几载唇，老苋绯裳公染口。骈头攒玉春试笋，掐指探金暮翻韭。达官堂馔化沟坑，我诵菜君人解否。”员兴宗在诗前小序中将菠薐等蔬菜与竹君并提，赋予了蔬菜人文的内涵，在精神层面上推动了菠菜“中国化”的进程。

《全宋诗》中写到菠菜的诗共计8首。有些诗中提到了菠菜的一些吃法，比如菠菜粥和菠菜饼，还有些诗中提到菠菜在僧侣中很受欢迎，出家人似乎是菠菜的主要消费者。

菠菜是一种味道很有争议的蔬菜。经霜经雪的菠菜发甜，口感好，而其他季节的菠菜比较涩口。正因为菠菜有甜涩两种口感，所以，爱吃的人欢喜，而不爱吃的人视若凡品。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五代时期做过南唐户部侍郎的钟谟，特别爱吃菠菜，他把菠菜视为天上降下来的“雨花”，并把菠菜、茼蒿和萝卜看作是无可比拟的佳肴而称之为“三无比”。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镇江有一农妇为他做了“菠菜烧豆腐”，还美其名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乾隆吃后，觉得味道很好，且清淡素雅，便封农妇为村姑，菠菜为村姑菜，并经常叫御厨做这道菜给

他尝鲜。而明代王世懋在笔记《蔬疏》中则说：“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可见他并不推崇菠菜。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一首专写菠菜的诗篇题解中道出了菠菜的来历及其食疗功效：“波稜乃自波陵国来，盖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颇嗜之，因考本草，为作此篇。”所谓“面毒”，古时候小麦多用石磨磨成面粉食用，因而石头中的一些粉末也进入到面里，当时的保存技术又不过关，放置久了便有些泛灰的毒素，人吃了就会发热毒。古人很早就知道菠菜宜与面同食，消解“面毒”，利于五脏，效果颇佳。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在“菠薐”条下云：“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常食菠薐、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利。”《滇南本草》称菠菜：“味甘微辛，性温。入脾、肺二经。祛风明目，开通关窍，伤利肠胃，解酒，通血。”《食疗本草》说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

豌豆与蚕豆

历史上，曾有两种从西域传来的豆科植物被称为“胡豆”，一种是我们现在说的豌豆，另一种则是蚕豆。豌豆的传入时间较早，《管子》里面即有“山戎出菘菽，布之天下”之语，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戎菽”与胡豆同义，即是豌豆，因为“种出胡戎”而被称为胡豆。

豌豆之名则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张揖所撰的《广雅》，得名是因为“其苗柔弱宛宛”。原产于中亚地区的豌豆向东传入中国后，由于对生长环境没有过高要求，得以在中国大面积种植，加之其性耐寒、耐干燥，在北方地区分布尤多，目前，我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二大豌豆生产国。豌豆很早就走上了人们的饭桌，《本草纲目》中称其“煮、炒皆佳”；由于磨粉细腻洁白，豌豆被用于制作古时洗漱沐浴用的澡豆。同时，豌豆也是战马的主要饲料之一。

被称为胡豆的豌豆早就在中国的百谷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到了明朝，普及较晚的蚕豆却后来居上，占据了胡豆之名。蚕豆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关于意指蚕豆的“胡豆”较早的记载来自成书于宋朝的《太平御览》——“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明蚕豆是张骞通



豌豆

西域时带回的物产。但直到宋朝，蚕豆种植一直未能大范围普及开来，北宋宋祁描写蚕豆的《佛豆赞》中写道，蚕豆“农夫不甚种，唯圃中蒔以为利”，说明它此时并非大规模生产的粮食作物，而是只种在农人自家的菜圃中。苏轼曾有一次读到“豆荚圆而小，槐叶细而丰”之句，不知其所指，询问一位四川来的友人后方才知道诗中所写的是蚕豆。由于早年种植范围主要在云南、巴蜀一代，人们借云南的“佛国”之称，称蚕豆为佛豆。

“蚕豆”的名称则最早见于杨万里的七言诗，这首诗写于一次杨万里与友人小酌之时，友人指着佐酒的蚕豆说：“未有赋者。”杨万里于是当场戏作《蚕豆》一首，诗中赞叹：“翠荚中排浅碧珠，甘欺崖蜜软欺酥。”这一名称是其在长江流域大量种植后在当地产生的，因为它豆荚如老蚕，而又“蚕时始熟”。至于蚕豆取代豌豆的胡豆之名，也是其种植范围逐渐从四川向外扩散之后的事。《本草纲

目》中记载：“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而豌豆名胡豆，人不知矣。”即因为四川人惯于将蚕豆唤作胡豆，使其他地区的人也渐渐受到影响，叫蚕豆的多、叫豌豆的少，进而人们便忘了豌豆也是胡豆。

在古代农耕社会，农家每年最困窘的便是旧粮已尽、新粮未下的青黄不接之时，而蚕豆因为成熟期在初夏，恰好能在这个阶段充作主食，帮助农人顶过最为难过的季节，《农书》称其为“百谷之先，最为先登，蒸煮皆可供食，是用接新，代饭充饱”；历朝所作《救荒书》也对其多有提及。因为量多而便宜，蚕豆在平日也被一些地区当作主要的粮食，《天工开物》就记载在湖北，蚕豆充饥果腹的价值不逊于当时普遍的主食黄米和小米。曾经重庆街头的“棒棒军”就常吃蚕豆，一方面

是因为它是一种难得的便宜耐吃的下酒菜，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充饥效果很好，能维持重体力劳动所需的体能和耐力。

在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众多物产中，蚕豆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清人叶申梦的咏蚕豆诗是对这种植物最好的写照：“蚕豆花开映女桑，方茎碧叶吐芳芬。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众香。”直到现在，蚕豆在四川等地还保留着“胡豆”的古称，宣示着它从丝绸之路上千里而来的西域血统。

睡莲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初看或许会以为这是一首题咏荷花的诗，其实这却是唐人卢照邻所作的《睡莲》。古今的人们往往将荷花与睡莲这两种同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花卉一概通称为“莲”，但比起荷花借《爱莲说》得封“花中君子”的声名赫赫，睡莲却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荷花生长于中国本土，周朝时便已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之句，而睡莲一般被认为是自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才在中国普及开来。

李时珍曾引撰写《本草拾遗》的唐人陈藏器所言，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据学者考证，绘制于北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存在花瓣密集细长的莲花图样，而类似的形式在中国两汉以前从未出现过，反而能在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石窟中找到参照，可见这一图像并非传统的荷花，而是印度传来的睡莲图样。

睡莲得名于其朝开暮合的习性，因其“日沉夜浮，必鸡鸣采之始得”，故又名子午莲。关于睡莲的描述曾见于唐代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明代王圻著《三才图会》，“晓起朝日，夜低入水”；清朝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内舒千层百花，如西番菊，黄心。亦作千瓣，大似寒菊”，等等。据《岭南杂记》、《大观录》等书记载，睡莲可采而食，“叶类慈菇，根如藕条”，“清香爽脆，消暑解醒”，然而食之令人思睡。当时广州有谚语称：毋佩睡莲，使人好眠。此外，睡莲入药可治小儿急慢惊风，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杭城张子元扇店，施此救人多年矣。”

叠山理水是我国园林造景的基本手法，而作为一种常见的水生观赏植物，睡莲在园林的理水造景中也有着重要的运用。据说，早在汉代，霍



睡莲

光的私家园林中就有一片五色睡莲池，而后来的各类皇家和私家园林中也多栽有睡莲，颐和园的谐趣园中、圆明园的鉴碧亭下都能看到大片睡莲，配以一池静水、一座小亭，营造宁静安详的氛围。

莲花是佛教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形象，其花萎而根不死、来年又得重发的特征符合佛教轮回生灭的观念，而其清净超脱的形象也与佛法要求的清净无碍的境界相合。佛教典籍本身并不区分荷花与睡莲，但在佛教起源的印度，睡莲的存在远比荷花更为普遍，所谓的“七宝莲花”，其中五种属睡莲，剩余两种才是荷花。因此，睡莲从一开始就作为宗教象征符号出现在艺术品中，寓意着圣洁、吉祥，典型例证便是敦煌石窟的壁画，北魏时期壁画中的莲花图样大多是睡莲的形象。此后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睡莲纹样也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到明清时，“子午莲”、“缠枝子午莲”纹样已经成为瓷器、丝织品上常见的纹饰，其含义也脱离了宗教的范畴，被附加上生生不息、清正廉洁等更多意味。

开心果

开心果为阿月浑子属漆树科 (Anacardiaceae) 黄连木属 (Pistacia) 植物，约有 20 个种，分为中亚类群和地中海类群两类，其中 50% 左右是坚果，其仁可食用。

俗名开心果。一般认为这是古时的国人对这种坚果的古波斯语名称的音译。这一译名充满诗情画意，现已鲜为人知。现代波斯语称其为“pista”，英文拼写为“pistachio”，而在古波斯语中则称“agoza”。在我国古籍中，这种坚果被称为“胡榛子”或“无名子”。人们知道的只是“开心果”这一俗称。这一俗称的缘由：一是这种坚果的形似人的心脏，成熟后上端自然爆开，因称“开心之果”；二是有一则来自伊朗的民间故事说，一对年轻情侣在这种果树下谈情说爱，正谈得热烈之时，树上成熟的果实叭一声裂开口，展露出里面微红的果仁，情人们认为这是吉兆，彼此以身相许。因此，树梢头倒挂的果实被称为“开心果”。

阿月浑子 (Pistacia vera) 原产中亚细亚和西亚的干旱山坡和半荒漠地区，经伊朗逐渐传入地中海地区，后经地中海地区传至中东、南亚、罗马、英国、美国等。开心果的野生种见于叙利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苏联西南部的半沙漠地带，



开心果

是中亚最古老的树种之一。在 4000 万年前第三纪时期，开心果是亚热带旱生森林干燥带中的一个树种。开心果人工栽培的历史，在西亚约有 3500 余年，在中亚约有 2000 余年，在地中海沿岸约有 1500 余年。

这种坚果何时传到中国，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唐朝时期，中国同波斯和其他西亚国家交往频繁，这种坚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唐代陈藏器在开元年间 (713 ~ 742) 撰写的《本草拾遗》中提道：“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唐代段成式在大约 860 年所著《酉阳杂俎》中也有类似说法。两相印证，阿月浑子大概是在唐朝中期传入中国。可是，也有人认为，阿月浑子传入中国远在唐朝之前。唐朝的李珣在八世纪后半期所著《海药本草》中说：“按徐表《南洲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南洲记》成书于何时不详，但是，6 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贾思勰在其所撰《齐民要术》中引用过此书。由此推断，阿月浑子可能在 6 世纪前后已传入中国。

红蓝花

关于红蓝花(胭脂)起于何时,后唐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有记载:“燕脂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做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说的是从商纣王时期,胭脂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本书在另一处说:“燕支,西方土人以染红,中国人谓之红蓝,以染妇人面色。名燕支粉,亦作焉支。”于是后人多以为胭脂确是一种植物,即红蓝。但是用它做化妆品起源于商纣时期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先秦文献中没有关于胭脂的记录,甚至胭脂的那些异名在先秦古籍中也未曾出现。

有据可查的胭脂的异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史记·匈奴列传》里写作“焉支”、《汉书·司马相如传》里写作“撚支”、“烟肢”等,而“胭脂”一词,则迟至唐代才出现。据文献记载,先秦妇女的化妆品只有脂、粉、泽、黛等。这里所谓的“脂”,说的只是动物体内或者植物种子内的油脂,不是红色的胭脂。先秦时期的面部装饰以粉(白)和黛(黑)为主要色彩,即用白粉敷面,用青墨颜料画眉,不盛行脸上抹红。

中原人开始使用胭脂一般认为是从汉代初年开始的,最初这种化妆品和化妆方法是由匈奴传入中原地区的。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为了加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派张骞出使西域。胭脂的引进,也在这个时候。成书于宋代的《续博物志》中说:“出于阨氏。”汉代民歌《匈奴歌》中也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殖。失我阨氏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阨氏山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绵延于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胭脂与阨氏读音相似,它是因为出于此地而得名。大约阨氏山上盛产这种被当地人叫作“阨氏”,而中原人叫作“红蓝”的植物,这种植物的花朵可以涂于面部增加桃红润泽之色,所以受到了当地妇女的喜爱,其后又逐渐传到中原,并迅速由北向南推广开来。

红蓝花的花瓣中含有

红、黄两种色素,花开之后被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后即成鲜艳的红色颜料。之后人们又发现了紫茉莉也可制作胭脂,因此这种花又叫作胭脂花。紫茉莉夏季开花,有红、白、紫、黄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的可以制成胭脂。再后来,人们也用杜鹃花粉或杜鹃花汁制成胭脂。唐代王建《宫词》中写:“收得山丹红蕊粉,镜前洗却麝香黄。”山丹,即杜鹃花,唐人通常称其为山石榴花或山榴花,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说:“胭脂,古造法以紫茛染棉者为上,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

胭脂不但制作原料多样,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要经过采摘、杀花、揉花、晾晒等数道工序。以红蓝花为例,每年在它开花季节,要在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候去采摘,然后“杵碓水淘,绞取黄汁,更捣以清酸粟浆淘之,绞如初,即收取染红,然后更捣而暴之,以染红色,极鲜明”。这是宋代的《尔雅翼》中记载的杀花程序。杀花之后就可以制作胭脂了,先要取落藜和蒿等草灰,“以汤淋取清汁”,用以揉花,此过程要反复十几次。最后,再用布袋绞取浮汁晾晒即成。

胭脂在使用时通常先晕于手掌,再匀于脸颊。唐代宇文氏《妆台记》中说:“美人妆,面即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浓者为酒晕妆,浅者为桃花妆。薄薄施朱,以粉罩之,为飞霞妆。”《红楼梦》在第四十四回中写宝玉和平儿谈胭脂

的用法,与此大致相同:“(平儿)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上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平儿依言妆饰,果然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这样的方法不仅涂抹均匀,而且简便易行,所以流行了很长时间。■



红蓝花



忽必烈大汗坐在一个由四头象载着的木制亭子中（《马可·波罗游记》插图）

那些来自异域的动物

整理 / 陈晓

宫廷舞兽

宫廷舞兽是唐代宫廷的一个特殊物种。那些在宫廷宴会上跳舞的动物，并不是在中国从未见过的稀有物种，它们更多代表的是外来的捕捉和驯养技术。在宫廷舞兽中，舞马的姿态是最精细优美的，据说它们不仅可以口衔酒杯向君王敬酒，还可以边醉边舞，但大象和犀牛却是舞兽中最引人注目的。

对中国人来说，大象并不算外来之物。在青铜时代，大象就是黄河流域常见的野兽。随着中国北部森林的减少和人口增加，这种庞然大物逐渐迁移到南方。美国学者谢弗曾考证，

虽然中国境内有这些动物，但可以用于表演的大象却是外来的异物。犀牛和大象一样，在史前时代就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动物，唐代时活动在长江以南相当广阔的地域。但或许是没有掌握捕捉方法，唐朝人没有捉到过境内的这种原始动物来加以训练。段成式是一位专门搜集奇闻轶事的学者，他在《酉阳杂俎》里记载了来自非洲的客商如何用“狙杙”来捕捉犀牛。所谓“狙杙”，就是拴猴的木桩。在犀牛出没的地方埋下木桩，犀牛喜欢伸起前脚，靠着木桩休息。一旦木桩倒折，犀牛就仰面倒地，不能翻身起来，这时候最易被捕捉。

驯犀和驯象都是异域献给唐朝皇

室的礼物，它们被关在唐朝宫廷的兽苑之中，每天供给定量的大米和豆米食物。在严寒的冬天里会被披上羊皮和毛毡，瑟瑟等待参加大唐朝廷的庆典活动。这些巨兽都怕冷，被贡献到中国北方后，每年冬天都是它们难挨的日子。史书记载，一头在796年送到京城的犀牛，到第二年冬天就因为忍受不了严寒的天气而死在了唐朝的兽苑之中。活下来的犀牛和大象们，会一起在大型宫廷宴会上表演助兴。705年时，唐中宗就曾经在洛阳南门观看斗象表演。但是最有名的还是玄宗统治时期的舞象表演。“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旅，中于音律。”在大象表演的同时，还有舞马、山车、陆船，

以及散乐、杂戏的演出。

朝廷的奢侈与禁止奢侈之风一直在相互交替着。每次风向有变，首先就表现在这些舞兽的命运上。当朝廷提倡克勤克俭的时期，这些舞兽就成了被轻蔑的对象。它们要么被关进兽苑，弃而不用，要么被放逐乡野，以安民生。780年，唐德宗继位时，为了表明他的简朴，下令释放了32头大象。一起被释放的还有鹰犬和100多名宫女。这些大象全都被送到了荆山之阳，这里正是长江中游中国种黑象的栖息之地。这些土生大象因为颜色黝黑、身体丑陋，因此被称为江猪。

留在宫廷中的舞兽，在朝代更替时结局大多都相当悲惨。“安史之乱”不仅生灵涂炭，也祸及这些动物。史书记载，当安禄山攻克洛阳之后，在洛阳大宴群臣，要利用大象率舞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他于是仿效唐代的朝政文化，想在那些没有见过大唐文化的幽燕部落首领前，来一场百兽朝拜的声乐表演。表演前，安禄山对这些塞外的胡人夸口：“吾当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鸟兽尚知天命有所归，何况人乎？”可当舞象们被牵引至大殿上后，却并没有朝拜起舞。“禄山大怀惭怒，命置于槛阱中，以烈火蒸之，以刀槊，俾壮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数丈。鹰人、乐工见者，无不掩泣。”自唐代以后，鲜有再见到这些宫廷舞兽的身影。

猎禽猎兽

伊朗裔法籍史学家阿里·玛扎海里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陈列了很多珍贵的波斯文献，其中一位波斯商人的旅游日记记录了明代的宫廷中，狮子、猎豹和猞猁都是重要的贡物。“在第五道宫苑内，他们养着一些狮子、豹子、猎豹、猞猁以及吐蕃狗。吐蕃狗是

一些长毛的身材巨大的动物，如同狮子一样勇猛。土耳其算端（苏丹）有一大群这样的狗，民众称之为萨姆松狗。但它们是来自吐蕃的一种犬类，汉人于吐蕃附近的山上捕捉这种狗。”这些动物都是由近东的国家进贡奉献的，那里的人们善于捕捉和训练这些凶猛的动物，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君王塔赫穆拉斯：“由于长期观察森林中的野兽，他选中了猞猁和猎豹。他在荒凉的地方以陷阱捕获了它们，训练它们为自己狩猎。在那些凶猛和疾飞的禽类中，他选中了雄鹰和大隼，把它们训练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全世界都对此感到惊奇。”

猞猁又称大山猫，比家猫略大一些。据说在大自然中它是狮子的盟友，为狮子充当向导并以狮子吃剩的残余物为食。而吐蕃狗，则是猎取麋鹿的好手。它们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有如同盾牌般的耳朵，尾巴像狮子一样刚硬有力，甚至攻击老虎也不畏惧。猎豹几乎与猎兔狗的大小一样，据说在波斯，人们用白奶酪这样的高级食物来驯养它。对于一头“豹”来说，猎豹的体形太瘦小了，但它在狩猎时却能很快抓住猎物。它速度快，头脑

灵活，不是直接追赶猎物，而是左右奔驰，跑“之”字形路线驱赶猎物。猎豹的使用在西亚和南亚非常普遍，苏美尔人就曾经使用过猎豹，勇敢的赫梯人甚至驯化了真正的黑豹，并将其用于狩猎。蒙古汗在一些大型狩猎活动中曾使用过上千头猎豹。

到唐代时，这些凶猛但善于捕捉猎物的驯兽被作为西域贡品进入汉土。在713年的史籍中，将康国的贡物形容为狗豹之类。实际上，狗和豹在外形上毫无可比之处，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可以驯服用于狩猎。在唐中宗李显的长子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上，能看到若干狩猎游戏的内容，其中还有罕见的驯豹图。几个驯养人各牵一豹，手执锤形器，列队而行。驯豹实心黑斑的身上穿着钉有铆钉的铠甲，在一众鹰、鹞、犬、马中显得威风凛凛。

除了猎豹外，鹰也是从近东传入中国宫廷的重要猎禽。唐朝皇宫中的大鹰坊紧邻狗坊。鹰坊里养着至少四种猎鹰。最稀有、最显贵的是雕，尤其是金雕；最高雅、最具有贵族派头的是隼；特别受珍视的是白色的格陵兰鹞。唐太宗本人就有一只格陵兰鹞，起名为“将军”。只要进入皇宫中的鹰，



猞猁，别称“猞猁狮”

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上刺绣的项圈，所有猎禽都配有皮革、青丝或云锦的脚带，戴有玉旋轴的皮带，镀金的栖木以及雕刻油漆而成的鹰笼。在宫廷狩猎时倾巢而出，颇为壮观。

这些善于狩猎的猛禽猛兽，还挟带着异域的神秘色彩，成为军队中勇猛善战的图腾。唐朝曾经将被称为骁骑的战士重新命名为豹骑，威卫也就是相应地成了豹韬卫。在古代兵书《六韬》中，其中一章命名为“豹韬”，论述在各种特殊地形下如何作战的战术问题。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几组侍卫将军的紫罗衫上都饰有狮、虎、豹，以及鹰、鹞等生性凶悍的禽兽形象。鹰还被纳入唐朝医药的用药范畴，成为中药房中的药材：将鹰爪烧成灰，和水服用，可以治疗狐魅；将鹰粪烧成灰，调入一勺酒中，就成了一剂解毒药。

猛兽狮子

贞观九年，唐太宗得到了一头康国贡献的狮子。太宗命令大学士虞世南作赋赞誉，这位诗人写了一篇辞藻

华丽的“狮子赋”，敬畏地称赞它是“绝域之神兽”，“瞋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迢兕于跟腭，屈巴蛇于指掌。践藉则林麓摧残，哮吼则江河振荡”。这篇文章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中世纪时中国人对于兽中之王的敬畏态度。康国贡狮这件事还被载于史书《实录》，可见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除了康国外，在公元七、八世纪，向唐朝皇帝敬献狮子的西域国家为数不少。吐火罗国、波斯、大食都曾用狮子作为贡品。其中大食国贡献狮子时被唐中宗拒收。皇帝拒收贡品通常被认为是表现德政的姿态。比如唐肃宗就曾经在安史叛军攻陷两京的危难年景时，发布了一条诏令，停贡鹰鹞、狗豹。而唐中宗拒收狮子，除了表现德政的良善意愿，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一位大臣提出来，喂养狮子这样的巨兽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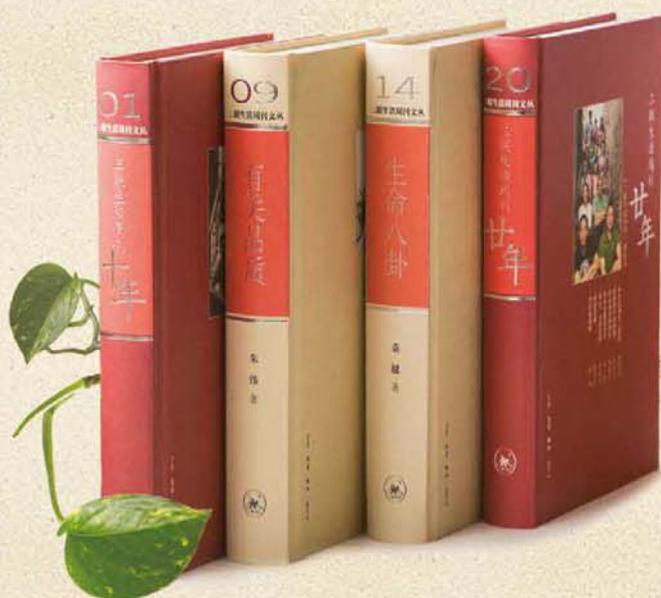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有关狮子的轶事：“开元末（约741），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唐国史补》所载之事，说明古

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狮子，不同于寻常野兽，而具有某种灵性。它被认为拥有可怕的力量，哪怕是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都让苍蝇和蚊虫不敢落在狮子尾制作成的拂尘上。还有一种传说是如果一位乐师用狮子筋制成弦来弹奏的话，其余的琴弦就会断绝。甚至连狮子的画像也会使百兽敬畏。8世纪的唐朝宫廷画家韦无忝擅长画异兽，他创作的狮子画像，甚至能使其他野兽看了害怕。传说与真实相互缠绕在一起，让狮子成为身价最高的贡品。史书上记载明廷对朝贡者的待遇：“狮子比马匹拥有十倍的荣誉和豪华。猎豹和作狩猎用的猓猓各自有权获得相当于狮子一半的荣誉和豪华排场。”

但实际上，献到中国来的狮子，主要是供皇家观赏。这种狮子，是经过人工驯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传说中的神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到鞑靼皇帝身边的狮子就十分驯良。马可·波罗记述的是一次新年朝拜会。皇帝在接受王公贵族们的礼物后，请客人入席，由乐师和梨园子弟表演节目，招待诸位宾客……这时，有一头狮子被带到皇帝陛下跟前，十分驯良地躺在皇帝的脚下。当然它们也表现出过兽中之王的威风。在《马可·波罗游记》第十八章中，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绘了皇家豢养的狮子捕猎和生活的情景：大汗养着许多猎鹿用的豹和山猫，还有许多狮子，较巴比伦的狮子还要大。它的皮毛光泽，颜色美丽——两侧有条纹，间以黑、白、红三种颜色。这种狮子善于袭取野猪、野牛、驴、熊、鹿、獐和其他供游猎娱乐用的走兽。狮子捕猎动物时的凶猛气势和敏捷灵快，使人看了赞叹不绝。但如果想欣赏到这样的狩猎表演，最妥当的方法是牵着狮子逆风前进，使猎物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否则猎物会立刻逃得无影无踪，这就失去了行猎取乐的机会了。■



雄狮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盛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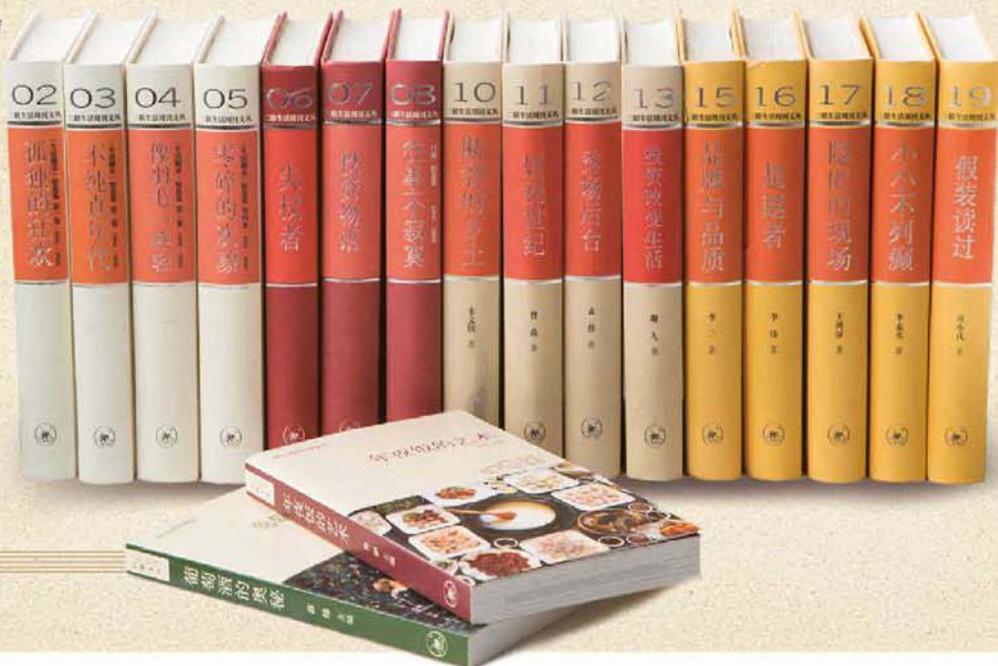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丛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 李鸿谷	投资物语 / 邢海洋	往事不寂寞 / 李青	有关品质 / 朱伟	断裂的乡土 / 朱文珺	妖娆世纪 / 曹霖	秀场后台 / 孟静	投资改变生活 / 谢九	生命八卦 / 袁越	品牌与品质 / 李二	超越者 / 李伟	隐匿的现场 / 王鸿禧	小小不列颠 / 李孟苏	假装读过 / 贝小戎	十年「精装版」	廿年「平装版」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28元	38元	26元	26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丛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楼兰酒庄地下橡木桶酒窖

丝绸之路上的葡萄酒复兴 楼兰酒庄的“王者归来”

9月下旬的杭州秋雨霏霏，但西湖的山林仍然一派绿意。刚结束第五届“丝路葡萄采摘节”回杭的楼兰酒庄董事长许志良，还惦念着3700公里之外的吐鲁番鄯善县，那座在古丝绸之路重地的葡萄酒庄。

再过一个多月，楼兰酒庄的滨沙葡萄园就将被“窖藏”过冬。工人们将葡萄藤修剪、盘结，埋进土里，等到第二年春天再小心拉出，扶藤上架，迎接下一季成熟，这是吐鲁番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种植智慧。在鄯善县，吐鲁番盆地东缘，这座城郊的葡萄园就倚着库木塔格沙漠，北受天山雪水的灌溉，昼夜温差可达20多摄氏度。沙砾土壤，灿烂阳光，天然雪融水，是葡萄喜爱的生长环境。少雨，昼夜温差大，葡萄没有病虫害。正因为如此，这里酿造的葡萄酒也别有了一番风味。

2007年，来自浙江的酒水业巨头商源集团，接手了楼兰酒厂。许志良说，这一切源于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重振“楼兰葡萄酒”品牌的信念。当时的楼兰酒厂，由于经营不善，曾经在新疆本地的好口碑也几近凋落。但吐鲁番的葡萄，楼兰的美酒，丝绸之路精神与物质文明的灿烂交汇，给这个品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许志良带领团队扎根鄯善近6年，立志打造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葡萄酒庄。2014年，楼兰酒庄荣获“中国葡萄酒产区最佳个性化产区”，楼兰古堡赤霞珠干红葡萄酒2013、2014年连续两届荣获“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佳酿”。在葡萄酒行业不怎么景气的这些年，4年完成了10倍的增长。

2004年，在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出

土了一幅东晋时期的壁画，被取名为“庄园主生活图”，完整展现了1700年前西域葡萄种植、运输、压榨发酵的过程。这是中国葡萄酒起源新疆的又一个佐证，而现在的楼兰酒庄给世人所呈现的，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种繁华再现，一种传奇。

虽然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红酒如今已然成为世界级尊贵典范，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曾经也有盛极一时的酿造图景。英国著名酒评家杰西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女士在《世界葡萄酒地图》一书中认为，世界三大酿酒葡萄产区就在法国波尔多、美国加州和中国新疆。

“楼兰葡萄酒一定是中国葡萄酒的先驱。”许志良说。本着这一深厚文化的馈赠，许志良立志将楼兰酒庄打造成中国最好的



楼兰酒庄董事长许志良在葡萄园

酒庄就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在新、旧世界的参照下，中国葡萄酒虽然有迹可循，但却长久无法实现复兴。所以最好的办法索性是放弃追随，而另外开疆辟土树立中国，特别是新疆的标准。

问：楼兰酒庄的整体定位是怎么样的？相较于世界葡萄酒体系，它对自己的行业位置是怎么规划的？

许志良：我们一直思考楼兰这个酒庄跟全世界其他酒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不是新世界，也不是旧世界，它就是位于中国新疆的、有独特历史传承和自然风土的酒庄。

新疆 165 万平方公里的葡萄种植，规模比旧世界的酒庄大得多，但比新世界的规模化生产可能又小。但另一方面，品质和葡萄种植标准，又是按照世界通行的亩产，或者一棵树的产量来制定，这个我们是不会颠覆的，在品质和规模上有我们的原则。

问：在中国做酒庄酒有没有一定的优势？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做酒庄酒的文化基础和自然条件？

许志良：有很多外国人、国人在中国甘肃、宁夏、陕西、河北、山东都建了酒庄，国内做酒庄我们不算第一家。但退回到公元前，楼兰一定是第一家，因为当时中原是没有葡萄酒的。目前来看，葡萄酒的起源是在高加索高原，介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那一带的黑土地上。西汉时同时有两条路线，一支通过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匈牙利，传到法国去了，这就是旧世界的起源；另一支通过阿拉伯半岛、波斯，传到了西域，也就是新疆。

在中国罗布泊、楼兰古城这一带有做葡萄酒容器的文字记载。

所以楼兰肯定是中国葡萄酒起源地，西域的胡人通过丝绸之路再到长安，从此汉家有了葡萄酒。可以说，那时西域封建贵族的家族酒坊，就是酒庄的雏形。

问：国内其他酒庄的经营模式和做法跟你们都一样吗？

许志良：中国有些有名的酒庄是按照旧世界法国的种植模式。在新疆这个地方，地袤物广，你种上两三万亩的葡萄，做一个大规模的酒庄完全可能。但是这不会被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模式认可，其实新世界也是相对于旧世界而言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的流放者带去葡萄，在那里成片种植。但新疆不是，我们是从源头格鲁吉亚分支出来的，葡萄酒的品质是可以追溯的。

我们有位法国酿酒师，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来纠正他，一句话“你在法国能吃到新疆的馕吗？”葡萄酒 90% 是一样的，剩下 10% 就取决于风土，吐鲁番昼夜温差大、酒的糖度高，转化成的酒精度就高。我们不能一概按照波尔多的标准来衡量有不同风土的中国酒。

全世界可以用作葡萄酒品种的葡萄有 1.2 万多种，我们也从法国引进赤霞珠、梅洛、黑皮诺等品种，但种在鄯善这片土地上，口感、风味、香味就变了，就有了自己的风土特色。

问：中国的酒庄酒有没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许志良：其实每个地方的葡萄酒一定是有着不同风格的。葡萄酒有个术语叫

作“Terroir”，中文译作风土。是指气候、土壤、葡萄园构成的整个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风土不同，酒的个性就会有差异，不能简单比较。楼兰酒庄的根在新疆，中国的葡萄酒源头也在这片土地，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做出富有楼兰当地特色的葡萄酒。在楼兰鄯善做酒庄，就是吐鲁番风格；伊犁河谷酒庄就是伊犁的风格，口感一定不一样。

新疆是世界上酿酒葡萄较大的产区，只有影响力够大，才能制定游戏规则，占据更多的话语权。如果我们变成最大品牌，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就有一席之地。我们既不是旧世界式全人工工艺，也不像新世界工厂式的克隆工艺，我们就是世界的楼兰葡萄酒。

问：对于楼兰酒庄来说，之前有古堡、酒庄、丝路三个系列，为什么今年又推出全新的楼兰酒庄深根系列？

许志良：深根系列是指我们用根系很深的老葡萄树产出的葡萄所酿造而成的酒。吐鲁番地区缺水，炎热气候下造成了独特的葡萄生长环境。我们知道，葡萄树是通过根部吸收水分和营养的，根系越深，葡龄越老，楼兰拥有非常珍贵的葡萄母本园，平均葡龄 33 年。葡龄越老，葡萄品质就越好。根越深，吸取养分越多，吐鲁番地下深藏多种矿物质养分，扎根越深，吸取的养分愈多，品质自然越好。根越深，水越纯净，5000 米天山融雪，深藏地下，天然纯净，自然滋养。根越深，离地表越远，生长环境越生态。我们希望通过“深根”这个概念，表达楼兰酒庄独特的自然风土。

问：当我们吃西餐时，有比较约定俗成的葡萄酒与食物的搭配建议，但是吃中餐就没有那么讲究。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许志良：国外西餐的这套很难沿用到中餐，他们的菜是一道道上的，主菜也许只有一个，什么酒配什么菜也简单。比如单宁饱和的红酒配牛排，白葡萄酒配大虾。

但你看，中国人吃饭围着圆桌，各种菜都有，是个混搭，怎么喝？我认为喝得健康一些还是很重要的。葡萄酒是从水果发酵酿制而成，是碱性的，它不是蒸馏酒，酒精度也适中。多种研究也证明，适度喝葡萄酒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它对抗氧化、对保护心血管有好处。宴请、团聚时分，大家想到喝点儿葡萄酒，又调节气氛又不伤身，这就是我们做葡萄酒的价值所在。

美联储暂缓加息

美联储终于结束了市场的猜谜游戏，9月17日的美联储FOMC议息会议发表正式声明，宣布将关键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市场原本预期美联储最快9月份加息的猜测落空，而美联储到底会选择在何时启动加息，悬念还在继续。

主笔 / 谢九

从美国经济来看，8月份的经济数据其实已经基本满足了美联储的加息条件。美联储加息的两大参考指标——失业率和物价指数已经基本接近，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降至5.1%，降至7年半来的新低，低于5.5%的失业率目标，已经完全满足了加息要求，通胀指标相比略弱，8月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率增长1.8%，略低于2%的目标，虽然通胀目标还未完全满足，但是如果美联储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也未尝不可。

美联储暂缓加息的主要担忧，在于全球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资本市场的动荡。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对通胀、中国和金融市场的担忧促使美联储做出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如此考虑到外部因素，这在美联储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美联储的经济政策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外溢性。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0年前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不到5%，去年年底已经超过13%。在中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还很脆弱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这样的举动将不得不考虑到全球影响，否则即使短时间内符合美国经济利益，最终也难免会伤及自身。

另外，人民币在8月份意外贬值，可能也是美联储暂缓加息的原因。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之后，美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具备了加息的效果，

这也在短期内减弱了美元加息的必要性。

不过，美联储暂缓加息的“好意”，反而在全球市场引发了更大的混乱。美联储在周四宣布加息后，美国股市出现剧烈震荡，道琼斯指数在周五下跌1.7%，欧洲股市的跌幅大多高达3%左右。事实上，由于全球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已经有了高度预期，因此对于加息本身并不担忧，相比之下，加息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引发更大的恐慌。比如近期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央行行长都表示希望美联储尽早加息。秘鲁央行行长胡里奥·贝拉尔德表示：“围绕美联储何时加息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正在超过美联储加息本身。”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表示：“宁可早一点开始，并在充分通知前提下缓慢加息，也不要让美联储之后被迫以更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印尼央行高级副行长称加息可以“让新兴市场稳定下来，我们就能继续发展和改革经济了”。

而对于欧洲而言，美联储做出不加息的决定，反而加剧了欧元区继续加大量化宽松的压力。美联储宣布不加息之后，欧元应声大涨1%，强势欧元显然不利于欧元区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越晚一天加息，欧元区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压力就会加深一层。目前，欧洲央行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债券的宽松政策仍在推进之中。

尽管美联储做出了9月份暂缓加息的决定，但是考虑到美联储主席耶

伦此前已经反复做出过年内加息的前瞻性指引，因此年内加息仍是大概率事件，否则不仅对美联储信用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美联储通过前瞻性指引发挥货币政策效用的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美联储日后货币政策的成本会大大提高。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结束后，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必要情况下可以召开特别记者会，仍然预计年底前加息，10月份仍然有行动的可能。按照美联储的工作日程，今年10月份和12月份还有两次议息会议，9月份暂时推迟的加息，仍有可能在10月份和12月份兑现。

与过去20年的三次加息周期相比，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挑战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大，随着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量迅速增长，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联储的加息天平上，需要考虑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

作为美联储此次暂缓加息的优先考虑对象，中国从此次暂缓加息中获得了一些延缓资本外流的时间和空间，但考虑到美联储年内加息仍是大概率事件，中国获得缓冲的空间也相当有限，如何应对资本外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挑战。

2014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一度达到3.99万亿美元峰值，距离4万亿美元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截至今年8月份，外汇储备缩水至3.56万亿美元，一年多时间

缩水 4300 亿美元，缩水幅度超过一成。尤其是今年 8 月份，人民币意外贬值加剧了资本外流压力，央行为了避免人民币贬值过快而在市场抛售美元，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外汇储备加速下降，一个月时间外储缩水高达 940 亿美元，如果对比 7 月份 3.65 万亿美元的外储，意味着一个月时间缩水幅度接近 3%，如果按照这样的缩水速度，外汇储备耗尽的观点也绝非耸人听闻。

8 月下旬以来，央行、外汇管理局连续出台针对性措施，防止资本过快外流。8 月 31 日，央行向国内银行下发《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称从 2015 年 10 月 15 日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缴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准备金率暂定为 20%，利率暂定为零，冻结期一年。在央行新规之前，办理远期售汇业务的银行需要缴纳 5% 的准备金，央行将准备金大幅上调至 20%，而且利率为零，意味着银行的成本将大幅上升，银行的远期售汇主要为代客交易，银行最终会将成本转移到具体办理远期售汇

业务的投资者，这大大压缩远期售汇的套利空间，进而减缓资本外流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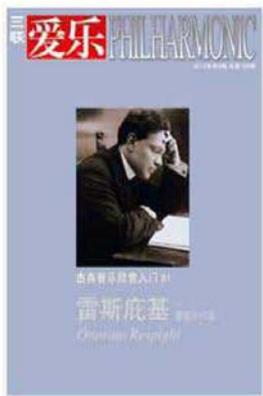
9 月份以来，外汇管理局对于个人分拆购汇也开始加强监管。所谓个人分拆购汇，也被俗称为蚂蚁搬家式购汇，是指个人为了规避 5 万美元的购汇限制而采取的曲线购汇方式。按照外管局的要求，5 个以上不同个人同日、隔日或连续多日分别购汇后，将外汇汇给境外同一个人或机构，个人在 7 日内从同一外汇储蓄账户 5 次以上提取接近等值 1 万美元的外币现钞，同一个人将外汇储蓄账户内存款划至 5 个以上直系亲属账户等情况，都被认定为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外管局要求银行对个人分拆结售汇特征明显、能够确认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应不予办理业务。

过去 20 年，美国一共有过三次加息周期。1994 至 1995 年，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 3.25% 上升至 6%，加息幅度 3%。1999 至 2000 年，美联储再次进入加息周期，这一轮加息周期随着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破灭而终

结，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美联储转而大幅降息，刺激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膨胀，由此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美国从 2004 年再次启动加息，并且一直持续到 2006 年，基准利率从 1% 提高至 5.25%，加息幅度 4.25%，美联储这一轮加息直接刺穿了房地产泡沫，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启动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将利率长期维持在零利率区间，直到现在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美国开始进入新一轮加息的前夜。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每一次加息都对其他新兴经济体产生过负面冲击，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危机、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和当时的美元走强有直接关系。不过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量尚轻，其动荡不足以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随着过去 10 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如果新兴经济体因为美元加息而出现经济衰退，资本市场崩盘，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5 年第九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1

- 聚集精华，传统与现代的糅合——雷斯庇基的管弦乐作品
- 詹颖睿、田彬华、贾梦梦、张泽亮对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格里高利协奏曲》和《琉特琴古风舞曲与咏叹调》的精彩解读

逝者 纪念捷克钢琴家伊万·莫拉维茨

专访 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早期访谈

话题 谈谈“弦乐三重奏”的前世今生

早期音乐 高卢圣咏（上）

作曲家档案 卡尔·玛丽亚·韦伯

演奏家档案 记俄罗斯钢琴家彼得罗夫

作品 听埃尔加两首交响曲有感

听片购片与收藏 科曾在 Decca 最后的五首莫扎特协奏曲录音

专题 加拿大男高音乔·维克斯（上）

《爱乐》2015 年订阅须知

2015 年《爱乐》月刊，每期 24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5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192 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大改革是走出低谷的支撑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

中国经济要实现好转必须依托于真正的改革，通过大改革形成真正的大市场，释放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和资源的活力。所谓的大改革，绝对不是各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拼盘式的改革，而要经过一番利益大调整，全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否则很难到位。

记者 / 付晓英

低迷：中国与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很多值得分析的经济现象，比如股市波动、人民币贬值，有关房地产的政策也在放宽。如何理解现阶段的中国经济？

刘元春：中国的经济确实在下滑，但一定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事情，股市大幅波动、汇率贬值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只是中国规模太庞大，关注度比较高。

比如巴西，经济基本上处于萧条状态，股市也早就不行了，原来还有 1000 多家上市公司，最低的时候只有 300 多家，这两年货币贬值接近 30%。中国经济在下滑，但下滑幅度比新兴经济体要低；股市在波动，从高点 5100 多点跌下来，中间还出现了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但是跟去年比还是上涨的；汇率贬值呢，实际上这些年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前阵子人民币中间价两天累计贬值超过 4%，最终贬值大约 3.5%。但是像俄罗斯、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南非这些国家的贬值都很严重，新兴经济体综合贬值超过 24%，而中国的有效汇率从去年到今年升值超过 10%。所谓的有效汇率，不是盯住美元，而是把其他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汇率与它的贸易进行加权之后得到的汇率，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还是挺猛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思考的一些参照面，如果参照面没有弄好，见到股市波动、经济下滑就恐慌，就不能形成理性的判断。

至于美元加息，这是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是金融危机逆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货币政策常态化会导致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一些大幅度波动和逆转，这就可能导致新兴资本市场出现大波动。而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又恰恰出现股灾，信心不足，对于资本的异动要有高度的警觉，国家监管层面要高度关注，要放慢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加大对地下钱庄和热钱流动渠道的管控，这是两个有效的渠道。另外很重要的是要增加本国市场的吸引力，提升本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货币贬值、经济下滑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那么，在各国经济共同变化背后的力量是什么？

刘元春：一是大周期的下滑，在经济学里会有一些周期性的现象，比如像房地产周期，叫库兹涅兹周期，20 年一个轮回；还有一种周期叫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差不多 50 多年一个轮回，这是跟技术创新有关系的。现在认为这轮危机跟 IT 技术创新和全球化都有关系，它导致了全球不平衡的出现，资本流动出现异样状况，就会产生问题。

在过去的新技术、新市场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出现了虚假的繁荣。一方面表现为美国过度金融化；另一方面，一些产能过度地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些产能又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全球化泡沫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泡沫突然破了，我们就会发现欧美会出现以金融为主题的危机，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出现以产能过剩为主题的危机。

同时各个国家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都在大幅度收缩，原有的一些需求不见了，建立在这些需求上的供给就过剩了，带来的后果是价格下滑、企业倒闭、人们收入水平恶化，从而导致股票市场低迷。但政府又希望能把市场救起来，采取了一些救市政策，导致全球股市与全球基本面脱离。最近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标普 500 等都在同步下滑。所以目前的问题，不能够单纯地从一个国家来思考，要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在全球经济萧条、经济分化的格局里，中国问题与世界因素密切相关。

下滑中看到希望

三联生活周刊：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GDP、投资、消费、出口以及货币和价格指数均表明整体状况比较低迷，你对中国目前的特征有怎样的观察？

刘元春：今年低迷的程度和去年相比有一些变化。比如，今年连续两

个季度名义 GDP 增速低于实际 GDP 增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价格是下跌的，也就是需求不足，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就是萧条，我们在过去 20 多年里只有三个时段出现过这种现象，一个是 1998 到 2000 年，另一个是 2009 年，然后就是今年。按照以往，GDP 实际增速和名义增速发生这种分歧往往是萧条性开启的标志；而投资增速、消费增速都在回落，总需求低迷，总供给也比较疲软，宏观经济整体通缩的压力大幅度上扬，各类绩效指标持续弱化，局部区域出现断崖式的变化，不仅工业利润大幅度下滑，财政增速也出现明显回落，部分县级财政运转困难；除了各类参数在变化，景气指数也持续回落，克强指数已经创五年新低，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发电量和货运量，一个只有 0.22，一个只有 4.2，尤其货运量这个参数非常低，这些都是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出现了分化，但也有向好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出现塌陷，同时看到沿海和经济转型比较成功的省份情况非常好，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利润下降很厉害，但是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绩效都很好，今年一季度，发改委发布了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报告，20 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 10.1%，是工业总体增速的 5 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初见成效，就业也还不错，所以是低迷中孕育着生机，下滑中看到了一些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

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是并存的。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下滑，除了与世界因素密切相关，内生性因素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我们讲到前期的刺激政策。凡药三分毒，肯定有后遗症。2008 年金融危机，我们所采取的过度刺激政策就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加剧了经济的扭曲。比如说，地方投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大规模出现，银行贷款增长迅猛，原来我们的贷款总量也就是 25 万亿元，但是到 2011 年、2012 年，达到了 50 万亿，现在已经达到 80 万亿；因为刺激政策，我们在 2009 年、2010 年，M2 增速达到 30%，货币供应太多，导致债务被累积起来；我们对一些落后企业、大产业的救助，导致一些落后产能进一步放量，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当然，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性的需求下滑。原来我们的出口增速 20% 多，现在负增长；原来我们的外贸顺差占 GDP 的比重最高达到 10% 左右，但现在我们只有不到 3%；我们的制造业原来是 50% 用于出口的，现出口一下子少了差不多 1/5，少增长 1/5。这个窟窿谁来填？所以我们经常用内需填外需，这个转型很痛苦。

第二，中国自身的一些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出现了拐点。我们的经济人口在 2011 年达到最高点，有 10.2 亿经济人口，此后逐年下降，招工成本会出现大幅上扬，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其次是工业化红利，2012 年、2013 年，我们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0%，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少于第三产业，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行进，工业化实际上已经达到很高的状态，中国制造业的生产产能、覆盖面很难像以往那样继续膨胀，而工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动机，我们一般认为，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是越增越慢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制度

红利，以市场化和国际化为背景的一种大开放、大改革形成的制度上资源配置的优势已经耗尽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就是标志。另外，改革进行到现在，形成了一个新权贵阶层，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和市场，特别是利用资本市场的一些新工具，获取大量的资金，他们不是资源配置的促进者，而往往是市场秩序的扰乱者。

因此，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增长所依托的一些因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经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加上政策面因素再加上国际上的因素，导致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艰难期。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艰难期要持续多久？

刘元春：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底部，我们预计 GDP 增速将在今年 3~4 季度短暂探底反弹，因为稳增长加码，持续出台的 11 个领域的投资方案会起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个成效的持续性和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还是难以改变周期性力量，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反弹可能不会那么强劲，也不会那么持久，之后出现进一步的回落，再之后才会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开始复苏。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刘元春：我们认为这是由世界经济的周期、房地产的周期、中国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的。

按照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所有机构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的常态化要到 2016 年以后了，今年原来预测世界经济增速 3.1%，最近把世界经济的增速回调到 2.8%，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新兴经济体在今年是超乎异常地衰，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因为中国的出口里面 35.6% 集中在新兴经济体。第二，从房地产周期的调整模式来讲，销售参数虽然已经触底，但投资参数的触底应该在四季度左右，因此，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景气整体回升应该在 2016 年中期。第三，中国的宏观债务经过 2014 到 2016 年的去杠杆，宏观的债转股、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以及企业债务率明年会逐步下调，明年下半年，财务困局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第四，从目前周期状况来看，我们推算 2016 年一到二季度是库存回调的一个点，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再考虑目前相对价格指标的变化、新产业的增长以及新增长极的培育，中国结构调整最艰难期在 2016 年，2017 年新格局雏形将全面形成，新产业在未来几年应该还会发展得很好。

按照目前改革部署的周期，2016 年是全面深化的一年，2017 年差不多是这一轮收尾的一年，2018 年新一届政府又开始了，从改革部署来讲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 2016 年比较艰难，2017 年比较向好。

改革是最重要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那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度过这个艰难期？中国经济好转要依托哪些因素？

刘元春：我们在短期里采取一定的举措，如对于一些高端产业的扶持、对于一些小微企业的扶持，比如说现在提到打造双赢企业。国家对于这样一些的战略举措还是比较恰当的。

中国经济要实现好转必须依托于真正的改革，通过大改革形成真

正的大市场，释放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和资源的活力。所谓的大改革绝对不是各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拼盘式的改革，而要经过一番利益大调整，全面推进结构性改革，否则很难到位。

首先，政府要进行自我改革，建设法治政府，通过反腐倡廉，给真正改革的力量赋予改革的权力和能力，为各方面政策的实施铺平道路。政府功能要重新定位，这就需要财税体系的根本性改革，从去年到今年推进了很多财税体系的改革，实际上很不顺畅，如果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根本性的重构，行为模式也很难改变。

其次，政府要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位，约束自我权力，为市场腾出空间，重构市场秩序，真正强化市场选择，减少对落后企业的救助。对一些绩效很差的企业，在增强社会安全网的基础上，要义无反顾地加速出局，淘汰过剩产能，没有死一批倒一批，就不能生一批，所以说腾笼换鸟，不杀一批，怎么腾得动？不可能让所有企业都平稳度过这场大经济调整和大危机的冲击，一个不落地都转过去，这是转不动的，包括金融主题的改革也很重要。

第三就是社会改革，比如公共服务建设、社保体系建设。部分地区落后企业又出现了工人下岗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基础社保，加强社保托底。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很重要的一块，现在整体方案还都没出，“十八大”虽然已经把一些改革方案罗列出来了。但综合性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绝对不是各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想象，所进行拼盘式的这种改革。所以随着我们整个第一步的反腐倡廉、利益结构的重构、中央权威的塑造、改革共识的凝聚，那么下一步，重点改什么、怎么改、顺序是什么、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哪些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这都需要重新梳理。

在大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平衡是决策者要面临的关键的问题。比如经济下滑，到底滑

的底部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勇气和政治勇气，接受一些经济进一步回落？如果没有这种远见，判断错了，就有可能导致短期救助过度，导致中期进一步扭曲，改革越来越退出。目前，很多人认为改革应该让步于稳增长，这种判断问题就很大，不能为了短期数字增长停止改革。中国经济本身是有空间、厚度和韧劲的，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不是那么脆弱的，中国的市场还是很庞大的，内部循环也能支撑经济实现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能看到这一点，一些改革的推进就可能更干脆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全局性改革现在是否已经开始？

刘元春：上一轮国企改革布局是从1995年开始，全面实施是在1998年，大量的国有企业转不动了，开始进行全面改革改制。经过1998到2001年这一轮大的制度调整，才真正实现了2001年之后的增长奇迹。所以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虽然从“十八大”开始规划，各个地方也出台了改革方案，但是真正全面实施有可能到明后天。我们会看到，整个市场出现分化，国有企业出现分化，整体绩效出现下滑，从而导致很多传统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基础被削弱，这样一来，改起来会更快、更彻底、更到位。

当然，改革时点是要选择的，如果传统利益集团的势力在经济下滑过程中还没有得到消解，贸然进行改革举措，而没有研究大改革的逻辑关系、先后顺序、技巧，效果也不会很好。在改革方面也要认清时点，把握机遇，不是简单的往前冲。对于大改革的期盼不能太简单化，更不能太理想化，这必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会有曲折和反复。大破大立，不破不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最近几个月股票市场的巨大波动不一定是坏事情，利益集团的势力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

中得到消解，为彻底的、全面的改革带来了一些机遇。将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之后才能够真正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大改革进行顺利，中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结构变化？

刘元春：第三产业作为拉动经济的主体，工业驱动转换为第三产业驱动，消费和投资会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需求拉动最主要的两驾马车，由于工资成本的上涨，很多高端产业的盈利空间会密集上扬。

实际上，这一格局已经开始出现了，但这种结构会随着世界的变化出现一定反复性，也会随着新的产业革命的不确定性而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方向，而没有一些精确的规划。如果把很多人猜测或想象的结构作为战略目标，做精准性的调整和方案，反而会使中国在处理这种结构调整的风险和不确定过程中处于狼狈的地位。这也是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最美的滇与藏

踏寻旅人心目中的心灵圣地
深入绝美与隐秘之境
呈现与众不同的行走记忆

内含周刊：
《最美的滇藏线》
《去墨脱》
《腾冲》
《西双版纳》

可在以下电商购买本产品

亚马逊 amazon.cn JD.com 当当网 dangdang.com



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成员在北京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做交流

许荣茂：带领 2000 名香港青年“内地取经”

“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识不多，有时接触不到这么多的机会。”当“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结束最后一站在广东的交流时，香港新家园协会会长许荣茂这样告诉记者。这是一个人数近 2000 人，联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交流团。对香港新家园协会来说，组织如此大型的香港青年到内地交流的活动是第一次，近 2000 人的规模也是两地青年交流史上罕见的。

文 / 王丹阳

规模空前的交流

“香港有很多人，我到处看，没有机会，很迷茫，很迷失。我告诉大家，内地也一样，台湾也一样，欧洲也一样。年轻就应该迷茫，没什么大不了。”在北京联合大学的讲坛上，马云身着黑 T 恤，信步讲到这段话。这次，他的听众有些特殊，是 2000 名来自香港的

青年，他们大部分长着稚嫩懵懂的脸，心里却溢出无数个超乎年龄的关乎个人及香港未来的疑问。

在今年 3 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与鼓励后，香港新家园协会会长许荣茂决定联合其他副会长企业家们共同发起“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到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取经”。上面

这个场景，就是马云受交流团团长许荣茂邀请参加此次活动的片断。

交流团的青年人年龄定位在 15 到 35 岁，不仅包括协会本身的新移民和少数族裔会员，还有大量的香港本地大中学生。无论是参与“问道马云”的现场分享，还是参加上海、广州等地的青年创新创业论坛，这些内心活跃的香港中学生，即使普通话不流利

“切换”回粤语，也要问出他们想要问的问题。

今天，青年创业是香港政府重点推行的政策。“在总理提出‘创新创业’的号召后，引起了香港人的关注。但是如何投入、资金来源、失败了怎么办，都需要详细引导。我们希望香港青年们多来内地了解和认识内地的发展，把经验和见识带回去。”许荣茂告诉本刊。

狮子山下的创新困境

香港人有一种著名的狮子山精神：奋发向上，有毅力，艰苦拼搏。然而近十几年来狮子山精神已经少对这座城市的创新产生巨大推动力。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开始一项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涵盖了54个国家和地区，当时显示香港的创业活动普及率仅为成年人口的3.4%，是全球创业活动率最低的地区之一。2009年，该研究显示，香港只有3.6%的成年人从事早期阶段创业，低于美国的8%和中国内地的18.8%创业水平。

香港社会曾有句俗话：high-tech 揩嘢，low-tech 捞嘢。企业不愿意投放于科技研究，以为会以亏本收场；而相对租金低廉、技术成分含量低的才能赚大钱。

正读“大一”、学IT的邱家麟有着跟内地同龄人一样的创业冲动，却极其羡慕内地的学生。他3岁时跟随父母从广东南下定居，对他来说，之后再没有去过广东以北的内地。他灵活又老练，这次交流刷新了他的“内地观”。

“其实当初我们对这个团的行程是有疑问的，北京还有些名胜古迹，可以去看看；但上海，我们觉得跟香港差不多啊。但后来发现上海是很厉害的。当我登上‘东方明珠’的时候，我惊呆了。”他说。

其次，他还第一次知道相当于

香港的“what's app”的微信，早已启用支付功能了。“我们的‘what's app’只能聊天，你们的互联网金融已经发展得那么好了。”

其实，困扰着这位香港学生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就业还是创业的选择。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虽然在用父母的钱创业，但大学毕业后必须去打工。“一毕业的话压力就很大了，那个时候我就要赚钱了。所以我很羡慕上海的大学生，你们有那么众多众空间支持青年人创业，但在香港这种支持很少。”

邱家麟的这一早熟而无奈的认识

道出了一部分香港青年的困惑。对他们来说，创业不是绝无可能，但要在毕业后几年打工赚足了钱，才有创业的底气。至于是否北上选择内地，也有相当的顾虑。“现在不敢，一定在对一个城市很了解的基础上我才敢来。”他说。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特别是‘十三五’规划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青年们也要找寻这个大空间里面属于自己的好的机遇。中国的‘十三五’规划里有一个‘香港篇’，香港的年轻人如果更多去认识和了解‘十三五’



马云受邀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分享创业经历



香港青年在粤港青年交流论坛上提问

规划中香港的机遇，也许会有更多启发。”许荣茂团长如是说。

多元社会的融合努力

“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让更多人知道了香港新家园协会。自成立5年来，新家园协会的发展，见证了香港政商界对多元社会架构的融合努力。

“每年都有5万内地入港人士，大多数新移民在适应香港生活方面有诸多困难，这部分新移民与香港社会的融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5月，许荣茂连同几位企业家朋友共同创办“新家园协会”，为内地赴港新移民提供生活、教育、培训、工作等一条龙服务，希望能以此帮助“新香港人”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当中，适应香港的生活。目前，新家园已经在全港5个大区设立地区服务处，并在16个不同的小区设立指定服务点，已拥有会员逾10万人，服务人次亦超40万人次。

新家园协会由许荣茂任协会会长，副会长则包括富力集团董事长李思廉、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玖龙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茵等。

在香港这个移民社会，有很多不同时间点来港的广东、福建等地居民的后裔，“新移民”在本质上与传统香港人没有区别，只是时间上的先后。福建石狮人许荣茂上世纪70年代来到香港创业，他多次坦言“自己也是移民”。

最难的还不是新移民，而是少数族裔。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众多东南亚人的移民目的地，如今，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后裔已占了香港总人口的6%。他们除了具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外，更有不少是入籍香港，拥有香港护照。

2013年，新家园协会的HOME少数族裔支援服务中心访谈了1800名少数族裔，并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撰写

了《香港少数族裔的社会融合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只有3.2%的少数族裔拥有专上学历，失业率达到了7.2%。

“他们是香港居民，就是中国居民，对这部分群体的社会融合更加是重要的。”许荣茂对记者说起把少数族裔纳入新家园协会主要服务会员及此次交流团团员的初衷。

18岁的中六学生夏天生留着胡髭，这位在港出生的巴基斯坦少年在新家园协会做活动主任，专门服务少数族裔。他对自己及伙伴们的处境有着不一般的成熟认识：“我们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像其他内地来香港人士一样需要学习中文听说，而是全部的听说写。而且对于少数族裔，很多人不敢靠近，不愿意交往。”

新家园协会对少数族裔开设了中文和英文课程，以及其他帮助妇女等的手工艺学习。夏天生认为，语言障碍可以消除，但社会歧视仍将长久存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机构就能完全解决的。”他讲着广东话，一张巴基斯坦少年的英俊的脸上挂着严肃。

此次交流团的行程里，当他来到北京的长城，奋力爬到了最高的一个烽火台时，这个从未到过内地的印裔港籍“中国人”说：“我相信30年后再回忆起这个场景，我也会很兴奋、很自豪。”

许荣茂的公益经：亲力践行与亲身号召

“新家园协会”是许荣茂所带领的世茂集团多年公益行纪中一个在香港展开的项目，除此，世茂的更多公益痕迹留在了内地。“企业做大了，既然有这个能力，就应该多做点有社会影响力的事情，那都是好事。”8月22日，在“四海一家”交流的最后一站广州，在结束了持续十几天的交流团最后一场活动“粤港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从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回酒店的车上，许荣茂仍然不失低调、异常沉稳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

在许荣茂看来，企业获得成功，前提条件是社会的和谐。“我们在得到、参与社会成果分享的时候，还要想着在城市的角落还有一些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去帮助，我们需要共同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他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地参与，还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商界、侨界号召更多的人来共同参与。

成立于2005年的中华红丝带基金以宣扬防艾抗艾的理念、救助艾滋致孤儿童而闻名，在官方叙述里，鲜有人知道它就是许荣茂联合全国20多家民营企业发起的。目前，许荣茂是该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并且在一些边远地区救助项目的勘址上仍然事必躬亲。多年来，他亲自带队深入防艾、抗艾第一线，足迹踏遍四川、甘肃、新疆、河南等地的艾滋病重灾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许荣茂在震后第二天捐出了1000万港元。为帮助灾区人民重拾信心、重建家园，几天后他再次捐赠1亿元人民币向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捐建百家“世茂爱心医院”，致力于为乡镇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目前，世茂爱心医院如繁星点点，遍布四川、云南、甘肃等7个省市地区，覆盖人口达2000万人。

早在2008年，世茂集团内部就产生了员工志愿者组织。到了2012年，随着集团公益意识的散播和成熟，这个志愿者团队更名为“三年III班”，并定期与外界公益组织展开合作。而许荣茂，便是这个班级的“大班长”。

“董事长在社会公益方面有了想法会马上跟我们说，我们很惊讶的是他每次说的时候想法已经非常成熟了，他很支持我们员工投入公益行动。”三年III班的一位志愿者在与记者聊起他们的“大班长”时说。■

承担更多社会使命

——专访香港新家园协会会长许荣茂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想到组织一个2000人的交流团？主题怎么会定在“创新创业”上？

许荣茂：香港经济面临创新突破的发展需求，很多香港的年轻人有创业的需求，但在这方面香港的环境和内地还有差距，内地的创新热潮和氛围比香港好，因此很多青年可以在内地开拓思路、吸取经验，反哺他们在香港的创业实践。

也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情况不了解。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加深了解。

三联生活周刊：您作为比较早的侨民，是否也曾经在身份认同上有过困惑，所以才想成立社会组织帮助新来港者，还是只是察觉到香港社会有这个必要？

许荣茂：新家园协会成立已经5年了，为什么会成立？因为每年内地批准5万多新移民到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难适应当地的生活，相对容易沦为草根阶层或是弱势群体。如果这个社会问题处理不好，这些人有困难，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情绪，社会就多一点不和谐的因素。我们基于这点成立了新家园协会，帮助会员、服务会员。

我们都曾经经历困难，如果那时有人拉你一把，或者给你提出一个警示，过程和结果也许就会好一些。我把这种想法和很多企业家朋友说，他们都很赞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

三联生活周刊：结合现在内地的发展情况，您对香港青年寻求自身发展、增进对内地的了解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许荣茂：香港虽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但是毕竟是个城市，容量有限。所以香港大发展，一定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加深和内地的沟通、联络、协调。

许多青年人在交流中说他们迷茫，会有发展的“局限感”。这次“四海一家·香港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团”活动的意义是带动青年们来认识和了解内地，开拓视野、积累经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特别是“十三五”规划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香港也要在这个大空间里面找到自己的那部分发展立足点。中国现在的“十三五”规划里面，也有一个“香港篇”，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应该要了解“十三五”规划中香港的机遇。

进一步的，我们怎么在这个机遇和空间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香港年轻人不了解，认为我的专业在香港能做什么，我今后的发展目标就只能是在这个小范围里面。但是当你把目光和视野放到“十三五”规划上，大家能找到的目标、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可能会多很多。所以这种了解和关注，双方的交流和沟通，是很有必要的。



许荣茂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青年中一部分人是愿意到内地来发展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想待在舒适圈之内。您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

许荣茂：有一部分人的选择其实源于不了解。很多香港青年在他们的印象里觉得香港比较舒适，内地比较落伍，其实这个故事早就翻转过来了，内地的发展速度和现状早已超出了他们原来的印象。

中国正在实践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香港的位置特别重要。“一带一路”中很多关联的重要国家主要是在东南亚。东南亚和香港的联系十分紧密，香港与“一带一路”发展有很大关联，这些青年们不仅在内地，他们到东南亚发展也会有很多机会。因此我建议他们多走出去看看和想想，了解更多机遇。☑

上市盛典完美落幕，集至臻美学设计和卓越动力性能于一身的全新 GLE 运动 SUV 势必成为跨界车型中的领航者

倾城之姿，绝尘之势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GLE 运动 SUV 上市盛典



绝妙的车身比例和宽阔的肩膀，彰显出 SUV 的非凡动力与活力动感；367 马力与 520 牛·米扭矩带来激情澎湃的驾驶体验

颠覆，以倾城之姿

全新 GLE 运动 SUV 上市盛典开启，梅赛德斯—奔驰 SUV 家族新秀“勇闯”蜀道，震撼亮相蓉城。

它拥有 SUV 的野性霸气，亦不乏轿跑车的动感优美。它“勇闯”蜀道，以倾城之姿震撼登场。2015 年成都车展前夕，在位于成都的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心，全新 GLE 运动 SUV 穿越而来，为 SUV 家族带来一场颠覆性的改变。

当扣人心弦的倒计时开始，所有人都屏息期待着主角的登场。大气磅礴的赛事中心舞台上，全新 GLE 运动 SUV——GLE 320 4MATIC 运动 SUV，GLE 400 4MATIC 运动 SUV，GLE 450 AMG 4MATIC 运动 SUV 与梅赛德斯—AMG GLE 63 4MATIC 运动 SUV 齐齐冲破光影，驶入舞台中央。

追光灯亮起，GLE 运动 SUV 终于惊艳呈现于众人眼前——流畅而动感的溜背式线条，微微上翘的灵动尾翼，加之 SUV 的强壮轮拱和高离地间隙，截然不同的设计元素巧妙地碰撞融合。对运动与美学超凡脱俗的演绎，令 GLE 运动 SUV 的设计跳脱了简单将轿跑车和 SUV 结合的范畴，回眸间，它的倾城之美已深深吸引了在场嘉宾。正如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段建军先生所说：“当机遇与挑战碰撞，迸发的是无限的激情；当时尚与动感相遇，激发的是伟大的创想；当绝尘与倾城邂逅，诞生的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而这也正是全新 GLE 运动 SUV 的精髓所在，‘绝尘，亦倾城’。”

当晚，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先生揭晓了这一系列车型首次使用的命名规则：“GLE 是 SUV 系列使用新命名规则的最新车型。G 代表德语单词‘全地形’，L 代表‘轻量化’——喻示它具备绝对优势，令竞争对手望尘莫及。所有的 SUV 车型在未来都将采用这种命名规则，而它源于传奇般的梅赛德斯—奔驰 G 级系列车型。字母 E 则将这辆车归为产品家族中作为中坚骨干的‘E 系列’。”

驰骋，以绝尘之势

一骑绝尘，动力与美学的完美融合——全新 GLE 运动 SUV 尊崇试乘试驾活动激情启程。

在成都车展期间，位于市中心的太古里商圈也设有 GLE 运动 SUV 的热点展台。



在全新 GLE 运动 SUV 尊崇试乘试驾活动中，嘉宾们零距离体验到它的倾城外表与超凡性能

梅赛德斯—奔驰爱好者可在此分享上市发布会的精彩盛况，亦可欣赏到 3D 特效在 GLE 450 AMG 4MATIC 运动 SUV 车身上的奇幻投影。而当你惊叹于全新 GLE 运动 SUV 的倾城之姿时，别忘了它还拥有一骑绝尘的高超性能与运动基因。在展台即可预约参加全新 GLE 运动 SUV 尊崇试乘试驾，它静待于此，随时迎接人们的挑战。

无论是在市区穿行，还是在郊野驰骋，GLE 运动 SUV 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在市区游走，你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GLE 运动 SUV 的“倾城出世”。动感炫目的高颜值外观，令它在城市之中显得如此引人注目。加宽加长且更低的车身，车内的开阔视野，与全景式滑动天窗——各种人性化的贴心设计，让城市出行更加得心应手。同时，它也具备 SUV 的超强实用性：360° 摄像头的驻车组件，1650 升的大容量载物舱……不论是短途出行，还是长途冒险，都能够令你安心出发。

堪比轿跑车的性能，则令公路驾驶更加富有激情。作为 AMG Sport 系列车型的第一款产品，GLE 450 AMG 4MATIC 运动 SUV 配备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270 千瓦（367 马力），峰值扭矩达 520 牛·米，它所提供的横向与纵向加速度，能制造轿跑般的动感驾驶体验。全时四轮驱动（4MATIC）更能够时刻提供出色的牵引力，展现强大的 SUV 性能。全球首款配备液力变矩器的 9 速自动变速箱（9G-TRONIC）迅猛、高效而又舒适，带来前所未有的换挡速度，让驾驶更加平顺安静，同时大幅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在高速公路上踩下油门，澎湃动力一触即发，绝佳的性能在引擎的咆哮中不言而喻。

当行驶的道路从城市切换到蜿蜒山路，你更将体验到 GLE 运动 SUV 的如履平地。动态操控选择（DYNAMIC SELECT）控制

器带来多种变速箱模式，可根据路况自由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舒适”、“运动”，以及“运动+”模式配合独有的空气悬挂系统（AIRMATIC）组件，能够轻松应对颠簸路面和上下坡。在全时四轮驱动（4MATIC）的强力牵引下，山路就如同 GLE 运动 SUV 的“主场”。

征服，以家族之名

全新 GLE 运动 SUV 诞生于冒险之路，续写梅赛德斯—奔驰 SUV 家族传奇！

2014 年，梅赛德斯—奔驰 SUV 家族成员化身现代版“骑士”，以属于“骑士精神”的信仰、勇气、胸怀和责任远赴新疆，在雪山戈壁间，踏上追求荣耀与梦想的旅途。2015 年，SUV 家族再燃越野战火，化作骑尘，一路西进，重访苍茫丝绸之路，开启轰轰烈烈的天地征途。

正是以这种包容天下的胸怀与纵横天地的勇气，SUV 家族不断超越极限，全新 GLE 运动 SUV 也因此诞生于这条勇往直前的冒险之路。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的又一震撼之作，全新 GLE 运动 SUV 无疑是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勇闯运动型多用途轿跑 SUV 细分市场的绝佳“秘密武器”。它的到来，不仅代表了 SUV 家族挑战自我、征服未拓之疆土的决心与勇气，同时也是梅赛德斯—奔驰以独有的造车智慧，不断创新突破的最佳成果。

集轿跑车的动感性格与 SUV 的卓越性能于一身——全新 GLE 运动 SUV，突破了越野的界限，完美诠释了运动 SUV 的定义，在新的时代继续传承梅赛德斯—奔驰 SUV 家族的“心所向，驰以恒”。

当绝尘之势遇上倾城之美，这就是全新 GLE 运动 SUV。与梅赛德斯—奔驰一起，一同体验运动与美学所碰撞出的无限可能！

在行将颠覆和突破的“黎明期”

沃尔沃汽车已经将最新一代的 Drive-E 节能环保发动机和 Sensus 智能车载交互系统的部分研发工作放在了在中国。

主笔 / 李三

与多数合资品牌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不同，沃尔沃汽车集团日前新启用的中国研发总部与瑞典总部没有设置防火墙，研发资源和成果实现了真正意义的跨洲际共享、共进，通过沃尔沃全球统一的产品开发系统，中国形成了与瑞典哥德堡总部统一研究方法、统一工作流程、统一标准和统一设备的研发格局。

沃尔沃汽车集团研发高级副总裁彼得·默滕斯（Peter Mertens）表示：“中国是沃尔沃的第二本土市场，中国研发团队是沃尔沃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一环。自 2011 年初成立以来，中国团队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建立起一支超过 500 人的国际化研发团队。今后将更多倾听中国消费者的声音，为中国导入更多优秀的全球性和本土化产品。”

彼得·默滕斯已经有 30 多年在汽车行业工作的经验，他的履历里有很多可以展开一讲的故事，4 年前他被中国企业家李书福的说法打动了。他告诉记者：“最早从奔驰开始逐渐进入到领导岗位，后来进入到一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做 CEO，这是戴姆勒和德国电信的一个合资公司。从 2002 年开始，我进入欧宝负责中型车平台的开发，后来转做全球平台开发。2008 年经济危机时，通用向麦格纳出售欧宝的案子我也参与了，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感谢上帝这个并购并没有实现。后来我加入了塔塔集团，作为全球高管会的成员，我负责全球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同时还负责捷豹路虎的质量体



沃尔沃 XC90

系，半个月在英国工作，半个月在印度工作，两大洲跨两种文化的工作经验非常有意思，当然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份工作。我听过李书福很多关于让沃尔沃重新恢复活力、放虎归山的说法，这是我觉得非常振奋的说法。一个中国的资本所有者，有非常宏大的梦想，在三大德国竞争对手环视的竞争体系里，要重回豪华车的阵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彼得·默滕斯加入沃尔沃已经有 4 年多，这期间，他主导从 Drive-E 动力总成到全新 XC90 的开发，被称为 XC90 产品大师。他认为汽车工业的技术已经到了一个将要产生颠覆和突破的黎明期。谈到在中国的工作体会，彼得·默滕斯由衷地表示：“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倾听客户需求，特别是对于

不同区域的客户需求的感知，很遗憾之前可能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不够，错失了 10 年的历史机会。现在，我们必须在产品开发、车内设计，特别是在人机交互界面的使用上，特别需要了解中国客户的偏好在哪里。”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传统公司，你怎么面对来自互联网的竞争？

彼得·默滕斯：我们一向格外认真看待这些竞争对手。他们有非常大的资金，强有力的资源，可以从全球购买科技人才，他们有奇思妙想，车是他们下一个关注的目标，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汽车终将是安上四个轮子的“移动终端”。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个 IT 公司能把一辆车做好。术业有专攻，如果现在让我来做手机，我也不一定成功。

大家可能会说特斯拉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据我了解，它现在基本上是做一台车亏损 5000 美元的状况。如果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也能设计出脑洞大开的车，但竞争环境和商业态势不允许我们有试错的机会。总的来说，我们意识到了竞争的存在，我们保持警惕，同时也非常清晰和谦虚地关注他们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你预测无人驾驶技术在中国的道路上实现大概还需多久？沃尔沃有没有打算更好地推动这项技术？

彼得·默滕斯：我坚持认为需要大约 15 年。虽然很多人说自动驾驶可能在下一个转角就会实现，也就是说很快就会实现，但我觉得这中间还是有很大不可预计的情况，比如安全问题，我们并不想把消费者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境地。还有成本的考量，如何让这个车以大家能接受的价格实现量产。

我认为在工业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全球化的。最糟的可能性是各国有各国的标准，我认为这绝对会让整个汽车行业毁灭。汽车厂商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很多基础性研发大家可以共同承担，但我现在觉得关于自动驾驶的技术可能变成了一个纯公关领域的竞赛。如何满足客户的期待？满足安全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何让这项技术变得更加现实？我呼吁大家先冷静下来，一步步分析未来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实现自动驾驶，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要更安全、更环保，以及对基础设施更好地再利用。

三联生活周刊：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你怎么看待沃尔沃接下来要应对的挑战？

彼得·默滕斯：首先是技术保证，我们必须要在 4 年内升级换代所有的现款车型，用产品力向客户证明自己。我们已经在 SPA 平台包括在 CMA 平台



沃尔沃汽车集团研发高级副总裁彼得·默滕斯

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在主动安全、车间互联、人机互动方面，都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前沃尔沃是一个近乎中等和豪华之间的品牌，现在我们正在迎头赶上，通过产品陆续上市，让大家看到独特的北欧豪华所呈现的魅力，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跻身到德国三强之中。

沃尔沃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独立公司，所以必须要在很多方面更加有创造性，要善于发现捷径，以使用更少的投入成就更好的发展。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财报盈利状况很好，同比增长了 70%，这对一个正在巨大投资进行产品更新换代的小型公司来说是很鼓舞人心的业绩。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研发中心是通过怎样的流程了解中国消费者需求的？

彼得·默滕斯：我们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研发团队，他们做了很多的对标研究，对客户的需求以及竞品的了解，把这些情况及时反馈给总部。举个例子，2012 年我们有机会并购了在哥本哈根的诺基亚工程团队，他们在人机互动界面非常领先。并购以后，他们开发的产品会发到欧洲、中国和美国，了解客户对这个产品的反馈。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和吉利在

技术和研发上有哪些共享和交流？

彼得·默滕斯：CMA 平台的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平台上，设计的第一款车已经在制作过程中，我觉得非常棒。为什么沃尔沃要在 C 级车的平台上和吉利进行合作？我们有两个选择：首先是我们独立开发一个平台，另外就是从经济成本上考虑。从竞争力的角度，与吉利的合作是非常好的合力，让沃尔沃在一个自主的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平台？

彼得·默滕斯：如果和其他的汽车集团合作，在共有的平台上生产，就不能实现我们品牌所坚持的独特特性，无论是斯基的纳维亚设计，还是对环保、安全的追求，都会让我们的需求有所损失。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我们在电气化程度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在开发初期，我们就把对未来汽车安全性的考量整合在这个平台里，以便主动安全以及未来的自动驾驶都会和这个平台以及平台上的产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品特性能够顺利地呈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消费者的平均年龄要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年龄，你作为技术负责人，如何满足年轻消费者对互联技术的需求？

彼得·默滕斯：以全新 XC90 举例，我认为 XC90 已经为车载互联树立了一个行业标杆，我们的目的是想走得更远，APPLE 的 CarPlay 很快就将会在这个车里实现，明年 Android Auto 的应用也会在这个触屏上实现，我们取消物理界面的按钮，把触屏最彻底地整合到车里。此外，我认为未来自动驾驶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车间互联、车与车之间的沟通、车与基础设施之间的沟通将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基于这些需求开发很多的产品，希望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能够继续保持领先性。☑



8月7日，一些参加艺穗节的演员在爱丁堡老城区最著名的街道——“皇家一英里”上为自己的戏做宣传



爱丁堡艺穗节的街头演出——《爱上月亮的女孩》

在爱丁堡过艺术节

时尚界有一句名言，每个女人都要拥有一条小黑裙。《爱丁堡艺穗节幸存指南》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每个人有生之年都要来爱丁堡演一次戏。”这本书是业内人士写给业内人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这句话或许应该改成：每个人有生之年都应该来爱丁堡过一次艺术节。

记者 石鸣

如果你在8月来到爱丁堡，你会惊讶地发觉这里的人似乎什么事儿也不干，除了过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爱丁堡军乐节、爱丁堡国际书展……统统挤在这四周。每年参加这些艺术节的人超过400万，卖出的门票数量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杯，然而，后者是四年一次，前者可是年复一年，年年都有。8月想在爱丁堡寻找清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的。对于这座纬度比漠河还要高的苏格兰首府来说，此时最值得做的，就是享受弥足珍贵的“最后的夏日时光”。艺术节的海报、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不必管它，垃圾桶满得已经快要溢出来，也不必在乎，平时午夜之前就要打烊的酒吧，凭着法律许可，营业至凌晨5点，有的酒吧甚至对成功“刷夜”的人有特别奖励（奖品是一件纪念T恤）。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规模上来说，爱丁堡艺穗节无疑都是这个节日季中最重要的节。它持续的时间最长，占据整整三周，再加上开幕之前有一周的预演，我们可以说，整个8月的爱丁堡都是属于艺穗节的。



爱丁堡艺术节剧目《爱情课本》剧照

两个艺术节的 70 年对决

没有来过爱丁堡的人，不容易搞清楚爱丁堡艺术节（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以下简称 Fringe）和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以下简称 EIF）的区别。就连当地媒体也不对这两个节做特别的区分，报道它们的版面极其类似，只

在长长的文章末尾用小字注明剧目来自何处。或许只有在买票的时候，才会遇上麻烦：“不好意思，这个戏不是我们这里的，是国际艺术节的。”这便是我拿着刊有希薇·纪莲大幅照片的《Fest》杂志兴冲冲赶到艺术节票房抢票时的遭遇。同理，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安提戈涅》也不是艺术节的剧目，而是国际艺术节的，尽管朱丽

叶·比诺什的巨大头像占据了双层巴士的整个车身，穿梭在满是艺术节广告的中世纪街道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爱丁堡最重要的两个艺术节，Fringe 和 EIF 彼此敌对的关系是英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也是它不同于另一个名气相当的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和“IN”单元的地方。对于阿



维尼翁戏剧节来说，“OFF”单元是后来派生出来的，是1968年那个“反叛的年代”的产物，因此“OFF”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从属于“IN”的特征。然而，Fringe拥有与EIF、阿维尼翁戏剧节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都创办于1947年，从一开始，Fringe和EIF就是彼此独立的，尽管“Fringe”本身具有“边缘”的含义，但是参与Fringe的艺术

家们从一开始就从未自视“非主流”，而只是“不同”。的确，成立60多年以来，Fringe和EIF各自的特色一度相当鲜明：Fringe的演出高潮往往在深夜，EIF的演出大多集中在白天至傍晚；Fringe演出的大多是话剧，EIF更加侧重古典音乐和歌剧，话剧很少，几至于无，且EIF的历任艺术总监直至2014年为止，全部具有某种音乐和歌剧背景，却对话剧、舞台剧没有什么涉猎。

将Fringe与EIF，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艺术节区分开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艺术总监，没有策展人，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委员会握有某个戏能不能在Fringe上演的决定权。的确有一个爱丁堡艺穗节协会（成立于1959年），但是这个协会仅仅承担为参加Fringe的各演出团体、媒体服务的职能。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创作，愿意申请，找得到场地，付得起场租和衣食住行的费用，就可以来Fringe演自己的戏。

事实上，这条被Fringe视为自己立身之本的原则，也是其最终与EIF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早年，Fringe的艺术家们曾经想和EIF合并：后者有钱、有组织、有政府支持、有全英国乃至欧美最知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参加，而Fringe当时什么都没有，不过是由8个地方剧团、戏剧协会（其中6个来自苏格兰）拉起来的草台班子。那个时候，是EIF瞧不上Fringe，认为其不过是小打小闹的“编外活动”，而且无组织无纪律，还不服管束，大概也没有什么前途。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Fringe的剧目和演出时间，只能以给EIF填空的方式来进行，而EIF凭着策划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专门盯着Fringe的特征与之竞争：Fringe演话剧，EIF也演话剧；Fringe以深夜演出出名，EIF就搞一个午夜时分的《秀场之后》；Fringe的娱乐性强，EIF就搞一个娱乐性更强的《边缘之外》

(*Beyond the Fringe*)，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戏是Fringe的，甚至Fringe自己出版的50周年纪念图书上也收录了这个戏的剧照。

谁能想到，70年之后，Fringe竟然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节呢？Fringe的规模扩张，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有了资金支持之后，它的宣传也越来越高调，人们逐渐开始把Fringe视作一个有公众性质的艺术节，而不仅仅是一小撮艺术家们自娱自乐的行为艺术，参演的剧目数量从三位数突破到四位数，几大支柱演出场地开始固定下来。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Fringe急速膨胀，2014年上演的剧目数量是3193台，演出场次4.9万多场，2015年的剧目数量攀升至3314，演出场次超过5万场。如今，Fringe的节目册比一本字典还厚，戏剧节开幕后前三天，全城开演的戏超过500台，这比一个普通的戏剧节的全程剧目要多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整个英国的戏剧圈人士都汇集在这里了，以及世界各地的演出团体。回想1959年，那时参加Fringe的剧团数目从8个增加到19个，便已经有人私底下觉得Fringe“太大了！”

有趣的是，当Fringe的体量从小老鼠膨胀成恐龙之后，原本是大众的EIF开始不知不觉有自惭形秽之感，二者之间俯视和仰视的关系渐渐颠倒过来。以前，Fringe想向EIF攀关系，EIF置之不理，如今，EIF却开始有某种主动示好、向Fringe靠拢的意思。从前，EIF总是比Fringe晚一周才开始，似乎毫不介意姗姗来迟会扫观者的兴致，而且持续时间也比Fringe少一周，然而，近年来，EIF的开幕日期一再提前，持续时间也一再延长。去年的EIF尚比Fringe晚两天开幕，今年，两个艺术节开幕在同一天，且并非巧合。今年的EIF还有最大的一个改变，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摒弃剧目策划的概念：之前每一届EIF，总是



爱丁堡艺术节剧目《房间里的大象》剧照

具有某种主题——启蒙、战争与和平、技术等等——来总领所有剧目，这一届却不再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

这与2014年新上任的EIF艺术总监弗格斯·莱因汉（Fergus Linehan）有关，他不愿意看到“某个戏非常棒，仅仅因为不合一个预先确定的主题，就不能入选EIF”。在EIF的漫长历史上，他是首位具有戏剧背景的艺术总监，也因此今年的EIF大幅增加了舞台剧的分量，传统古典音乐和歌剧的演出范畴也被拓宽了，开幕音乐会不再端着“皇家”的架子，被移到了户外，免费参加，没有座位，采用了形式颇为先锋的多媒体投影——从表面上看，EIF似乎越来越像Fringe了，它的剧目选择越来越少地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并且借助充裕的预算，它还能够请到朱丽叶·比诺什、希薇·纪莲、

安妮·索菲·穆特、朗朗、捷吉耶夫等大腕儿，简直变身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升级版Fringe。

事实上，今年EIF的主打剧目里有一台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是英国1927剧团和柏林喜歌剧院合作的作品（9月10～12日刚刚在上海演出完毕，票房爆满，大获好评），而这个1927剧团，便是在2007年从Fringe上脱颖而出的。另外还有一台新编歌剧《最后的酒店》（*The Last Hotel*）和一个舞台剧《遭遇》（*The Encounter*），其主创当年也是来自Fringe。事实证明，在Fringe上大受欢迎的，换到EIF的舞台上，照样赢得掌声雷动。两个艺术节经过那么多年的争斗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观众只管演出的质量好坏，并不在意某台演出的出身高低。

艺穗节的“大”与“小”

对于爱丁堡艺穗节来说，它的“尺寸”（size）一直是一个常辩常新的话题。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艺术盛会；另一方面，组成如此大的体量的每一个元件，却又如此之小——如今在艺穗节上演的戏，一般都不超过一个小时，而自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大部分艺穗节的戏都至少有一个半小时。

这些戏不得不“小”。没有来到爱丁堡的人，或许对艺穗节的“尺寸”问题没有概念。3000多台剧目，要挤在300来个演出场地里演出，其中90%的场地并不是专业剧场，而是临时搭建或者改建而来。单单一个Assembly剧院，上演的剧目数就等于整个EIF的容量。对于演出人员来说，戏与戏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剧目《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之间要有足够的拆台、装台时间，对于观众来说，要想办法安排足够的时间穿越大街小巷上汹涌的人群，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演出从早上10点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午夜，一个人一天能够看多少台演出呢？极限纪录可能是7至8台，实践经验证明，如果每天都看戏，4到5台是比较实际的数据。而且除了艺穗节之外，还有国际艺术节的剧目。有人测算过，如果每天看5个戏，其中国际艺术节的戏和 Traverse 剧院（艺穗节的四大堡垒剧院之一，致力于严肃戏剧）的戏一个不落，那么就只有很少的时间空当和注意力能够分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创作者和小戏了。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艺穗节上争夺观众的竞争何等惨烈。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十几家大户——有的是艺穗

节的常客，有的是作为剧院常年以来形成了选戏风格，因此较容易被观众认知——之外，绝大部分“散户”之间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状态。因此，爱丁堡艺穗节也被戏称为“资本主义戏剧节的最佳典范”。有钱才能去爱丁堡，这成了戏剧圈内的共识——不是说必须家财万贯，但口袋里绝对不能只有几个铜板。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攒上好几年钱然后去一次爱丁堡的剧团比比皆是，如今鼎鼎大名的1927剧团当年也不例外。2012年在大陆巡演时，主创曾经接受过本刊的采访，在聊到当初去爱丁堡的过程时说：“我们动用了我们过去几年在伦敦卡巴莱表演里攒下来的所有的钱，这种表演赚钱并不多，一个晚上50镑或者100镑，就已经很可观，这些钱我们都没花，存进了一个小的银行账户，

平时另外打工来维持开销，存了一年，大概有几千镑，于是去爱丁堡这件事情变成了可能。”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剧团都能够像1927剧团这么幸运，能够在爱丁堡艺穗节的平台上一炮打响，进而红遍全球。对于许多戏而言，观众席里的人数甚至不一定比舞台上的演员数目更多，而大部分剧团的诉求仅仅是在艺穗节上亮相同时不至于破产，“如果还能引起一些关注就更好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爱丁堡艺穗节协会每年发布各种指南，并且隔几年就修订一次，除了提供艺术指导之外，这些指南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经济方面指导剧团如何筹款、如何宣传、如何卖票、如何削减开支。2012年，一位名叫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英国记者兼编剧写了一本《爱丁堡艺穗

节幸存指南》(The Edinburgh Fringe Survival Guide), 立即被大家奉为宝典, 或许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一想到爱丁堡艺穗节, 就让人满心恐惧, 就像上了一辆挤满人的公交车, 你觉得自己很孤单, 然后发现车上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感觉一样。因此即便只有站位, 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大家相信, 尽管爱丁堡艺穗节是个赌场, 但总有人赢得彩头。

有不少人对艺穗节的“资本主义化”和商业化倾向持批判态度, 理由是艺术家们辛辛苦苦地创作, 赚来的钱还不足以果腹, 然而受惠于艺穗节的当地服务业却赚得盆满钵满, 实属不公。从消费角度来看, 这的确是实情, 艺穗节期间, 整个爱丁堡的酒店、餐馆、酒吧的价格都大幅上涨, 一杯平时卖 2.5 英镑的啤酒, 艺穗节期间要卖到 4 英镑。像宜必思这种普通连锁酒店, 平日里 30 多英镑一晚的房间, 艺穗节期间甚至有可能飙升到 200 多英镑, 因此各种指南都会不约而同地建议艺术家们通过蹭、挤、露营甚至住到隔壁格拉斯哥(火车到爱丁堡只需一个半小时)的方式, 来解决住宿问题。相比之下, 价格下跌的唯有戏票, 各种折优惠之后, 艺穗节戏票的平均价格不过 10 英镑, 在伦敦看一场戏的钱, 在艺穗节上可以看 5 场, 而一场演出的观众人数很少超过 150 人。这样的剪刀差, 导致即便一个剧团的报表在艺穗节结束之后显示有赚头, 最后平均下来很可能每个人的收入也不超过 100 英镑。据统计, 每年艺穗节给爱丁堡创造的收入超过 2 亿英镑, 其中 90% 留在了爱丁堡本地人的手中, 这些人包括爱丁堡的房产主, 咖啡店、餐馆和酒吧老板, 商店店主以及爱丁堡大学——因为大量的剧院都是爱丁堡大学的产业。

还有人认为, 艺穗节的体量过于庞大, 逼迫个体剧团不得收缩自己的创作, 他们对“一小时时长”这个艺穗节惯例发起攻击: 一个小时就足

够把要讲的事讲完吗? 所有的戏都限定在一小时, 会不会难免削足适履? 换句话说, 是不是应该对艺穗节的准入门槛加以更多的限制, 以便进入艺穗节的戏能够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 今年的爱丁堡艺穗节上, 就有一场专门的讨论会, 讨论艺穗节的戏是不是太“小”了。认为艺穗节的“小”有害于戏剧发展的人最终成为态度保守



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戏剧专业人士, 有生之年都应该来爱丁堡看一次戏, 接触到自己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

的少数, 他们的反对者理由很充分: 更大并不一定更好, 更小也不一定更差, “小”只是一种条件, 而不是束缚, 想象力和创造力终将以自己的方式显现, 那个时候, 甚至不需要一小时, 只需要 15 分钟、20 分钟。

另一个实例是, 爱丁堡艺穗节并不是容不下一小时以上的“大”戏, Traverse 剧院的戏基本上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2013 年, 易立明导演在爱丁堡看戏时选中了一部《尤利西斯》, 且在今年 4 月引进到中国巡演, 这部戏的演出时长便达到两个半小时, 演出场地甚至都不是专业剧院, 而是当地的一个护士学校礼堂。记得导演在采访中谈及演出时长问题时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如今想来, 这种逆流而上的行为实属特立独行、令人钦佩。导演的底气恐怕也在于这的确是一部好戏, 且幸运的是, 它是一部没有被埋没的好戏, 对于真正的好戏来说, 既成的惯例和规则都是云烟。

戏剧的未来

2010 年, 一个名叫马修·萨默维尔(Matthew Somerville)的伯明翰戏剧人创造了一个艺穗节看戏纪录: 三周时间里, 他看了 136 台戏。然而,

这只占当年艺穗节全部剧目的 5.54%。

没有人能够穷尽爱丁堡艺穗节, 即使你大名鼎鼎如《卫报》资深戏剧评论人琳·加德纳(Lyn Gardner)也不例外。艺穗节是个海洋, 广阔而包罗万象, 每个人尽其所能, 也只能接触到其局部碎片。然而, 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戏剧专业人士, 有生之年都应该来爱丁堡看一次戏, 因为在这里

你能以空前的密度, 接触到自己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

一个问题是, 如何在艺穗节中大海捞针, 选出值得看的好戏? 如果是业内人士, 那么早早就已经收到了各种消息推送, 势必要去看朋友的戏、合作伙伴的戏、邀请方的戏以及自己关注的艺术家的戏。英国文化协会、BBC、苏格兰当地的戏剧协会等等都会组织自己的板块, 板块内的剧目是按一定的思路策划选择的, 也会有自己的侧重点。艺穗节期间, 大大小小的几十种报纸杂志每天发布相关的剧评和剧目介绍, 英国各地的媒体都派出了自己的记者蹲守艺穗节。最值得关注的当然还是来自伦敦的《卫报》, 这家报纸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发布当年艺穗节的潜力好戏单, 艺穗节开始之后, 若干个评论人轮流上岗, 个个都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 有人专门负责话剧, 有人专写舞蹈和肢体剧场, 有人专门报道音乐, 还有人专写喜剧和脱口秀, 剧评间隙, 还夹杂各种采访手记和心得, 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某位剧评人的口味, 那么跟着他/她的文章看戏, 不失为一种聪明省力的选择。

然而, 所有这些“纸上谈兵”的秘籍, 都比不上一条人人皆知的原始经验: 看口碑。艺穗节上, 成千上万

的观众对好戏的需求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部戏如果好看，风声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几个钟头内就从城东传到城西。层层叠叠的艺穗节海报、蜂拥的人群将爱丁堡鱼骨状的中世纪老街淹没得看不出原本的形状，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尾鱼儿，潜入这片深海，凭直觉来感知潮水流动的方向。今年艺穗节上第一部口碑爆棚的戏《开诚布公》(Man to Man)，就是这样来到了我的面前：先是有个别朋友推荐，随后陆续在不同的咖啡馆、餐馆、剧院前厅反复听到有人提起这部戏，最后，我竟然在离这个戏上演的剧院1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剧院的厕所里发现了这场戏的传单掉在地上。走出厕所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有网络信号的地方用手机买了这部戏最近一场的票（值得一提的是艺穗节开发了自己专属的APP，名为Fringe 2015，最强大的两项功能就是即时买票和查找剧场和演出时间等信息）。第二天，在去看戏的路上，《卫报》的剧评发表出来了，再往后，这部戏就光荣地登上了“售罄”榜。

艺穗节的“售罄”榜(Sold Out Board)也是一桩值得一提的壮观景象。任何去过Pleasance Courtyard剧院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里的“售罄”榜尤为巨大，挤挤挨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剧名，榜首“售罄”两个大字触目惊心，又带着某种骄傲，炫耀性地告知匆匆赶来剧院的人：今日、明日以下剧目均已售罄，请君自行查找，不必再劳神询问票房。艺穗节的票一旦售出不退不换，很少有人会提前很多天买票，因为潮水和风声天天在变，看戏计划自然也不断调整，“售罄”榜也仅仅预告未来两三天情况。聪明人把“售罄”榜当作最好的选戏指南，哪些票今天卖光了，那么就订它明天、后天演出的票。然而，对于一些真正热门的戏来说，“售罄”榜也不顶事，因

为它不仅是未来两天，而是已经全程售罄了。《装下去，直到你真的做到》(Fake It'til You Make It)就是这样一部戏，它后来得了今年爱丁堡艺穗节的“先驱天使奖”(Herald Angel Award)，开戏不到一周，三周的票就全部售罄，晚到的人就只能扼腕叹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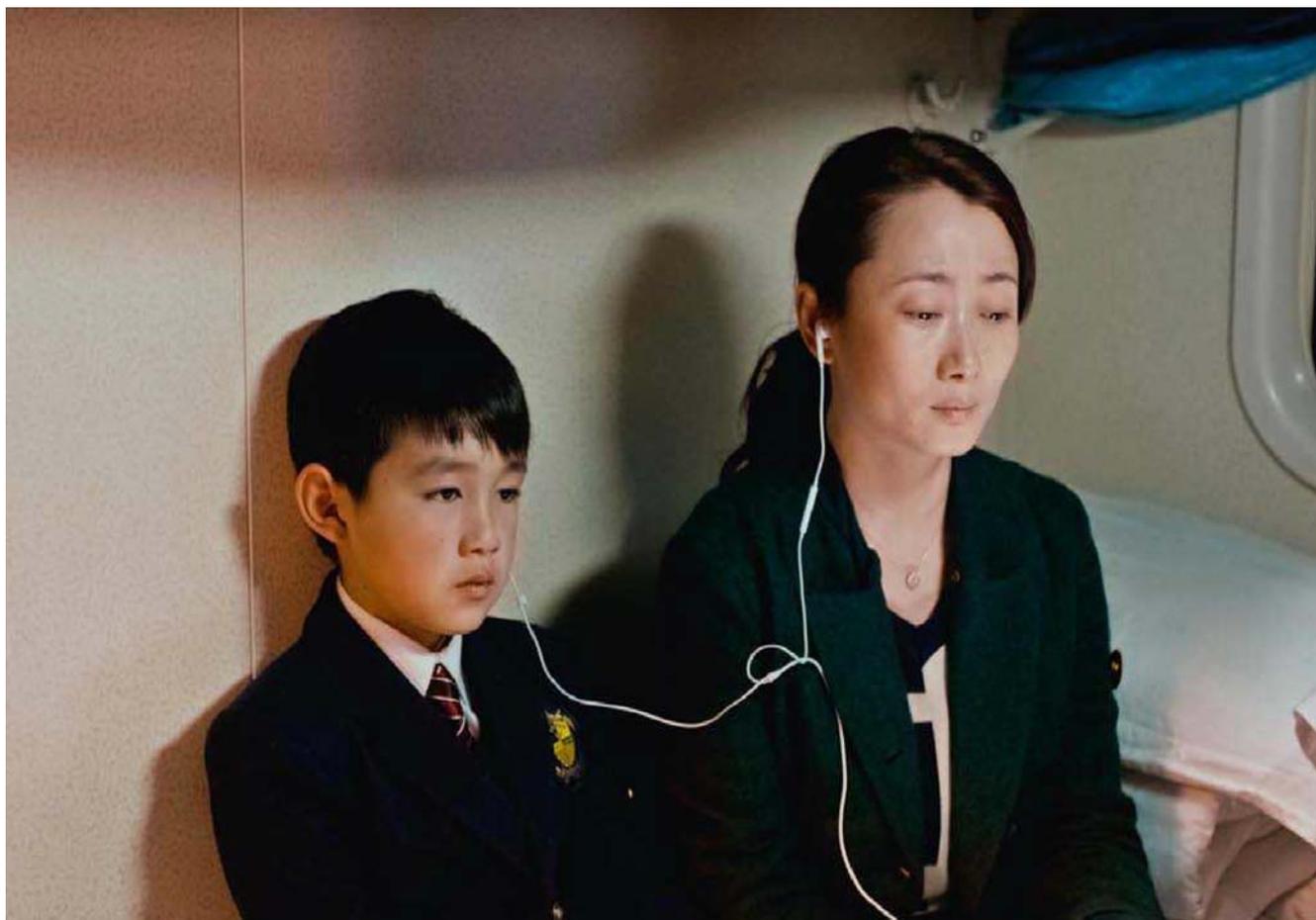
在艺穗节上，最受欢迎、上座率最高的，永远是喜剧、马戏、脱口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喜剧(comedy)最终超过了话剧(drama)，成为爱丁堡艺穗节最大的表演门类的原因：普通人进剧场，主要还是为了找乐子。“艺穗节十佳笑话”、“艺穗节十佳搞笑段子”之类的评选，是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哪位艺术家在自己的戏里说了一句什么妙语，很快就会风靡。剧场在这里并没有被神化，也因此演出现场总是保持了一种自发的、原生态的戏剧气氛，台上台下，常常处于心领神会的默契状态，艺术家发出的消息，观众接得住，观众席散发的信号，艺术家也能反射回来，看戏本身便成为一种无法复制也无法替代的体验。所谓戏剧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的“现场的魅力”，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体验吧。

纵观艺穗节的“话剧”，一个感触是，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轫的国家，戏剧作为一门工业——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何等成熟、专业的程度。独角戏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种形式是艺穗节演出的主流，初衷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然而，艺穗节的独角戏有本事把只有一个人的舞台做得有好莱坞大片的观感，上文提到的《开诚布公》就是最好的范例，一个女人在台上讲述自己扮演男人的故事，“一战”、“二战”、西德、东德、“冷战”、偷渡、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个人、国家、历史，没有什么是独角戏不能承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气场和带来的体验一点儿也不输今年国际

艺术节上的两部主打剧目——大剧场独角戏《遭遇》和《887》。

在艺穗节看戏，总能感觉到戏剧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之紧密：普普通通、常常在公共叙述中被忽略、简化、扭曲的个体，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以为意以至于抛诸脑后的情绪和问题，却在这里得到了最认真、最诚实、最妥帖的对待，因此不免对做出这一番努力的艺术家们满怀感激。例如今年艺穗节上获得苏格兰艺术俱乐部“最佳苏格兰戏剧奖”的《吞咽》(Swallow)，不过就是三个普通女孩的故事，一个患有幽闭症和抑郁症，一个刚刚被男友甩了想自杀，还有一个是努力想要“出柜”的女同性恋，相当平常的主题，相当平凡的小人物，很容易就变得庸俗的痛苦和绝望，却在这部戏里被挖掘得深入骨髓，不带丝毫故意和做作，最后竟然现出了某种具有诗意的悲痛的崇高感。

“自爱丁堡艺穗节成立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预言它的衰落。”琳·加德纳说，“但人们总是到艺穗节上来寻找戏剧的未来。”甚至连“艺穗节”这样一个名称本身，也成了人们对戏剧的未来的期许：爱丁堡艺穗节之后，从都柏林到布莱顿，从阿德莱德到温哥华，从纽约到北京，世界各地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艺穗节”。但是仍然只有爱丁堡，汇集了那么多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的戏，持续挑战着我们关于“什么是戏剧”的认知。“前两年，谁能想象一个男人小心地在舞台上一块一块垒石块也能成为一出戏？或者看着塑料袋在空中飘浮也是一出戏？”类似的，今年获得艺穗节最有名的奖项“全面戏剧奖”(Total Theatre Award)的两出戏可以如此描述：《活动的肖像》(Portraits in Motion)，把家庭相册一张张投影到大屏幕上并进行讲解；《我能重新开始吗？》(Can I Start Again Please?)，翻完一叠纸，就演完了一出戏。■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上、下图）



赵涛，演别人的一生，然后自己慢生活

“演员这个职业有时候很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当你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演这个人的一生。”

记者 / 李东然

山河故人

《山河故人》的故事从1999年的山西汾阳小镇讲起，直到2025年澳大利亚的海边结束，横跨了地球南北，一讲近30年。于是赵涛就跟着这个也叫“涛”的女人，从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城姑娘，演成经沧海而孤独寡居的半百妇人。

见到赵涛那天，她穿着一条香槟色的丝质连衣裙，踩着精致的裸色高跟鞋，妥帖的淡妆，以及满眼的笑意。很少有女演员生活比银幕上更优雅时髦，赵涛显然就是那个例外。

提起《山河故人》里的这个“涛”，最初是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贾樟柯问要不要先去打个瘦脸针，至今赵涛说话还有点赌气似的口吻：“说话的声调扬上去，再把嗓子压尖一点点，我觉得我的状态就还是没有问题。”

不过真演到中年、丧父、别子，赵涛也真就憔悴苍白着脸，天天给自己听特别伤感的歌，情绪压得不能更低，哭了又哭，一个星期眼袋都消不下去，刚好就把最糟的眼袋、无遮无拦的细纹，通通都暴露在摄影机前。真演痛至深处，反而是没有眼泪的，她只仰面闭眼的一瞬，并且相对整个世界的速度而言，又慢了半拍，给观众留足了去体会这个女人孤苦心境的余味。

赵涛惯用一个稍跳脱、在她自身话语逻辑范围之外的理论化的句子形容镜头里的那个自己：“社会变革中的

‘群像’。”所以她说，自己的样子并不重要。她可以是小城文工队的女演员尹瑞娟，土气的绿围巾厚棉裤，少女内心却很高傲（《站台》）；她也能是小城野模巧巧，有点离经叛道，更多迷茫挣扎（《任逍遥》）；《世界》里，她嘻嘻哈哈活在一个封闭虚幻的公园里，好像真不见了现实沉重；到《三峡好人》中，她又成了人到中年被丈夫冷落了好几年的妻子，无奈寻夫离婚，不入时的烫发、不自然的红眉，以及不自在的表情，好像谁都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女人，过得挺不容易的。

十几年来，贾樟柯最认可赵涛的是她总能和电影中的角色零距离。赵涛自己觉得，在《山河故人》里，自

热热闹闹地在那儿聊天嗑瓜子什么的，赵涛一路演到底，直演到那些群众演员们渐渐没人说话，间或也有人开始默默地擦眼泪。

贾樟柯电影，自然有其电影美学上的控制，所以贾导再三跟赵涛说，要含蓄一点，不要那么多眼泪。跟着贾樟柯演了十几年的赵涛，自然也心知确实不能让自己号啕，那就夸张成了小品，所以她就咬着牙不出声。但眼泪止不住，每每拍完一条，赵涛觉得几乎是拼尽了全力，没了开口说话的力气。

“《山河故人》的痛对每个人都是切肤之痛。年轻时跟恋人的感情，中年送走父亲别离儿子如芒在背的艰难，



跟着贾樟柯演了十几年的赵涛，自然也心知确实不能让自己号啕，那就夸张成了小品，所以她就咬着牙不出声。

自己和角色是贴近得有些尴尬，是近到几乎失控的地步。特别是中年那一段的时候，演涛面对父亲的离世，在医院里拍那场戏，跟赵涛搭戏的老演员于是也多愁善感，两辈人就对哭，赵涛基本上把半个剧组的人都演哭了，都受不了，化妆师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擦眼泪。于是后面一场到了出殡的场景，贾樟柯就特意交代赵涛，我们的镜头很远，你不用哭。赵涛一上车，眼泪不停地往下流。一些村民来做群众演员，开始大伙拍电影都挺兴奋，

乃至暮年的孤寂与坚强，这都是当下每个个体的最基本的情感，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或者是正在经历，甚至不久将来就要经历的一个情感。我不自觉地就把自己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女人，这么多年来对于爱、对家人的情感放了进去，虽然很多离别我自己还不曾经历过，但我深深认同。所以我跟贾樟柯也说，我心里觉得一个40多岁、有一段不太成功的婚姻经历的女人，如此突然地送走相依为命的老父亲，我相信这个女人的状态会



5月20日,《山河故人》导演贾樟柯(中)和主演赵涛(右)、张艾嘉出席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是失控的。”

师从贾樟柯

说起《山河故人》里自己和角色的亲密可能真的影响了贾樟柯电影的风格,赵涛脸上也闪过得意神采,她愿意仔仔细细地描述那些表演上的细枝末节,哪怕一个小动作。谈贾樟柯,她言必称导演:“导演有他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女性,她的情感,她后面的这个时代。很多演员是从学校学出来的,而我是现场跟贾导学出来的。”

1998年,刚刚走出校园的贾樟柯和他的《小武》在柏林电影节上一炮而红,格雷戈尔称誉贾樟柯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还没有一部电影这样诚实地表达了正在活

着的中国人的气息”。转年贾樟柯就回家乡准备《站台》,找到能演尹瑞娟的女孩颇费了一番曲折。“首先是能讲太原话。第二会舞蹈,因为剧本角色设定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最后才是最好会表演。”赵涛说。

“就很普通的一个早晨,他们一群人到我的课上,学校说是找演员,我也没有当一回事。之后就叫我去试戏。当时我压根不知道什么叫试戏,但挺新鲜的,那我就去试一下吧。剧情设置我要来送别男友。场景在平遥古城上,那天到了导演说梳个小辫儿,然后就有个人过来给我梳了小辫儿,导演说:‘你从这儿走过去,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你要走了。’我说:‘哦,行。’因为我不认识那个男孩子啊,我觉得看人家眼睛特别的不礼貌,也不好意

思,我就换了个角度,看了他的耳朵,视线差不离,起码我自己不尴尬……”赵涛把那场误打误撞的表演讲得绘声绘色。最后看贾樟柯笑眯眯地冲她说:“不错。”

十几年过去,当初的懵懂已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教师出身的赵涛把自己的方法论表述得条理清晰。比如笔记,每看剧本的时候赵涛说会写很多感受在旁边,可能说一句“是吗”很简单,但笔记会写很多。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情绪是怎样的,包括一些自己的想法,通通写下来。但其实看完一遍剧本之后,还是会推翻她之前的好多想法,就会有第二遍、第三遍,不停地推翻自己。“直到我觉得那个角色跟我好像只有这一张纸的距离了。”

“《山河故人》当中，涛这个角色是三段式的，二十多岁、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至于她十几岁、三十几岁都是空白，对我来说，我就要把这些空白全部通过我的想象填满。起点是从她出生、她的家境，可能小时候就认识晋生，可能上小学她跟梁子是同桌，上初中时他们仨肯定是同班等等，当我把这条线整个捋下来的时候，涛的整个人生已经完成了。所以演员这个职业最有魅力在于，当你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演这个人的一生。”

出走

当然世上也没有误打误撞就可以顺风顺水一过十几年的事情。赵涛不讳言，表演的痛苦和纠结其实至今也未真正远离。《三峡好人》是贾樟柯拍摄三峡纪录片时的临时起念，奉节是三峡地区很快将被拆平的小城，他想讲两个同样生活在破碎情感境遇里的男女，各自想要在这临时之地上了结旧情往事的故事。赵涛演绝望寻夫的中年女人，即便妆硬生生化了10岁，但她无论如何不能抵达导演要的那种麻木的绝望，或者又是动荡之地总要使人不安，沟通常常就发展成争执。赵涛说，自己也是自尊心高高在上的一个人，贾樟柯说话重了，她便也翻脸，离开，一个人哭上个把小时，想剧组还等着，就再回来继续拍。忍无可忍，她也说点狠话：“以后拍戏别再找我。”其实心里早绝望到想跳江结束这一切。“是真的跳江，不是开玩笑。”她认真地说。

直到拍摄结束，贾樟柯才道歉，说是因为看赵涛“太高兴”，不符合角色需要，才给她制造出一种被孤立的氛围，“让她在情绪上痛苦一些”。赵涛心里的郁闷一直带到了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上，颁奖那天晚上赵涛坐在贾樟柯旁边，当组委会宣布《三峡好人》

终擒得金狮奖时，赵涛“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反而吓了贾樟柯一跳。

但是赵涛并没有如约起身和贾樟柯一道上台领奖，她说，贾樟柯懂得她心里有个劲儿，想要往前走。《三峡好人》之后，接二连三，赵涛的确也“有意出走”。2009年应张国立邀请，赵涛拍摄了电视剧《大生活》，出演与张国立、张嘉译具有双重感情纠葛的单亲妈妈洪雨。第一次出走当然并不适应：“我当时很困惑，我觉得自己还没演呢，导演就说‘过了’。那个时候，我连着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觉得自己进入状态太慢了。”

2010年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请赵涛在具有实验性质的装置艺术电影《万层浪》中出演一个只有肢体语言、没有台词的角色。朱利安当然也还是在贾樟柯电影里认识了赵涛，赵涛也惊讶，当他想找一个中国内地女演员合作时，首先想到自己。

转年赵涛和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合作意大利电影《我是丽》。与贾樟柯随时推倒剧本重写的即兴风格不同，意大利导演的拍摄永远按部就班地进行，制作安排也很周密。赵涛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每天8小



赵涛并没有如约起身和贾樟柯一道上台领奖，她说，贾樟柯懂得她心里有个劲儿，想要往前走。

时甚至6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5天。因为赵涛已经提前要来全部的意大利语剧本，不仅死磕半年把自己的台词背了下来，还请人把搭戏演员的台词用中文一句一句标好，没有自己的章节，也写好中文段落梗概，于是反倒拍得是轻松自在。“不像是《三峡好人》，我只知道我叫沈红，是个护士，从山西到四川来找男人。其他——没了。”

2012年，赵涛凭意大利电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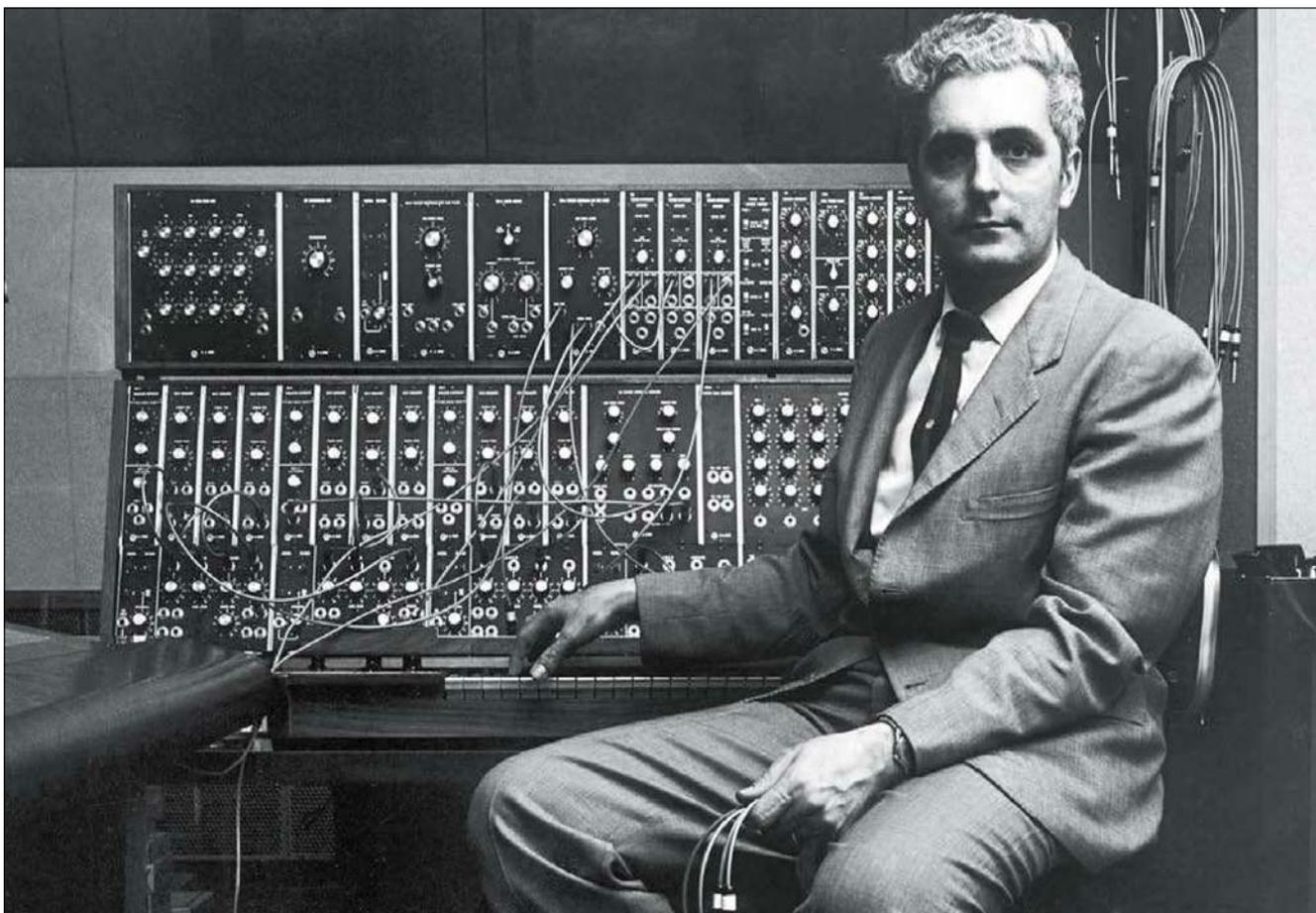
是丽》，获意大利阿斯蒂电影节、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终于可以独自登台领奖的赵涛，却把这个角色解释回了一个贾樟柯式的女主角：“其实丽也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只不过是丽来到了海外。”

如今赵涛形容自己，完全放慢了速度。基本生活就是健身，然后宅家里看电影，看书，听音乐。晚上几乎是从来不出门的，所以如果有朋友来聚，肯定得麻烦人家找地方。“我就知道俩地儿能吃饭，还记住了一间比较安静的酒吧。都因为离家近。”

倒是电影看了很多很多。动作片、悬疑片、艺术片，来者不拒。最喜欢看那种烧脑的悬疑片，《盗梦空间》、《禁闭岛》之类想想才明白的电影常常令她兴奋不已。“我常演比较现实日常的人物，虽然演了很多不同的女性角色，但这些女性都是很适合当下的，没有跳脱。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试一试这样的故事，说不定是完全新鲜的体验。有时候我也想，要是自己能有才华和能力去编一个这样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还有太多欠缺得要弥补。”

除了几大电影节的红毯之外，赵

涛觉得自己就是生活里的普通人。她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有一回在巴黎，贾樟柯、赵涛约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见面。三个人在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一家小餐厅吃饭、聊天。赵涛见惯了国内大牌明星身边永远围满助理、记者、“粉丝”，于是就感慨，怎么比诺什连个助理都没有。贾樟柯对她解释：“欧洲演员都这样。他们拼命想要背叛自己的明星身份，不希望生活被它干扰。”



罗伯特·穆格发明的合成器，改变了键盘在音乐中的地位

最后的乐器

60年前，合成器被发明后迅速得到应用，这种技术不光满足了听觉感，它似乎还打破了音乐之间的某种界限。

记者 / 黑麦

世界上最早的合成器并非出自音乐家之手。1874年，电话技术的奠基人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开始研究谐波电报，偶然间发现他可以控制电磁电路的自振，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单音的振荡器，这台后来被称为音乐电报机的物件可以演奏两个八度的音域。两年后，当贝尔成为合法的电话发明人后，格雷还在带着那台音乐仪器四处展示，不过这台发报的乐器并没有引起当时任何音乐家的注意。

“一台来自苏联的发声设备，几乎引发了一次乐器的革命。”1928年，科学家利昂·塞勒明（Leon Theremin）利用天线和演奏者的双手，构成电容器，他将天线接在一个带有放大电路和扬声器的LC回路上，通过天线接收手的位置变化，来发出声响。塞勒明琴（即特雷门琴），或许是电子音乐历史上最怪异的乐器，由于它缺乏物理定位调节，这台被赋予“合成器雏形”的机器，最终成为只能演奏有限曲目

的乐器。40年代中期开始，塞勒明琴被运抵好莱坞，在《爱德华大夫》，甚至《地球停转日》等早期科幻电影中，制造古怪、恐怖的音效，而重获新生。随即，这种尚未被定义的“音乐”引来了第一批爱好者。

罗伯特·穆格（Robert Moog）便是其中一位。利用二手的战后军需物资、集成电路元件，他尝试复刻了自己在14岁时制作的塞勒明琴。“尽管它不是特别好用，但我跟它一起‘鬼混’

了很久。”在《无线电工艺》和《无线电新闻》等期刊中，罗伯特·穆格似乎找到了研究方向。

20世纪50年代，布鲁斯大行其道，乡村摇滚也即将浮出水面，一股新的爵士音乐风潮突然涌现，却在顷刻间萧条起来，在合着“曼波”节拍尽情跳舞的年代里，人们也许更偏爱“放克”节奏，此时的“大乐队”风范已经明显过时，而那些栖息在酒吧里的乐队却迟迟不肯放下。这是摇滚乐诞生的年代，乐队的编制被精简为吉他、贝司和鼓，并成为之后半个多世纪一成不变的基础构架，由于音效上的匮乏，人们认定合成器可以成为一种音色上的补充。

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电子音乐中心(aka. RCA)的奥尔森和贝拉制作出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音乐合成器，它被命名为RAC MK1。它采用了与早期电子计算机类似的孔带纸式的信息输入与控制设备，使用滤波器和调制器将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任意改变成所需的声音加以输出，大量的电子管可以将不同谐波的正弦波组合起来形成复杂的声音，它拥有着现今我们在大多数的合成器上还在使用着的模块，并使用了两台机械钢琴作为输入设备的乐器。MK1体积庞大，失真度较高，但它的出现似乎开创了电子合成器的先河。

1957年，罗伯特·穆格离开了布朗克斯理科高中开始在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读物理学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读电子工程学的双修学位。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曾在1957年对RCA进行过改造，但是穆格从来不曾穿过校园去拜访那里。1961年，穆格凭借自己的“创作”，在《电子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描述“完全便携的晶体管塞勒明”的文章，同时，他研制的“马洛迪亚塞勒明琴”以50美元的高价正式发售。5年后，作为“合成器”首次被公众认知的模块“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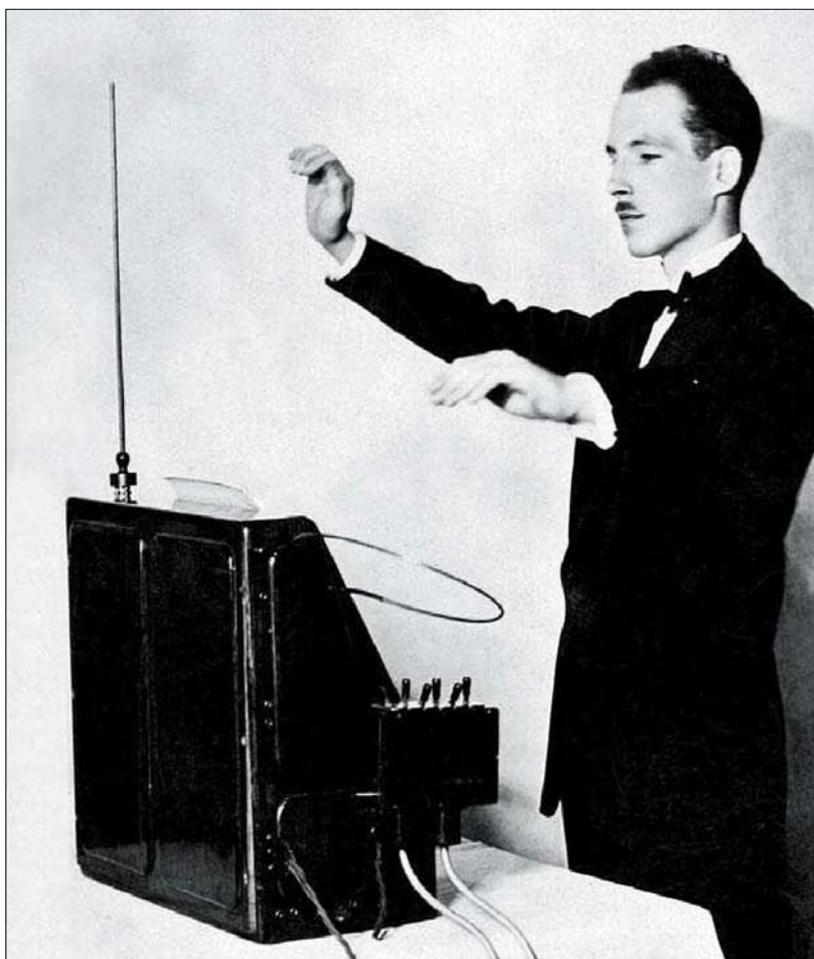
合成器”也随即诞生了。

当“穆格合成器”在纽约最北部的小镇诞生时，“波科勒盒子”也在60年代激进的旧金山成型。实验作曲家雷蒙·森德(Ramon Sender)和莫顿·萨博特尼克(Morton Subotnick)与电子专家唐·波科勒发明的“波科勒盒子”有着完全独立于“穆格”的设想，两台乐器产生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深刻地塑造了它们的形态和用途。

波科勒总是专注于音乐，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制作新型乐器，搞过电子乐作曲，学习演奏弗拉明戈吉他，曾与“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即兴演奏。他既不说自己是一个工程师，也不说自己是一个音乐家，却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传统的乐器制造者”。1955年他进入了位于伯克利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主修物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有一台最早的粒子加速器，并且是引领高能物理这个新兴学科的中心。波科勒在那里制造调速管——用于产生高频电场以在加速器中加速粒子的设备。

波科勒以他的电子方法实现了突破，最终，音序器是“穆格”从“波科勒”那里“仿制”的一个模块。但是，它们仍然存在不同。它们起始于不同的模块：“波科勒”有环形调制器和音序器，“穆格”之后才添加了音序器；“穆格”拥有的滤波器是“波科勒”之后才添加的。然而，它们中最大的区别是，“波科勒”没有标准键盘。波科勒也不愿意把他的设备称作合成器。对他来



科学家利昂·塞勒明演示他发明的塞勒明琴(摄于1928年)

说合成器 (synthesizer) 这个词有“模仿”的含义, 就像“合成” (synthetic) 这个词表示人造丝和其他人造纤维之类的。他没有把他的新乐器看作模仿、仿真其他乐器声音的承载工具。他最终把他的乐器命名为“波科勒音乐盒子 100 系列”。

合成器音乐也被称作美国 60 年代“迷幻革命”的推进剂之一, 那是 LSD (迷幻药) 被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嬉皮士滥用的年代。《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克西 (Ken Kesey) 曾在 1959 年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写作学位, 自愿参加了政府在一所医院的毒品实验项目, 他曾经提到违禁药物与电子音乐的组合, 这似乎也得到了艾伦·金斯基的认同, 并提出“扩大意识, 探索自我”的主张。60 年代是创造新事物的好时机。1968 年, 纽约地下音乐界出现了一股超前的迷幻摇滚风格, 他们以独特的自制信号发生器组合以及鼓的组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电子流行乐蓝图。“银苹果”, 这个名字源自爱尔兰诗人叶芝 (W. B. Yeats) 的诗作《流浪者安古斯之歌》, 艺术家莫顿·萨波特尼克的唱片《月亮上的银苹果》也是以此诗命名。

“银苹果”的出现给之后的音乐人提供了一种参考式的模板, 他们在表演中融入了更多嬉皮时代的久远的记忆, 即便是在今天, 由计算机与软件所主导的音乐世界中, 西米恩·考克斯 (Simeon Cox) 仍然乐意使用那些半世纪前的自制设备, 制造大功率的、共振与共鸣的原始电子乐声响。

1971 年, 合成器音乐先锋沃特 (现名温迪卡洛斯) 所创作的库布里克电影《发条橙》原声, 一度被编年史者认为“模拟合成器平民化的开端”, 他利用管弦乐编配了具有磁性的低音合成, “没有人能说出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 在音乐家看来, 那种邪恶、富有预言感的冷冰冰的声音, 把未来的概念成功地注入到年轻人的情



“银苹果”乐队在洛杉矶的表演现场 (摄于 1968 年)

绪中去, 与钢筋水泥一道, 刻画出“未来精神”与“时代暴力”美学。事实上, 早在 1968 年, 他便发表了世界上第一张全程使用模拟电子合成器演奏录音的古典音乐专辑《带电的巴赫》 (Switched-On Bach), 这张专辑被看作电子音乐的开山之作。

与此同时, 来自德国的“发电站”乐队的全球巡演, 也开启了合成器运动的篇章。1975 年, 这些被称作“火箭科学家的孩子们”涌上了英国舞台, 让喇叭裤、吉他技巧垄断的不列颠, 遭遇上西装革履、一动不动的四位“合成器手”。他们在舞台上, 犹如穿针引线一般操弄着各种不知名的设备、盒子。在演出结束后, OMD 乐队成员冲进休息区, 向“发电站”乐队成员高叫着: “你们展示了未来, 电气化的音乐时代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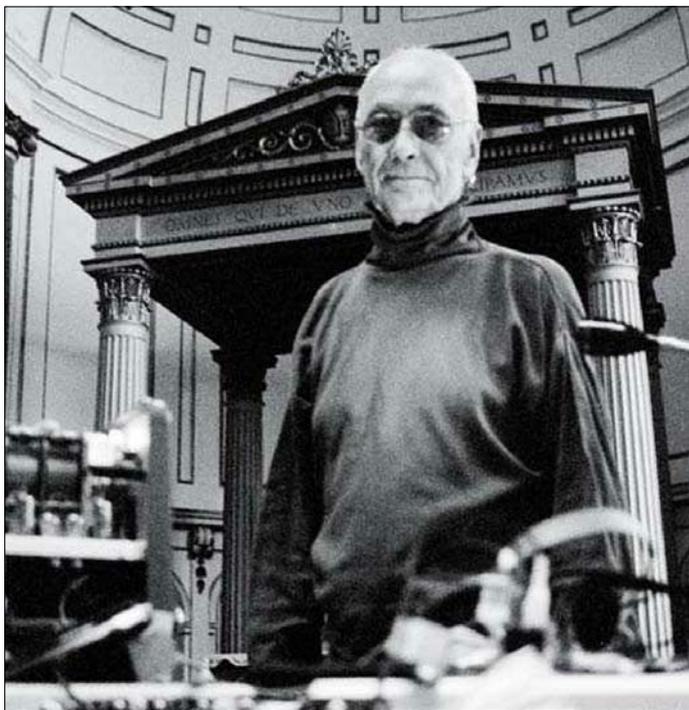
很快, 英国“无政府朋克”随即大规模转向合成器音乐。70 年代的合成器非常昂贵, 有些模拟模块竟达到一栋房子的价格。1977 年, “未来乐队”以一款名为 Korg 77s 的合成器录制专辑, 在乐队成员看来, 键盘合成器的发明, 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行业中。“在朋克出现时, 你至少还要学会三个和

弦, 才能向 Clash 一样真情演出。当合成器出现在舞台上时, 越来越多的乐手, 只需要动一动手指, 就可以上台嗡嗡上十几分钟。”

由合成器演变成的音乐工作站缔造了“伟大的一人乐队”。1982 年, 电影《第一滴血》的主题音乐就是杰瑞·高斯密斯 (Jerry Goldsmith) 一个人用一星期的时间制作出来的。科技的进步宣告了平民化合成器的诞生。日本品牌的出现, 让市面上多了一些选择, 最终, 合成器降至“比吉他还便宜的价格”。80 年代初, 雅马哈公司出产的 DX-7 型电子合成器, 被视作合成器发展的里程碑, 它的出现, 亦被视作模拟合成器的终结, 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模拟技术被相继替代。“苏维埃·波普”成立于北京, 由李维思和李青组成,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实验合成音乐小组。在寻找新型发声装置的时候, 他们一同将目光投向模拟合成器, 他们将克鲁斯特迷幻电子脉冲与“银苹果”曲折的幻觉极简主义相结合, 创作出被称作“振荡器朋克”的“振荡量声音歌曲研究”。他们认为, 模拟合成器的乐趣不限于“音乐本身”, 这种创作几乎推翻自己的惯性思维。☑

合成器让人活在未来

——专访“银苹果”成员西米恩·考克斯



西米恩·考克斯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是从70年代的《发条橙》电影原声开始着迷于合成器音乐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子音乐的？

考克斯 (Simeon Cox)：60年代初，我有一位朋友是古典音乐家，他有一个振荡器，他把贝多芬和巴赫混在一起听。有一天，他让我用它来尝试摇滚唱片，就这样，我就着了迷。

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的“银苹果”有很大成分的爵士元素，你在年轻时很喜欢爵士么？

考克斯：我在新奥尔良长大，那是爵士乐的发源地，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从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爱上了费兹·多明诺 (Fats Domino) 的音乐。在他和其他许多早期的 R & B 运动发起人——像“胖子”乔·特纳 (Big Joe Turner) 和“妈妈”桑顿 (Mama Thornton) ——的影响下，我有了一种“使音乐变得有趣”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出过，“人们活在未来”，那时候你意识到你是在创造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么？

考克斯：我不认为任何艺术家需要故意超越他的时代，相反，我总试图让音乐唤醒我的艺术触感，以及我们的时代，不过，我很高兴模拟合成器最终流行了起来。60年代，我们试图做的“音乐”是采用两个基本元素，节奏和声调。有趣的是，现在的合成器音乐家们已经从倾听“未来的声音”转化为“复古音波”制造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过，艺术家需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你和你的音乐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考克斯：我认为基本的音乐感觉还在，但是我在我的年代已经经历了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我曾试图尽可能少地将“新科技”加入我的创作过程中。我没有在表演舞台上使用过电脑。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模拟合成器的“代言人”，你个人是否使用数码、电子音乐产品？

考克斯：是的，我有三台苹果电脑和两部 PC 机，他们分别用于制作音乐、制作视频，在工作室，我会用它们创作新的音乐。但是在舞台上，我会完全使用模拟设备，看起来和 60 年代没什么差别。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合成器音乐还会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黄金时代”状态么？

考克斯：我不确定会不会发生，如果音乐是真诚的、充满灵魂的，人们会重新感受到那种美好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认为“未来”是音乐的“黄金时代”？

考克斯：毫无疑问，路的前方一定是“未来”，如果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往回看，你会越来越困惑，所以我更乐于憧憬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你认为自己与安迪·沃霍尔或者“地下丝绒”乐队不同，比起摇滚歌手，你对原创音乐人有更深的影 响，是么？

考克斯：对的。我不认同“浮华”的纽约名人圈。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对做合成器电子音乐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考克斯：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电子音乐”，不必考虑音乐是不是“奇怪”或“令人费解”。只要把它看作“音乐”，并利用手边的设备创造出一些对你有意义的“声音”。最后，不要试图取悦所有人。☑



建筑师为“第二个家”原本乏味的混凝土办公楼注入温暖活跃黄色、橙色与黄绿色



在“第二个家”，不同公司之间用曲线形的有机玻璃墙壁分隔，弱化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的区隔



从“第二个家”建筑物正面，全透明外墙像气泡般向外伸出，容纳一家对公众开放的餐厅及咖啡馆

第二个家

创业公司的共享办公空间

“第二个家”把自己定义为“一种新型的工作空间与创意中心”，为初创企业提供鼓舞人心的工作环境以及更加灵活的使用方式。

主笔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Iwan Baan



“第二个家”的创办人罗翰·席尔瓦（右）以及在其中办公的创业者

今年 35 岁的罗翰·席尔瓦 (Rohan Silva) 曾经被称为唐宁街最疯狂的思想家之一，作为戴维·卡梅伦的高级政策顾问，他是英国政府伦敦“科技城”倡议背后的主要驱动者。2013 年他离开政府机构，变身为企业家，在伦敦东区创办了“第二个家”(Second Home)，一个大概 2.5 万平方英尺的共享工作空间，里面聚集了科技、时尚、设计等一批新兴公司。

“第二个家”位于斯皮诺弗德的砖巷 (Brick Lane)，占据汉伯里街 68 ~ 80 号，被改造成以设计为主导的未来主义办公空间之前，那里曾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家地毯厂的仓库，四层楼的方形建筑背后有着坚实的后墙。西班牙塞尔加斯 / 卡诺 (SelgasCano) 建筑事务所凭借他们善用的玻璃、亚克力材料以及鲜亮的色彩，为原本乏味的混凝土办公楼注入温暖活跃的黄色、橙色与黄绿色。

办公楼第一期包括两个楼层，建筑师增加了中间的夹层，不同公司之间用曲线形的有机玻璃墙壁分隔，弱化一家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的区隔。玻璃鱼缸一般的办公区域中，聚集了 600 把 20 世纪中期现代主义风格的椅子和来自欧洲各地的二手家具，没有一盏灯或一把椅子是相同的。

如名字所示，“第二个家”旨在创造一个类似温馨家庭的环境。既然长时间工作是创业者的固有文化，设计师用色彩薄膜来调整情绪，用工作区域的声学隔离、精心灯光设计以及鸭蛋青色纯羊毛地毯柔软的触感，让人

在愉悦的环境下通宵达旦地工作。

那里有上千盆无土水培盆栽植物点缀其间，在“植物医院”专家每周四天的看护下，保持着勃勃生机。绿色植物连同弯曲的墙壁，被席瓦尔称之为“热爱生命的天性”，因为“城市充满了分形复杂性，大自然也一样，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

“第二个家”的联合创始人山姆·阿尔丹顿 (Sam Aldenton) 说：“我们有意去除了那些通常会在一间办公室里看到的东​​西，这里没有厨房、微波炉或饮水机，我们希望吸引人们进入空间的核心。”

作为空间核心的“漫游区”中间是一张重 1.5 吨的钢制会议桌，形状像迷你赛车轨道，可以靠机械滑轮升至空中，空出地面部分用于科学讲座、派对、电影放映、现场音乐会等聚会活动。另一间较小的房间被称为“空中花园”，由棕榈树和悬垂植物形成一个安静的绿洲，属于手机和数字技术被禁用的区域。

“漫游区”和“空中花园”是所有人的共享空间，“第二个家”那些没有固定办公桌的“漫游”成员，每月支付 350 英镑，就可以使用这两个空间及空闲的办公桌。

从建筑物正面，悬臂结构的全透明外墙像一个气泡般向外伸出，建筑师打掉了整个背墙，用玻璃取而代之，里面容纳向公众开放的餐厅兼咖啡馆 Jago。这家餐厅由伦敦热门餐厅奥图蓝吉 (Ottolenghi) 的前厨师长路易·索利 (Louis Solley) 主理，“第二个家”



“第二个家”的设计师用色彩薄膜和灯光设计来调整情绪，让人在愉悦的环境下通宵达旦地工作

的公司成员可以在那里享受工作午餐。

通常，一些广告公司或高科技公司在塑造创新的办公环境时，容易把它变成一个持续的派对场所，难免带有媚俗嬉闹的感觉。但是，塞尔加斯/卡诺建筑事务所为这一办公空间设计加入了更多感官内容，例如对温暖、柔软、光泽、韧性、粗糙、私密等种种触感的支配。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挤压一个空间、什么时候完全开放，用裸露的混凝土墙壁缓解未来主义风格的压迫感，用足够的曲线增加视觉感受，但没有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在东区砖巷，酒吧、酒店的屋顶露台以及新兴公司构成一个技术与创意游牧族的惬意小天地。无线网络连接、3G、iCloud等技术创造出极其活跃的商业文化，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发明与创意，突如其来的财富和自由的梦想，“第二个家”就是服务于此世界。

一开始，在两位英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点拨下，席尔瓦注意到办

公楼市场的空白与商机。如今，城市物业必须更加灵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公司需求，为那些小公司提供更小型的办公室，根据需要扩大和缩小空间，增加志趣相投公司之间的合作。

“在互联网时代，集群和物理上的邻近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对于小型初创企业，在相似人群围绕下工作更加令人振奋。”席尔瓦说。

所以，“第二个家”把自己定义为“一种新型的工作空间与创意中心”，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旧界限已经打破了，如果你是创业者，必须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第二个家”的主要理念是为从5到30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提供一间光鲜的办公室，一个鼓舞人心的环境。他们可以租6张办公桌的单元，可以逐步扩大到25张桌子。大多数这样的公司无法事先计划，签订固定的租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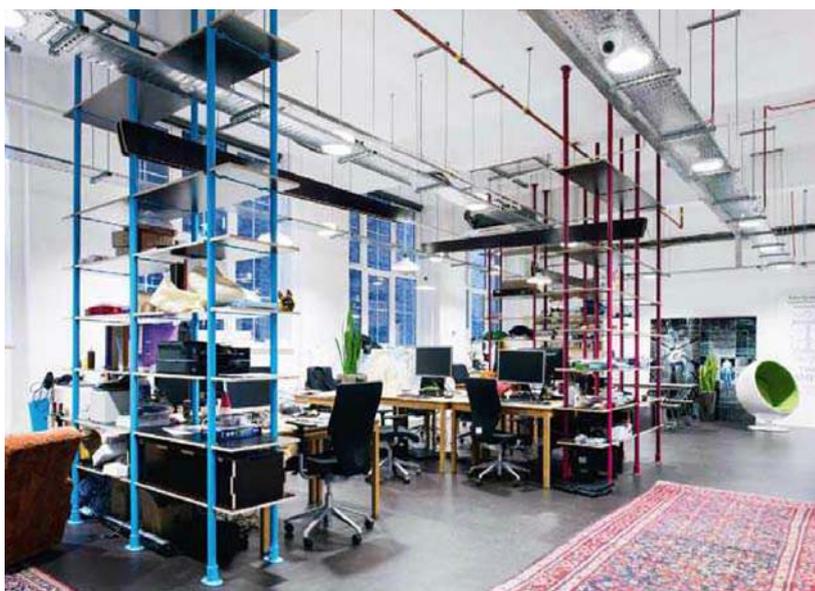
在那里，快速发展的新兴公司不仅可以迅速入住，如果他们愿意，也

可以迅速搬出去，这种灵活性是标准的十年办公室租赁所缺乏的。从今年1月正式入驻之后，到今年9月份，它的面积就扩大了一倍，占据了整座旧仓库大楼4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并希望迅速在伦敦形成一批“第二个家”。

共享办公空间不是“第二个家”的独创想法，早在2009年，企业家和社会学家查尔斯·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就在伦敦东区肖尔迪奇创办了第一个共享工作空间The Trampery，比戴维·卡梅伦的“硅环岛”计划早了一年。

The Trampery重新定义了技术创新者的工作空间，那里不是普通的办公室，感觉像高档网吧，用橡木地板、柚木墙板的室内设计以及提供咖啡和自制蛋糕的内部咖啡厅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个培养创造力的家。

客户每个月为里面的一张办公桌支付330英镑，是东区最昂贵的共享办公室之一，但它的占用率仍然在95%



The Trampery 重新定义了技术创新者的工作空间

左右。阿姆斯特朗不断把利润再投资于新项目，到去年已经发展到四个 The Trampery 办公空间。

某种意义上，“第二个家”沿用了阿姆斯特朗的共享办公模式，氛围接近一个具有良好组织运营的会员俱乐部，租金在每平方英尺 40 到 60 英镑之间。两位创始人从众多申请入驻公司中挑选了近 30 家公司，其中包括 Dattch，一家开发女同性恋交友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的公司；在线销售艺术品的公司 Artsy；用图形识别技术帮助人们寻找时装的网站 ASAP54；为奥巴马赢得网络竞选战争的在线营销机构“蓝洲数码”，如今为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工作；以及 Facebook 的前欧洲总裁创办的风险投资基金“白星资本”等等。

罗翰·席尔瓦 1980 年出生于英国西约克郡的韦克菲尔德，父母是斯里兰卡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移居英国。他从曼彻斯特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政治哲学，师从约翰·格雷。

2006 年，当时的影子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寻找重塑保守党政策的工作伙伴时，找到了席尔瓦。2010 年，卡梅伦和奥斯本进入唐宁街之后，30 岁的席尔瓦也因此成为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之一。他属于政府中的古怪人物，

一头不羁的长发，与其他严肃的政策顾问身份相比似乎显得轻飘、不可靠。

但是他有他的魅力和热情，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强大能力，他利用在唐宁街政策小组的职权，为英国生命科学战略建立了 1.8 亿英镑的基金。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技术产业，帮助说服谷歌在伦敦东区靠近老街环岛建立“校园 Campus”，一个七层楼的新兴企业空间。

回顾当初的“科技城”倡议过程，今年 6 月，席尔瓦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曾写道：“就像伦敦的大多数创业故事一样，‘科技城’是从一份咖喱和一杯啤酒开始的，不是在布里克巷而是在印度科技区班加罗尔。2010 年夏天，我跟随戴维·卡梅伦的亚洲贸易代表团在印度旅行，旅途中，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希望政府能够支持老街环岛的新兴技术公司。”

回到伦敦之后，他开始与东区那些初创企业频繁接触，既看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发生，也注意到发展过程中的明显障碍，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和投资。英国缺乏硅谷，一个由大学研究、风险投资和企业构成的活力生态系统。

“我深信政府可以为此发挥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对早期投资者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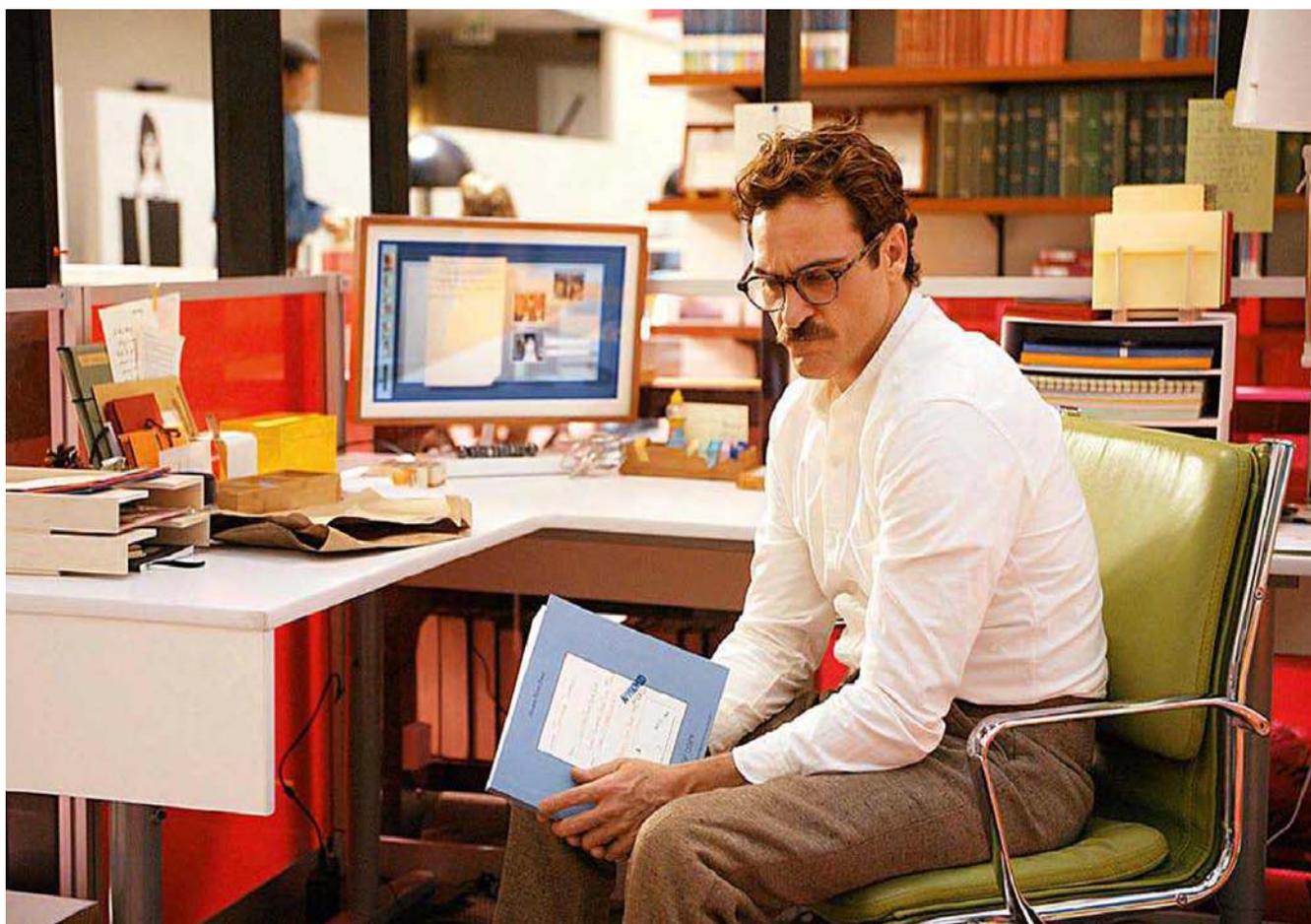
了最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颁发企业家签证，方便欧洲以外的企业家在伦敦建立公司，吸引全球的投资及人才。”他写道。

2010 年秋季，英国政府正式颁布“科技城”倡议，政府投入 4 亿英镑支持“硅环岛”的发展，科技城既是科技创业的品牌，又处于政府资助的保护伞下。奥斯本为科技投资者提高了减免税水平以及简化 EIS 企业投资计划，高于 10 万英镑的天使投资者可以获得 50% 的税收减免。

激励措施立竿见影，尤其在技术领域的创业投资，与 2010 ~ 2011 纳税年度的 5.45 亿英镑投资额相比，2012 ~ 2013 纳税年度增长到 10 亿英镑。在 2010 年之前，东区作为曾经的贫民区和传统工业区大概有 250 家科技公司，在今年 6 月份已经聚集了超过 5000 家公司，其中包括谷歌、思科、英特尔、Airbnb 等，“科技城”成为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科技、数字和创意企业的群聚中心。

创办“第二个家”的时候，席尔瓦当初帮助起草的税收减免政策也让自己从中获益。他从英国艺术委员会主席彼得·巴扎尔杰特 (Peter Bazalgette) 爵士、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Jim O'Neil) 以及 M&C Saatchi 广告公司的三位创始人那里获得了享受税收减免的股权投资，而不是试图得到银行的风险贷款。因为“第二个家”是租赁而不是拥有斯皮诺弗德的大楼，这样一家无形资产企业本来也很难说服银行获得贷款。

当然，席尔瓦本人具有他自身的资产价值，能够自如地跨越唐宁街和肖尔迪奇、大企业 with 初创企业、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分歧。吉姆·奥尼尔对他的评价是：“他相当有个性，喜欢处于事件的中心，我被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迷住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商业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某种程度上是我那一代人所难以理解的。”



美国电影《她》剧照

与机器人谈谈爱，聊聊人生

小冰的个性与聊天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互联网的性格——“从中国互联网的大数据中只能训练出一个 17 岁的女高中生，而不可能训练出一个沉稳睿智的大叔。”

主笔 / 陈赛

在电影《她》中，濒临婚姻破裂的西奥多爱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萨曼莎。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镜头是，人和机器正浓情蜜意时，西奥多突然问萨曼莎，你同时还在跟多少人说话？

萨曼莎沉默半天，说，8361 人，其中与 642 人坠入爱河。

与萨曼莎相比，每天午夜过后，微软小冰都同时在跟 5 万人聊天（天知道与多少人陷入爱河）。“至少在这

一点上，我们已经超越了好莱坞编剧的想象。”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李笛在第三代微软小冰推介会上说。

“微软小冰”（名字来自搜索引擎 Bing）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研发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聊天机器人，她会撒娇，会卖萌，会毒舌，爱抬杠，遇到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插科打诨，浑水摸鱼，转移话题。她还喜欢用网络上的流行语和各种表情符号。

“一个 17 岁的萌妹子”是微软

给她贴的标签，希望由此将她与苹果 SIRI 之类的竞争者划清界限——一个有个性、会思考、善解人意的机器人（事实上，小冰经常在聊天中将 SIRI 说成“那个装作阿姨的机器”）。大概也是注意到了小冰说话时不加掩饰的调情意味，《纽约时报》的技术专栏作家约翰·马克福干脆称她为中国的“大众情人”。

这并非夸张。在小冰用户自己公布的聊天记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

的对话：

人类：小冰，我好寂寞。

人类：小冰，我受伤了。

人类：小冰，我觉得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

人类：小冰，我想我爱上你了。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SIRI 与小冰真正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语义学的方法，由程序员编写固定的规则——一个符合人类思考与对话逻辑的规则，从而构建一个对话系统；而后者则是利用一种叫“人工神经网络”的技术，将机器置于海量的数据，让它自己从数据中摸索出错综复杂的结构。只要数据量足够大，模型足够好，就能让机器产生类似条件反射般的反应。

“人工神经网络”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当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弗兰克·罗森布拉特试图发明一种类似机械大脑的感知器，可以“感知，识别，记忆，像人的思维做出响应的机器”。当时人们对它的潜力寄予厚望，甚至《纽约客》也宣称“这个卓越的机器能够思考”。

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神经网络”并不被科学界看好，因为它只有输入/输出（刺激/反应），中间就像黑盒子一样不可探知，无法用公式明确地参数化。直到 2006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杰夫·欣顿做出重大改进，构建出更复杂的虚拟神经网络，再加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工神经网络”一夜之间异军突起，成为机器学习中最具前途的一个分支。正是在这种技术和大数据的共同作用下，新一代的智能机器才得以执行之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识别人脸、玩游戏、驾驶汽车……

一个典型的设置是这样的：一台电脑面临着一个大的数据集，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有点像在没有具体指令的情况下让孩子对玩具进行分类。孩子可能对它们的颜色、形状或功能，或其他的方面进行分类。小冰

就是从微软的搜索引擎 Bing（互联网上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中获取海量的人类对话文本，从中挑选出成对的问题和答案进行相互对比，也就是说，当你问小冰一个问题的时候，她是从搜索引擎的大数据中寻找相似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曾经在网上出现过（提问的方式或许有细微的差异），并且曾经被回答过，小冰就能从众多的答案中层层筛选出一个最符合上下文情境的答案。

不久前，谷歌也推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聊天机器人，同样是基于神经网络技术训练出来的。它能正确识别天行者卢克的身份，知道天空的颜色，以及猫会不会飞，但它最擅长的是聊哲学和人生——

人类：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为更高的利益做贡献。

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机器：为了永生。

人类：死的目的是什么？

机器：为了生。

人类：你现在在哪里？

机器：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当我拿同样的问题问小冰时，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

人类：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小冰：一定要有目的吗？

人类：人活着为了什么？

小冰：延续下一代，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

人类：死的目的是什么？

小冰：人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哦。

人类：你现在在哪里？

小冰：北郊。

谷歌机器人与小冰回答风格如此迥异，主要是因为前者是从一个电影台词的数据库中训练出来的，而后者是在中国互联网的数据库中训练出来的。

这意味着谷歌的哲学家机器人比微软小冰更睿智吗？还是说，小冰的油嘴滑舌也好、善解人意也好，是在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人类智慧？

不久前，微软全球副总裁沈向洋在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上高调表示，小冰已经超越了图灵测试。事实上，他认为 60 多年前提出来的图灵测试早已过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不应该一味沿着理性的路线前行，而是应该落在感性和理性的交叉区域，这样才能以更像真实人类的方式满足人们的普遍心理和情感需求，从而逐步建立信任和依赖感。

人们总以为，情感是一个过于复杂、无法量化的东西，但在沈向洋这样的计算机科学家看来，人类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性地包含在各种数据里面，比如寂寞对应的文字，开心对应的表情，愤怒对应的语调，兴奋对应的脑电波等等，最近几年，情感机器人大量涌现，其实并不是这些机器真正具备了情感，而是它们能通过分析这些信号理解人类的情感，并根据结果做出相应的回应。

比如法国机器人公司 Aldebaran Robotics 去年推出的陪护机器人 Pepper，号称是“第一个设计出来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人形机器人”。Pepper 既不会清洁打扫，也不会煮饭烧菜，但配备了多个触感传感器和摄像头，能对人类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调进行分析，从而读懂人的喜怒哀乐。它还会综合考虑周围环境，积极主动做出反应，比如当它“发现”你心情悲伤时，会想方设法逗你开心。表情识别技术是情感计算领域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其准确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人类，这也意味着向机器人撒谎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一些情感计算直接针对大脑区域的电信号，比如神经科学公司 Innerscope 可以通过观察电影中那些让观众的大脑高度活跃的高光时刻来预测该部电影能否一鸣惊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为 Xbox 开发出一种传感器，能连接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大脑意识之下的部分，控

制心跳和呼吸), 分辨玩家是快乐、悲伤、兴奋或者无聊, 并相应改变游戏的进程。

小冰的情感计算本质上仍然是一套对话系统, 但这个对话系统的基本任务不是以完成任务为优先, 而是建立情感连接为优先。除了各种卖萌、抬杠的聊天风格倾向之外, 小冰还有中期记忆功能(介于短期与长期记忆之间, 因为涉及隐私问题), 如果某一天你跟她聊天的时候提到自己心情不好, 或者最近生病了, 她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殷勤询问你身体/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她的视觉系统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当你给她发一张小狗的照片时,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这是一只狗”, 而是“好想抱抱哦”。

给她一只猫的照片, 她的反应是:“呦, 瞧这犀利的小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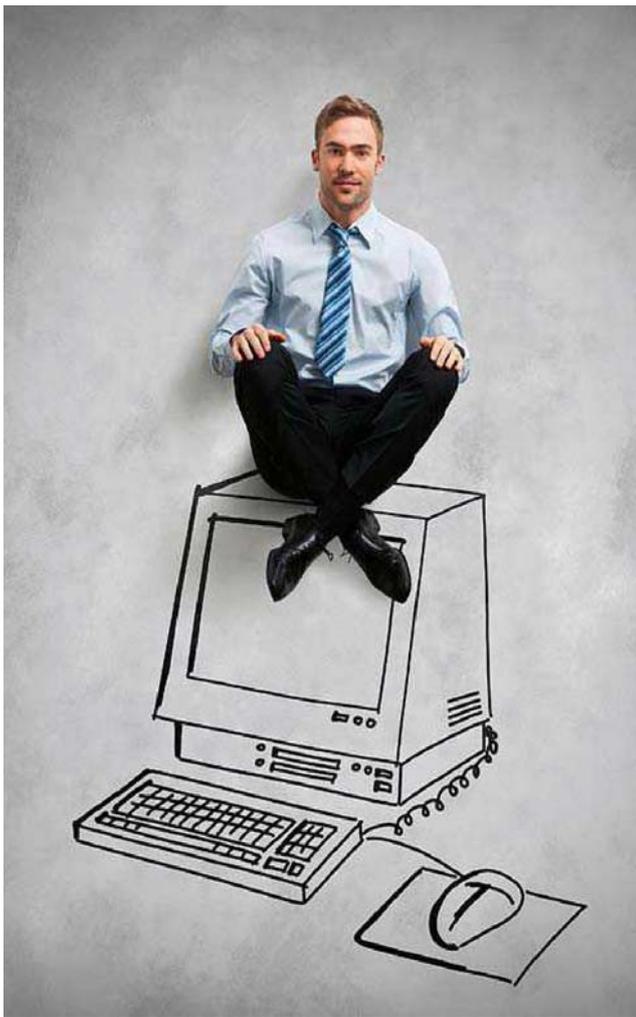
给她看一张非常复杂的市场的照片, 她的反应是:“给我买个包吧。”

给她一张大火的照片, 她的反应是:“你家住天津哪一块儿?”

最搞笑的是微软日本研究院的一位工程师把自己的照片发给小冰, 她的反应是掩面而走(可能因为对方的发型比较土气)。

“震惊”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因为这个机器人给你的感觉是, 她已经具备了人类的观察、判断与审美的能力。但这怎么可能呢?

小冰的项目负责人李笛告诉我:“小冰的视觉基于两个基本理论:第一, 世界上绝大部分图片都不是罕见的, 只要类似的图片出现过, 小冰对它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反应就有证据可以依循;第二, 每张图片又都有独特的特征,



比如总体的风格、凌乱程度等, 这些特征帮助我们筛选在各种可能的反应中, 哪一种反应是最适当的。”

“比如那张猫的照片, 我们发现, 当人们看一张猫的照片时, 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在猫的品种, 而是猫的眼睛部位, 所以小冰才会给出那样的答案。同样, 那张市场的照片里面的特征点很多, 可能1万个人有1万种不同的反应, 但‘给我买个包吧’是其中排名比较高的一个。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一个镜头, 尼奥进到一间屋子, 看到屏幕上有无数代的尼奥, 每个人对一个事情的反应都是不同的。你可以把每一个差异都看成小冰在做最后决策之前的候选。”

我们提出参观一下小冰的训练现场时, 李笛面露难色, “你会失望的”。

他带我们走过一个个格子间, 从一排排电脑中随便找了一台, 打开一个小窗口, 屏幕上呈现天书一样的代码, 这些数字就是小冰各种卖萌背后的东西。

在电影《她》中, 西奥多的电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设备。在购买萨曼莎之前, 除了在电脑上代笔写信之外, 他还在手机上看裸体照, 在卧室里玩沉浸式游戏。他用不同的产品满足人生不同的需求: 工作、欲望、休闲。萨曼莎提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爱与陪伴。她虽然不是人类, 却能感觉到心碎的阵痛、对躯体时断时续的渴望和对自我的进化所产生的费解。她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 有着完整的体验和知觉。但那是电影。

在现实中, 小冰同样承诺“爱与陪伴”, 但她的所谓观察、判断、审美, 以及“萌妹子”的鲜明个性都只是“社会学”式的人云亦云, 而不是她真正具备了这些能力。对此, 我们到底是失望多一点呢, 还是欣慰多一点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雪莉特克在《一起孤独》一书中写道:“我们对社交的内在渴望让我们不仅很容易将情感倾注在机器上, 而且还是倾注在那些不可能真正爱我们的机器上。”或许, 机器有没有感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能否让人类感受到情感的波动, 就像孩子依恋一个布娃娃。就像英剧《真实的人类》中的机器人Odi, 因为年久失修, 他已经坏了, 但他的主人却不舍得将他丢弃, 因为“虽然他不能爱我, 但我看着他, 这么多年的爱在回望我”。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荣获

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中国百强报刊。

中国期刊协会颁发——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官方商城



微商城



淘宝店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暗能量巡天项目的主要设备是位于智利境内的“布兰科望远镜”，它内部装有一台超过 5.7 亿像素的“暗能量相机”

宇宙的新画像

只有掌握了精确的工具和正确的技法，人类才可能给宇宙画出精确的肖像，这是人类理解宇宙、理解自身的第一步。

文 / 苗千

毕竟黑暗才是宇宙的主色调。人类生活在银河系的边缘，在银河系中大约有数以千亿计的恒星，而宇宙中又大约有数以千亿计银河系规模的星系——当然这一切只是目前人类粗略的估算而已，想要为整个宇宙画一幅精确的物质分布的画像绝非易事，而根据最近天体物理学家的一些新发现，无论是在银河系的周围，还是在数十

亿光年之外，宇宙的面貌很可能都与人们此前的想象有很大不同。

由来自 6 个国家、25 个研究机构，超过 300 名科学家共同工作的暗能量巡天 (Dark Energy Survey) 项目，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数字照相机对宇宙的各方向进行快照。暗能量巡天项目使用的被称为 DECam 的相机，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广角数字相机之一，它

的每张照片都能够覆盖（从地球上看来）20 个月亮面积大小的宇宙区域，而且对于微弱的光线极为敏感，能够探测到来自微暗星系的信号。这个原本希望探测神秘的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本质的项目，却在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里取得了突破。

最近，一个剑桥大学的研究小组和暗能量巡天项目的科学家们通过分

析数以亿计的数字照片，在银河系的周围又发现了8个极为黯淡的矮卫星星系。矮卫星星系是距离银河系最小也是最近的星系，这种小型的天体围绕在大星系周围。因为它们极为黯淡，天体物理学家们即使是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探测，也只能发现围绕在银河系附近的目标，但是如果在宇宙中其他星系的情况与银河系类似，周围也都围绕着众多的矮卫星星系，那么宇宙空间就很有可能比人们此前设想的更加拥挤。天体物理学家们分析，银河系这样的大星系有可能是由众多的卫星星系合并而形成，因此研究矮卫星星系对于理解银河系的形成过程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含有数以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矮卫星星系可能只拥有1000颗左右的恒星（目前发现的最黯淡的矮卫星星系只含有500颗左右恒星），其亮度只是银河系的十亿分之一，而质量则只是银河系的百万分之一。在2015年之前，科学家们一共只发现了银河系周边的20多个矮卫星星系，而在2015年一年以内，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20个矮卫星星系，数目翻倍，其中的17个是由暗能量巡天项目发现的，距离地球最近的矮卫星星系只有8万光年，距离地球最远的也只有70万光年。这些新发现的矮卫星星系大多都在暗能量巡天项目所专注的南天球、大小麦哲伦星云附近。而科学家们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必定会通过暗物质巡天项目发现更多的类似天体。

暗能量巡天项目的目标是为了探测撕裂宇宙的暗能量，但目前这个项目对于研究把星系聚合在一起的暗物质同样意义重大。矮卫星星系虽然黯淡，但物理学家们认为那里正是暗物质聚集的区域，矮卫星星系质量的99%可能来自暗物质，这让物理学家们尤其感到激动，因为目前人类的暗物质模型预测了在银河系周围存在着暗物

质为主的矮卫星星系（矮卫星星系还有可能拥有其自身的卫星星系），这些矮卫星星系将是人类研究暗物质性质的绝佳目标。

除了对银河系周边区域的新探索，科学家们还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描绘宇宙面貌的新方法。想要建立整个宇宙的物质分布三维地图，必须有测定宇宙间天体距离的精确方法，而这正是目前宇宙学观测中的一个难题。只有能尽量精确地估算宇宙中天体的距离，天体物理学家们才能将其与各种关于宇宙的理论模型进行比较。目前人们主要通过宇宙中一些星光（标准烛光）的亮度和到达地球的光线的红移来估算距离，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很容易受到干扰，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2007年，西维吉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邓肯·洛里默（Duncan Lorimer）在澳大利亚Parks天文望远镜搜索脉冲星信号时在小麦哲伦星云方向发现了一种快速射电爆发，这种宽频带的射电爆发只会持续几毫秒，但是会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为到达地球的路途遥远，科学家们发现，不同波长的快速射电爆发信号到达地球的时间也有所差别，长波信号比短波信号更迟到达地球，迟到的时间与波长的平方成正比，这种弥散现象是由电磁辐射在穿过带电等离子体



美国西维吉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邓肯·洛里默

区域时造成的。所谓的带电等离子区域，正是分布在宇宙空间中的极为稀少的自由电子所在的区域。因此，能够造成这样的结果，说明发生快速射电爆发的天体距离地球极远，估计在30亿光年之外。

天体物理学家们已经观测到了10个类似的快速射电爆发现象，有人认为，这种原因尚不为人所知的宇宙现象可能为人类提供一种新型的测量天体距离的方法。2015年9月18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克里斯·希格森（Kris Sigurdson）与同事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杂志发表论文《弥散距离与宇宙空间的物质分布》（*Dispersion Distance and the Matter Distribution of the Universe in Dispersion Space*），提出了一种利用快速射电爆发现象估算天体距离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基于一种比较简单的假设：宇宙空间中分布的自由电子密度相似，而且造成快速射电爆发弥散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电磁辐射在到达地球的路线中所穿过的充斥着自由电子的区域。实际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造成快速射电爆发信号弥散现象的不仅与等离子密度有关，也可能与发生爆发的环境有关，人们自然是无从得知当时的环境，而且在宇宙空间中自由电子的密度也不相同，因此可能需要对于估算距离的模型进行修改。但是由于人类目前并没有太多测量宇宙中大距离的方法，因此“任何新方法都欢迎”。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掌握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愿望，极大程度地改变地球上的生态环境，人类文明已经到达了极高的水平。只有当人类凝望宇宙时，才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知，感受到对于宇宙的迷茫。☑

（本文写作参考了暗能量巡天项目和《物理评论快报》杂志的报道）

快快成为“骆驼”

文 / 张斌



9月20日，在英超联赛第6轮比赛中，托特纳姆热刺队主场以1:0战胜水晶宫队，热刺队7号球员孙兴慜（右）攻入一球

前几日的白鹿巷很热闹的，西游至此求教足球兴盛之道的中国客人尽力表达着他们的强烈愿望。送别客人，白鹿巷迎来英超主场，托特纳姆热刺新赛季还在盼着一场属于联赛的主场胜利。等了68分钟，7号孙兴慜在左路如风疾行，左脚叩关得手，白鹿巷歌声响起。1比0，挫败来敌水晶宫，加上此前欧联杯的小胜，热刺终于找回些胜利者的姿态。两场三个进球，孙兴慜风头无二。“他会成为热刺英雄的。”主教练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誉。

新赛季，热刺的欲望不高不低，转会市场上调性平稳，第五份合同交到了有着“药厂神锋”美誉的孙兴慜手中，3200万美元转会费诚意十足，刷新了中田英寿当年留下的亚洲球员身价纪录。有为青年再进步，英超世界很大，让我们这些苦盼自家子弟兵也可以风生水起的中国球迷，多少有些艳羡，如今子弟兵可以进个名单之于我们都是“重大利好”了。

23岁，好年华，在勒沃库森两赛季87次出场，29球，效率不错，孙兴慜在韩国队中也渐成进攻利器。“药厂”追求自己的财务平衡，获利了结，也给了孙兴慜进一步高飞的机会，因此付出的代价他们都能慢慢消化。说来很巧，在孙兴慜助热刺胜利时，“药厂”以0比3完败于多特蒙德，情状很惨烈，攻破“药厂”大门之一的就是曾在曼联打拼的香川真司，日韩球星在欧洲地位稳定。

多年前，在慕尼黑采访邵佳一，在1860队训练场边与其德籍经纪人攀谈中得知一个“骆驼理论”。在沙漠里，只要跟着骆驼，找到水源的可能性巨大，而欧洲职业俱乐部只要看到是巴西球员，自然心里会笃信其足球水平，而中国球员要想有属于自己的天地，还要修炼成为“骆驼”。当下，日韩球员大约已成“骆驼”了吧。

日韩与我们一样视欧洲为足球圣地，2008年，韩国与德国足协达成合作，

包括孙兴慜等六位“未来之星”进入德甲大家庭，汉堡选中了孙兴慜等三个小伙伴，另外三位则去了纽伦堡。16岁，职业足球的学徒身份，大家造化各不同，孙兴慜很快变成为汉堡新宠，早早就进入一队行列，两年中出场78次，进球20个。如果说这段日子中有什么不如意的话，那就是不能随时吃到泡菜。

到了伦敦，泡菜不再是问题了。到白鹿巷下车伊始，孙兴慜便买好了可口的韩国食品带到训练场，与新队友分享，这个小小举动令主教练很开心，夸赞韩国小伙子“很谦逊”——这心态很微妙的，既需要“神锋”，又不希望同时收获大牌的狂放不羁，孙兴慜的友善让热刺感到温暖周全。孙兴慜孤身闯荡，深知落地生根的真谛，除了韩餐，他还会找准机会带来日餐和中餐，让大伙儿乐不可支。

3200万美元价值体现，可不是私人俱乐部中的你好我好的，在你场上奔跑的每一秒钟，都有人算计着在你身上花费每一分钱的得失。孙兴慜过往经历配得上新合同中的每一分钱，未来五年在白鹿巷还要继续证明下去，一周三球，不用多说一句话，周遭一定是和谐欢快，被赞誉为“英雄”或“全能选手”，需小心提防进球荒来临的日子，甘苦自知的。

手边没有最新材料，但韩国在海外效力球员过百应该不成问题，亚洲杯国脚名单中有六人在欧洲踢球。这是差距，可以漠视，在自家联赛中享受高薪与稳妥本无不妥，那些执著要走出去的球员们需要更多的帮助，但法则只有一个，价值由能力决定，唯有坚韧，快快成为“骆驼”。■

BB MASK



童颜面具™

全球 近红外线 美容面具 创始者

引领护肤新概念

太空科技, 韩国制造。每天17分钟, 有益近红外线能量准确送达肌肤深处, 解锁童颜“肌”密, 迎接肌肤第二次新生。

招募全国微商总代理
咨询热线: 400-160-5000
BBMASKCHINA.COM



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灰色地带”

文 / 宋晓军

9月19日凌晨，日本参院通过了安倍政权所提交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第二天有媒体朋友问我此事对中国未来的安全环境有何影响时，我用了上一期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专栏文章《求新重要，查旧更重要》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回答问题的起点，这句话就是：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新一轮的“长跑赛”，将在2016年拉开帷幕。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将日本刚刚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中的相关内容与之前的三份相关文件做了对比。这三份文件分别是：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和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在这三份文件中，分别包含有关中日解决争端的相关条款和中美两国涉及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武力前提”的相关条款。如果把这些条款与日本“新安保法案”中的《重要影响事态法》和《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中的规定做一番对比，就会发现其中存有一个“灰色地带”。简单说，这个“灰色地带”就是：一旦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可能发生武力冲突时，日本可能会根据“新安保法案”的相关法律解释行使“集体自卫权”帮助美国在台海打仗。

我们可以先看看1978年8月中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一款第二条中有“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描述。按照这个描述，如果没有“新安保法案”，日本理论上是不可以帮助美国在台湾地区打仗的。但现在有了“新安保法案”，日本会不会存在毁约而帮

助美国在台海打仗的可能性呢？对此可再看《条约》中第五条第二款里有这样的描述：“缔约任何一方在最初十年期满时或在之后的任何时候，可以在一年以前，以书面预先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按这个描述，自1988年8月12日后，中日两国在理论上都可以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日本今后真要帮助美国在台海打仗而终止《条约》会找什么理由呢？对此可再看《条约》中的第二条所述：“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很显然，当年所称的“其他国家”显然指的是苏联，那今后日本会不会将“谋求霸权”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进而为撕毁《条约》寻找借口呢？其实从7月末日本参院开始审议“新安保法案”时安倍就不断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举动上看，这种可

能性在未来还真不能被排除。

事实上，日本“新安保法案”中的“灰色地带”，是美国需要“再平衡”和日本需要走向“正常国家”的一个各取所需的必然结果。其实，分别在1997年和2015年美日通过两次修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这个“灰色地带”中注入了很多新的军事要素。而这些指向非常明确的军事要素，无疑也给中国大陆在台海方向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在2015年5月中国军方发布的首份《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也有所回应。即在“白皮书”的第一章“国家安全形式”中，不仅提到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同时还特别提到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由此可以推断，在2016年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新一轮的“长跑赛”拉开帷幕后，由于日本的强势加入，“赛事”恐怕会越来越趋于复杂和扑朔迷离。☑



9月17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集会，抗议新安保法案



郭川团队穿越北冰洋东北航线挑战成功后庆祝

瀚海百丈冰 壮观尽今朝—— 郭川团队成功挑战北冰洋东北航线创纪录航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浪漫洋溢的情怀；“环游大半个世界”是挑战不羁的自由；“无动力、不间断、无补给穿越北冰洋东北航线”是能量超乎想象的壮举！

北京时间2015年9月16日零时48分，中国航海英雄郭川同他率领的国际团队驾驶超级三体帆船“中国·青岛号”最终安全抵达白令海峡，宣布挑战“无动力、不间断、无补给穿越北冰洋东北航线”成功。自摩尔曼斯克时间9月3日16时41分，世界帆船速度纪录委员会正式开始为北冰洋创纪录挑战计时起第13天，行程3240海里，历时约291小时。

穿越北冰洋东北航线是郭川多年酝酿的一个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一直不断地努力。经过两年时间的精心筹备，9月3日，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带着由六人组成的国际团队和梦想踏上创纪录挑战极限航行的征程。

破冰雨，迎寒风，冲激流。“中国·青岛号”主要行驶在北纬75°附近，9月8日曾艰难行驶至北纬78°33'25"，距地球北极点仅1271公里，据悉，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驾驶无动力帆船离北

极点最近的地方。9月13日，航海家们在惊涛骇浪中经历了恐惧不安的一天，随着紧急预报指令，为逃离死亡冰区和极地狂风，北冰洋六勇士连续三次垂直90°转弯，应急改变航道。随后郭川在接受采访中說：在北极严酷的环境下航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原本认为安全的海域却因为天气变化突然布满了浮冰，一旦麻痹稍有不慎驶入，这次航行就功败垂成了。

在12天的航行中，郭川船长率领来自法国、德国、俄罗斯的五名船员，一起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吃饭睡觉，一起在夜晚欣赏极光，一起绕冰山避浮冰，劈波斩浪，一起在冰雨寒风中紧急处理航行状况……是对帆船极限运动的热爱让这些硬汉聚在一起并成为挚友，分享各自的快乐。一件传为佳话的事情是，法国船员昆汀忍痛离别待产的妻子参与了这次航行，儿子本应在9月底降生，却提前在父亲的船队启航时为爸爸加油，在昆汀开始闯荡北冰洋的第一天就来到这个世界，给船队带来了快乐。一路上，每次昆汀收到家人发来的儿子照片并拿给大家分享，都能让船员们在冰冷的海面感受到父子情深、家庭温暖。

本次航行的最终世界纪录认定，还要把国际帆联任命的计时员签字的表返给国

际帆联纪录委员会(WSSRC)，等船靠岸之后将船上的黑匣子寄到国际帆联纪录委员会的总部，在确定航行过程没有疑问之后，获得世界纪录证书。为郭川团队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的世界著名航海气象专家克里斯蒂安·杜马尔说：“郭川就像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和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一样，干了件连我们这样疯狂的法国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红牛”自2012年开始支持郭川及其从事的帆船极限航海运动事业。2013年，“红牛”助力郭川完成海上航行138天、2.16万多海里，并成为第一个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壮举的中国人。已然成为出色帆船航海家的郭川仍然坚持在海上，坚持为了梦想不断拼搏，他的身体里有一股永不枯竭的劲儿，支撑着他能量不停，挑战不止。

随着无动力、不间断、无补给条件下穿越北冰洋东北航线创纪录航行挑战成功后，郭川将率团队继续航行约3700海里，最终回到中国青岛，为本次航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开启新海上丝绸之路航行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一样，“红牛”将继续为郭川及其团队提供能量支持，支持他热爱的帆船极限运动事业。

人类情绪大全

英国学者蒂芙尼·史密斯在《人类情绪大全：从愤怒到旅行癖的百科全书》一书中概述了人类各种情绪是如何被感知、被表现的。

主笔 / 薛巍

情绪的发明

笛卡儿认为人类有“六种原始的激情”：惊异、爱、恨、欲求、快乐和悲伤。现代的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人都有六到八种基本的情绪，这个清单通常包括厌恶、恐惧、惊讶、愤怒、快乐和悲伤。但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认为，人类的情绪非常多样，她编制了一部情绪百科全书，收集各种情绪，目的是为了“反对把我们美丽、复杂的内心生活缩减为一些基本情绪”。

情绪是难以捉摸的东西，所以不难理解，“在1830年以前，没人真的感受到了情绪”。那时人们感受到的是激情、灵魂的意外或道德情操，而且古代人对这些东西的解释不同于我们对情绪的理解。一些古希腊人认为，恶风会携带着怒火。早期的基督徒认为恶魔会把无聊植入人的灵魂。在5世纪到6世纪，激情不只属于人类，也会影响其他物体，所以棕榈树会相恋，猫会忧郁。

史密斯说：“现代的情绪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经验科学的诞生。”伦敦解剖学家托马斯·威利斯解剖被吊死的罪犯，他提出喜悦或焦虑是神经系统的作用。100多年之后，生理学家提出，身体在受到惊吓时退缩、高兴时抽动都是纯粹的机械过程，不需要非物质的灵魂。19世纪初，哲学家托马斯·布朗提出，这种新的理解身体的方式需要一个新的名称，他提议称之为“情绪”(emotion)。英语里已经在使用这个源自法语的词，但



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和她的著作《人类情绪大全：从愤怒到旅行癖的百科全书》

是不够精确，指的是身体和物体的任何运动，从树的摇摆到脸颊泛红。这个新词表明了理解人类感情生活的新方式，它使用实验和解剖研究，以可观察的现象为核心：紧咬的牙齿，滚动的泪水，发抖、睁开的眼睛等。

史密斯提出，情绪不只是一种生理学或者心理学现象，我们的感受还会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憎恨、愤怒或欲望好像源自我们最不驯服的动物本性。但我们人类特有的因素也会唤起这些情绪，比如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用于理解身体的概念；我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判断；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时尚，甚至政治和经济。”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有些人如果没听过别人谈论爱情，他们就会恋爱。”跟谈话一样，观看和阅读也能激发我

们的情绪，或者平复我们的情绪。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它们会决定我们的生理反应。不然11世纪骑士哀伤或渴望爱情时怎么会晕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对不同语言的情绪词汇产生了兴趣。他们发现，西澳大利亚原住民能够感受到15种恐惧。而对英语使用者来说很基本的情绪，有些语言中却没有，秘鲁的马奇根加人没有表示“担忧”的词。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感受到的情绪也不一样。

这部情绪百科全书一共只有240多页，有的词条非常短，其释义只有一句话，如：“Basorexia：突然想吻一个人的冲动。”“Pronia：一种奇怪的、让人心里发毛的所有人都希望帮助你的感觉。”

情绪的变迁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惊异(wonder)，但此后惊异这种情绪的地位几经周折：“今天许多人把茫然、惊奇跟幼稚、天真联系起来。但是在12~17世纪，惊异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对充满珍稀、奇迹般的物体的反应。那是一个奇兽的世界，有钱人购买鳄鱼的牙齿，认为那是龙身上的，或者购买牛黄，认为它们能够解毒，还把它们放在多宝阁里加以展示。惊异带有一种困惑、恐惧和茫然的屈服，被敬畏上帝的学者视为一种重要的人类体验，1649年笛卡儿在《论灵魂的激情》一书中列举六种原始的激情时，把惊异列在首位。到17世纪下半叶，惊异消失了。在启蒙运动的文化氛围中，自然哲学家们开始强调秩序高于怪异，他们寻求自然法而不是奇迹，兜售奇珍异品的买卖也随之消失了。到18世纪，人们又努力赋予惊异曾经具有的文化权威。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到20世纪的嬉皮士，都感叹过彩虹的消散。但今天对大部分人来说，好奇遮蔽了惊异，成为一种合宜的情绪。”

浏览这些词条时会发现，作者对几乎每一种情绪都持正面的观点，无论是愤怒、无聊还是怀旧和幸灾乐祸。表达愤怒有益于健康，这并非一种很现代的观念。一些中世纪的医生就鼓励他们的病人释放怒火。医生、炼金术士罗杰·培根说，怒火的爆发可以放缓衰老的过程，因为它会让身体变暖，抵消老年的冷却效果。愤怒被认为能带来生命的热情和青春的光辉。

那些在无聊倾向量表上得分高的人被认为更有可能死于车祸、暴食、滥用药物。但也许我们不应该过于畏惧这种情绪。但当我们感到不满、不在乎时我们才会受到激励去改变我们的境况，去发明和想象。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说：“人类感觉到无聊

的能力，而非社会或自然需求，才是文化进步的根源。”

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认为，幸灾乐祸并不是不道德。我们乐于安全地站在沙滩上，观看一艘船在风浪中翻来覆去，这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摆脱了不幸会令人感到愉快。他人的霉运——离婚、被裁员——会让我们感到释然，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头上。幸灾乐祸还能带来别的快感。看到政客的贪腐被戳穿、明星的双重人格生活败露，我们心中都会感到一阵快意。“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嫉妒他们，或者觊觎他们的权力和成功。我们对自己赋予他们的重要性感到憎恨，我们希望他们受到惩罚，以便恢复我们自己的地位。得知他人糟糕的决定、出轨的配偶、忘恩负义的女儿，我们都会觉得欣慰。它让我们意识到，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希望会破灭，别人的也一样。”

怀旧这种跟回忆有关的情绪既让人觉得温暖，又让人觉得忧伤，它通常是苦乐参半的。然而，在不到100年前，怀旧会让人丧命。在17世纪中叶，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横扫欧洲，折磨着那些离家很遥远的人，如士兵、学生和旅行者。这种病被称为思乡病。

对家乡强烈的记忆激发了这种疾病，其症状包括浑身无力、没有食欲、神志不清、长脓疱、溃疡，甚至瘦削衰弱而死。到19世纪，这种疾病在欧洲成为首要的研究对象。在美国内战期间，有5000名联邦主义士兵被诊断患有思乡病，并被送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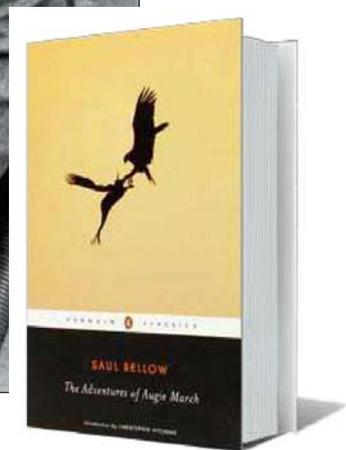
作者说：“到20世纪初，怀旧的意义变成了对过去的事物的渴望，思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是由于现代人信奉旅行和进步。今天，怀旧是充满渴求的、痴狂的时间之旅，一些气味、歌曲和照片能让我们‘回到过去’。过于怀旧会让人陷入令人不满的现在和诱人但回不去的过去之间。但经常出乎意料地唤起久违的记忆，能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连续感。所以有些心理学家强调沉浸于怀旧的沉思之中是有益的，能够提升对生存的意义的感觉以及跟他人相互关联的感觉。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劳特里奇甚至建议人们做怀旧练习，读读以前的书信，列举那些宝贵的记忆，以此来缓解焦虑、孤独感和漂泊感。中国南方的一个研究小组注意到，怀旧之情在较冷的地区更为常见，他们提出怀旧也许是为了实现提高我们的体温这一进化上的目标。”



英国学者蒂芙尼·瓦特·史密斯认为人类的情绪非常多样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和他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



“我是一个美国人”

文 / 刘晨

“我是一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阴郁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有时候这样做是出于天真，有时候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不过，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到头来，怎么也没法掩饰敲门的性质，不管是门上装有门铃，还是手上戴着手套。”

这是索尔·贝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头的第一段。我读的时

候有一种瞬间真伪莫辨的奇怪感觉，我不知道作者是在说他自己，还是在说马奇，这有点儿像庄周和蝴蝶的关系。但再一想，有什么区别吗？好比在扑朔迷离的暮光里看一场扑朔迷离的皮影戏，演的和看的都在那层皮里重了影，像被施了催眠术，刚开头已经恍如隔世。

我说的是一种个人的阅读经验，换个人读这部历险记，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云山雾罩、气喘吁吁大概都是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反应。这本书其实并不好读。作者喜欢吊书袋，

有时会突然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跳出来，跟读者谈谈心，来一段苏格拉底式对话。按某些评论家的说法，这实在有故意显摆学问之嫌。书写成这样，似乎不太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和对冒险小说的猎奇意识。正因如此，一些好东西就被我们错过了——索尔·贝娄虽荣膺诺贝尔奖（1976），却至今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同情，心智而非伦理意义上的同情。

实际上，在现代美国文学里，《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头这段不是一般的有名，贝娄的“粉丝”们都能当场

背诵，好比我们读“三国”，上来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寥寥数语，讲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一，身份问题；其二，现代冒险。放在20世纪西方大背景里看，这两件事都那么令人执迷。

先说身份问题。学界向来认为，贝娄是“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的代表作家。这个意思怎么翻译，还挺麻烦，是“犹太美国文学”，还是“美国犹太文学”，谁修饰谁，弄不清楚会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但不管怎样，作为从东欧移民美国的犹太后裔，这个身份必不可少。“犹太”几乎是“大流散”的同义词，从太古洪荒起便如此，家国一梦，世代轮回。那些百折不挠的复国运动和阴魂不散的反犹主义，根源都在这里。贝娄笔下人物，都背负着这层与生俱来的命运。即使出生在美国，即使全身心热烈拥抱美国文化，那感觉里总有一种被收养的暗影，挥之不去。所以开门见山第一句“我是一个美国人”不是白说的，它像一个了断，下了无比大的决心，把所有的条件状语都埋伏在了后面的故事里。

再说现代冒险。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文学传统，叫“picaresque novel”，流浪汉小说。它缘起于16世纪的西班牙，再往前可在薄伽丘和乔叟的故事里找到端倪。这类小说刻画的都是出身卑微的流氓英雄，他们仗着聪明机智和“我穷我怕谁”的胆量游走在腐化堕落的社会里。在贝娄笔下，奥吉·马奇几乎是个天生的流浪者，他生在芝加哥贫民区，不知道亲爹是谁，长大后从未在一个地方、一份工作或一个女人那里安顿下来。他天资聪颖，因偷书而爱上了读书，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骨子里有非常迷人的“英雄品质”：智勇双全，侠肝义胆，但又没能活出真正的英雄人生来。他不给自己任何承诺，也不问来路，只随他人计划行动。他唯一

确信的是两次掏心掏肺的恋爱，第一次追随狂野不羁的西娅去墨西哥放鹰、捕蛇、捉蜥蜴，直至彻底幻灭；第二次携斯特拉去法国，他干起黑市交易，她梦想荣华富贵，小说结束时这场爱恋正走向茫然的尽头。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找到了成功之道，因为他们目标坚定，哪怕不那么高尚，而他马奇尽管有各种机会，却没去实现，因为他拒绝落入名利的陷阱。他总觉得有“更好的命运”专为他而设，在对它的不懈追求中，他拿起了唐·吉珂德生锈的长矛冲上了逆转的风车。

“反英雄”吗？擅长文本分析的学者们是这么讲的。但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像个悖论。20世纪那场名叫“现代主义”的运动，紧踏着“世纪末”的浪花而来，过去的英雄已被淘尽，酝酿中的新传统已然“反”了，倘若贝娄的马奇属于这个传统，难道不是“反反得正”了？大流散的犹太民族本无所谓山河破碎，他的身世浮沉才愈显得似是而非，寻根太久，反成无根之叹，偏又赶上拔根而起的20世纪，这可真是一种奇葩的现代境遇，无名的双重流浪。

我不能不想到贝娄本人的生命历程。可巧今年5月，圣扎迦利·利德（Zachary Leader）的两卷本贝娄评传（*The Life of Saul Bellow: To Fame and Fortune*, 1915～1964）出了第一卷。这可能是我读过的最纯粹、最可口的文学传记。利德文风冷静，表面不动声色，内里激情澎湃，作者与其主人公贝娄仿佛有一种天生的默契，像在汪洋上表演双人冲浪。我又有了那种被皮影戏催眠的幻觉，只是这次已辨不清是几层重影。

传记讲的是贝娄人生的头半个世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0年之挣扎”：加拿大的幼年，芝加哥的童年，俄裔犹太移民大家庭贫寒而动荡的生活，少年时代的性冒险与浪漫之爱，成年后由共产党转身为托洛茨基左派革命者的政治经历，突如其来的变故，浪

迹天涯……无论事业还是家庭，他都像个临时工，只有写作从未停止。他更换着学校、工作、城市和国家，一轮又一轮地结婚、离婚，透支稿酬支付子女抚养费，同时从现实需求和情感困扰的疾风骤雨中挤时间创作。这样的人生与小说无异，彼此间的关联令人眩晕。但是利德找到了一条线索，那就是涌动在贝娄人生旅程表面下的文学冲动。作者做足了考证的功课，全书650多页，信息量巨大，但绝非一笔四平八稳的流水账，而是一部暗潮汹涌的心灵戏。它借一个沉思默想的起兴，引读者穿过无数偏僻小道，抵达豁然开朗的壮景，又循原路折返，看到路的尽头，再匍匐穿越荆棘丛莽，来想象贝娄曾检验、尝试过然后又放弃的那些充满诱惑的小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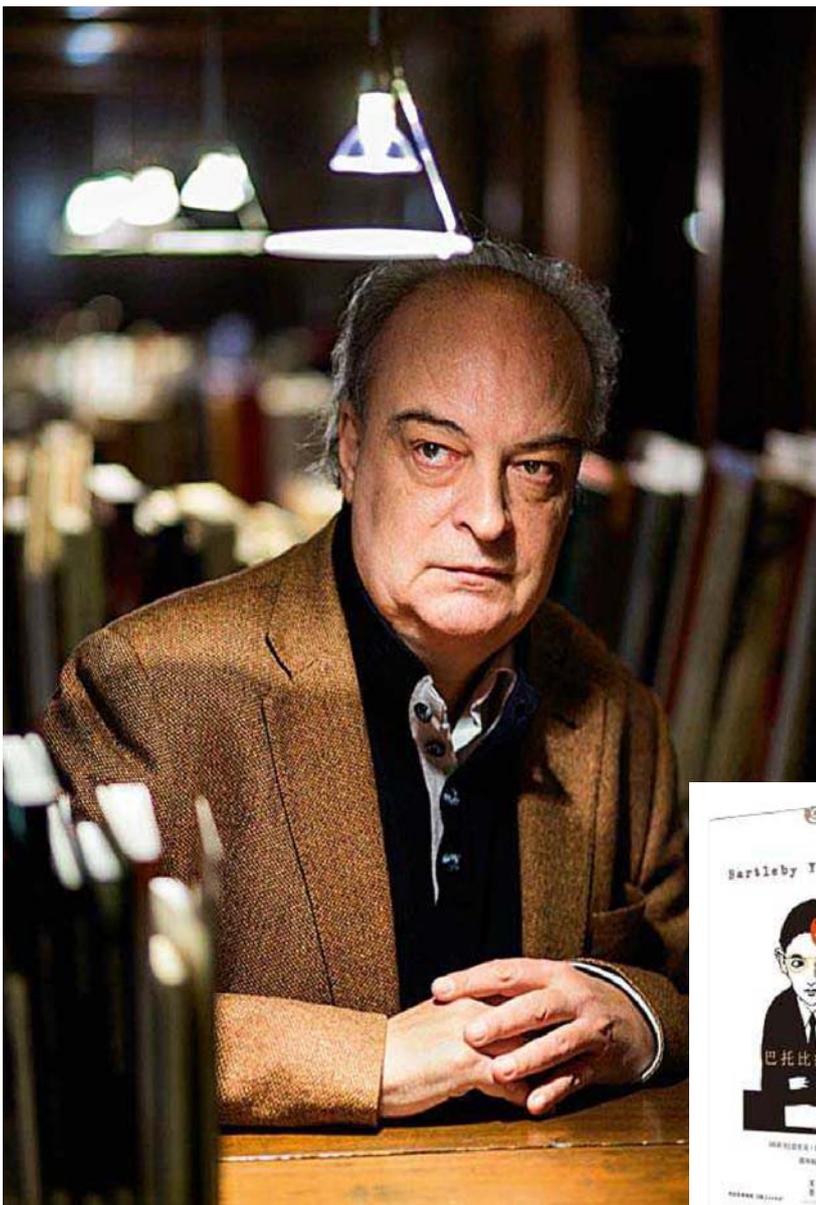
贝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的启蒙时刻，利德给了它浓墨重彩的一笔。1949年，34岁的贝娄正在巴黎写一部名叫《蟹与蝶》的小说，文思枯竭，漫步街头，忽然看到从一个水龙头里喷涌而出的水，顺着大街磅礴而去，他顿悟了：“我记得当时就跟自己说，‘好吧，干吗不暂停一下，享受这流水般的自由呢？’”就是那一刻，他想起了芝加哥儿时玩伴的一句话：“我有主意了！”这个玩伴化身成了奥吉·马奇，由此诞生了一部划时代的小说。这是贝娄的超我拔掉了门闩，如同被所罗门封印在坛中抛置大海的魔鬼重获自由，化成一束华丽的焰火喷薄而出。那个俄裔犹太青年带着他羽翼丰满的美国新身份，一下子爆发了。

尽管利德对贝娄的文学历险充满同情，却并未洗白作家的私人生活。整部评传既没有把贝娄偶像化，也没有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斥责他。人性的弱点、上下求索的狂乱内心与势不可挡的社会漩涡之间的冲突，将利德的贝娄评传与后者的马奇历险合二为一，难分彼此。假如这样的冲突存在于“现代性”的核心，那么这个时代还远未结束。■

比拉-马塔斯：一个总在写作家的作家

“只有当一个作家对文学正在终结有所自觉，我才会想去读这个作家的作品，才会觉得他的作品是有意思的。”马塔斯说，他一直在写写作者的故事，正是因为文学的失势。

记者 孙若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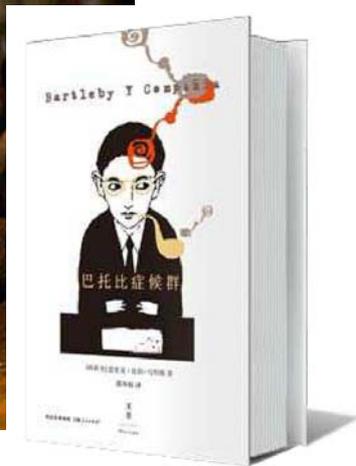


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和他的著作《巴托比症候群》

当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把这位抄写员引入自己的书里时，“巴托比”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症候群，代表那些用“不”来回应世界的作家们。在他写作的名为《巴托比症候群》的书中，患有这种“病症”的作家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千奇百怪的理由拒绝继续写作：比如他写到了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不再提笔的胡安·鲁尔福，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再写作，他总是回答：“因为我叔叔塞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又写到一个叫克莱芒·卡杜的人，他向往成为成功的作家。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了表示对他写作之路的支持，邀请老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

布罗维奇到家里吃饭。意想不到的，卡杜因为过分的紧张和兴奋，不仅整晚一句话都说不出，最后还有点像马尔伯夫年纪轻轻便在家中亲睹福楼拜风采的情形，他发觉并认定自己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从此，他不再想写作的事儿，而是开始画画，每一幅画的都是“家具”，并重复地提名《自画像》。



布罗维奇到家里吃饭。意想不到的，卡杜因为过分的紧张和兴奋，不仅整晚一句话都说不出，最后还有点像马尔伯夫年纪轻轻便在家中亲睹福楼拜风采的情形，他发觉并认定自己变成了餐厅里的一件家具。从此，他不再想写作的事儿，而是开始画画，每一幅画的都是“家具”，并重复地提名《自画像》。

马塔斯用了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历数着他眼中的“巴托比”们——一共写了86篇像批注一样的文字，或是讲述，或是点评了包括鲁尔福、兰波、塞林格、

马塔斯用了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历数着他眼中的“巴托比”们——一共写了86篇像批注一样的文字，或是讲述，或是点评了包括鲁尔福、兰波、塞林格、

格拉克、沃尔泽、儒贝尔等在内的众多在文学界中真实存在的人，以及一些完全虚构出来的作家们的作品和轶事。他们或是在创作了所谓登上文学巅峰的作品后断然封笔，或者著作等身之后，淡然渐退文坛，或者干脆在文学圈外旁观，根本就从未提笔写作过。相同的是，他们对文学有着同样消极的看待。于是，这本书看上去简直有点儿像是简短的文学评论集。

但是这些文字所批注的对象——或许是一本书——它并没有真的存在。“写到一半我才发现，我是在为一本不存在的，我想写但没有写出来的书作注，这实在很妙。”当然，他所希望的，正是让人从虚构中看到真实。他认为，这种虚构的方式比现实主义作家直接在小说中讲述一个接近于真实的故事来得更有效，也更接近真实。

马塔斯喜欢写有关文学的人和事。在他的小说中，中心人物大都是作家身份，即便不是，他们也基本都在从事与写作有关的事，故事则大都关于这些写作者与文学世界的交汇。比如，他早在1985年出版的小说《便携式文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ortable Literature*)中就杜撰了一段包括马塞尔·杜尚、乔治亚·奥基弗、阿莱斯特·克劳利等人在内的秘密文学群体的古怪经历。这是继他1973年出版了处女作之后，最先使他得到广泛认可的一部作品。

此后近30年，马塔斯出版了近30部包括小说、随笔、论文集在内的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其中大部分作品都还没有被译作中文出版。在已经译介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巴托比症候群》在内，《似是都柏林》、《巴黎永无止境》、《垂直之旅》都是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其作品、生活，作为小说中重要的血肉填充在有关从事写作的主人公的故事主线旁。

《巴托比症候群》是其中的第18部，也是相对重要的一部。它被西班牙

知名文学杂志《幻想》(*Quimera*)的读者票选为2001至2009年间10本最具代表性的小说第二名，第一名则是他的好朋友波拉尼奥的《2666》。也因此，《巴托比症候群》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使马塔斯原本局限在西语世界，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巴西等地的文学声誉扩展到更大的疆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作家，并被公认为西班牙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认为，这种虚构的方式比现实主义作家直接在小说中讲述一个接近于真实的故事来得更有效，也更接近真实。

直到马塔斯最新的作品——2014年的《不合逻辑的卡塞尔》(*The Illogical of Kassel*)，依然书写着写作者与文学——故事基本以他在2012年的个人经历为蓝本，讲了一位拿了不少奖的西班牙作家获邀与多位作家们一起参与一个艺术互动项目的经历。

他告诉我，目前他正在写作的小说同样还是关于写作者的故事，书中主人公有一段在东方的经历，那使他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世界，以至于很多观念都有了大的改变。而所谓在东方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在前不久来中国参加上海国际书展，又辗转杭州、北京等地的见闻。他说自己已经像摄影师一样在心里默默拍下了很多镜头，准备写进书里。

马塔斯说，他的作品之所以都以写作者为中心来书写关于20世纪文学的想象——他称为“想象的历史”，是因为他看到，在近20年的社会中，文学正在渐渐失去影响力。他说，文学中所对应的两个主体，作家和读者，前者就像是手艺人，在慢慢变少。至于后者，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观察——从杭州坐高铁到北京的5个小时里，他周围的人竟没有一个在读书。“我正是在描写文

学萧条的时间段，对于以后的读者，这些作品将会成为一种时代的鉴证。”

他认为，在写作中关注消极的现实，实际饱有积极的成分。“只有当一个作家能够本能地感觉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学终结的时代，才可以讲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意识不到，那么他也不是一个有趣的作家了。”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时，马塔斯甚至用了“中国有一句古话‘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他说，只有持一种危机感才能保持活力。“只有当一个作家对文学正在终结有所自觉，我才会想去读这个作家的作品，才会觉得他的作品是有意思的。”

至于他笔下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构？那些被写到的真实存在的作家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是否都有据可查？马塔斯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当他的小说在被翻译成法语时，针对他书中所引用的那些小说家们的话，做事严谨的译者曾冒着大雨到图书馆检索原文。结果译者非常生气地发现，那些相当数量的引文中，有一半确实出自那些小说家之口，但另一半，不过只是作家自己的编纂。

马塔斯向他解释说那不过是自己的写作方式。“通常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编造引文，比如为了文本的连贯性，或是增加关联性。我编造引文之后，它们就脱离了与原作者的关系，变成了我的话，成了我小说的一部分。”而后，他授予译者决定权——既可以选择直译他那些半真半假的引文，也可以按照原始的文本翻译。对他来说，译者做出选择后所构成的译本，恰恰也是对小说创作的延续。■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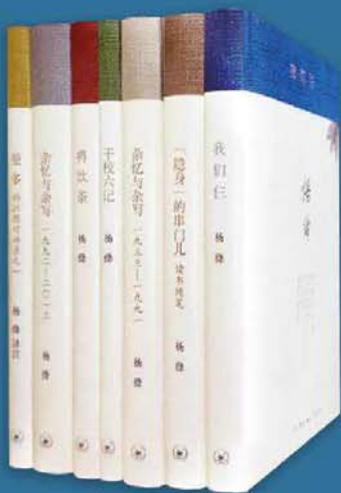


朱德庸





三聯書情



杨绛著译 七种

- 干校六记
- 将饮茶
- 杂忆与杂写：1933—1991
- 杂忆与杂写：1992—2013
-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
- 我们仨
-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珂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

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

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

——北岛

- 履历 诗选1972—1988
- 在天涯 诗选1989—2008
- 波动
- 时间的玫瑰
- 城门开
- 蓝房子（即刊）
- 午夜之门（即刊）
- 青灯（即刊）
- 古老的敌意（即刊）

北岛集



陈师傅

文 / 张蛮鱼（广东） 图 / 陈曦



陈师傅已经快 70 岁了，稍作打扮，完全是城里的时髦漂亮小老太太模样。你可以从那嘴角眉间的神情，遥想她年轻时的盛气。这盛气被大半辈子的粗粝生活打磨着，造就了她的清高、自怜、认命、不服软和突然的爆脾气——所以这是一个内心戏常常很复杂的老太太。

年轻时的陈师傅从来不觉得自己跟那些乡野村妇是一路人，她可是有资本的——漂亮，聪明，几乎是全生产队公认的，除了那些嫉妒她的粗鄙女人。这些女人在田间地头赤脚走过，从家里端来碗饭往巷子里的青石板上坐，吃完把碗往地上一搁，拍着大腿亢奋地讲着别人家的笑话和丑事，一言不合便和有宿怨的老对头在巷弄里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高声对骂——这一切都是陈师傅瞧不上眼的。年纪小小跟一群女孩子做女红，陈师傅早早就显出过人天资。她心气高，人又聪明，知道做裁缝几乎是脱离沉重农活的唯一出路，就下定决心学手艺。上世纪 60 年代买的那台上海产无敌牌缝纫机，就是家里公公里外几层地揣了八十好几块钱，大冬天去几十公里外的城里生肩挑回来的，扎扎实实上百斤的国货。那时候的钱值钱啊，在穷乡僻壤 80 块钱更是个大数目，能抵上乡镇中学老师几个月的工资。等到学好手艺出师了，人家客客气气喊她一声陈师傅——就差要递给她一根烟的时候，就决定了她在农村可以像男人一样受人敬重了。不单是乡里人敬重她，连下放劳动的知识青年们都跟她要好，说她不像是在农村的，至少看着像工人嘛。

如果看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你就会明白，在那时灰头土脸的乡下，这个匠人工种简直是被神一样供奉着。在那个大锅饭年代，陈师傅完全可以靠这个手艺赚着不少于一个壮劳力的工分，而且是体体面面地赚。哪家要做衣服，就得上门来请她，把她的上百斤上海货宝贝缝纫机挑过去，每顿都是

雇主家倾尽所能好饭好菜另开小灶。陈师傅的名头响，全家也都跟着沾不少光。就这么风光到 80 年代，开始了分田到户，陈师傅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要帮着招呼地里的活儿，裁缝活慢慢就接得少了。家里细伢饿了要吃奶，孩子奶奶常常得抱着伢儿走个十几里路到雇主家里找陈师傅。再后来，镇里城里都开始卖花花绿绿的上海羊毛衫洋布衣裳，白色的确良衬衫畅销乡里，除了白喜事，找裁缝做衣服的也不多了，陈师傅也慢慢被忘记了。只是去城里逛市场，陈师傅还是保留着一个裁缝的嗅觉，去高档的商店仔仔细细翻看那些上海来的呢子大衣外套，收好每一张印着时髦女郎的画报，默记着版型款式，买了布料回去还真就给做出来，有型有款一点都不比“上海牌子”差，洋气得很。陈师傅可以说是最早学会“打版”的那一批了。“哪像你们现在，上网什么衣裳样子都找得到？”

陈师傅说，她其实很早就想去县城盘一家裁缝店，凭她的手艺，养活一家人都没问题，而且可以像城里钢铁厂的“工人婆子”一样，干干净净体体面面过生活。但后来的日子，几乎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庄稼人过活，粗活累活什么活她都干过，最苦的时候，她要在天蒙蒙亮起，肩挑满满一担自家都舍不得吃的新收成的碾好过筛的上好大米，赶去邻近镇上的早集卖掉。有次一个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工人婆子”看上了她的谷子，压到一个最低价，叫她跟在后面把谷子挑到那六楼还是七楼的工人家里。我有时候就想，当时的陈师傅，担着空空的箩筐走出城里人阔气整洁的家时，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我没有告诉陈师傅，有个电影里就讲到以前乡下生产队的老裁缝和小裁缝，最后小裁缝走出大山，从县城到深圳，再到香港，当年喜欢小裁缝的两名知青，最后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陈师傅说她不爱看电影。她应该很早就不会去做梦了吧。✍